和延安时代

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484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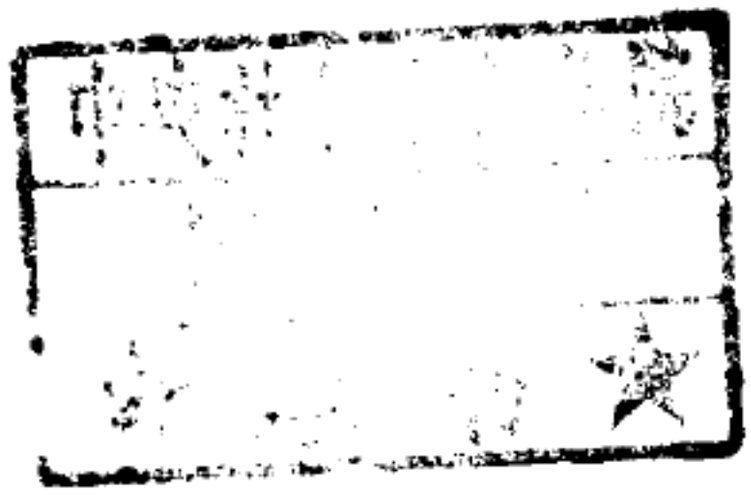
88342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和延安时代

黄士安　赵　广　王延湜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和延安时代
黄士安　赵　广　王延湜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6 插页　470 千字
1993年12月第 1 版　1993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119－6/G・4408
定　价：20.0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

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

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吸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1 日

出 版 说 明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延安时代，培育了延安精神。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组织上巩固的时期，也是领导中国革命成绩最辉煌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用“延安时代”的提法比用“延安时期”的提法更为科学，这样就把延安时代作为党的历史中的一个特定的专门问题来研究，以避免同党的通常的历史分期问题相混同。

所以用“延安时代”的提法，是因为中共中央在这个时代，长期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延安，形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个地区的名字，而主要是中国革命一个时代的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这个时代创造的丰功伟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影响。用延安命名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有代表性的，是正确的。

延安时代，通常是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算起，到194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为止，共13年时间。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便于研究、探讨这一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各种活动和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诸问题，从1935

年1月遵义会议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比较完整了。延安时代，实际上是遵义会议上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一代稳定的领导集体，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党中央在政治上达到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为了便于研究延安时代这一特定的专题对象，应按照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区分为若干历史发展阶段。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月17日——10月18日）。

（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开拓与巩固（1935年10月19日——1936年11月21日）。

（三）中国共产党打开局面走向全国，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酝酿与逐步形成（1936年11月22日——1937年7月6日）。

（四）全民抗日战争爆发，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大发展（1937年7月7日——1941年1月3日）。

（五）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1941年1月4日——1942年12月31日）。

（六）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巩固，抗日战争的胜利（1943年1月1日——1945年9月3日）。

（七）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努力制止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9月4日——1946年6月25日）。

（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6年6月26日——1947年6月29日）。

（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30日——1948年9月15日）。

（十）战略决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8 年 9 月 16 日——1949 年 10 月 1 日）。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代的结晶。延安时代和延安精神，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这部书，只是就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作些探讨。

延安精神的形成，同党政治上的成熟，同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同步的。延安精神是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生动体现。彭真指出，经过整风，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党的七大，把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总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这是对延安精神形成过程的集中说明。如果从准备酝酿算起，把延安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形态来研究，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的建立，大约 14 年的时间。

现在，党大力宣传、学习、实践延安精神。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连发表论延安精神的讲话。邓小平强调在新时期“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提出“要动员全党继续发扬延安精神”。那么，延安精神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彭真指出，延安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经验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里，重点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在延安时代总结、继承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斗争的经验，领导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凝聚而成的一种精神。延安精神是全党全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实践。

延安精神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延安精神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延安精神同毛泽东思

想理论体系，同党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研究延安精神，要紧紧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延安精神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脚踏实地，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无私奉献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精神。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学习、研究、实践延安精神，就是要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问题，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问题。依据这些基本点，对延安精神的研究可以充分展开，努力探讨延安精神特定范围内的问题，即党在延安时代所形成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对敌斗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的建设诸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党和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等等。今天研究延安精神，要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延安精神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在新的时期弘扬延安精神，应处理好继续弘扬和继承弘扬的关系。继续弘扬就是要求老同志在新的时期起新的表率作用。这是延安精神在新时期得以弘扬的先决条件。老同志在过去起了表率作用，使延安精神得以形成和发扬；今后，需要老同志继续起表率作用，延安精神才能得以继续弘扬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是仅仅从历史的回顾中、道理的宣讲中来认识延安精神，他们更要从老同志的现实表现中来看延安精神。而只有当历史的回顾、道理的宣讲同老同志的现实表现是一致的，延安精神才能产生有效的力量。继承弘扬就是要教育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喜闻、爱看、心甘情愿地实践延安精神。这是延安精神在新

时期得以继续发扬的主要条件。延安精神的学习、宣传和实践，重点要放在青年人身上，特别是中青年干部要率先带头，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学习、研究和宣传，以使延安精神深入人心，在新的时期继续发挥作用。

这部书，只是给同志们学习、研究延安精神的问题提供一些基础材料。

目　　录

序 …… **马文瑞**（1）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稳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 ……（23）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稳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23）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36）

二、中国共产党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努力 ……（54）

（一）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制定……（54）

（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加强……（86）

三、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延安精神的逐步形成……（128）

（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整顿党的作风问题的提出 ……（128）

（二）加强党内学习，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 (142)
（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发表，
党的建设的加强 …… (164)
（四）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
实事求是原则的系统阐述 …… (251)
（五）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增强党性、加强调查
研究 …… (256)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发扬 …… (287)
（一）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切实整顿党
的作风 …… (287)
（二）发扬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作风，反对主
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 (304)
（三）发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
共产主义精神，反对宗派主义以
整顿党风 …… (346)
（四）发扬言之有物的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 (371)
（五）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整风学习总结，
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党的优
良传统成为每个党员和干部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 …… (389)
五、党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系统总结，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 (421)
（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结合党的历史和路线
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 (421)

（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的召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 …… (456)
（三）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 …… (488)
六、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 (502)
（一）整党和党内民主的发扬推动着党的优良传统的发展 …… (502)
（二）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 …… (590)
七、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 …… (622)

后　记 …… (625)

序

马 文 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对近代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同时，它又总结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共产党人又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把这种精神变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精神武器，克敌制胜的法宝，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延安精神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最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团结友爱、顾全大局的精神；等等。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一致的。

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从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大约 14 年的时间。大

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41年；延安精神的基本形成；（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至党的“七大”的召开，延安精神正式形成；（三）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精神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理论政策的制定，《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延安精神的基本形成

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论证了这个问题。但那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分子，实事求是思想受到严重阻碍。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解决有关中国革命的一次会议。会议批判了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决定实行毛泽东以前提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想。实事求是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关键。1935年10月，红军主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了万里长征的胜利，到达抗日前线陕北。1935年12月，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结合对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批评了“圣经上记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并把它提高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这是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继续，也可以

看作是《实践论》的先导。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残余的影响，使党有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利用在延安工作环境相对安定的条件，刻苦地深入钻研了哲学，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作出科学的哲学总结，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发展过程、目的和真理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实践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坚决反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分裂的主观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而这个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和调查研究密切配合，加以灵活运用。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澄清了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军事著作，这些军事著作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论述战争的指导原则时写道："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如何才能得到对于一个战役的正确的认识呢？毛泽东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就是战争指挥中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内容，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还作过许多阐释和发挥，最完整的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个阐释言简意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5年，中国面临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进攻华北，决定灭亡中国；二是中国革命力量弱小。中国共产党以这两个基本事实为出发点，勇于打破“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及时正确地提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唯一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党正确地领导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热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现实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集团。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左翼集团；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他们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在这科学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等等。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广泛地团结了亿万群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一时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党和人民的关系上，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要做到为群众，就是说只有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让人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又要教育人民群众，指明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光明的前途，群众觉得有盼头，才会有劲头，有凝聚力，也才能靠得住。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向他们讲清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和利益的政策。比如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

地政策；既要改善工人生活，又要遵守劳动纪律，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劳动政策；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廉政的政策，等等。这些在经济、政治诸方面给人民群众以实惠并教育人民切实提高人民觉悟的结果，党把人民群众特别是极其广大极其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结成了坚固的工农联盟。全国特别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儿童团和民众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建立起来了。这就使人民抗日战争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正当抗日战争进行到紧急关头，消极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肆炮制和贩卖各种反共“理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宣扬“一次革命论”，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妄想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在中国实行它那个人独裁、一党专政、特务统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欣欣向荣的气象又被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走不通，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瓜分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掠夺中国财富和奴役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它们绝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这也是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了的。自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努力学习西方。他们认为西方的一些新学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其次，国内的封建势力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实现独立和民主，然后才能继续前进。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变中国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好比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发展。但社会主义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软弱无力，不能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任务，这个责任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无产阶级自“五四”登台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它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共产党），历史地形成了。

《新民主主义论》还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迄今是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但居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必须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继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新民主主义论》彻底地批判了“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指出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

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总是要失败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新民主主义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学说。它的发表，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这一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理论策略的制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发，说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了，并且能够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正如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期所指出的：“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①]这也标志着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已基本形成。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从此开始了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党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选学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联系党的工作实际和党员的思想实际，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顿了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大大地提高了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使党的思想和行动达到空前的团结。延安整风取得了极可贵的建党经验，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首先，克服主观主义，提高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员干部。延安整风以前毛泽东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②]然而，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严重地阻碍党的这一工作的开展。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另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他们生吞活剥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摘引片言只语去迷惑吓唬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

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经验主义，缺乏理论，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常常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不顾实际地到处搬用。他们局限于自己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因而也容易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思想实质都是一致的，都是将理论和实际分离。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主观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毛泽东正确地形象地把理论联系实际比作“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3]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怎样改造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使他们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4]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发出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42 年 1 月，张闻天身体力行，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 15 个月的实地调查。他的这项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的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和

提高，而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在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写道：调查研究“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项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与此同时，中央西北局、中央青委等党政军民各部门各团体也都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制定了调查研究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形成了全党范围的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纠正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对领导方法作出的高度概括。这种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

其次，克服宗派主义，提倡团结友爱，顾全大局。当时，宗派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对党内的宗派主义，一种是对党外的宗派主义。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团结。他们往往错误地对待局部利益和全体利益的关系，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

部利益。这些人往往在口头上也说尊重党，实际上却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二位。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往往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任人唯亲，作风很不正派。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况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允许违反这个原则。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这一部分同志，他们喜欢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不了解人家的长处，严重地脱离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⑤]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让人家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这样就是照顾多数，团结大多数群众一道工作。这一时期，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发展，地域不同，或是工作不同，而产生了各部分同志互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

象。这些现象，看来似乎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他强调："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⑥

第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这好比"打扫房子"和"洗脸"。1943 年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关于 1931 年初到 1934 年的这一期间的历史问题。目的是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纠正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对于犯错误与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党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毛泽东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⑦特别是王明在党内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使党的肌体遭受极大的伤害。党中央深刻地吸取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整风中对王明教条主义错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否定一切。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危害是极大的。但这一时期的错误，对于 24 年来在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

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部分现象，而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的。另一方面，党中央在否定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强调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整风中对于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用着重个人责任，简单打击的办法，而是采取了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式，既具体地分析其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找出他们所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改正错误的办法，又指出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对于任何过去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以恳切的同志态度，帮助他们去了解和改正错误。正如毛泽东在 1944 年 12 月 1 日致陈毅信中所说，“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只要“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8]上述这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法，使广大党员干部振奋了精神，明确了方向，达到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共同继续前进的目的。

第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延安整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毛泽东对这一方针做了详细的解释：“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

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9]按照这种精神，每个同志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认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最后写出总结，确定努力方向。其次，提倡同志之间的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改正错误，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开展自我批评。整风学习的自觉性，要具体地表现为严肃地解剖自己，通过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觉悟，用正确的思想自觉地克服错误思想。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始终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意见，统统摆在桌面上，从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鲜明对比中，对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强调在批评别人的错误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以便更利于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最后在对人的处理上持慎重态度，不轻易给以纪律处分。根据整风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一方针概括成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正确地体现了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公式成为党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延安整风运动还反对了“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正如毛泽东1953年同

薄一波谈话时所说："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10]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倾向的模范，它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面。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1]毛泽东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这一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三、执政党理论的提出，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走的道路和所处的国情，深刻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针对胜利后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主要是：运用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脱离群众；等等。这不仅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在新形势下对延安精神赋予了新的内容。

首先，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

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⑫人民民主专政，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决不是说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恰恰相反，不但不给他们民主，还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为什么要这样呢？道理很简单，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分子还存在的条件下，国家专政职能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⑬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党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

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4]由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长期的压迫，全国先进的现代性的工业只有10%左右，而落后的手工业和农业则占90%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建设成现代工业化国家，要比工业先进国付出更多的代价，要困难和艰巨得多，路程相对来说要长得多。为了早日实现这个大目标，毛泽东要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鉴于党的中心工作由战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发出努力学习经济建设工作的号召。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15]

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能否廉洁自律，戒骄戒躁，保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党兴衰的关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预见到了执政党条件下党风建设的艰巨性以及党风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求全党同志戒骄戒躁，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把持的国民政府用停发经费和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共产党人和解放区军民困死。正如毛泽东在描述1941年、1942年

解放区军民生活情景时说的，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大极了。这种艰苦的环境，迫使共产党人必须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本色。通过大生产运动和实行奖励廉洁、禁绝贪污的措施，发展了生产，得到了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密切了群众关系。延安出现了军民同庆，大家欢喜，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产党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艰苦奋斗作风，它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它是延安精神的特色。毛泽东在谈到艰苦奋斗的作用时自豪地说："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16]毛泽东还注意吸取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并用它来教育党员。1944 年 3 月，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读了以后深受启发，把这本书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党员干部学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17]。党在执政以后，转变了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艰苦复杂环境，有些革命意志薄弱者会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腐败下去。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18]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

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向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发出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著名电报，他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

党中央还注意到执政党内部的团结，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结论中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毛泽东上述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延安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关键，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延安精神，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它给了人们这样一种信心，只要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她一切为人民，没有自己的私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挑起了抗日大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千百万群众成为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屠杀、欺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今天，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经济搞上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正在全力以赴地带领人民为之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局，任何人都要顾全而不能破坏这个大局。延安时期，大批青年从国统区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奋斗，出生入死，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体现了人生价值。今天，生活在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好环境中的青年，不能只图享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保持安定的社会环境，扎扎实实地工作，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体现人生价值。延安精神形成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即国情不同。照搬照抄别国的东西，都是要失败的。延安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这就要求老同志不忘延安精神，并将它传给下一代；年轻的同志要学习了解研究延安精神，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延安精神世代相传，永放光芒。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1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2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18—81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2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94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938页。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27—828页。

⑩薄一波：《崇敬的怀念》，1981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

⑪《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94 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480 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476 页。

⑭《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428 页。

⑮《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480—1481 页。

⑯《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188 页。

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42 页。

⑱《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438 页。

⑲《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2 页。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中央稳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稳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

1935 年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省遵义城举行。会议至 17 日结束。出席遵义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红军总部和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着重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的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

助者。

遵义会议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一）政治路线的开始端正为加强党的建设创造了根本条件。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极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军事指挥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是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政治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为以后全面纠正这一错误政治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二）中央稳定的集体领导核心的形成，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集中表现。遵义会议解决了组织问题，实际上免除了执行错误路线，进行错误军事指挥的博古、李德的领导职权，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在内的集体领导。这是党的正确路线得以确立和贯彻的组织保证。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集体领导核心，党的兴旺发达的新局面就逐步打开了。（三）党内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为全党的团结奠定了基础。在红军长征的紧急局势下，党和红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遵义会议后，红军逐渐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紧密团结密切相关。（四）创造了党内斗争的范例。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展开全面的批评。这是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进行活动的，它对中国革命危害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充分认识其真实面目之前，贸然开展全面批评，只能影响全党的团结。因此，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另外，在纠正军事和组织上错误的同时，严格区别推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和一般执行者，只集中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对其他人采取耐心等待，争取其转变立场的作

法，就是对博古和李德也作了妥善安排，正是由于这种正确而适度的党内批评，不仅使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而且为以后在条件充分具备的时候，彻底清算王明路线的错误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五）发扬独立自主精神。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的会议。从此开始，党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整个局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遵义会议为党的建设提供的基本经验十分宝贵，在以后党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35 年 1 月 19 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并规定了必须注意的事项：严格政治纪律，执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坚决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

1935 年 1 月 27 日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俘就义。在赣东北怀玉山，因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在狱中方志敏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斗争，并写下了《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著作。8 月 6 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1935 年 1 月 29 日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毛泽东领导红军向古蔺、叙永前进。

1935 年 2 月 3 日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朱德发布红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 4 日战斗部署的命令。命令围攻叙永县城的红军迅即改向滇省扎西方向集中。在

向扎西进军途中，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叙永城郊向群众筹粮时，红军给群众及后续部队留下了这样的条子："老伯，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工农红军，因为两天没有吃上饭，路过你这里，你又不在家，所以把你的粮食吃了一些。现在按市价给你留下了钱，请查收。并望你能原谅。"有的还给后续部队留言："同志们，这家老乡的粮食，已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

1935 年 2 月 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讨论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 5 位同志组成，项英为主席，统一指挥军事斗争。

1935 年 2 月 5 日前后　中共中央决定洛甫在全党负总的责任。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1935 年 2 月 8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常委开始分头在各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1935 年 2 月 9 日　中央军委进驻扎西县城，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红军在扎西驻扎 11 天之久。时值农历春节期间，红军一到就帮助群众大搞卫生，清除街道上的污泥浊水，铲除积雪、垃圾。夜晚不少战士在帐篷中过夜，不料天降鹅毛大雪，积

有一尺多厚。不少用篱笆搭成的帐篷被积雪压塌，被狂风吹倒。老百姓纷纷来到宿营地，请红军战士到家中躲避风雪。红军战士为了不打扰百姓，婉言谢绝邀请，重新支起帐篷，坚持在雪地宿营。扎西各族群众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军队，感动得热泪盈眶。

1935 年 2 月 10 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央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要求缩编中央红军充实连队的战斗力，也可选拔一部分成立游击队，在地方上进行活动。红一、三军团各编四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三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红一方面军共 16 个团。

1935 年 2 月 18 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在发布的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从胜利的战斗中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已迫切的放在每个政治工作人员的面前"，因此要求每个政治工作人员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加强政治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某些散漫、军风纪松懈，个别干部责任心不强，存在军阀残余等不良现象，指示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提高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等等。指示要求对以前沿途寄养在群众家中的伤病员，属于哪个部队的，哪个部队必须派人去慰问，解决他们的困难，伤愈归队的，连队中应进行欢迎和教育。

1935 年 2 月 18 日　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西岸的太平渡。经过深入工作，群众自动帮助红军渡江。工兵连以每只船预付 20、30 块白洋的办法，征集了 20 多只船；并用预先作价付

款的办法征集了门板、楼板、杉杆等桥面材料；较快地在太平渡的沙溪渡口、九溪口、风溪口、老鸦沱和二郎滩等地架好浮桥，保证主力部队按时过江。

1935 年 2 月 18 日至 21 日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向东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1935 年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项英及中央分局。中央指出，行动前必须将行动的任务及目前的形势在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解释与动员，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应取之于活动地区，干部应分散到游击区、被占领区、白区。应对干部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必须周密的建立秘密交通网。“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的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的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1935 年 2 月 24 日　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濯田区水口镇小彭村被俘后就义。在狱中，无论敌人采取刑讯逼供，还是软禁厚待，多方诱降，都未能动摇瞿秋白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最后由蒋介石下密令予以处决。6 月 18 日，瞿秋白手挟香烟，慢步走向长汀西门外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1935 年 2 月 28 日　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黄昏前红军对守敌发起总攻击，当日深夜，军委电令红一、三军团乘胜猛追逃敌。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天没吃饭的饥饿疲劳，不顾天黑雨路难行，高呼着“冲呀！杀呀！猛打猛追呀！敌人坍了呀！不让敌人逃跑一个呀！开展缴枪捉俘虏比赛呀！把敌人追到乌江喝水呀！”等口号，

对敌穷追不舍。红军将抓获的近3000名俘虏，集中到遵义城，组织为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3元。并对其进行政治教育，说明红军的宗旨和性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欢迎他们当红军。对于俘虏中的中上级军官，朱德总司令亲自召集谈话，进行教育。对于不愿留下当红军的官兵，一律发给路费，护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80%自愿当红军，被释放的官兵也感谢红军的优待。这就既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红军虐待俘虏的谎言，又传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1935年3月1日　朱德指示九军团召集群众祝捷大会。朱德在电报中指示：庆祝5日内连克桐梓、遵义的胜利。遵照指示，各部队纷纷举行祝捷大会。广大指战员进行了遵义会议前后的对比，有不少人亲切地把毛泽东叫做当代的“诸葛亮”。

1935年3月4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指挥向黔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的作战行动。5日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一、三军团后方部队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1935年3月4日　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兼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牺牲。在会昌河突围中，贺昌身负重伤。国民党兵高呼着“捉活的”向他冲击。贺昌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壮烈牺牲。

1935年3月11日左右　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1935年3月21日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中央红军分别经

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935 年 3 月 21 日　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江西大庾英勇就义。牺牲前作诗《带镣行》："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还给亲人写下遗书。在给兄嫂的遗书中说："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并告诉其子，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要自食其力，要晚婚等。"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1935 年 4 月 30 日—5 月 9 日　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中央军委总部进驻寻甸县柯渡，部署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5 月 3 日晚，红军中路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占领禄劝县皎平渡并偷渡成功，至 9 日，红军主力利用 7 条渡船，全部渡过金沙江。渡江期间，红军严守渡江纪律：一切渡河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得稍有违背。红军还严守群众纪律。对于帮助红军渡江的 30 多名船工，优给工资，每天日夜工资现洋 5 元。且日夜进餐 6 次，每天杀猪。而指挥渡河的红军指挥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红军渡河以后，把船毁掉，考虑到船夫的生活暂时没有出路，每人除工资外，又给现洋 30 元。大部分船工深为感动，而愿意随红军入川。5 月 5 日至 6 日，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从会泽以西的树

节、盐井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同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 年 5 月 1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铁场举行。会议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进一步阐明了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5 月中旬　周恩来强调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红九军团在西昌地区向中央上交几十匹骡马，几千块银元等财物。后来，周恩来表扬说："你们九军团单独行动这么长时间，在后面掩护中央，掩护主力顺利北上，不但没有受挫折，还扩充了队伍，增加了钱粮。中央正缺马匹、钱粮时，你们就送来了，真是雪里送炭，你们干得好，有功劳。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1935 年 5 月 22 日　朱德强调红军要做好民族工作。在彝族地区，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当日，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叔侄饮血酒结盟。由于正确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在彝族同胞协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于 24 日占领大渡河南岸安顺场。

1935 年 5 月 25 日　红军强渡大渡河。红一军团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熊尚林、曾会明、刘长发、张克表、郭世苍、张成球、张桂成、肖汉尧、陈万清等十七名勇士，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和国

民党军的阻击，强行渡过了大渡河。红一团随即控制渡口。

1935 年 5 月 29 日　红军飞夺泸定桥。红一军团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连 22 名战士，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 12 颗手榴弹，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泸定桥东桥头敌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攻击。紧跟其后的是第三连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每人除携带武器外，还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红军胜利占领泸定桥，并冲入泸定城内。后续部队紧跟入城，攻占泸定城。至 6 月 2 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天险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得到奖励：每人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1935 年 6 月 2 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渡过大渡河后政治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六月政治工作之中心为：（甲）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战斗力，为此：1. 应向干部及红色战士广泛的解释渡过大渡河胜利的意义，为着创立新苏区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要使全体指战员了解，只有战争的胜利消灭进攻我们的敌人，我们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在这解释之中，继续并深入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偷安放心情绪。2. 政治部应动员全部力量在每个战斗之前进行战斗鼓动及准备工作，作战时的政治保证及战后部队之迅速整理。3. 提高部队中的军事技能，特别是新战士必须会同指挥机关确定加强军事锻炼的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在连队中进行号召，养成一定数量的特等射手、机关枪手、手榴弹手。4. 巩固部队首先是与疾病现象斗争。（乙）将地方工作提高到它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主要的工作的高点。指示对扩大红军、检查纪律、组织和武装群众、争取俘虏、瓦解白军等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1935 年 6 月 7 日　刘排长千里归队。红九军团攻占天全。在

天全休息的一天中午，一个衣衫褴褛，自称是无线电14分队的同志，一定要见九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见面后，袁光认出是无线电队运输排刘排长。他是因为在贵州得重病而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病愈后开始了只身追赶部队的艰难历程。没有武器，没有一分钱，他只有一颗从军帽上摘下来的红五星和一颗一定要找到红军的赤诚的心。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他躲过了敌人的重重盘查，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徒步跋涉两千里，终于在川康边界赶上了自己的队伍。“刘排长千里归队”激励着红军战士去夺取新的胜利。

1935年6月8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军委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号召“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1935年6月10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作指示。总政治部强调，野战军为求得迅速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苏维埃运动，必须以最大力量坚决克服前进路上的粮食困难。首先进行政治动员与下列工作：（一）各连队须于10号上午开会解释，备足7天粮食的意义。每个红色军人须有决心在困难中渡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最后紧急关头，完成历史上的光荣任务。（二）动员每个指战员、杂务人员，均须亲自参加收集粮食并负责携带，以竞赛完成和超过7天规定，政治人员更须以身作则。（三）尽今日一天之力，搜集谷米杂粮，碾谷工具须有计划分配使用，杂粮可做成饼，猪牛肉可烤干，盐应尽量补足一月。（四）动员减轻行李包裹及雇请临时夫子背带粮食，战斗部队除先头及后卫外，可以一部分人挑米，一部分背枪。

（五）粮食使用应极端节省。（六）责成各级首长及政治部（处），须于今晚负责检查各伙食单位是否依令补足粮食，不足者须连夜完成，以后更须随时检查缺数，并督促补充。

1935 年 6 月 12 日　红军翻越夹金山。红一方面军开始翻越宝兴县西北的夹金山。夹金山海拔 4500 多米，终年积雪。由于山高缺氧，不少人牺牲，其中多为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和炊事员。炊事员背负铁锅爬山，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为了抢救战友，他们在最缺氧的山顶上停下来做鲜姜辣椒汤，红三军团的两名炊事员，正是在把热汤递给别人的时候，倒下牺牲的。

1935 年 6 月 12 日　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征服大雪山，到达懋功县达维，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1935 年 6 月 13 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总政治部指出，我们先头部队已与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络，各军团政治部应即进行：（一）迅速传布已经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捷报，提高红色战士情绪，鼓动不掉队，不落伍，不怕粮食困难，注意卫生，严整纪律，迅速争取与四方面军的全部汇合。（二）解释两大主力的汇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克服以为汇合后可以放下枪弹，安心休息的情绪。（三）在部队中发动与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娱乐，准备礼物，去会亲爱的弟兄。二师应即进行与四方面军先头的联欢。

1935 年 6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声

明："现在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5 年 6 月 16 日　红一、四方面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到达懋功达维镇，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当晚，红一、红四方面军举行热烈的会师庆祝大会。

1935 年 6 月 18 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赤化川陕甘计划之下的战斗任务大纲。总政治部指出："要完成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的任务，基本上还是要依靠我红军战士的勇敢作战，打胜仗消灭敌人。因此，我们与四方军会合后，不是可以放下枪安心休息，而是要战斗！"

1935 年 6 月 20 日　朱德等要求红军节约粮食。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团负责人：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稀一干。

1935 年 6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小平、林彪、彭德怀、邓发、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明确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向松潘与胡宗南部作战，首先占领甘南。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行动，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这一战略方针。18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1935 年 6 月 29 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松潘

战役计划。军委并命令红一、红四方面军组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左路军以林彪为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率16个团向卓克基、壤口、噶曲河、色既坝前进。中路军以徐向前为司令率10个团经马塘、墨洼向黄胜关前进。右路军以陈昌浩为司令率12个团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8个团在岷江东岸，何畏率4个团在懋功、两河口、抚边，箝制敌人。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前进。

1935年6月29日　中共中央着手解决红军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为尽快解决红一、四方面军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任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底至7月上旬　红军到达黑水县芦花。两河口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北开进。这是一次困难很大的雪山地区行军。这一带雪山横亘，道路崎岖，河沟纵横，气候多变；这一带反动土司的反动武装时常放冷枪，扰乱、阻击红军前进；这一带藏民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欺骗和胁迫，逃匿一空，红军严重缺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7月初从两河口出发，经过大板村、黄草坪到木城，翻过长征途中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又经刷经寺，翻越海拔4800多米的大雪山——长板山，于7月上旬到达黑水县芦花。

1935年7月1日　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张国

焘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并以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想再向西退却。同时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

1935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制定筹粮政策。周恩来、朱德、洛甫发布中央决议筹粮政策，规定：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其它应照价收买。

1935年7月18日　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会后，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向各军团首长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1935年8月1日　八一宣言发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建议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

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为民族生存而战。“八一宣言”初步克服了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的明显转变。

1935年8月3日　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拖延，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半月之久，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 潘地区，薛岳部同胡宗南部靠拢，《松潘战役计划》已无法执行，中革军委于本日改定《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 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1935年8月4日至6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放在红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为此，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会议强调，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坚决同一切反对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会议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与指挥，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1935年8月上旬　红军编成左路军与右路军。为执行《夏洮

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右两路分别从克卓基和毛儿盖出发，经过草地北上。

1935 年 8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一报告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为实现北上方针，“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会议决定左路军随右路军行动。

1935 年 8 月 20 日　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指示指出，在过草地之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准备。特别在毛儿盖，要动员割麦子、做草鞋，准备羊毛、皮子做衣服。并要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 年 8 月 21 日　红军开始草地行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草地行军。草地是一片茫茫水草，人迹罕至，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带。饥饿、泥潭、雨雪夺去了大批红军战士的生命。红一团一营的一个班，在大雨中露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全部停止了呼吸。但是，这支英雄的队伍，

上至58岁的徐特立、52岁的谢觉哉、50岁的林伯渠、49岁的董必武，下至十几岁的红小鬼，抱定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念，发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深厚的无产阶级友爱精神，终于战胜困难走出了草地，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创造了世界行军史上的又一奇迹。

1935年8月底　红军包座战斗获胜。红军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一个团扼守。胡宗南得悉红军北进消息后，急调其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之漳腊驰援包座，企图堵截红军。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红一军和红三军在长征中减员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第十师承担攻打包座的战斗任务。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30日战斗打响。虽然刚走出草地，指战员们体力消耗很大，但打起仗来个个勇猛。至31日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激战中，红四军第十师长王友均牺牲。包座战斗，红军毙伤国民党4千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各种枪1500余枝（挺），电台1部。这一胜利，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5年9月3日　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于8月15日从马尔康马塘、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县，过草地，于8月下旬抵葛曲河边。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部队不能北渡，于9月3日致电中央，决定自9月4日起，左路军于三日内全部退回阿坝；并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回击松潘。朱德、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行径，坚持按原定计划和已抵达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但张国焘一意孤行。

1935年9月9日　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立即北上。

1935年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出席。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二、三纵队。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五人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1935年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要求率左路军北上。中央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团结与一致。”电文再次要求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并说明中央率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9月18日中共中央到达哈铺，又等待7天之久，但张国焘毫无悔改之意。

1935 年 9 月 15 日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委于 7 月 15 日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于本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16 日同陕甘、陕北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转战中牺牲。17 日，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三个师，共 7000 余人。同时，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为陕甘晋省委。红十五军团一建立，立即投入反击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的斗争。10 月 1 日取得劳山战役胜利，接着主力南下，又于 25 日攻克榆林桥，有力地保卫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部署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 年 9 月中旬　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会议通过分裂党的决议，声称：“目前的国内形势是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 是利用川、康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张国焘在会上威逼朱德、刘伯承反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朱德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

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此后，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中，既坚持原则，又讲大局，讲团结，采取灵活的态度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并尽力保护一些同志，使其免遭迫害。

1935 年 9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决定把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革命大本营。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进入藏民聚居地区。由于藏族上层反动分子造谣和威胁，藏民早已藏匿粮食等物，躲入山林。在吃住遇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仍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房门关闭，就在屋檐下宿营，遇到大雨，只好顶着被子过夜。没有粮食只好找野菜、野果充饥。有的连队找到羊只杀掉吃了，就把羊皮抚平放在地上，旁边写上纸条，放上银元；有的割了地里的庄稼，就在地头插上木牌，写明收割粮食的数量，放上银元或留下借条；有的使用了藏民的锅灶，离开时把锅洗刷干净，并留下致谢的纸条。这一带是原始森林区，时常暴雨如注，红军北上，大都要经过深山密林，隘关栈道，行进十分艰难。红军通过藏民区，还要处处提防藏族上层中反动分子进行的袭击，几乎每天都要牺牲几十名战士。有时碰到袭扰而必须还击时，为了不误伤山林中的藏族群众，只好朝天放几排空枪，驱散丛林中的伏兵，又继续前进。9 月 16 日，各部到达腊子口西南的黑拉、刀扎里、康多、里朵一带，才基本上脱离了藏民区中的危险地域。9 月 17 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 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27 日占领榜罗镇，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

局常委会议，进一步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行进，把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革命的大本营，放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1935 年 10 月 5 日，张国焘公开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东南的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中央主席”；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朱德不同意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做法，耐心劝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张国焘对朱德的告诫置若罔闻。

1935 年 10 月 19 日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吴起镇，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通渭榜罗镇提出的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正式作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决定。会议还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要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和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要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 11 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并开始为实现中共中央新的战斗任务而艰苦奋斗。

1935 年　陈云对长征精神的概述。在长征期间，陈云根据遵义会议的精神，先后发表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上旬)、《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1935 年 6 月 5

日)、《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 年秋)。在这些著作里，陈云详细地记述了和论证了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创造的生动感人的长征精神。

一、长征中，工农红军从上到基层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陈云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红军歌曲中所唱的："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正多"。他说明了保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红军在作战的前夜，每连的党团员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天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后补者，也正因此，所以红军部队极不易击溃。陈云用生动的事例说明党的领导得以坚持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党领导下，红军是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集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确因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切实有效的教育工作(在当时条件下是来不得一点形式主义的)，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曾受党的专门教育，在红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红军的新兵，大半依靠红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分子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团员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没有懊丧呼号的，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陈云以十七勇士渡过大渡河的壮举，生动地说明了红军的士气高昂和共产党员的奋不顾身的行为。红军仅用两只船，挑选十七名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枪弹声中，驰向河的对岸。驱逐

敌军一个营，占领敌垒。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精神，先锋作用，是国民党军队和其他一切军队都不可能具备的。

二、长征中，党和红军切切实实为人民，人民群众真诚地拥护和帮助党和红军。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之所以不被击败，反而日益壮大，是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他认为，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护党和红军，其原因：一是党和红军能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实际的利益；二是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搞得好；三是党团员和红军战士有严明的纪律和模范的作用；四是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残酷压迫、奴役和剥削，在鲜明的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陈云用大量的事实，论证这方面的表现。

陈云首先回顾江西红色区域的情况。他说，党和红军在那里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长久，正是由于当地民众极力帮助的原因。后来，由于领导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使江西红色区域的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部分游击队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游击队和群众联系的薄弱。由于游击队常常仅仅注意到军事的行动，而轻视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不能取得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和参加，而使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挫折。

他说，红军之所以能从江西突破敌军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当红军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因为过去是毛泽东、朱德活动的区域，人民群众深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见到红军这次到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行军时，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湘南农民所以能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半由于共产党的活动，半由于

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的缘故。当年毛泽东、朱德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诈贫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贫苦农民对国民党痛恨到了极点。

陈云指出，当红军进入贵州后，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拥护红军的主张，不仅因红军活动的结果，也由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的压迫，不是外地人所能想象的，军队抽丁，苛捐杂税，勒种鸦片烟苗，使农民的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这次红军入黔，国民党军阀侯之担已勒收两次"剿赤"捐。国民党军队既不能卫民反是害民，此实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陈云深感云贵川三省人民大众生活实在太苦。四川会理的居民莫不怨愤国民党川康军阀刘元塘平日种种的压迫：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给陈云印象深刻永远不忘的，是桐梓县城的贫富悬殊的鲜明对照。桐梓县是黔北入川的门户，县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余。桐梓县为贵州历来该省党政领袖的家乡，因此，有美丽堂皇的洋楼数十座。这些洋房，都属贵州历年来的军政要人。而在洋房之旁，都有无数简陋的草屋。军政要人的门前有汽车，可以来往于遵义及川边，而贫民则背负背斗，终年辛苦而不得温饱，贫富之分，宛然如画。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则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财物分给民众。加上党和红军有严明的纪律，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使红军士兵遵守，每个战士的一举一动，都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买卖公平，钞票兑现，从不扰民。在这种情况之下，红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欢迎。如红

军进驻遵义城时，商民不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旗上高书欢迎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朱德是在欢迎声和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的。这次长征红军入川，沿途不知经过多少困难，但红军有人民群众的帮助，所以没有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红军者有几万人。

陈云由此得出结论，党和红军所以得到民众帮助，不因红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红军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不仅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分给居民。民众感到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

陈云在长征中，还对党联系、教育、组织、引导群众的一整套群众路线作了总结。他指出，红军应结合当地群众的有利形势，要去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把斗争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形式。第一，在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上，陈云指出，首先需要地方党和游击队去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的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用群众心坎内的要求鼓动群众起来为这些要求而斗争。这种群众的要求，不仅仅是我们平日所了解到的和笼统的，如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抽丁、派夫等等，而必须是当地最大多数的群众眼前的反对某一种捐税、某一种压迫的要求。我们只有提出了这种具体的口号，而且充分地说明这个口号的理由，使群众充分的相信这个口号是他们必需的，而且可以胜利的，只有真正进行了这种具体工作，使我们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才能动员群众为着这个口号而坚决斗争。只有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起来斗争了的时候，我们才能逐渐的领导群众走向更高的斗争。第二，在群众工作的策略上，陈云指出，我们能否组织和掀起广大群众的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能否扩大斗争的范围，能否真正把握住群

众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就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和保证这一统一战线内部的党的领导权。他说，为了争取领导，必须用我们的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拥护，同时组织斗争中的群众，这样把运动的领导权取到我们手上来。这样做，也就有充分的可能逐渐使群众脱离那些投机的不可靠的分子，而迅速站在我们领导之下。第三，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陈云强调，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应该估计到群众中政治觉悟程度的不同，不必立即在群众中组织工农红军游击队，应该灵活些。依据当地群众运动的经验和群众的要求，例如，可以先大大地发展抗捐军的组织。在组织抗捐军时，必须纠正关门主义错误（例如在冕宁召开千余人的大会，四五百名群众要求报名加入抗捐军，而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了 50 余人）。陈云说，抗捐军应该是群众的武装组织，而且要使其真正成为能够作战的群众武装，但是它不能脱离群众运动而去招兵买马地组织队伍。只有把抗捐军的组织扩大成为群众运动，才能在运动中锻炼出更勇敢更觉悟的、能够脱离生产的分子来组织作战的队伍。必须注意到，组织抗捐军同时是组织群众的方式之一。第四，要使领导干部具有在各种环境下独立工作的能力。陈云说，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创造红色区域的任务，就要组织群众和灵活的运用策略，同时，还要估计到游击队常常可以得不到上级按时的领导，而必须能够在各种顺利的、困难的、复杂的环境中独立的工作，这必须使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具有各种才能。而这种才能必须给以培养和教育。游击队在出发以前，至少对于领导干部必须使其了解：（一）产生中国工农民主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和目前革命形势的存在；（二）发动和领导群众的策略及工作方法；（三）怎样组织党、发展党和领导党；（四）游击队的

必要的军事知识。只有了解了上边这些问题，才能使游击队在政治上坚定起来，在运动的发展上措置裕如。第五，在组织上要十分坚强巩固。陈云说，要使游击队能够担负起这样伟大的任务，不仅必须给以上述的教育，而且在组织上要十分坚强巩固而能够去教育群众。陈云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游击队内党的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同战斗员共甘苦，这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二是游击队必须彻底纠正看不起当地新战士的倾向，必须努力地吸收他们到游击队中来，而且要培养和吸引他们逐渐担负中下级的领导，因为这些人是游击队去接近群众、教育群众的桥梁。

三、长征中党和红军有很高的工作效率和很强的组织能力。陈云用事实说明红军办事之敏捷。如红军进遵义城第二天，被服厂、修械所、粮食厂都已开办。新兵的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总卫生部所有的伤兵约300余人，在这里休息期间，有8/10医愈出院。

陈云用红军渡金沙江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红军在各方面组织能力之高之强。红军渡过金沙江仅凭6只破烂的船，其重要原因，则是红军对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红军总司令部及中共中央派有共产党高级干部组成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都必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的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每只船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号数。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还有一名船上的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

军之对于服从命令之严，是国民党军队所不及的。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也必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得稍有违背。红军的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还表现于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 18 人，后增至 27 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是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产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先给工资。每天日夜工资现洋 5 元，且日夜进餐 6 次，每次杀猪。而共产党指挥渡河的人员，则每餐的菜蔬只是青豆。红军渡河以后，把船毁掉。考虑到船夫的生活暂时没有出路，每人除给工资外，各给现洋 30 元。因此船夫中大部分人对红军有好感，而愿随红军入川。红军的人枪由船渡过金沙江，同时也把全部军马跟于船尾游泳渡过金沙江。因此，红军自豪地说，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陈云认为，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办事敏捷，有很高的工作效率，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有严格的纪律，这是区别于国民党的一些重要特征。

四、党的领袖和党的各级干部的德才兼备，是长征精神得以形成、发扬和光大的重要条件。陈云指出，红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并在各种实践的磨炼中，养成了能战胜各种困难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和红军中有一些领袖，非但敏捷，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的首创者，在国民党军队不断围攻和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形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朱德不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的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的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中的黄埔学生很多和周熟悉，周恩来的勇敢、毅力和办事精神，

黄埔学生对他至今仍有好感。红军中的高级指挥人员，如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和政治问题上，对共产党有坚定的信心，是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陈云进一步指出，这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不但有坚定 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超的才能，在日常生活及其品德方面，也堪称楷模。陈云在这里和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官长作了鲜明的对比。他指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一个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不要说师长军长了。但红军军官则相反，红军军官的日常生活，确是和士兵同甘共苦。而且红军领袖和士兵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和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的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任何军队所没有。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和士兵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陈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袖的品德及办事精神，是现世国民党及其军官望尘莫及的。他举几事为例说：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没有听说红军军官有贪污和克扣军需者。他又以林祖涵、徐特立两位老人的模范行动为例。林老为红色区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徐老为教育部副部长，在长征中，将马送给伤病员，自己步行。林、徐两老的洁身自好、愈老愈壮的精神，是南京政府的要人无法相比的。陈云还特别指出一件事，认为非但国民党军官所没有，而且为常人所不及的，就是赵博生、董振堂两人。他们是西北军孙连仲部下的高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红军。赵、董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一到红色区域，就将十几年来各人所蓄的七八千元，全数捐给中共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及牺牲

个人的精神，和国民党贪污犯法、假公济私的官员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五、长征精神坚定了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对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充满信心，充分乐观。陈云指出，中国革命运动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极为迅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成为中国的一支强大力量。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现在成为燎原之势。陈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反动派们搞什么“剿共”和消灭共产党的活动是必然要失败的。

六、陈云概述的长征精神，是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后，逐步形成的。长征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纠正自己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以后又发展成为延安精神等等各种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扬，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倡导的创业精神。90 年代初，当外国的一些将军深入考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79 师以后，将军们深有体会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不但精通军事，而且个个很有政治头脑”，认为“中国军队是目的最明确的军队”，“他们对祖国的奉献，为整体的事业而牺牲的精神，是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无法相比的。”

二、中国共产党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努力

（一）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制定

1935 年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肃反等情况的汇报。在研究他们的汇报后，认为 1935 年 9、10 月间西北革命根据地在肃反中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逮捕，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随后，中央成立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在秦邦宪指导下审查肃反问题。11 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 平反大会，公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释放，分配工作。陕北军民为此欢欣鼓舞。刘志丹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并表示不计个人恩怨，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与此同时，党中央还解决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遗留下来的问题，为 300 多名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AB 团”、“反革命嫌疑犯”的同志摘帽平反，受害同志深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所感动。

1935 年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红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会议还决定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洛甫、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到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

1935 年 11 月 6 日　中央红军同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把大批武器、弹药、布匹、棉衣和现洋赠送给中央红军。但由于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吃饭、穿衣问题仍很困难，不少指战员还没有穿上棉衣，有的甚至仍穿着短裤。所以毛泽东亲笔写借条，向红十五军团借 2500 元。红十五军团当时经济也很困难，还需要 3500 元才能解决冬装、买药、买油、买盐等问题，但军长徐海东从大局出发，立即指示从现有的 7000 块现洋中，拿出 5000 元，送给党中央。这种“雪里送炭”的精神，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高度赞扬。

1935 年 11 月 19 日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9 月国民党军 130 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虽多次寻找，均未找到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的堡垒封锁却越来越紧。为此，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本日，红二、红六军团近 2 万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水獭铺、教子垭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

始长征。

1935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　红军直罗镇战役获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战斗中，红军指战员勇猛顽强，坚决打击敌人，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虏 53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3500 余枝（挺）。由于这次作战的对象是国民党东北军，因此红军指战员在战斗中还注意政治瓦解，战场喊话："宽待东北军！""欢迎东北军掉转枪口打日本！"战役结束后，红军教育和释放了俘虏，这一切对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1 月 30 日，红一方面军在东村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中，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在于：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战略和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战斗准备的充足；群众与我们一致。

1935 年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央红军以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胜利完成长征，同陕甘两省取得会合，巩固与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革命根据地与领导中心，"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号召全中国的民众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

1935 年 11 月 28 日　中华工农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并吞华北，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卖国贼正在出卖华北、出卖全中国的形势下，只有全国海、陆、空

军和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抗日反蒋，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宣言重申工农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5 年 12 月 5 日　中国共产党同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专程到西安同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 12 月 1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并表示希望杨虎城派遣代表前来陕北革命根据地，商洽一切。

1935 年 12 月 5 日　中共中央坚持原则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一）此间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1936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

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935年12月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央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同过去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在这种形势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和善意的中立态度，这对我们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因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是把富农推到反革命的怀抱中去，是在加强反革命同我们斗争的力量。因此，对于富农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没收，与普通农民同样平均分得土地，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其扩大生产和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935年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北平学生联合会的具体组织下，北平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政府军警的重重阻挠，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爱国学生遭到残酷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13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出席。1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

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着重批评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议和报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控制华北之后，正准备“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新形势下，广大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正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同时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新变化，以及买办地主营垒发生分裂的可能，说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确定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

1935年12月27日　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1934年8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10月开始的中央红军的转移。1935年3月，川陕边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

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的，在另一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1935 年 12 月 27 日　毛泽东论长征的意义。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一）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 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 2 万余里，纵横 11 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二）长征又是宣言书。他说，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三）长征又是宣传队。他说，长征向 11 个省内大约 2 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

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四）长征又是播种机。他说，长征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毛泽东指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1935年12月27日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这正是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毛泽东分析统一战线的道理时指出，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

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毛泽东分析关门主义的道理时，认为他们的观点是：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统一战线的道路和关门主义的道路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他说，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3岁小孩子，3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

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毛泽东说，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1935 年 12 月 27 日　毛泽东论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经过锻炼的红军是革命的中心力量。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毛泽东回顾历史经验说，1927 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毛泽东说，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毛泽东进一步具体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论证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他说，不能希望统一战线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1935 年 12 月 27 日　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

关系问题。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他进一步分析抗日战争时说，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5 年 12 月 31 日　红军和东北军达成协定。红军和驻甘泉的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双方互不打枪。193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 20 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毛泽东等指出，东北军广大官兵是愿意抗日的，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卖国内战和消灭异己的反动政策，迫使东北军不打日本，而去进攻决心抗日的红军，这是没有出路的，并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书信指出，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同时明确表示，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抗日，作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并表示希望互派代表协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1936 年 2 月 19 日，中央红军与东北军建立通讯联系。2 月 25 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到洛川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

哲会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发展贸易等口头协议。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除同意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表示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1936年3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博古、周恩来向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各省委负责人发出《中革军委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定内容之通报》：（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联系人购买。（四）恢复红区白区之间通商，红军、六十七军皆有保护之责。为向蒋介石保守秘密，通报要求陕北、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省委、军区口头传达协定，“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以上协定于本日开始实行。

1936年1月2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当前要解决几个组织原则问题：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要迅速地发展；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同时各个苏区也被敌人分割在不同地区，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城市，但是有自己的政权、武装，已有的武装已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报告强调反对“关门主义”问题，要求改变对于党员成份的机械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长期斗争中选择干部。

1936年1月15日　红军东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宣布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路，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1月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2月中旬东征，并做出人事安排。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张浩、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三人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负责后方工作。1936年2月4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布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的训令。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以绝对负责的精神，深入进行政治工作，以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指出："行军中政治工作的基础，应确实的放在党和团的工作方面。党和团的工作的不间断性是完成任务的保障。党的支部应成为整个政治工作的推动机，而党员和团员应成为每一个工作的模范执行者。""党支部对每个党团员中所发生之不良现象，应即时给予批评和纠正。支部生活应当健全起来，不要因行军作战等关系而使它受到停顿。支部委员会各种工作，如小组会的召开、考察党员，与个别党员谈话，介绍新党员，收纳党费等，应经常的进行。""在每次大小战斗之后，支部均应作一总的检阅，检查每个党团员的表现，任务的完成等，战后党团员的调剂，应迅速进行之。"2月20日至21日，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为扩大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毛泽东、彭德怀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战役。红军主力分两路，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阎锡山部"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迅速进入晋西地区。

1936年1月28日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成立。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统一东北抗日军队的行动，东北反日联

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举行，决定组成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总司令。1月20日，东北各抗日部队领导人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7月，共改编和扩编抗日联军10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第三路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为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不畏艰难困苦，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大大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内地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成为其巩固的后方战略基地的企图。

1936年1月29日　中共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第一次到南京，向正在与南京政府铁道部部长曾养甫接触的吕振羽传达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主要是：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随后，吕振羽即向曾养甫正式提出中共的上述条件。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提出四点要求：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维埃运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

1936年春　中共令潘汉年回国以促成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奉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有关的苏联党政负责人广泛联系，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多次会谈。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就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中共代表团认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国内进行为好，于是决定派潘汉年回国，

以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合作抗日。

1936 年 2 月 1 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北平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民先队成立后，团结广大进步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

1936 年 2 月 15 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通令各地政府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带头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规定从中央到乡的脱离生产人员，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大队，利用假日帮助红军家属种地、砍柴、挑水。

1936 年 2 月 21 日　中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通电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

1936 年 2 月 27 日　中共代表张子华偕同南京政府方面代表董健吾到达瓦窑堡。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听取张、董二人对南京政府要求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情况介绍。

1936 年 2 月　中共与十七路军达成协定。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会谈后，达成如下协定：（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须要过境时，可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9 月 8 日，中共与杨虎城最后达成抗日合作口头协定。张文彬自西安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已与杨虎城最后达成抗日合作口头协定，

主要内容有：（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驻防地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二）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食料等必需品。（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1936 年 3 月 4 日　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联名电博古转董健吾。张闻天等请董转告南京政府，中共愿依据以下原则进行谈判：“（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 月 5 日，董健吾带着中共方面的意见离开瓦窑堡南下。

1936 年 3 月 20 日至 2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西部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如何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谈反蒋问题。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今后不随红军行动。

1936 年 3 月　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六项要求。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针对曾养甫于1936年1月提出的四点反要求，周小舟向吕振羽传达指示如下：（一）阶级斗争问题，国共合作后，只要国民党改善工农生活，中共为加强国内团结，可实行战时阶段休战；（二）国民党应实行“二五减租”政策，中共暂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四）组成国防政府后，武装推翻国民政府问题将不存在。随后，周小舟在铁道部会见曾养甫，并递交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给宋子文等人的信件，每信附有一份“八一宣言”。

1936年3月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党的北方局书记。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方局为肃清白区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一二·九运动的成果扩大到全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北方局还在国统区大力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北平、天津两市委的领导力量，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并派出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白区工作得到恢复和新的发展。

1936年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揭乱抗日后方宣言。宣言向全国同胞揭露阎锡山动员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蒋介石则又以上10师的兵力，协助阎锡山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向北推进，以捣乱陕甘苏区抗日后方的罪行。宣言严厉警告蒋介

石、阎锡山，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红军誓以全力消灭阻拦抗日去路和捣乱抗日后方之敌，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宣言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并再次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1936年4月9日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等问题致电张闻天。电文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讨日令，因为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电文指出，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并提议用党与苏维埃政权名义，立即发出告国人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申明我们愿与一切受蒋氏的命令、执行拦阻红军任务的部队订立抗日讨逆协定，以争取落后群众和蒋系部队。

1936年4月9日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李克农、刘鼎、王以哲参加。双方就停止内战、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红军的战略方向、互派常驻代表、互相通商、联合苏联等事项，以及如何看待蒋介石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双方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

1936年4月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区革命互济会的组织与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出，革命互济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它以革命互济的精神，对一切革命者的被压迫摧残牺牲等给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互济会的直接救济工作，应放在直接救济被难战士及其家属的方面（如对受伤的、白区坐监的、牺牲的战士及其家属之救济，对被敌摧残而无家可归的难民之救济等），但

这种救济，应分别个人的实际的需要，不应采用平均主义的方法。决定强调指出，互济会的工作不应限制在消极的物质救济的方面，应当用各种方法向被难战士及其家属进行精神上的帮助（如给他们传播革命消息和革命思想，引导和鼓励被难家属及难民之壮年者加入红军参加革命工作，帮助他们中之老弱者得到职业等），鼓励起继续奋斗的精神。

1936 年 4 月 10 日　刘少奇指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论证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和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表现是：反对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害怕他们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搞过分的、机械的党内斗争。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党内长期继续和重复的结果，只能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为了实现党的这一路线，必须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们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1936 年 4 月 17 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苏区财政问题，决定少印纸币，开源节流，厉行节约，以达收支平衡。

1936 年 4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而艰苦奋斗，其精诚保国的决心，谅早为全国同胞所洞悉。""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因此，中国共产党以至诚向中国国民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等 40 余个党派、社团及全国其它各党、各派、各报馆、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的全体同胞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宣言将中国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不再提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共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1936 年 4 月 28 日　红二、六军团在北上途中。红二、六军团在滇西北丽江县石鼓、巨甸两处过天险金沙江，随即翻 5300 多米高的玉龙大雪山，30 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1936 年 5 月 5 日，红二、六军团分两路由中甸出发。右纵队红六军团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左纵队红二军团经得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并继续翻越四五千米高的大雪山。

1936 年 4 月　刘少奇论党在白区的职工运动的方针。他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中心城市和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在形势和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为了积蓄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和巩固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为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更加改善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要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和反动派斗争。

1936 年 5 月 5 日　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幡然改悔，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回师通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1936 年 5 月 18 日　红军西征。为保卫和扩大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进一步争取和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本日在延川县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地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命令部队于 5 月 19 日、20 日出发。至 7 月底，红军俘国民党军旅长以下 2 千余人，缴获各种枪 2 千余枝（挺），马 500 余匹，占领定边、环县、豫旺、盐池、同心等城镇，开辟了纵横各约 200 公里的新区。

1936 年 6 月 6 日　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经过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和劝说，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分裂党另立第二“中央”的活动，达 243 天，最后以失败而结束。

1936 年 6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央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争取的方法，主要是依靠耐心的说服和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

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靠阴谋诡计，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但这并不排除对部分的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和影响。为加速东北军的转变，应该采取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的做法。

1936 年 7 月 2 日　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 日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和中共中央会合。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 3 个纵队由甘孜、炉霍、靖化出发，向班佑、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跟进。两个方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经过 20 多天的艰难跋涉，于 8 月初先后走出草地。过草地时，红二方面军是后卫部队，沿途筹粮更加困难，有时甚至找不到野菜，只好以野草、牛皮充饥。许多同志口里含着野草，长眠在草地的泥沼中。仅一月时间，红二方面军损失即达数千人。

1936 年 7 月 15 日　刘少奇论肃清党内空谈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式。他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文，指出在党的北方组织的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中，严重的存在着空谈的工作作风和空谈的领导方式。告诫“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就说什么，懂得，就说懂，不懂得，不要说懂。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1936年7月中旬　朱德率左路纵队抵阿坝地区准备过草地。行前朱德详细了解兵站部收容的伤病员情况，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要人不要枪，把多余的枪统统毁掉。要求把伤病员全部带出草地。

1936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央指出："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和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特作出如下决定：一、全部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二、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三、富农的地土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如果农民要求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的土地也当拿出一起平分，但富农应和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四、大农业主的土地按照对富农的政策办理；五、商人兼大地主，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六、不没收各种小业主、生活很坏的小地主、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七、取消高利贷，"但商业借贷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八、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土地出租条例。

1936年夏　陈毅填写"赣南游击词"，描叙游击战争的艰苦生活。"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天放晴，对月设野营。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梦中念敌情。休玩笑，耳语声

放低。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纠偏要心虚。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勤学习，落伍实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莫怨嗟，稳脚度年华。贼子引狼输禹鼎，大军抗日渡金沙。铁树要开花。”

1936年8月1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布关于筹款问题的训令。训令指示，根据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阶级，只要他不反对红军抗日，可以用捐募的方式使他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来，要做到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进行募捐运动，以筹得抗日经费。

1936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义正词严批评的同时，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并对此表示诚恳的欢迎。信中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建立民主共和国”，郑重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敦促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民主。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1936年9月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

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一方面必须继续揭露蒋介石的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行，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订立抗日协定。同时，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并准备派出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6 年 9 月 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它“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强调指出，扩大和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1936 年 10 月 1 日　陈云提出要防止混入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奸细破坏革命。他在《救国时报》上发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一文，指出现在反对革命的人已经不仅仅站在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外面来反对革命，而且还派遣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内部来破坏革命。“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进行革命工作。

1936 年 10 月 9 日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22 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同南下策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为庆祝一、二、四方面

军大会合通电》中宣告："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

1936年10月11日至12日　周恩来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工作对红军的发展起过很多作用，尤其在长征中表现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应加强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教育仍是阶级教育，既注意民族教育，也不可忽视国际主义教育。周恩来还提出政治工作要和实际相联系。

1936年11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中央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根本改造，使共青团变为广大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同时加强对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大批吸收青年团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11月11日　西路军的组成及其失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行动，全军共2.1万余人。此后，西路军在甘西北同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优势兵力浴血奋战4个多月，毙伤俘敌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终于失败，余下的部队和伤病员共2千余人，分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营救下，只有部分人员陆续回到陕北。在西征作战中，军长董振堂、军政治委员陈海松、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军参谋长陈伯稚、李屏仁，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王海清、刘理运、李连祥、叶崇本、董俊彦、陈家柱，师政治委员李德明、易汉文、朱金畅、杨朝礼、秦贤道、张文德等，相继英勇牺牲。之后，军长孙玉清，师长邵烈

坤、熊厚发，英勇就义。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永为后人敬仰。

1936 年 12 月 12 日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

1936 年 12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向刘少奇发出西安事变后促进南京政府停战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的电文。中央指示“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但是“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936 年 12 月 15 日　毛泽东等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建议南京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 月 17 日，应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有秦邦宪、叶剑英等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下午，周恩来等人从肤施飞抵西安，傍晚，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表明中共的态度：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并与张学良商定以停止内战、成立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同宋子文谈判。

1936 年 12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央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

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是由于事变采取了武装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使西安与南京处于分开对立的地位，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一是爆发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结束内战，促成全国的团结抗战。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立场；给张、杨以军事上、政治上的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1936 年 12 月 20 日　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来电。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际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一）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1936 年 12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央指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被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为尽快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其动摇地位，走上对外抗战的道路，必须：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继续推动地方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扩大全国的抗日救

亡运动，吸收广大下层群众参加，加强组织性；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组织，并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应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1936 年 12 月 23 日　南京、西安和中共三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举行正式会谈。24 日，会谈达成如下协议：（一）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宋美龄、宋子文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分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

1936 年 12 月 24 日　下午，周恩来会晤宋子文。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改组国民党；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25 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往南京。

1937 年 1 月中旬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1937 年 1 月 30 日　毛泽东号召全党向徐特立学习。他在写给徐特立 60 岁生日的祝贺信中说：“你是我 20 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人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 1927 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

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来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去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1937 年 1 月 30 日　莫文骅论徐特立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在《新中华报》著文，为徐特立祝寿：“你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模范，你是热情的革命家，党中央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你是我党中的老党员，没有昏庸、腐化、骄傲、堕落的些微成份，思想是随时进步的，言语、行动都表现出象一个勇敢的、新鲜活泼的、可敬可爱的革命青年！你是始终艰苦奋斗的，你有最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毅力，特别是在长征中更使人叹服！你那时不说没有许多担子，驮马，连一只大包袱也没有！两袖清风，腰间挂着几本书，一只茶盅，一双筷条，在那困难的环境中，你泰然自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战胜了一切！”“你的人格是使我感动的！值得我学习！”

1937 年 2 月 3 日　丁玲谈彭德怀的优良作风的形象。她在《新中华报》发表《速写彭德怀》一文，勾画出这位前敌总指挥的

形象："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适宜，不过在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都有许多被寒风所摧毁的小裂口布满着"。他有时也同下级开一些无伤的玩笑，"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的向他们解释着许多政治工作上的问题"。"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厉的！虽说在一切生活是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很凶的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他时常坐在草堆和泥地上，听老百姓讲家里的事，并伸出大拇指说："呱呱叫，你老乡好的很！"老乡拍拍他的背，将烟杆递到他的嘴边，"他总是笑着推着来拒绝了。"

1937 年 2 月 10 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五项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表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则中国共产党愿作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论，在原则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确定了两党再次合作的条件。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1937 年 3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1 日结束。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特别

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以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完成党在当前的伟大任务。决定还指出，中央在估计张国焘重大错误的同时，也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

1937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开始有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是非常不够的，非常迟缓与非常含糊的。要促使其彻底转变，还需要全党作出更大努力。“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15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加强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7年7月8日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国。中央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

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1937 年 7 月 8 日　中国工农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电文指出，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同时电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表示愿为其后盾，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 年 7 月 13 日　延安全市共产党员和各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最前线”。

1937 年 7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军委就红军改编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发布命令。军委指出，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二十九军已在抗战，国民政府正在调派援军，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的任务。令到后，即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士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军事训练着重实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无后方作战等项，各军事学校大体同时办理。以上各项限 10 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

1937 年 7 月 21 日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致朱德等信。信中通报蒋介石在庐山谈判中，坚持对红军改编的条件是：红军 3 个师的管理教育，须直属国民政府行营；3 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我们的对策应是立即自行改编 3 个方面军，每

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个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1937年7月22日　彭德怀在中国工农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他对10年的艰苦斗争进行了总结，指出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我们向南京政府要求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同时要缩编。缩编的意义是改变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改编以后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改编以后，干部的选择与教育更为重要，要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改正缺点，反对在红军实际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1937年7月27日　中共中央强调红军与苏区在改编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红军改编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决定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我包办，决不让步。但红军统率机关之名义可暂时让步，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进一个人。红军迅速改编并准备出动抗日，军委已有明令，现在实行改编的问题。由于南京不会多发地方经费，因此，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独立军师一概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时留1个师至少1个旅在后方，如此方有饭吃。

1937年7月28日　毛泽东、张闻天提出关于红军改编的原则。（一）8月15日编好，20日出动抗日。（二）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计，保安队正司令高岗，副司令肖劲光，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等的补充。

1937 年 7 月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学员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着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7 年 7 月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撰写了《实践论》，8 月又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反映论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作了哲学上的概括和总结，从认识论上彻底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它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强调革命者必须亲身参加社会实践；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革命者要善于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盾论》根据宇宙间种种矛盾现象和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深刻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矛盾运动的特殊性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全面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7 年 8 月 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发出指示。中央要求各游击区域展开长期忍耐的工作和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在没有和平以前，一方面要进行坚决的自卫战，一方面又要坚持统一战线的工作，求得和平。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斗争。

1937 年 8 月 10 日　毛泽东谈共产党应有谦逊态度。毛泽东

给彭雪枫电中说，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工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不熟悉的情况，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

1937 年 8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 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艰苦的持久战。为此，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统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制定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路线，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 年 8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军委指出，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强调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 10 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1937 年 8 月 2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座谈会。会议讨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朱德发言说："由苏区到白区去工作，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就会被国民党吸引过去。因此，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要突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对此，个别人应该有所警觉，要在革命过程中进行锻炼。"

1937 年 8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所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指出，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 9 人组成，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会统辖。各师组成军政委员会，分别以林彪、贺龙、刘伯承为书记，均受军委分会统辖。

1937 年 9 月 6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辖陕西、甘肃、宁夏的 23 个县，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50 万。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

1937 年 9 月 21 日　毛泽东提出红军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他在致彭德怀电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

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1937 年 9 月 22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在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9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团结御侮的必要。中共中央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9 月 29 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是应该把两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成为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成为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同时应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

1937 年 9 月 24 日　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夜间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右侧高地。25 日 7 时许，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敌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八路军一一五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乘敌混乱之际，实施突击，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使敌飞机、火炮无法发挥作用。经整日激战，歼敌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 20 余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 200 余辆。平型关战役是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7 年 9 月 25 日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就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发出训令。（一）立即

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二）立即在我们占领地域，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对友军及政权机关，争取合作的态度；（三）立即在敌人占领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四）立即在战区提出减租减税减息，没收汉奸日寇财产，分给抗日人民及抗日军人家属。

1937 年 9 月 2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央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但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

1937 年 9 月 27 日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给四川亲属陈玉珍信。朱德在信中说：“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可办好。昨廿四五两日，我们的八路军参加上打了几个小胜仗，夺得大炮一门，弹两千多发，战车七十四辆，打死敌人千多个，俘二百多，得军用品很多，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

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1937 年 9 月 30 日　王稼祥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他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中国第八路军的胜利与抗战的光明前途》中指出，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是中国民族历史上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八路军的将领与战士，是中华民族的最好子孙，是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之中很多是中国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团员，他们在政治上是有高度的觉悟，同时他们是英勇坚决自我牺牲精神的模范。这个军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创造了革命的先进的军队制度，他上下是绝对一致的；这个军队建立了极严肃的自觉的纪律，与地方人民群众向来都是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到处得着人民的爱戴，并且是长于发动地方群众帮助和参加抗战；这个军队有共产党的领导与骨干，有其天才的领袖与天才的战略家——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诸同志。这一切都使这个军队有坚强的战斗力。

1937 年 10 月 1 日　中共中央提出应保持南方各游击区战略支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 10 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为了这些支点不被国民党拔去，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各区游击队调动之前，邻近 200 里内的保安队、民团，首先调动，至少同时调动，往后不让部队进驻；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游击队数目；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部队进入游击区。指示还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

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

1937 年 10 月 4 日　毛泽东就对待交我军指挥之友军部队的方针问题发出指示。毛泽东说，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的部队，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红军周围。对他们应取的态度与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937 年 10 月 6 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要求优待俘虏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根据平型关战斗及各游击部队经验，日军非拼死不肯交枪，虽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不独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而且以残暴手段对付俘虏，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开展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斗力，并推动友军学习这一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各级政治机关应立即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也可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驻地，给日伪军散发宣传品，进行瓦解敌军的各种宣传。要优待俘虏，医治伤兵。要注意搜集日军政治情报，加以研究。

1937 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要求严格党和政府的纪律，从严治党。他在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同意对黄克功案件的判决。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老红军，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 年 10 月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毛泽东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

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人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1937 年 10 月 10 日　刘少奇提出在华北党要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运动。他在《奋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中指出，目前群众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开始成为主要的危险。今天全华北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广大的反日游击战争。完成这一任务的中心一环，是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独立自主的领导群众运动，在敌占区，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公开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动员与组织群众，在山西我军的后方，应努力争取我党的公开，争取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组织的权利，并坚决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经济斗争，并在华北各地建立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必须十倍百倍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每一县，每一地区、乡村和武装部队中都要建立党的组织。

1937 年 10 月 13 日　张闻天、毛泽东提出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的倾向的问题。他们在给各地党委的电报中指出，在部分

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及党员中，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在增长，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其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统一战线中，不但不取消对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国民党在华北失败后，气焰大杀，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

1937 年 10 月 15 日　张闻天、毛泽东对于汉奸的没收政策问题作出解释。他们说，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是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之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党明确说明的必要。

1937 年 10 月 16 日　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他指出，华北抗日的正规战争如果继续遭受一些挫折，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要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必须对保留军阀主义恶习的部队进行彻底改造。

1937 年 10 月 17 日　中共中央要求克服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与投降主义的危险。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在全国性抗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在民众救亡运动方面，表现了动摇。一方面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但

同时又惧怕救亡运动超出它的控制范围，而对其采取“统制”与“包办”政策。因此打破国民党的这种政策，是我党目前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指示指出，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与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坚决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千百倍的加强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工作，发扬全党在救亡运动中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克服一切障碍与困难，是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必要条件。

1937 年 10 月 19 日　第十八集团军前线总指挥部向中央提出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他们认为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下降，因而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员中，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的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从组织上得到适当解决：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职权与过去政委相同；旅设政治处；各旅单独行动时，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师设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军政委会书记由党代表兼任。10 月 22 日，张闻天、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周恩来电，“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1937 年 10 月 25 日　毛泽东提出反对骄傲和轻敌思想。他在向第十八集团军首长及各级负责同志发出的关于反对骄傲和轻敌思想的电文说：“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在土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气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1937 年 10 月 25 日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提出优待日军俘虏的政策。（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1937 年 10 月 25 日　毛泽东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原则。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1937 年 10 月 30 日　毛泽东要求部队严守群纪律。他在给八路军各首长电报中指出，对行进部队的群众纪律应十分注意，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1937 年 10 月　新四军建立。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活动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下辖 4 个支队，全军共 1.03 万人。为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和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

书记。

1937 年 10 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叛徒自首分子及非自首行为的规定。（一）共产党员不论被捕与否，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为叛徒：甲、供出或泄露党的秘密者；乙、供出人及机关者；丙、在监狱生活中及在监狱斗争，采取向敌人告密者；丁、在反省院不是消极敷衍院规，而是积极的根据反省院规章及意志倡导模范作用，或帮助反省院监视犯人的活动者；戊、劝人自首者。（二）从被捕被俘到出狱为止，未破坏任何秘密，未供出任何人及机关，仅仅在文字言论上有反党行为者，或未经被捕自动向统治阶级自首，但未破坏任何机关或供出任何人员及秘密者，均为自首分子。（三）以上规定不仅适用于党员，而且适用于共产青年团员，及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团员。

1937 年 11 月 4 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会上作目前的时局讲演。他指出，抗战以来的成绩不可抹杀：（一）抗日战争是百年未有的，其性质是革命的。（二）在抗战中中国国内比较团结。（三）在军事上虽然遭受许多失败，但给 了日寇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四）取得了国际间的同情。（五）在战争中取得了深刻的教训。蒋介石 10 月 9 日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护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怎么打呢？在军事上要学八路军的打法，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

1937 年 11 月 8 日　毛泽东发出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他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华北总的形势是，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它则附于八路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原则下，放

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12日　张闻天、毛泽东发出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他们指出上海沦陷后，上海救亡运动必将更为困难，公开救亡团体应准备必要时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亦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上海沦陷后，救亡运动的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因此党与非党的干部，亦应重新分配，工作方式也应有必要的转变。

1937年11月13日　毛泽东就华北红军的任务与扩军方法致电朱德等。他指出，八路军的任务在于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争夺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1937年11月12日　毛泽东提出把陕甘宁边区首先建成全国民主政治的先导。他在就特区大会选举问题致各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指出，陕甘宁特区大会定于1938年1月5日在延安开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实有全国性政治意义。特区的大会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这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力。八路军应积极热烈的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在选举运动中必须与抗战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以一切力量支持华北的游击战争，以

英勇战斗与政治工作的模范去影响一切友军，达到最后战胜日寇的目的。

1937年11月15日　毛泽东强调在山西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他在致周恩来等电中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我们必须自己作主，减少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商量。

1937年11月16日　周恩来提出坚持华北抗战的四项任务。他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作《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演讲时提出：（一）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改善部队的生活，发挥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争人不争地；（二）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地方自治自给，实行抗日纲领；（三）开放民运，宣传、发动、组织、武装民众；（四）肃清汉奸，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

1937年11月27日　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是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的。他在给表兄文运昌信中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

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了解了的。”

1937 年 12 月 3 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就军队在战区政治工作问题向各级政治部发出指示。（一）在群众中深入解释共产党现行政策与十大政纲，使群众真实了解共产党主张而不致受敌人欺骗；（二）激发群众民族仇恨，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并进行组织游击队的工作；（三）号召群众否认和反对维持会、伪政权，肃清汉奸活动；（四）注意统一战线的巩固，对友军态度，应谦让和气诚恳，反对一切高傲自大、谩骂和足以引起反感的行为。

1937 年 12 月 6 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就八路军应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加强统战教育问题致电朱德等。电文指出，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对假借名义及其他一切离开统一战线的原则应即具体取缔；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切实检查。

1937 年 12 月 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14 日结束。11 月 20 日，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在会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设总书记；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

1937 年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

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

1937 年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几年来所做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中央与共产国际给予他们的任务。

1937 年 12 月 15 日　毛泽东致书抗日军政大学第九队。他说："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惟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1937 年 12 月 24 日　毛泽东、萧劲光、谭政就八路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电文指出，为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特有如下指示：(一)对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二)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三)因征兵或抽捐税的事，引起群众与政府磨擦时，我们应居调解，避免对立。(四)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同时应要求政府帮助我们完成募补计划。(五)在统一战线内，立即停止募捐筹粮的行动，已经借用的仓库存粮，须即归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捉汉奸，必

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1937 年 12 月 31 日　周恩来提出对青年的期望。他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演讲时指出：（一）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为此，中国青年今天努力的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二）把以往学习的知识发扬光大，使理论适合于实际，把知识活用。

1938 年 1 月 10 日　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有人说，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的。“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如果一方面空谈革命主义与革命政纲，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却又多方阻碍革命主义与政纲见诸实行；如果一方面在宣言、广播谈话、训练中，向军队官兵与人民空喊全民族要参战，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处处不给人民参战的权利与机会，处处阻碍人民与军队的联系，甚至人民慰劳抗战军队都被禁止；如果一方面高谈抗战，空喊士兵要勇敢上前线，但是实际上高级军官临阵不前，甚至化装先逃。”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不得不变成点缀、凑趣、捧场的东西了。这样的政治工作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卖狗皮膏药’的东西了。”

1938 年 1 月 13 日　任弼时提出政治工作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他在《新华日报》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指出，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应视政治工作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这首先要建立健全政治

组织，应把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立在连队之中；要提高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威信，这又依靠于政治机关用自己负责的实际工作和军事指挥人员对政治机关的重视与尊重去达到。政治机关应当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抗战教育，增强战士信心，保障战斗任务的完成，应当发动和指导部队进行居民中的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

1938 年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对山东工作发出指示。中央在给山东省委指示中指出，济南失守后，山东广大地区有沦为被日寇占领区域之危险。山东被占后，省委工作将进到一个较困难的时期，应当抱定在山东坚持长期的艰苦斗争，即使在与中央的关系断绝后，也应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独立的进行工作，在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的原则下，发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坚持在山东与日寇作斗争。

1938 年 1 月下旬　周恩来在武汉会见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周恩来表示感谢他们援助中国革命，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1938 年 1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谭政在致八路军总部并转各师及政治部电中指出，八路军前后方和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8 月 3 日，毛泽东复朱德、彭德怀电中指出，王稼祥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机关设在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1938 年 2 月 1 日　八路军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发布整军训令。训令指出，我军入晋抗战以来，收到显著的成效，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严重现象，如贪污腐化散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干部逃亡，军事政治纪律松懈，军阀主义与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党和政治军事机关经常工作制度的削弱等，应引起严重注意。要保持我军艰苦卓绝，意志团结，坚决勇敢，高度政治警觉等优良的模范传统，必须依赖更加艰苦的政治工作和坚强的党的工作，必须对于各种不良倾向，给以及时的纠正与教育，一直到公开与之斗争。一切对于不良倾向放任的自由主义，都可能产生不良的结果。

1938年2月2日　朱德等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朱德指出在使用卫立煌部队时，不要用在过分艰苦和复杂的区域，而且要帮助他们侦察和警戒，以免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要用一切方法帮助友军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中的困难。我军应以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同时应提高警惕性，防止友军以吃喝及金钱来引诱我军。

1938年2月8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你们如果联合起来，日本侵略的魔鬼，将要在你们面前崩溃，全世界的法西斯阵线，将要在你们面前瓦解。”

1938年2月9日　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孩子剧团招待会上讲话。他鼓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1938年2月11日　毛泽东论三种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他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

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 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三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1938 年 2 月 14 日　任弼时论革命军队干部的素质。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怎样度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指出，要使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迅速成为坚强有战斗力的部队，首先就是干部的选择与配备。干部的条件，必须是具有高度忠实于民族利益，坚决勇敢，有作战经验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一切以自己荣华富贵个人享受高于民族利益的贪生怕死之徒，是不能充任这样军队的干部的。

1938 年 3 月 3 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告民众书。书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进攻到边区的边境上了，边区的形势十分严重与紧张。只有从誓死反抗中，能争求一条生路。边区的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决心领导边区民众为誓死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而奋斗。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缝纫队、洗衣队、看护队、救护队、慰劳队、锄奸队及修筑工事，征募战士，收集军需用品，供给军队粮食及盘查，放哨、警戒、侦

察、剿匪、锄奸等。

1938年3月5日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1938年3月10日　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以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以为也是全国以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吃小米而且不能经常吃。”

1938年3月12日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他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孙先生的 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毛泽东还指出，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他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

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1938年3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因此大量的、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为此，中央决定：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要宣传有了强大的党才能有强大的统一战线的真理；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的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迅速的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夫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及一切党的活动需要极端秘密的地方，则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对新党员应注意给他们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1938年3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指示。中央指出，如西安武汉失守，继续抗战的困难，必将更多，而中国内部必将发生新的动摇，这动摇或许将更甚于南京失守之

后。然而由于中国只有持久战才有出路，故克服动摇坚持抗战方针仍将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一）继续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总方针。(二)在统一战线中大量扩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与民众运动。（三）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四）红五月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及重要的工商业区域中，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而不要虚张声势。（五）有计划的从城市中征调得力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到农村担任领导游击战争等工作。

1938 年 3 月 25 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指出，日寇现在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

1938 年 3 月 25 日　周恩来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1938 年 4 月 2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央指出，党报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把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新华日报》上的社论；《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订一份帮助建立通讯工作。帮助建立读者会。

1938 年 4 月 11 日　毛泽东、张闻天谈国防教育。毛泽东在延

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上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就成千百万的新人。抗战教育不是强迫的，而是自觉的，这依靠着群众或学生的学习热忱，和教育干部的积极性。并且需要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亲密的联系起来。张闻天说，国防教育包含三个要素：一、强调民族自信心，二、增进全民族的团结，三、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1938年4月12日　张闻天论青年要有坚定高尚的理想。他在陕北公学作《论青年的修养》讲演中指出，青年要有坚定高尚的理想。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可以是今天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将来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终究要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青年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青年还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要同群众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1938年4月15日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举办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一周年纪念特刊"题词。"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的走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1938年4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应取的立场。中央主张建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用一切方法推动其具体实施，并自己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发挥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并反驳一切对我们的攻击。对于其中反对

阶级斗争与反对国际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缺点，给以侧面的、适宜的解释。赞助国民党的进步与扩大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1938 年 4 月 18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指出张国焘已于 4 月 17 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寿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予以公布。4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指出中央对于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曾一贯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针，就是在他犯了成立伪中央那样严重的错误之后，仍本着宽大精神用一切方法多方诱导，并仍让他负责部分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这些一切仁至义尽的方法终究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者的没落。中央过去对于挽救一个犯错误的党员实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张国焘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还使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的与巩固的 向着自己光荣的前途迈进。在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时，各级党部更应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

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同时，估计到张国焘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与破坏。

1938年5月1日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举办的“五一专刊”题词。“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除日寇，建设新中国。”

1938年5月1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五一纪念专刊”题词。“全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来纪念‘五一’，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中国工人阶级应努力于民族解放以谋自身的解放；另方面应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

1938年5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江苏省委工作发出指示。中央指出，省委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根据地。在目前环境下，活动的中心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没有敌人的广大乡村。被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工作，应服从广大乡村的游击战争，应长期积蓄力量，以便将来配合全国胜利的反攻，应转变过去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以适应目前新的情况。决不要为城市中的一时的便利所迷惑与群众中一时的抗敌情绪的高涨所影响，而走向冒险的斗争，削弱自己的力量，应不断的有计划的从中心城市派遣优秀干部到各地乡村中去工作，首先应派他们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以加强领导。

1938年5月1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布告。布告指出，目前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全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者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者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者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

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等等。这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特布告如次：（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及已经废除过的债务，不准擅自变更。（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革与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众团体等组织，政府及留守处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行为。（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政府及留守处无不乐予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凡未经政府及留守处同意，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的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四）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之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党通过政权和军队规定的这些原则，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促进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 年 5 月 17 日　任弼时论八路军的优良政治工作传统和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红军时代，就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今天依然保存着。不论是在驻军、行军或作战当中，都有各种不同方式去进行政治工作。部队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同时生活上能够刻苦。指挥员与战斗员间建立起友爱的同志关系。共产党支部起着领导和模范作用。部队中逃亡

的现象很少，作战时坚决勇敢，部队内部有团结活泼的精神，这是引起友军非常敬慕的。有一次，一个国民党报纸的新闻记者，到八路军总指挥部访问朱德。当他走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门口，看见一个年纪已老的人，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戴着眼镜看报纸。经参谋长介绍，才知道这老人就是朱总司令，引起他很大的惊异。他与朱总司令同吃午饭，饭菜极简单，与士兵所食相同。他又找了八路军士兵、伙夫谈话。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八路军有一个极大的特点，上自总司令，下至士兵、伙夫、马夫，所说的话，观点完全一致，只是程度有深浅不同而已。他说，八路军的教育与团结，真是值得钦佩。任弼时说，八路军除内部政治工作外，在抗战中还特别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为着这个目的，印发许多日文、中文、蒙文、韩文传单小册子，利用政府飞机或经过游击队和地方居民，以及组织武装宣传队，散发张贴到敌人区域，并教育指战员学习几句简单的日文口号，以便在作战时向敌人宣传。对俘虏的日本士兵，给以很好的优待和教育。我们散发的传单小册子，对日本士兵也起到了一些影响，时常从俘虏以及战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可以找到我们散发的宣传品。在战场上被我们包围的日本士兵，经过我们喊口号，有自动缴枪过来的。俘虏来的日本兵，有很少数现在帮助我们写日文传单小册子，他们甚至要求留在八路军工作，并要求设法将他们的家眷也搬到中国来，以免受日本政府的摧残。他还说，八路军与地方人民间，建立了很亲密合作关系。首先是由于八路军有很好的政治纪律。他们驻扎民房，须先征求居民的同意，损坏东西要赔偿，更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请我们到他家里住，送许多东西慰劳；而别的军队到一个地方，群众多逃走。特别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纪律很坏，发生掳掠甚至强奸妇女的现象，引

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一些办法，别的军队到了，由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我们的队伍因为得到群众拥护，在作战时，群众自动替我们搬运伤兵和战利品，修补难走的道路。平时则帮助我们运粮食、弹药，给予我们以很大的便利。

1938 年 5 月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毛泽东着重阐明了如下问题：（一）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论断。（二）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我战略相持；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规定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强调了抗日的政治动员的重要性。（四）规定了抗战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这两篇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典范，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成为抗日军民克敌制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两篇文献，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了科学的规划和正确的战略布局，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形成人民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篇文献阐发的原理，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1938 年 6 月 7 日　张闻天论党对犯错误同志采取严肃的耐心说服与教育的方针。他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一文中指出，张国焘的真面目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全部暴露出来的。中共对于张国焘过去所暴露的每一个错误，从来没有放松过去。为挽救一个老干部起见，对于他的错误每次总是采取最耐心的说服

与教育的方法。这是中共历来对于自己的干部的态度。不论张国焘过去怎样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中共的这种工作，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结果。每一次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使张国焘不能不暂时放弃他的错误，向党表示屈服，在一个时期内为革命为党做点工作。而更主要的是这些斗争教育了全党同志，使张国焘没有法子以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影响同志，使不肯真心改正错误的张国焘最后完全陷于孤立，使他在革命队伍中与党内投机与破坏的阴谋完全失败，结果不能不“单枪匹马，落荒而逃”。

1938 年 6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共 17 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央指出，中共过去的 17 年，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 17 年。一年来，在民族抗战的各条战线上，中共同志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共同志必须在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以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此，中共必须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十倍、百倍的扩大与巩固党的队伍，大大地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保持与发挥历来艰苦奋斗的作风。

1938 年 6 月 30 日　《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1938 年 6 月 30 日　王若飞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进步的新中国的缩影。他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边区在抗战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者和忠实的执行者、陕甘宁边区中国领导之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是推动全国团结抗战的一个主要力量。在今天他还是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是全国抗日最坚强的堡垒，彻底实行革命三民主义与

抗战建国纲领的模范地区，是巩固全国统一的模范，是进步的新中国的缩影。

1938年7月1日　中共中央表彰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纪念抗战1周年与中国共产党诞生17周年，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新四军，表彰他们在抗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电文指出，一年来你们进行了无后方的艰苦作战，配合了全国友军，创设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广大民众的斗争，武装了广大的抗日人民，同时也锻炼了你们自己，这些成绩，要归功于你们的英勇牺牲精神。

1938年7月2日　毛泽东论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他在延安接见世界学联代 表团回答他们的提问时，关于边区性质与作用问题，毛泽东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人民在抗日原则下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边区军队，官兵关系与人民的关系，有一种民主的精神，官兵、军民打成一片。边区教育是抗日的与民主的。边区经济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边区各级政府都是人民投票选举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顽固分子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法，这里象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也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正确的说法应是，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还待继续努力，方能更好。关于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作用，毛泽东说，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关于抗战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问题，毛泽东说，一句话，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

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

1938 年 7 月 5 日　毛泽东等表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使者、人民的代表。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指出，我们 7 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任为参政员，中共中央委员会已正式决定我们 7 人接受政府聘请加入国民参政会。我们深切了解：国民参政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使者、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我们将确定地为中国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

1938 年 7 月 21 日　董必武等捐献参政员的薪水。董必武等 6 位中共参政员，在《新华日报》发表启事。谓 8 月份参政员薪金每人 350 元，计 2100 元。每人交党费 55 元，其余部分捐助抗大、陕公、党校、延安托儿所各 300 元，捐助救济死难同志遗孤 570 元。

1938 年 7 月 25 日　《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巩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社论指出，边区政府为全边区人民所信任，把土地、生产、工人待遇、民主权利、武装教育等基本问题完全解决了。可是，对于日常问题（基本问题中的细小问题）还是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巩固各级政府同群众之间的联系做得不够。各级政府要深入到各种环境中去与人民中去，了解人民中的实际情形，细心考察群众的情绪，群众中所发生的每一困难与怀疑，不管他是如何微小，必须耐心解释与处理。使政府能一时一刻都不脱离群众，不会违背群众利益，真正与人民溶成一片，这样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我们还需要从群众中去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与批评，随时随地纠正自己的弱点与错误。我们应该牢记斯大林的警语："我们不仅应该教育群众，而且应该从群众那里去学习。"

1938 年 7 月 26 日　张闻天论共产党人如何待人接物。他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学员发表《论待人接物问题》讲演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在待人接物问题方面，同样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第一，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能够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恶等的限制，而容纳各种人材，使用各种人材，以便“人尽其才”，使他们在民族抗战中起他们的作用，即使是不大的作用也好。这种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第二，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在目前民族抗战的大时代，中国人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甘为日寇走狗的败类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愿意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的。只要我们能够以“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去进行教育，就一定能使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民族解放的良好战士，而使反对我们的力量减少 到最小限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全中国的人同我们一起，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革命的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惧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而应该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成为他们的模范，成为他们的教师，使他们成为自由与光明的坚决拥护者。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物！第三，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要谦虚和气，要能够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要真诚、坦白，要“言而有信”，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第四，要适当的对付坏人，要善于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彼此隔离起来，使好人的势力可以增长起来，并且使那些真正最坏的完全不可救药的坏人，容易被好人所收拾。

1938 年 7 月　八路军留守兵团提出生产与学习的口号，开展生产运动。留守兵团召开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根据毛泽东指示，提出生产与学习的口号。八月开始试行生产运动，一部分部队从事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做鞋等生产劳动，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战士生活。

1938 年 8 月 15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一条，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第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一）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第三条，犯第二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规定惩治之：（一）贪污数目在 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 300 元以上 500 元下者，处 3 年以上 5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者，处 1 年以上至 3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 100 元以下者，处 1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第四条，前第三条之未遂罪罚之。第五条，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第三条之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第六条，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第七条，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

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第八条，本条例解释之权属于边区政府。第九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1938 年 8 月 15 日　《新中华报》论现行干部工作中的弱点和错误。在社论《怎样爱护我们的干部》中指出，各级政府在干部政策的执行中，仍有不少弱点与错误，表现在：第一，不熟悉自己的人材。因而埋没了不少的人材。如遇到上级要调用一个干部，不是叫苦连天，便是以不堪工作的分子去搪塞，或者是将必要保留的干部调走，造成不必要的流动，而使经常工作无法建立。第二，不善于使用干部。因为某一干部在这一部门不能工作，便将其开除，而不估计到可以到别一部门仍能工作，或是干部有某弱点，便忘记了他还可以利用的长处，于是亦遭到开除。第三，不会帮助干部。以往我们的干部中，常常有一套公式，对于某一个干部，无论他生活有点浪漫，经济观念有点不正确，工作精神有点欠紧张，个性有点强硬等等，不管程度如何，动不动就是所谓“斗争”、“打击”，否则便是不理。第四，不会用民主的方法检查干部、教育干部。本来各级行政工作人员是经过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他们犯错误时，应该经过民众的弹劾以至罢免。可是某些地方撤换工作人员时，没有经过一定的手续，也没有经过民主的办法，只是一纸命令，这容易犯片面观察干部的错误，同时也取消了人民监督干部的责任。第五，对于干部困难问题的解决，亦需特别加以注意而不可忽视。

1938 年 8 月 20 日　毛泽东等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问题发出指示。他认为，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户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等；组织秋收运动；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组织廉

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

1938 年 8 月 25 日　朱德为纪念八路军成立一周年发表告国民书。他指出：一年来，八路军与日军交战 600 余次，毙伤日军 3.4 万余人，俘日军 2000 人。对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顾饷不作战”的诬蔑之词，予以有力驳斥。

1938 年 8 月 25 日　《新中华报》号召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在社论：《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指出，我们的八路军，边区各机关、团体、有英勇的斗争历史，有共产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必须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在全国树立更好的榜样。但很可惜的，我们队伍中，发现了个别不良分子，一遇着繁华靡丽的环境，即眼花缭乱，站不住脚甚至抛弃了自己神圣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恶习惯同流合污起来。见着别人的奢华，自己的艰苦，于是发生贪污，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光荣传统。在别人金钱美女的利诱下，而离开革命。有的浪用金钱，甚至于变相的接受商人的回佣，个别机关的同志，以为现在有钱用了，于是随便超过预算，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发生，我们要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在工作会议中，在一切会议中，无情地批判与揭发这种恶现象，来教育工作同志，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同志应该随时检点自己，以铁的力量来消灭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

1938 年 8 月 30 日　《新中华报》论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意义。在社论《顺利的来完成陕甘宁边区会议》中指出，有些人惧怕给人民民主权利，等于惧怕洪水猛兽一样，陕甘宁边区却恰恰是因为给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经过民主的办法：（一）动员了边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均积极地参加了抗战建国事业，边区的人民能在政府一声号召之下，把军需品一直送到山西前线去，能

为每个抗日战士代耕好庄稼；（二）武装了全边区人民，经过自卫军、少先队的方式，不仅学会了在后方帮助政府剿匪锄奸，而且动员了一十分之一以上的人直接到前线与日寇作战；（三）发展了国防经济和教育，使今年的开荒比去年增加 60%，学校比去年增加了 2 倍；（四）人民与政府和军队，没有疏远和隔膜，而是打成一片；（五）发动了工作人员和在前方的战士，替国家民族负着光荣的义务，这件事实，就是在边区没有高俸厚禄的官吏。“上面的事实说明，赋与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于抗战建国方面所获得的代价是无可比拟的。”

1938 年 9 月 8 日　王稼祥等关于冀中政治工作问题发出指示。指示指出：（一）应在干部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念；（二）坚持平原游击战，在于具有最大忍耐心和警惕性，必须同敌人争时机熬过困难，防止敌之袭击，并随时保持我之进攻的主动权，因此政治工作必须最大限度的发挥机警灵活，不间断不迟延的作风，保证一班一排都能分散活动和独立作战；（三）保证在敌人据点中活动的部队质量都是坚强的，因此锄奸工作、干部党员的审查工作，应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彻底进行；（四）要求军队严明纪律，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基本群众，争取中间分子，打入敌伪组织，以缩小敌之社会基础，取得人民广泛的拥护。所有筹粮募捐，没收汉奸财产，应统一于政府的计划，避免部队无计划的乱来；（五）巩固军政党的联系，统一主力与地方游击队的指挥关系；（六）发挥各级人员的机动能力，培养独立自主的工作作风。

1938 年 9 月 15 日　《新中华报》号召大大改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社论《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中指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有部分干部与群众关系弄得非常恶化，甚而至于有谩骂拷打群众

的现象发生，致使一部分群众对政府怀着意见与批评，不敢提出，造成政府与群众隔离。因此，必须大量改善干部与群众间的关系。各级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和蔼、亲近，切不要站在“高高在上”的地位去对待群众。对于群众中无论什么大小意见，应细心倾听，万不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群众中的疑问和困难，应采取各种必要的办法，去说服解决，决不要置之不理。只有以兄弟般的和蔼态度去接近群众，负责人以一个群众的地位去发现问题，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才能使我们的干部经常地为群众所信任所爱戴。

1938 年 9 月 25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统一财政一切收人及公有财产管理事发布通令。通令要求：(一)各县一切收入——税收、没收款、罚款、募捐、斗佣费等项收入，均应缴纳于各县第四科，再解交财政厅，但关于没收罚款，均应经过裁判机关，其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有没收惩罚之权。(二)各县 公有财产——土地、房屋、牲畜、树林、物品、器具等，均由各县第四科登记管理，不得有所损失，惟树林登记清楚，可由各县第二科经管，所出卖之钱，均归第四科收入。(三)各机关部队团体及裁判机关一切收入，无论数目多少，都得随时缴各县第四科及财政厅，取正式三联收据。但各县第四科所收之款，随时得缴财政厅或公库，严禁埋伏不报。没收之烟土尤禁出卖，以免破坏政府禁令。(四)各机关部队团体经费，除按月规定批发外，不予增加，即或有临时的 特殊需要及修理等费，必须开支时，得先作追加预算，呈报财政厅批准后，始得开支，否则不准报销。(五) 各机关部队团体在过去因必须的正当用途而超过之经费和借用一科或公库之经费，由各机关部队团体主管人员负责审查后，编制表册，连同单据送交各该上级再审核清理，提出意见，转交财政厅以求解决。不得借口过去经费不足，仍继续

其自收自用、贪污浪费、破坏财政统一之严重现象。今后如有发现上述贪污等事情，得依《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惩治之。

三、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延安精神的逐步形成

（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整顿党的作风问题的提出。

1938年9月29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至11月6日结束。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声明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评了王明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全会重申全党必须贯彻独立自主的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全会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会议还通过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的有关决定，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

立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和南方局（周恩来负责）。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1938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表告全体党员与华北民众书。北方局号召全体党员、八路军、游击队的全体将士及华北一切抗日政府、民众团体和全体民众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扫荡”华北的毒辣计划而坚持战斗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这次战役各方面工作中高度发挥其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模范作用，站到战争最前线去。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华北人民而牺牲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天职。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全体将士们，应在反对敌人进攻中显示最大的作用，配合友军和民众，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给进攻的敌人以痛击。全体华北民众，一切友党同志们！我们不分彼此亲密团结起来，抛开一切内部磨擦，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努力奋斗到底，华北的共产党员在任何危难的时候将和你们在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中同生共死！粉碎敌人的进攻，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华北！

1938 年 10 月 12—14 日　毛泽东论共产党员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他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指出在民族战争中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

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938年11月5日　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938年11月6日　毛泽东论党指挥枪的原则。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作《战争与战略问题》总结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1938年11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冀南工作发出指示。中央指出这个区域是磨擦厉害的地方，在统一战线方面，坚持原来立场，绝不轻易让步。对地主资本家采取中立孤立麻痹的政策，但不要认为他们都已是汉奸或者在同一时候都去当汉奸，应当区别他们间的不同成份而定我们不同的态度。在民众运动方面，注意继续改造区村政权和建立工会。在党的问题方面，必须注意党员成份之改善，在村的党领导机关内富农尚有一个相当的数目，而且下属干部的阶级意识非常薄弱。其他如干部调动工作太快，干部中还存在某些无原则斗争的现象，亦应纠正。

1938年12月15日　《新中华报》号召向延安县学习。在社论《向延安县学习》中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中，应该大量的发扬各级干部的工作创造性积极性，培养大批“独当一面”的领导者，以应付将来情况的需要。应该去掉依靠上级的心理，锻炼独立工作的能力，纵然在将来地域上被隔离时，仍能继续领导工作，并且一样把工作做好。

1938年12月20日　《新中华报》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在社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边区已经遇着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还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遭受更多物质上的困难。所以在边区内，应该要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一方面要激发工人农民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性，另一方面必须发动党、政、军各机关工作人员及战士参加生产。在穿的问题上，要求每一工作人员和战士，做到自己打衣服、鞋袜、手套等。在吃的问题上，要求各机关团体做到自己种蔬菜、喂猪、养鸡，因为边区还未开垦的荒地甚多，同时土地肥沃，急待人力去开发。我们号召各机关工作人员、各部队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和生产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的物质供应。

1938年12月25日　《新中华报》号召加强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在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中指出，在目前这场空前的历史战争中，要求得自己的生存，必须努力学习。领导干部，要学习高深的革命理论，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中，能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正确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下级干部及一般群众，须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准，以建立学习理论的必要基础。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号召党内来一个学习竞赛，为此，特提供一些意见：（一）学习方针：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总方

针下，一方面要研究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国的历史和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把握和指导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而不是关在书房讲空话的“理论家”。其次，要依照各级干部程度的高下，决定学习的内容，平均主义是无法取得学习成绩的。学习时，应根据这一原则：即由浅而深，由中国到国际，由少而多，由近而远，由具体而抽象。最后，关于学习计划亦应具体，认识学习的对象，然后决定学习什么。（二）学习组织：第一，县区乡各级原有的学习小组，应立即健全起来。过去不好的小组须加以改造，吸收政治水平较高而且肯负责任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尚未建立小组的各机关，应迅速建立起来。第二，讨论问题，切不要过多，务求深入，同时应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第三，对一般群众，首先加强识字组的工作。严格纠正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只注意数量而不注意质量的缺点。限期消灭文盲。

1939 年 1 月 2 日　毛泽东指出要高度重视财政经济问题。他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各个抗日根据地不但要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而且要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亲身参加生产。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1939 年 1 月 5 日　毛泽东论革命队伍中的青年。他在为安吴

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中指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1939 年 1 月 15 日　王稼祥论发扬民力和使用民力问题。他在《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要高度的发扬民力和合理的使用民力。为着高度发扬民力，必须开放抗日民众运动，改善民众生活，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吸收民众到军队游击队中去，组织民众武装，吸收民众参加政权，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但敌后抗战是长期的，民力的使用必须合理化，这首先要有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如实行统一累进税，减租减息，增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建立手工业，成立必要的军事工业。征兵要有计划地合理地实施。实行必要的货币政策，如发行纸币，抵制仇币，储蓄和保护法币，不使落入敌手等等。在敌后军队之给养，政府之财政，应该有独立自给应付长期抗战的准备和计划，而不应只依靠中央政府之供给。

1939 年 1 月 15 日　萧劲光论半年来的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一文指出，生产运动的提出，是由于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下，给养供应和军备补充十分困难，为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从消极的节省，而更进一步的到积极方面，提出开展部队中的生产运动，以改善部队的生活，消灭一切不良现象。从 1938 年 7 月决定开展 生产运动半年来，留守兵团不但完成了而且超过了原定的计划。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同时在军备上，也得到了部分

的补充，更加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由于每一个指战员，能深刻了解生产运动在长期抗战中的重大意义，也由于生产运动与本身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大大提高了全体战士的劳动热忱，使部队又成了一种战斗的集体劳动的场所，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许多劳动的英难。根据半年来发展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八路军留守兵团在今后有更大的开展生产运动的必要。今后生产运动的最高目的，是要在长期的抗战中，万一粮饷中断，或接济不上的时候，保证能够自给自足，以继续坚持抗战到底。在目前的可能性上来讲，必须做到能够进一步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并在军务上自己能解决部分的补充。因此，在留守兵团中，组织了统一的生产事业领导机关（不脱离原来的工作），负责统一的计划筹办，和工作的督促、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在今天还是一个尝试，但希望能够迅速的更大的发展起来，这在长期的抗战中，将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希望全国各友军加以考虑或尝试，使生产运动能在全国各个抗日部队中广泛地开展起来，使之成为发展国防生产事业上的一支有力的洪流，以保证战时军队中有源源不绝的物资供给。我们要发扬艰苦不拔英勇抗战的精神，同时并应开展抗日部队中的生产运动，使每一个国防战线上的抗日战士，成为集体劳动场所中的英雄，增加一批新的生产力量。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去做："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

1939 年 1 月 15 日　莫文骅论开展生产运动是留守兵团半年来工作的中心一环。《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莫文骅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部队本身工作的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生产运动是我们半年来工作中心的一环，7 月间毛泽东同志向留守兵团发出"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

的号召之后，及经过后方留守处和后方政治部的具体指示，部队热烈地动员起来，造成了生产的高潮，一般的都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超过了，具体表现在：给养大为改善，每星期可吃一两顿猪肉，并屯积了几个月的柴火和青菜；冬天的毛鞋、毛袜、毛手套自己织成了，过冬御寒问题解决了；有少数部队，还可以自制军衣，棉毛背心；以团为单位开办了一些消费合作社，把盈利补充了一些军用品。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开展集体的生产运动，把生产和战争结合起来。1939 年要开展大的生产运动（种粮食、开菜园、开农场、喂猪、喂羊、办合作社……），以部分帮助给养，更加改善战士生活，甚至准备万一将来经济极困难的时候，亦能自给。如果战争紧张，部队移动时，则留一小部分人员继续生产，不因战争而停顿生产，以实际回答毛泽东同志的“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的号召。

1939 年 1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拒绝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的意见。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共产党诚意的愿和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1939 年 1 月 31 日　王稼祥论党在农村的政策。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对地主阶级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来，积极参加抗战，不能不相当改良他们的生活，减轻地主阶级对于他们的压迫、剥削，减轻他们对于政府过重的负担。但是，这种农民政策，不应过左，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应有一定限度，不要把地主阶级推到日本侵略者方面去，不要使今天的阶级斗争超过于民族抗战的利益，要在“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下解决问题。要改善群众生活，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等工作仍

须作，但应在强调为着抗战的利益下去进行，并且不要把要求提得过高（减租以二五为宜，减息以一分为宜）。工会、农会的工作不仅注意减租减息问题，同时还要提出为抗战增加生产的运动。

1939 年 1 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纲领规定：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和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高度地发扬边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倾向。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发扬自我批评，以增进工作的效能。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材。开荒垦地，兴修水利，大量植树，鼓励家庭纺织业，并发动人民从事养猪、养鸡等副业，以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工业，供给抗战需要；发展商业和合作运动，充实消费合作社，建立集市贸易，开发交通事业；政府应发动人民竞赛，给以相当奖励，以提高生产热忱。

1939 年 1 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号召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为了度过抗战第二阶段的经济困难，准备敌人对边区的可能封锁，改善工作人员的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各机关工作人员，应该全体动员，参加生产运动。这种生产运动，是要在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之下来进行，实行生产运动，做到生活上的自给自足。指出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小手工业、商业、畜牧等事业，而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必须及时动员，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以免失时；必须有良好的组织工作，使每一个工作者都成为生产者，每一生产者都发挥其全部力量；必须进行广泛的、深

刻的政治动员，唤起和激励每一工作人员的生产热忱；耕牛、种子、耕具、土地、组织等问题，另由政府详细讨论，总之以做到完成并超过自给自足为目的。保证从1939年秋收起至1940年秋收止，一年中八个月食粮自给，蔬菜从1939年7月起自给，1939年的冬衣自给。

1939年1月　林伯渠指出扩大生产运动是目前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应该扩大耕地面积，1939年扩大耕地60万亩，增加棉产一倍。要广泛提高劳动热忱，发动妇女学习生产，奖励劳动英雄，发动一切机关学校和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以达到粮食蔬菜自给；广泛发展畜牧，以达到畜牧数量增加一倍。应号召农民集资买进母羊及牛驴，禁止母羊出口和宰杀；发展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颁布奖励手工业生产的条例，欢迎外边的企业家来边区投资，颁布投资保护条例；发展公营企业，川口的纺织工厂应加以扩大，使它能供给各机关、学校、部队衣服的需要，改良并扩大造纸的生产。发展农具、榨油、制革等手工业，以供人民和机关的需要；加强对石油、煤矿的管理，增加生产，提高质量；发展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事业。

1939年1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会议指出，持久抗战，已为确定之国策，发展经济建设，实为保证抗战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粉碎敌人封锁、建立民族工业基础、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边区政府对此工作积极推行，不遗余力，已收到莫大之成效。今后更应在现基础上继续发展。办法是：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开荒60万亩，共修水地1万亩，增加

棉产一倍，改良种子，注意多施肥料，保证1939年粮食生产较1938年增加20%；发展农村副业，提倡畜牧，防止兽瘟，改良畜种，使边区牲畜增加一倍。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的工业，奖励商人投资，提高工业生产。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之困难。

1939年2月1日　罗瑞卿谈军队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他说，军队中的干部教育，应是整个军队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应当开办更多更切合于抗战需要的军事政治的学校，注意军队干部的更多培养以外，而重要的一环，则应当加强部队中在职干部的军事政治的教育。在谈到怎样开展部队中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在军队中要特别强调教育对在职干部的重要性，使全军干部尤其是军事政治的领导机关，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和足够的认识。第二，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必须更加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要按照各个部队的具体情形，规定出一定时期内的教育计划，并分别规定出适合于各级干部的具体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以及一定时期内对各级干部教育进度的具体要求。第三，为了便于教育的进行，必须把全体干部适当地组织起来。组织原则，必须按照各级干部的程度。组织的办法，大体上连排两级及机关中的科员干事，营团两级及机关中的股长科长分别组入同一教育单位内，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应另行组织成学习小组。第四，依据各级干部的不同程度分别确定不同 的教育内容，采用不同的教材。第五，教育方法上，应依据高级、中级、初级干部的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对于高级干部的教育方法，主要采取自修——自己读书和小组的集体讨论两种；对于

中级干部，除自修和讨论外，还应采取集合上课的办法，而且上课和讨论成为主要的方法；对于初级干部，主要采取上课和讨论的办法。在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必须切实注意理论和实际联系的原则，要坚决反对和防止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第六，要解决教员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最好能找出富于理论素养的同志作指导员；在中级和初级干部中，可采用干部教干部的办法，也可找经过抗大教育过的干部担任学习小组的指导员。第七，要解决学习时间问题。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学习，要在整个工作时间内挤出一定的学习时间来。最后指出，根据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的指示，对于军队的领导机关，应当大大加强干部教育的组织和领导，把干部教育当成整个军队教育的极其中心的一环。对于每一个干部，则应当以虚心的谦逊的态度随时注意学习，放下自己的架子，认真的老老实实的去学习一点东西。

1939年2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李富春在报告中阐述了生产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指出在今天抗战阶段中要克服一切困难，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参加劳动，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发展我们边区的农业工业各种生产，保证我们后方和前方财政经济物质上的供给能自给自足。生产运动的发展，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并要用边区发展生产运动模范的实例去推动全国的生产运动。同时指出了发展生产运动存在的困难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和具备的有利条件：第一，边区的广大民众，是完成生产任务的主力军；第二，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所有脱离生产的部队机关学校有5万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第三，边区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有吃苦耐劳不向困难投降的革命传统；第四，过去在个别地方发展生产运动已取得了相当的经验。这是完成生产任务的最可

靠的保证。李富春还提出了生产运动的具体计划，指出发展农业是生产运动中心的一环，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要求全边区 200 万民众和党政军各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留守兵团、保安部队都要参加农业生产，为增加农业生产而斗争。为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要建立生产运动委员会，受总生产委员会的领导。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生产运动的教育、动员工作，组织和调剂劳动力，建立检查和奖励制度，并组织对生产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进行研究交流，不断推动生产运动的发展。他号召每一个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和战斗性去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伟大的生产运动的任务而斗争。

1939 年 2 月初　王稼祥指出应把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放在头等重要地位。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和其内部磨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应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应教育党员，忠实于党，忠实于无产阶级，就是忠实于民族。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员是阶级的战士，民族的战士。要克服党员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提高纪律性。

1939 年 2 月 12 日　周恩来发表《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他指出，好的干部，是建军的骨干。没有几万个政治坚强生活刻苦且具有现代化的军政知识的青年干部，军队的骨干是建立不起来的，干部的培养，不仅注意于数量，更须注意于质量，尤其须注意于师资教材学习方法及生活训练。干部如果不能从最下级工作做起，不能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工作，便算不得好干部，便担负不起建军的责任。他还指出，建立和加强政治工作，更成为建军工作中心之中心。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为要以军事推动政治，以建军保证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更须在军队

中建立坚强的政治工作，抗战后军队政治工作，虽粗具规模，但一般的说，工作重心还在上层不在下层，还在后方不在前方，还在机关不在部队，还在我后不在敌后。今后欲树立政治工作的楷模，就应先从补整的部队及深入敌后的部队做起，工作重心更应放在下层。文章强调说，我们要以坚持抗战的苦斗精神，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并且要战胜一切物质上的引诱。这样，才能养成刻苦自励的民族精神。

（二）加强党内学习，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1939年2月17日　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洛甫（张闻天）兼任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负责干部的学习教育等工作，以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

1939年2月　刘少奇到达竹沟。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从洛阳经临汝、叶县等地来到竹沟，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并要求抓紧把干部转移到敌占区去发动人民抗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在中原局办的学习班上作了报告，着重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及论党内斗争等问题，批判王明的假马克思主义和极左的斗争哲学。

1939年3月1日　毛泽东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1939年3月3日　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在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指出，要关心妇女大众的生活改善，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学习耕种，开

办手工厂，参加合作社、互助社及设法办保育院等。改善妇女生活，必须首先注意改善抗日军人家属的生活，发动群众优待、尊敬、帮助、慰劳抗属，组织和教育抗属。

1939 年 3 月 3 日　李富春论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新中华报》发表李富春《论生产运动》的文章。他阐述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意义：第一，动员全民的生动力量，加紧劳动，发展生产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持久抗战中的一切困难特别是财政经济物质的困难。第二，进行全边区 200 万人民和党政军学各机关、各部队的生产大动员，发动人力，发展农工商业保障人民的利益，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生主义的初步。第三，我们的生产运动，不仅动员已经从事生产的人民，而且特别动员一切脱离生产的人员，在基本上不妨碍战斗、工作和学习的原则下，号召和组织各机关各学校各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劳工神圣”的精神从事必要的劳动，不仅使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一致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作人民的模范，并且可以增加生产克服经济的困难，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加减轻人民的负担，使军队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知识界和劳动界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这就是必须使一切脱离生产者从事生产的主要意义。

1939 年 3 月 15 日　谭政说生产运动有伟大政治意义。《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谭政对延安军事部门检查工作的总结中指出，过去的一年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绩。在生产运动方面，为解决陕北物质困难、经费不足的问题，在一切为着抗战的口号下面，提出了生产运动的口号。其办法是：组织一切人员，在工作之暇，大家从事于各种可能和必需的生产，并发起生产的竞赛，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从 1938 年以来部分生产起，到 1939 年中共中央号召的大规模生产，已经出现了一个热烈的生产运动。1938 年在延

安的许多机关部队中，尤其边区的留守兵团中，生产运动有了相当显著的成绩，生产的事项有种菜、养猪、做衣服鞋袜、烧炭、采柴、挖窑洞、开办合作社等。经过一年的努力，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各个单位，多少有了一些积蓄。这种生产运动的特点是，本来脱离生产的部队，现在却仍然没有和生产脱离。而且变成了集体的生产。当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度过难关而斗争的时候，这种生产运动，是有伟大政治意义的。

1939 年 3 月 22 日　《新中华报》号召使生产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在社论《生产突击》中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一个多月来取得的初步成绩，表现在：领导者和各级干部的模范的领导作用，全体人员劳动热忱的发扬和动员的广泛，生产组织的建立，和全体人员直接地参加到生产运动中来，已开始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但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点。社论说，根据目前生产运动的情况，中央财政经济部决定，在本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实行生产突击。各单位按着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一周至半个月的突击计划。社论要求，突击运动应该超过于寻常的工作效率；要进行更深入的政治动员，激发每一个人员的劳动热忱，自觉地参加劳动，克服个别轻视劳动的倾向，创造和发现成千成万的劳动英雄；要适当地组织和调剂劳动力，把每一个人员吸收到生产运动中来，使之成为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

1939 年 3 月 22 日　《新中华报》报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校进行第一次生产检查。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学校（11 个单位）的生产运动，在以王首道为主任的总生产委员会的推动与领导下，根据已拟定的总生产计划，现正各个分头在积极进行着。洛甫亲自领导中央秘书处宣传部开荒，陈云、李富春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集肥工作。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生产成绩最好，已开荒 120 多

亩。中央党校也开荒地 100 多亩。通过生产检查，获得了一些生产的经验教训。

1939 年 3 月 22 日　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举行生产动员大会。《新中华报》以《一年之计在于春，生产运动开始了》为题报道了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举行动员大会，对生产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党中央直属机关学校总生产委员会主任王首道参加了陕北公学的生产动员大会并讲了话，报告了 1938 年生产运动的经验教训和 1939 年的方向。邓发参加了中央党校的生产动员大会，给大家讲述了生产的意义，指出生产运动在边区，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口号变为实际，胜利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为了坚持抗战，改善生活，不仅边区进行生产运动，全国也应进行。

1939 年 3 月 25 日　《新华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掀起生产运动热潮。陕甘宁边区各界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各机关计划种地 3600 垧（每垧 13 亩），争取 1940 年实行粮食自给。

1939 年 3 月　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发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他指出在新阶段，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新四军是有发展前途的。他号召新四军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指出了新四军所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一）坚持游击战争，拿战争的胜利来克服困难。（二）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三）坚持强大自己，使我们的部队发展，地位提高，力量增强，

这样才便于我们在大江南北进行工作。（四）坚持深入群众，使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为民众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我们要到群众中间去埋头苦干，扩大我们的影响。（五）坚持帮助友党友军，我们采取帮助、影响的方法，使友党友军感到我们是可以合作的朋友。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针。讲话还指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1939年4月10日　李富春指出生产运动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和精神。他在为《新中华报》写的专论《生产突击以后》中指出，延安附近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从3月20日起到4月9日止所进行的半月开荒突击胜利完成，“不违农时”地在播种以前开好荒地5.4万亩，确切地证明了党中央号召的生产运动已得到广大人民用他们的血汗来热烈拥护，生产运动已成为广大群众运动了。中共中央所号召的生产运动，已经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从事生产，已经把生产运动的影响广布到全中国去了。同时，生产突击运动的完成，发扬了革命的友爱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硬干、实干、快干的精神。专论还指出，必须抓紧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原则，不违农时地在全边区的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都能胜利地完成农业生产的任务。

1939年4月19日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1939年4月26日　中共中央论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发布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要动员全国人民奋战到底的精神，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伟大的抗战时代，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一切

不愿意作汉奸的人，必须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尤为必要，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分歧错杂的错误思想，要纠正一切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邪说，大力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要纠正一切破坏军令政令等无纪律现象，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要纠正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企图，纠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企图。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1939 年 5 月 1 日　毛泽东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关系。他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和“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讲演中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他还指出，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9 年 5 月 1 日　毛泽东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在《解放》周刊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

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希望全国青年和文化界，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939 年 5 月 1 日　刘少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他提出：（一）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组织民众，必须首先启发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了解他们有互相组织的必要，然后根据民众的这种自动性，给以推动、协助和引导，才能真正地组织民众。应该教育民众、说服民众、启发民众的要求和自动性；并协助民众组织起来。（二）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根据民众的不同要求，民众团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如各种政治组织、文化组织等。必须在民众种种要求上组织种种不同性质的民众团体，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除了用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去组织民众外，还必须用民众的经济要求和经济口号去组织民众。(三)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民众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要求，要组织民众，必须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组织，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多数。在各种组织中，产业组织和职业组织是组织民众的主要方式，因此，主要的民众团体，应该是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体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的团体等。如果在全国各地到处建立这些组织，那就可能真正的组织民众的大多数。

1939 年 5 月 4 日　毛泽东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他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 2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革命的根本力量、革命的骨干是占全国人口 90%的工

人农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回顾50多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青年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讲演重申了“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1939年5月15日　罗瑞卿论述抗大两年来的成绩和经验。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的《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一文中指出，抗大不同于其他任何学校，处境特殊艰苦和困难。具体地说：人力不够，干部尤其是教员，经常感到极大的

缺乏；财力不够，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必须的费用，仅仅依靠外力，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援助来支持；物力不够，全校用具缺乏，教育最低限度的设备器材和军事教育上各种必需的兵器缺乏或根本没有；经验不够，抗大是一个划阶段的创举，没有任何以往经验的继承；学校的复杂性，学生来源有八路军干部，有一般的学生，军队干部中职务相差很大，一般学生中的文化水平也相差悬殊，各方面都有极大的距离和差异；学校的流动性，随时组织队伍，随时也在解散队伍，随时有学生入校，随时也有学生出校，随时在开学，随时亦在毕业；学校扩大太快，使主观力量的准备，赶不上客观方面的要求；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基础，在工作开始时，没有党的骨干作用，在许多工作的推动上，感到有组织的政治保证不够；汉奸托匪及一切反对我们的奸人的破坏和捣乱，给我们的工作上以阻挠和困难。在上述困难的情况下，抗大两年余却获得了很大成绩，完成了党所给予的培养干部的伟大任务。(一)培养毕业的干部，学校给了他们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给了他们一定的有用的军事政治的知识，给了他们所必须具备的艰苦卓绝、不怕困难的革命传统和模范作用，就是说每一个抗大的学生，他们是学到了一些切合于当前抗日需要的东西，完成了党所提出的“把军队干部普遍提高一步”的任务。(二)大量的建设了党，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对于“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一切足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优秀青年，在其自愿的原则下，均被吸收于党内。(三)培养和创造出一大批忠实于教育事业的学校干部，使学校的组织机构，由极端简陋的状态中，逐渐强化起来。(四)学校的各方面都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创造了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教育理论，确立了一大套比较切实的工作办法。

（五）坚持了党的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优良传统。两年以来，战胜了校舍、教育设备、经费和人力的困难，艰苦的生活，已成为全体人员的一种习惯和作风，他们自己动手挖窑洞，自己动手进厨房，自己动手背柴背米，自己动手修理校舍。最近轰动全边区的生产运动，抗大亦给了中共中央这一伟大号召以最响亮的回答。

（六）抗大保持了学校和地方居民、群众团体、政府机关的友好关系，也进行必须的对外宣传，使抗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获得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关于抗大今后的工作方针，罗瑞卿指出，要深入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把六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贯彻于学校工作的各方面。继续运用和发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个整个的教育方针，以及实现这个方针在教学工作上继续贯彻“少而精”，“理论和实际联系”，“理论和实际并重”，“军事政治教育按需要的适度配合”，“集体学习”，“自动学习”，“互相帮助学习”等原则。

1939 年 5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央决定建立各地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宣传部下组织宣传委员会，统一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从中央局直到中心县委，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应设法争取对于某种公开刊物的影响。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文化运动的领导。应以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党的建设和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训练干部。宣传部应负责组织同级在职干部的学习，订出一定的学习计划，并保证完成。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刊物的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及读书会等。

1939 年 5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大会。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千余人到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应采取的

学习方法，提出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会上，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对学习运动的重要、干部的现状、今后的学习计划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报告。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洛甫作了学习须有持久性和恒心等问题的讲演。

1939年5月23日　李富春论延安各单位检查工作的内容和今后努力的总方针。他在《延安检查工作的总结》中指出，中央书记处号召在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组织部门，依据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和精神，实行有计划的工作检查，使六中全会决议见诸实行，就是这次进行部门工作检查的意义。检查工作分五个方面：第一，检查过去的工作，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是否尽职尽责；第二，检查学习方面的工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绩如何；第三，检查生产运动方面的工作，发展生产的成绩有多大，要总结生产运动的经验，尤其是后方兵团的经验，作为今后更普遍更广大的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和参考；第四，检查每一个同志是否彻底理解和坚决执行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五，检查党的生活是否健全，党的组织的发展及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在什么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下进行的，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是否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检查工作肯定了优点和成绩，找出了缺点，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意见：以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武器，总结工作成绩与缺点；今后党、政、民、学各方面在行政上、组织上、工作上努力的总方针是：（一）组织任务赶上政治任务；（二）由局部的工作转变到全边区、全国的工作；（三）以新的工作制度适应新的任务与新的组织；（四）以科学的工作方式来代替手工业方式；（五）努力生产，努力学习，使锻炼身体与锻炼头脑并重；（六）适

当的组织，配合适当的干部；（七）团结与教育各方面的全体党的与非党的干部，像一个人一样，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1939 年 5 月 23 日　陈云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所有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最高责任。他在《为什么要开除刘立功的党籍》一文中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份，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文章同时指出，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所以，不能只讲“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另一个主要的原则是党的工作的需要。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每一个党员应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党分配的工作。文章告诫全党同志，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观察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行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并指出，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党的纪律的倾向作斗争。要对党员进行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

不能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文章还针对一些同志不愿到基层工作的思想倾向，指出，学校里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并取得实践经验更重要。干部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班长要从老兵中提升起来，区委书记要从支部书记中提升起来。领导工作的能力要从下层的实际工作中生长起来。

1939年5月24日　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延安检查工作总结的决定。中央指出，这次党、政、军、民、学普遍深入的以前少有的工作检查，是完成了中央书记处在六中全会后关于工作检查的指示。这次大规模工作检查，是各方面组织工作的检查，中央书记处认为这次检查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为使这一检查的经验发展下去，中央指出：（一）此次检查是为了使各部门工作的更加进步，而这种工作之更加进步，还有待于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党与非党的工作人员依据此次检查总结所决定的一切制度、办法、切实努力地做去，才能达到目的。（二）依据此次检查经验建立经常的工作检查制度，这是改进工作的有力的与有效的办法。（三）拿这次检查经验运用到全国各地党的工作中去，使全国工作在及时检查之下，更加适合于党的政治任务，达到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之目的。

1939年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占区党的组织及工作任务的指示。中央指出：（一）在敌人进攻下，或某地被占后，当地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扩大游击战争，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二）党及政府民众团体的指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在游击队掩护下领导与巡视下层工作，并将可能隐藏的干部，分配去加强区村的领导。（三）一切技术机关，应秘密建立在群众中，特别加强秘密交通网的建立，以保持上下联系，并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四）严重注意保存干部，不适于环境的应送到上级党部训练和派

到八路军游击队中工作。无法立足的党员，可动员到军队游击队，或在安全地方开办普通训练班，收容和教育他们。在恢复联络党员的党籍时，应加以郑重考察，防止叛徒敌探混入。（五）加强游击队的巩固与扩大，组织强大的游击队，游击队每至一处都须有党的政府的代表及群众领袖，使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六）在敌人统治较严地区，党的组织应转入非常秘密的形式，党应研究许多的斗争方式，去反对敌人和巩固群众情绪。（七）加强党内教育，防止张惶失措、悲观动摇的现象发生。

1939 年 5 月 26 日　毛泽东论抗大的教育方针。他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写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

1939 年 5 月 30 日　邓小平论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他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一个浅近的真理。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敌后方的我国党、政、军、民，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抗战，要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第一，要把一切民众分别地组织在各种民众团体之内，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商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第二，要善于运用和经过这些群众组织，去进行广大民众的抗战教育，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自觉自愿地协助政府和军队；第三，每个民众团体，应关心会员的要求，尽可能地领导会员解决一些切身的困难与痛苦；第四，军队和政府必须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并

给以必要的协助；第五，在民众中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在解决各阶层间的问题时，必须各方兼顾，采取调节、仲裁、协商的方式，求得合理的解决，以巩固各阶层的团结，使敌人汉奸无可乘之机；第六，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敌人进攻的关头，必须足够地计算民众的力量；第七，在敌人占领区，必须了解群众所处的特殊环境与困难，因而，那些地方的民众组织和斗争方式，都应该是不同的。要站在保护民众的立场上，去教育他们如何与敌人进行隐蔽的可能的斗争。在敌后方许多地区，根据这样的方针去组织和动员民众，提高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每次反对敌人的斗争中，民众都发挥了伟大的力量，军队和政府依靠着民众力量，克服了许多困难。

1939 年 5 月 30 日　陈云论共产党员的标准。他在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论述了（一）入党资格，（二）党员的成份，（三）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四）候补党员，（五）共产党员的标准等问题。在共产党员的标准一节中指出：（1）共产党员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2）共产党员要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要求每个党员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3）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每个共产党员要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高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4）共产党员要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每个共产党员

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无论在任何困难和生死关头的情况下，都要坚决地忠实于党的决议；(5)共产党员要做群众的模范。每个共产党员应以实际行动，争取成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内部团结统一、廉洁清正、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6) 共产党员要努力学习。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要向群众学习。并强调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下，首先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现象。要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必须有坚持的精神。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全党应该热烈地响应党的六中全会提出的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的口号。陈云这一著作是延安整风必读的 22 个文件之一。

1939 年 5 月 30 日　朱德建“抗日井”。八路军总部驻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缺水，朱德等率八路军战士与群众一起，挖出一口大水井，解决了群众的吃水困难。群众称这眼井为“抗日井”。

1939 年 6 月 1 日　罗迈论干部教育问题。他在发表的《我们要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一文中指出，党的六中全会把学习理论的任务，提到了党的建设的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学习理论是全党的任务，全体党员都应当学习，党的干部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尤其需要加紧学习，需要更多的学习。结合学习的内容，要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中国问题、党的建设、军事问题，以及时事政治问题。怎样学习？他指出，按照由浅入深，

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级来进行。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的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他要求，一般采用个人学习和集体商讨两种方式，而应以个人自习为主，集体为辅；学习要有信心、决心，有顽强的精神，还要有恒心，有经常性，经常的学，不间断的学；要会抢时间学习，要虚心，要有高度的自动性。他说，干部教育是一种永久的经常的工作，是党的建设中重要的工作之一。全党的组织系统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机关中，都应该设干部教育部或在宣传部下设干部教育科，逐步建立起工作的规模，积累工作经验。

1939 年 6 月 2 日　延安《新中华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干部学习进展情况。在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以前，他们的学习就已经开展起来。大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规定，他们依据每一个同志的文化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组学习党的建设，丙组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发表的专论和社论。学习时间统一安排在上午 7 时至 9 时半，采取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并用的方式。讨论会 3 天开一次，把学习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1939 年 6 月 5 日　中共中央要求严格财经制度。中央在发布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财政经济日益困难，除积极加紧生产以谋自给外，目前特别要注意认真的严格地建立财政经济的制度，发扬艰苦作风，厉行节省，以便坚持抗战，坚持长期艰苦斗争。中央决定：严格统一收支；严格建立预决算制度，坚持节省的原则；建立会计审计制；为着调剂财政困难，必须厉行节省，以简单朴素为原则，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

1939 年 6 月 6 日　毛泽东要求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的，要一生代表他们。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奋斗，永远奋斗。

1939 年 6 月 10 日　毛泽东论教育和生产。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一) 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二) 干部教育问题。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 17 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 3 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三) 学习运动。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学习运动是一种长期大学校，每日 2 小时学习制。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学习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的机关与人员。(四) 生产运动。一切可能的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房、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边区 1939 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五) 团结战胜一切。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必须更加集中：减少不必要的民主。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六）加紧党内教育。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七）党应保护革命知识分子。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要吸引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加强群众运动，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1939 年 6 月 10 日　陈云论党的支部工作。他在《解放》周刊上发表《党的支部》一文中，阐述了支部的组织、支部的基本任务，地方党部如何领导支部的问题。在支部的基本任务中指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支部是征收党员的机关，支部是教育党员的学校。还指出，地方党部对于支部领导上的重要一环，就是培养支部的干部。要经常注意挑选和培养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干事），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掌握开展工作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责任心。要尽可能举办支部干部的临时训练班，或者经常地进行个别谈话。

1939 年 6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对直属各院校干部学习进行总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各院校在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下，积极进行干部教育工作，热烈响应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号召，把工作、学习、生产结合在一起。进行学习总检查的单位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计划规定，每星期对丙组干部讲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政治常识、时事分析等课程。

1939 年 6 月 20 日　总政治部成立学习委员会。学委会下边

成立若干学习分会，负责督促与检查各单位的学习。甲组的学习分为三类：高级首长属于第一类，采取专门研究的方式。科长以上属于第二类。科长以下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属于第三类。乙组的同志研究党的建设。学习委员会经常帮助各组解答问题。

1939 年 6 月 22 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发出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已经并且继续集中力量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及我游击部队。因此，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政治工作上，巩固自己，准备自己，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联络友军，巩固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以坚持抗战。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在军队的物质方面，应有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行节省运动，节省财政、弹药、医药、通讯材料等，另一方面进行征集资材的工作，进行生产运动及合作社运动，帮助地方政权开发资源，调集一批干部，加以训练，以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

1939 年 6 月 23 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立学习检查制度。为推动学习，有的大队组织了干部学习检查委员会。学习的内容是，甲组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乙组有的学习六中全会文件，有的研究党的建设，有的讨论总政治部测验抗大干部与党员的 10 个题目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

1939 年 6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在发布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中指出，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重视了解新的革命知识分子，耐烦地带领他们，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虚心从实践中学习。

1939 年 6 月 27 日　王稼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成为抗战的重心。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的《目前抗战的政策与战略的中心问题》一文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巩固国内团结统一，巩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反共。我们应当认识，敌后抗战已成为目前抗战的重心，游击战略已成为目前抗战的主要方式，敌后抗战的军队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军事素质。而我后方政府，军队与民众应在各方面尽力给在敌后艰苦奋斗的军队、游击队、地方政府及民众以切实的接济与帮助。总之，在抗战二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是：坚持统一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动摇投降，以粉碎日寇诱降和瓦解抗战阵线的阴谋政策！中国人民的军事任务是：真正帮助接济和巩固敌后的抗战，布置正面的防御，以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准备反攻，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1939 年 6 月 30 日　洛甫提出对全国的军队、政治、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主动的、大胆的、彻底的、迅速的改革。他在《新中华报》发表的纪念中共十八周年文章《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路线是：它始终站在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坚持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用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驱逐日寇出中国，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立场上。它坚决主张全国军队、政治、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动的、大胆的、彻底的、迅速的改革，尤其着重于民主自由权利的保障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着手于大量发动、组织与武装民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中华民族与国家内取得应有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平等地位。它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对于全国一切参加抗战的阶级、阶层与党派有利，而不只对于少数上层分子有利。

它主张力争外援，但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的立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所必须采取的路线，也是完全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路线。

1939 年 6 月 30 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调整干部学习组织。他们根据中央干部教育部关于学习的指示，把以前的各种研究小组改编为甲乙两组，按中央干部教育部的规定进行学习，每周定期召开讨论会。乙组还组织有党建座谈会，每周邀请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作报告。使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

1939 年 6 月 30 日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两年来的抗战，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与全体人民争取解放的最好力量。共产党的巩固、强大与发展，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荣与利益，而且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光荣和利益。

1939 年 6 月　总政治部要求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在发布的《关于加部党内教育的训令》中，决定在三个月内将对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的新党员，进行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

1939 年 7 月 6 日　彭德怀提出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六项要求。他在《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文中指出，巩固根据地是坚持敌后抗战的最基本任务。第一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巩固根据地的首要任务。而统一战线下层的基础巩固是最重要的事，而目前最主要还在于改善下层群众的生活。第二是实现民权主义改善行政机构。民主政治是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只有实现民主，才能密切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才能建立廉洁政府，提高政府的威信，要确定赋于人民以民权主义所规定

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以改善县、区、村政权。第三是武装民众，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强大的民众武装和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坚持敌后方抗战的必要条件之一。第四是发展生产合作事业。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封锁，排击敌人的商品倾销政策，基本的是发展我们的生产合作事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简单说来，便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开办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生产必需品，自己来运销。敌后方的全体军、政、民应该把此看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事业之一。军队方面自己要进行生产，更要鼓励人民生产，政府机关、民众团体要研究增加生产办法，并奖励人民生产。第五是加强锄奸工作，揭穿敌人形形色色的阴谋。第六是严整部队的纪律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部队内部都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要加强部队内部的教育，尤其是干部的教育，以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文化水准，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发表，党的建设的加强

1939 年 7 月 8 日——12 日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讲演论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等问题。在“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

行修养”一节中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一节中指出，我们要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是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只要我们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是可以成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在“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一节中指出，共产党员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即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还指出，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坚持的修养方法。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因此，共产党员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一节中指出，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党性的一种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无产阶级政党原则和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在“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一节中指出，解决党内的矛盾，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克服党内的分歧。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同志不但应该有党外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而且应该有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和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巩固、发展和前进。这一著作是延安整风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这一著作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7月18日　高自立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生产运动。他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级机关工作人员总结开荒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要我们每人种 3 垧地以自给，要不失农时来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各机关均每人已达到 4 垧半，而且在 6 月上旬便超过了任务，不仅未失农时，且提早完成。中共中央叫我们一方面生产自给，一方面不放松行政工作，这一指示，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因为不仅生产了，且帮助与领导了全边区人民的生产运动。在这一时期还建设了新市场，进行了学习运动，财政工作教育工作也都发展了。总之，已顺利的完成与超过了生产运动的第一步任务。

1939 年 7 月 20 日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上去，到农村工厂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1939 年 7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中央指出，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全党同志应深刻认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只有用一切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反共危险，推动中国进步，增加抗战力量，坚决奋斗，才能争取相持阶段与最后胜利的到来。

1939 年 7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培训知识青年的方针。在发出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青年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的办理方针是，应当把知识青年训练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着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课目不宜太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同时提出了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并强调，抗大分校必须在当地最高党及军事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宜所谓独立自由及各自为政，而党军机关亦必须对分校工作负完全责任，抗大本校在达到目的地进行深入的讨论，彻底转变工作。

1939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中央指出，根据各方材料，证明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我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起来，在舆论、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坚决反对中国抗战阵营内部任何人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

1939年8月13日　张鼎丞谈新四军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工作方针。他在《新四军怎样与大江南北的民众共同坚持抗战》一文中指出，新四军关于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工作方针是：第一，以积极抗日行动争取抗战不断胜利，去推动和提高民众抗战情绪。第二，严整本军的政治纪律，严肃军风纪，从实际行动上建立与民众的良好关系。第三，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建立与友军及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以及与当地知识界和绅商各界的抗日先进分子的良好关系。第四，运用适当方式商同地方当局进行抗战动员工作，以适应军队与人民共同抗战的需要。第五，用适当方式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第六，推动和帮助现有的地方武装积极抗战和军事政治的训练，争取不断的胜利。努力去普遍建立与训练不脱离生产的民众自卫武装。第七，动员民众进行反对汉奸、肃清汉奸的运动，和瓦解伪组织第八，在中国政权已经失去的地区，

进行恢复中国政权，推选坚决抗战深孚众望的人士，充当保甲长，使沦陷区政府与人民亲密的共同抗战。第九，提拔和培养抗敌救亡的群众工作的干部。在这样的方针下，大江南北的人民的确开始起来了：第一，大江南北的人民开始动员组织起来了，有各级抗战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很大数量农民参加的农民抗敌协会，有工人抗敌协会、商人抗敌协会、文化界知识界、学生青年男女的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有战地服务队、宣传队等等组织。第二，江南皖南的人民对于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的工作，做得很好，表示了群众的抗敌热忱。第三，积极拥护和帮助抗日军队，如，群众帮助我军作向导、当侦探、运输、担架、抬扶伤兵、交通采买等；慰劳抗战军队，帮助我军脱险等。第四，大江南北的群众大批的武装起来了，大批的抗日游击队积极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第五，群众自动的热烈的参加抗日军队。第六，群众对于反对汉奸清除汉奸的斗争，非常坚决热烈。第七，群众在参加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不少县区政府的同情和爱护，因此解除了不少痛苦，生活也改善了一些。

1939 年 8 月 24 日　王稼祥提出要培养一批好的知识分子党员作为党的骨干。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需要一批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比农民还好，要培养他们成为党的骨干。知识分子中贫苦的知识分子是好的，八路军干部中贫苦知识分子占多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入党后须进行下列教育：（一）教育其有阶级立场，清洗其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立场。（二）教育他们有组织性与纪律性，反对他们的散漫性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纠正他们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三）教育青年学生党员要重视民众中的实际工作，纠正他们轻视下层工作的倾向。（四）教育他们尊重工农，反对轻视工农

的倾向。

1939 年 8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为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特奸细；要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团结新老干部，对于干部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必须有专门的计划和经常的进行，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准与工作能力；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联系；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 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

1939 年 8 月 30 日　罗迈提出改进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意见。他在《怎样展开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从学习动员大会到现在，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已经 3 个月，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已经初步的建立起来了，甲、乙、丙三类的学习也已经初步的进行，大部分已经进入了学习运动的轨道。总结两个半月的学习经验，他强调：（一）学习的组织上的领导，应属于支部干事会和总支委。支部应当把组织和推动干部学习当作自己的主要的中心工作之一；总支委和支部干事会应当设教育干事，有 50 个干部以上的支部或总支委，教育干事最好是专任的，至少应当规定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学习。（二）要求所有行政上的领导同

志对此给以极大的注意，他们应当注意给干部以必要的学习时间，推动支部领导机关去推动学习。(三) 教员和指导员是我们学习中极关重要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应采取的具体办法，希望所有的指导员和教员热心和切实的履行指导和教授的责任，把帮助干部学习当作全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四) 在学习方法上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1939 年 8 月　毛泽东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在写给延安《解放》周刊的信中指出，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解放》周刊在 81、82、83 期连续刊载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

1939 年 9 月 5 日　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超过 1939 年计划。《新中华报》报道：陕甘宁边区开荒百余万亩，超过计划 45 万亩。报道说，边区政府基于中共中央生产运动之伟大号召，于 1939 年春拟定生产运动的具体实施计划：计全边区应开荒 60 万亩，兴修水利 1 万亩，植树 60 万株，畜牧方面，羊发展到 100 万只以上，牛驴各发展原有数的 1/3，另外并发展生产合作社 100 处。据边区总生产委员会的生产总结报告统计数字：计开荒下种完成 105.5834 千万亩，超过原定计划 45.5834 万亩，其中各机关、学校、部队开荒 13.6 万余亩。植树 139.2116 万株，兴修水利完成 5493 亩。畜牧方面，羊已扩大到 101.2786 万只，牛扩大到 13.7194 万头，驴扩大到 9.4007 万头。建立生产合作社 121 处。

1939 年 9 月 10 日　李富春对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作出初步总结。他指出，自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号召发动生产运动以来，经过全边区人民与工作人员的不懈怠的努力奋斗，半年来工农业各方面生产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边区在坚持抗战下保

卫边区解决财政物质困难与更加改善民生的基础。成绩的具体表现，主要在农业生产方面，原来计划开荒 60 万亩，完成实数为 1055834 亩，植树 100 万株，完成实数 1392116 株；发展羊 100 万头，完成实数 1012786 头；驴由已有的 78810 头到 97400 头；牛由原有的 102500 头扩大到 137194 头；修水利 5943 亩。其中在开荒总数中，脱离生产的在职的党、政、军、民、学人员约 4 万人，共开荒 136748 亩。在工业方面，建立了毛织、棉织难民工厂、农具工厂、制药厂、制革厂，还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工厂，如造纸厂、肥皂厂、铁器厂、缝纫工厂、制鞋厂、磨坊以及小的煤矿厂等合作小型工业，还发展了农民中的农村手工业。在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在毫无技术的现成基础与人力、物力、财力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来发展工业生产，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创造，经过“自力更生”的艰苦努力，可以说是奠下了“自给自足”的初基。

1939 年 9 月 18 日　陈云指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他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巩固党的首先而且基本的工作是巩固党的内部，教育党员，清除坏人。但是，当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的时候，除了去整理支部内部以外，同时应该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推动党员到群众工作中去锻炼，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都可以帮助党的组织的巩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所以，要把整理党的内部与加紧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支部的责任，不仅应该接受上级所给的任务，而且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要把“经常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作为指导支部工作的中心之一。

1939 年 9 月 25 日　王稼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坚持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共产主义的信徒，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们绝不因为任何原因而一时一刻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因此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共同纲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思想与信仰。三民主义的纲领与共产主义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虽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强调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与运动，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唯物辩证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具体的分析中国历史的、经济的、阶级的环境，订出他们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纲领和主张。还指出，反对任何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混同起来的企图，任何企图证明只有三民主义适合中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反动的，任何希望以三民主义来溶化和消灭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企图，都是非科学的反革命的。

1939 年 9 月 27 日　中共中央指出当前党的工作中心是巩固而不是发展。在《对冀察晋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党要用一切努力巩固党、巩固军队来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在政权建设中，要把各级政权紧紧握在我党手中；在群众工作中，应把全体群众都组织起来，应从发展生产事业、改善群众生活、提高文化教育方面抓紧进行；在党的工作方面，党的工作中心是巩固，不是发展。

1939 年 9 月 29 日　王稼祥指出要加强党内教育。他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一文中指出，要很好地进行党内

教育。对久经锻炼而过去缺乏机会学习的老干部必须找出时间和机会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对于知识分子与学生出身的新干部新党员的教育，第一，应当教育他们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清洗头脑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第二，应当教育他们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纠正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正确的解说民主集中制。第三，应当教育他们深入下层实际工作，重视实际斗争的经验，要他们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四，应当教育他们接受工农劳动群众，决心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不接近工农，轻视工农都是错误的。文章还指出，党内生活是有布尔塞维克的原则。党的铁的纪律应严格的维持，党的思想上的一致与思想斗争应正确的坚持，注意纠正其错误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尽一切努力来为党的巩固坚强和布尔塞维克化而不断的斗争。

1939 年 10 月 4 日　毛泽东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为该刊写发刊词，提出《共产党人》刊物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党的 18 年的历史证明：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相联系着的。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8 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它们三者的关系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

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在文中第一次概括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公式，把党的成长壮大过程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统一理解的过程。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的这一著作在延安精神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3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中央作出反奸细斗争的决议。中央指出，自抗战以来，中央向全党严重地提出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但是各地党的组织及军队、政权机关除了少数地方外，一般的说，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进行工作。中央认为，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加强反奸细斗争的工作，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与党的组织的巩固，不使党与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此，要求各地党的组织采取办法：（一）对反奸细斗争要作为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责成党的书记，军队的首长，负责此工作，并十倍的提高党员的警惕性；（二）要有系统地考查干部和党员，采取一切方法来防止敌探奸细托匪叛徒混入组织；（三）从中央局到地委成立保卫委员会，由党的书记、组织部长、社会部长等人员组成，在有政权军队的地方，由党政军及保卫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之；（四）建立专门的工作部门（社会部），或专门工作人员负责进行日常工作；（五）要在全体党员中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学校中应有反奸细斗争的科目；（六）各地党组织，应下大的决心，提调政治上坚定可靠、能力胜任称职的干部担负专门部门的工作。

1939 年 10 月 25 日　彭德怀谈怎样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

他在晋东南发表的《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的演讲中，解答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关于如何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问题时指出：（一）首先必须有优良的正规军和普遍的游击队，正规军要质量上精，这其中政治质量是主要的。（二）必须有三民主义的抗日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必须适当的改善人民的生活，并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基本利益。（三）必须把一切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不论在敌占区或我占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适当的深入的动员和组织起来。（四）必须看到抗日民族战争前途将来可能更加困难。坚持敌后抗战，不能专门依赖外面的接济，在军队中每个兵士不仅应当是战斗员、组织员、宣传员，同时还应当是生产员，在敌人后方不仅应当筹设小规模机器工业，同时还应当提倡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副业，要用尽各种方法，进行生产。他着重声明，无论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坚持驱逐日寇到鸭绿江边，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坚持进步，坚持三民主义，为建立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1939 年 10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指出今后的工作方针。在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正确估计到平原游击区的特点和今后困难的加多，今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应当是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必须正确的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今后应特别注意对工农群众采取积极的政策，把工农劳苦群众真正团结在我党周围，并加强以农救会为主要中心的群众组织，对当地的国民党采取抵制和孤立的政策。必须整顿内部，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工农及可靠分子手中，应停止党的发展而专心于巩固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反敌探奸细及托派的斗争。领导方式应适合战争情况，力求深入下层了解下层。

1939年11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否则也是不可能的。决定要求各级党部立刻纠正忽视下层群众工作，对深入群众工作缺少讨论与指导的错误现象。同时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具体要求，并明确指出，在目前时期中，共产党认真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不同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下，一步步地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巩固共产党，对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深入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才有可能。

1939年11月3日　陈云谈充分发动群众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他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一）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只有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新党员和新干部要到群众运动中去锻炼和提高。（二）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党的支部要深入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讨论

和决定，经过群众的斗争和努力，去实现减租减息的法令，实现那些今天可能实现和必须实现的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三）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应是党的区委、支部、小组的一项经常议事日程。群众情绪如何，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都是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应该严重注意的。而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

1939 年 11 月 7 日　洛甫谈正确处理党和非党群众的关系。他在《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第一，党是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它必须保持它同群众不同的特性，不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即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儿子，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二，党必须迁就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包括思想、习惯、传统、情绪等），把这个政治水平当作出发点，以接近群众，而同时党必须提高这个政治水平到更高的阶段，以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迁就群众，从群众今天所有的实际出发，是为了提高群众。第三，党必须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要求，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任，而同时党必须使群众从这种切身的、局部的要求的满足中去为了远大的理想而奋斗。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利益，而又领导他们去为了他们的最后解放的远大理想奋斗。第四，党必须善于等待与帮助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了解党的指示的正确，以

便能够同群众一同前进，使党在前进中取得群众的直接拥护。在群众前面，而又不脱离群众，等待群众，而又不做群众的尾巴。第五，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参加到一切有群众的群众团体中去，而同时又能经过这些集体去实现党的统一的领导，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经过群众组织的多样性，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中，又要尊重群众集体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又能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领导群众而又服务群众。第六，党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的一切经验，以便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向群众学习，而又能在学习中更好的来领导群众。

1939 年 11 月 7 日　八路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发布七大纲领。《新中华报》报道，为粉碎敌人阴谋，坚持华北抗战，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布七大纲领：（一）改善民生，减少阶级对立，强固阶级合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实行民主，改善政治机关。人民应有选举权、创制权、罢免权、复决权，并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建立参议会制度，肃清贪污，建立廉洁政府。（三）发动群众游击战线。（四）发展生产合作事业。保护与制造生产工具，振兴手工业与农业畜牧。（五）加强抗战教育与文化事业。（六）厉行锄奸运动。（七）加强抗战部队。动员民众自愿加入军队，切实优待其家属；严整部队纪律，进行政治工作，实现上下一致，军政民一致。

1939 年 11 月 20 日　李富春论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建设的特点。他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一文中，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的特点和边区党的组织工作，指出：第一，明确的建立党的领导系统。党在边区已体现了为无产

阶级及劳动群众的基本领导力量，公开的建立了党的领导系统。在政治上，党必须以自己坚定的政治方针，联合与指导非党组织，向着同一目的、同一方针前进。在组织上，则必须经常注意吸收在一切非党组织中的非党优秀分子入党，来保障党的领导作用。第二，必须普遍的建立党与发展党，只要有居民的市镇、乡村，均应尽可能建立党的组织，吸收积极的工人、雇农、贫苦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劳动妇女入党。发展党的条件，必须依靠于党员与群众生产的经常密切联系，从日常工作中，从每一个群众运动与斗争中去发现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第三，党的组织系统的建立，在于便利工作的领导与深入。为着适合农村的环境，便于领导的灵活与工作的贯彻，边区的行政区域须重新划分，党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系统，必须随着变更。现在边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边区党委，边委之下，依据行政专员设分区，分区之下设县委，区委，支部。第四，要大批培养与引进干部，正确地执行干部政策。要利用公开的环境，充分给党员特别是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一）举办大规模的党校、训练班，及军事的、行政的、民运的专门学校与训练班。（二）要责成各级党部办各种党的训练班，并且上级党部要有计划培养与供给适合于各种训练班的教员与教材。（三）特别要吸收本地的工农出身的男女党员及干部轮流受训，文化程度低的，必须给以一定时期的文化教育。（四）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综合与研究工作经验，定期的分别召开党、政、军、民的各种较大规模的会议，在会议中来教育干部，提高其工作能力，并倡导在工作中的干部学习制度，提高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同时，要更好的正确执行干部政策：（一）党的各级组织部门，应更有系统的、经常的、专门的进行了解与配备干部的工作。（二）需要人材多，故对干部要更好地使用与发挥他们的长处。提高他

们的积极性。(三) 更应当从生活上，特别是从政治上注意爱护干部，基本上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诚恳坦白的态度来帮助干部纠正其缺点与错误，只有对不可救药的分子，应当公开的在党内进行斗争。(四) 要注意党的干部的培养，还须注意非党干部的团结。第五，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严密党的纪律。要严整党的铁的纪律，发扬党员的各种工作上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反对一切自私自利，贪污腐化，消极怠工，风头主义等现象。第六，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严格注意党的某些必要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纪律。

1939 年 11 月 24 日　杨尚昆论党的支部是团结群众的核心。他在《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一切政策、主张、口号，都必须依靠支部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支部应当经常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党在群众中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所以，支部是团结群众的核心。

1939 年 11 月 25 日　李富春论党的支部是群众的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八路军作战区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支部要成为群众的核心。党的支部及支部的每个党员，是最接近群众的，是生活在群众之中的，群众工作是否能深入，依据支部是否能领导群众，成为群众核心来决定。因此，党的工作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为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

1939 年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中

国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决定总结了党和军队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今后应注意的事项。对于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1939 年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央指出，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地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组织任务，各级党部必须用极大努力，动员和说服那些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和同情我党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去认真亲近国民党干部及党员，使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影响和接近国民党嫡系非嫡系以及非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党政军领导人，使他们诚意地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

1939 年 12 月 6 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部队和政治机关，认真讨论和贯彻中共中央 12 月 1 日的决定，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抗大及各军政学校应尽力就地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加入为学生。并号召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锻炼，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号召工农干部好好学习文化与政

治，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

1939 年 12 月 9 日　毛泽东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在延安各学校学生及青年团体纪念一二·九运动 4 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中指出，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军队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39 年 12 月 9 日　王稼祥论青年应有革命的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 4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的先锋队，青年是进步的，一代比一代更进步。青年必须要有革命的科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要确定这一个方向，就是共产主义。青年要不落伍，首先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不但应当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帮助广大的青年去学习。青年的力量是伟大的，青年们要负起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来。

1939 年 12 月 10 日　陈云论干部队伍建设。他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老干部是党的骨干，但是，老干部领导革命的本领，在政治上文化上各方面的本领还不够。应该天天努力提高本领，提高水平。区委、特委的领导同志，要有计划的看书，要好好地学，长期地有恒心地学，像党中央的

干部一样。负责的人要带头学，别人也会照样去做。（二）提拔新干部和新老干部团结的问题。党在全国需要用很多干部，要接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参加军队工作和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是革命的需要。（三）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问题。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陈云特别强调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一定要严格要求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采取客观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看现象。（四）纯洁干部队伍。要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要对所有作过坏事的人，危害过党的事业的人，应该严肃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

1939 年 12 月 21 日　白求恩于 193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北唐县逝世后，毛泽东写《纪念白求恩》一文悼念。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来到中国。1938 年春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一）论述了白求恩的国际主

义、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种精神就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毛泽东阐述了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他认为白求恩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二）论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说，白求恩的这种精神表现在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毛泽东批评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情，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对于这种表现的人，毛泽东认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毛泽东说，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三）论述了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说，白求恩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毛泽东

认为，白求恩的这种精神，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四）要求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著作是阐述延安精神重要著作之一。

1939 年 12 月 25 日　罗迈提出要吸收一批有理论基础的知识分子干部。他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陕甘宁边区内部的统一战线、阶级政策与共产党》一文。指出要更加巩固党，就要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最根本的是切实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文化水平与马列主义水平。因为只有马列主义是战胜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武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与领导能力。要胜利的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在党的各级重要环节中，吸收一批比较有理论基础的新的知识分子的干部，并好好的团结他们和使用他们。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首先是党的书记，能以身作则的来提倡和领导其他党员、干部的学习。

1939 年 12 月　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地主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指出，中国革命包括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这一著作，引导全党加深对中国国情和党的纲领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内容的充实，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9 年 12 月　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大会认为边区必须根据 3 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成绩，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因此，边区在 1940 年的经济战线上，必须动员全体人力、物力完成下列任务：（一）开荒 100 万亩，并帮助农民改良耕种，发展水利，以达到增加细粮 10 万石的生产。（二）改良畜牧，增加牛、驴、羊共 40 万头，增加工业原料。（三）以乡为单位造公林，保护森林。（四）扩大政府经营的工厂，帮助人民手工业的发展。（五）注意开凿煤矿及发展交通事业。（六）帮助人民切实整理与扩大合作事业。（七）欢迎各地实业家投资边区，并给他们以方便。根据上述目标，由边区政府制定具体计划，以银行放款、低利借贷、实行奖励、发展商业流通等方法，动员全党保障实行之。

1939 年 12 月　陈云论学习理论是每个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他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学习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一项任务。学习理论是每个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他还指出，对

于程度不同的个人，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像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读书要作笔记并且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读书还要同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1939年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1939年　毛泽东致信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信中说：“炮兵团全体官兵同志们！八路军炮兵团成立一周年，盼望你们努力政治军事科学技术之学习，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

1939年　毛泽东自己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共六人。在他住的窑洞里，每星期召集一次会。在1939年这一年里，毛泽东主要谈的是矛盾论问题，每次都是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在一起讨论。参加小组的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陈伯达、和培元。

1940年1月3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干部教育。在发出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一）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二）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大致规定为：1. 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2. 中级课程：联共（布）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3. 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4. 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

面经常研究；5. 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三）在职干部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同时以学习一门为原则。（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五）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六）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的工作，提高其质量，干部轮流征调入学。（八）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九）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的教育工作。（十）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

1940 年 1 月 5 日　洛甫论新文化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对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

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1940年1月15日　毛泽东号召学习吴玉章对革命的坚持性。他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贺吴玉章六十寿辰大会上致祝词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我们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1940年1月15日　王稼祥要求加强人民军队的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和政治工作。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指出，（一）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是最先进最客观最正确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学习继承了这个学说，并且把这个学说具体的应用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就——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成就，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与军队的成就不仅依靠先进的理论，并且依靠长期的实践，依靠自己在长期战争中的经验，依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说与经验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十余年的战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党员十多年来都不断的在火线上，在战争中，在军队中工作着、战斗着。这样使它积蓄了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三）中国共产党是密切的依靠了中国劳苦群众和中国人民，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而建立它的军队和军事成就的。在最近的中国历史上，除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战争和军队外，还没有能够这样的与人民真正结合，与

人民真正打成一片的。他还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外国著名军事专家的著作和世界重要战争的历史，研究中国战争史和中国古今军事家的重要著作。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方面，要继续发扬艰苦、紧张、不间断、模范作风等等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应当有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应当努力于政治教育更有系统的更有步骤的和更有计划的实行，使政治教育放在真实的基础上；应当努力于军队中党员的党性提高，教育党员尊重党的组织，尊重地方党；应当努力于工作方法的改进与创造，总结和整理过去的经验，研究新的工作方法，克服保守的公式的照例主义，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工作原则和方法，使整个政治工作前进一步。

1940 年 1 月 16 日　毛泽东论政府的人要同老百姓结合。他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发表的讲演中说，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边区政府受老百姓拥护，作出许多好事。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能打倒的。

1940 年 1 月 20 日　王首道论生产运动的经济、政治和教育意义。他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我们是一支新的劳动军》一文，对中央直属机关学校 10 个月生产运动作了总结。他指出，1939 年 2 月 2 日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党中央发出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参加生产战线的伟大号召之后，各单位都进行了热烈的动员，大家热烈响应中央的生产号召。中央秘书处、组织部、教

导处、党校……各单位都互相订立了友谊的生产竞赛条约，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准备开荒。3 月 20 日财政经济部发出了进行开荒突击运动的通知，整个延安和边区的人们都开始进行开荒的突击，满山遍地都散布着开荒的队伍。经过开荒、播种、锄草、收获、冬藏与翻地等几个生产阶段，取得了伟大的收获：（一）经济上的收获：中央直属机关学校，1939 年总收获细粮 735.52 石，完成原计划 854.53 石的 90%以上；从粮、菜、草总收获量上来看，总共农业收获合成现洋是 44401 元，平均每个人的收获得净利 17 元。除农业收获外，还有许多副业的收获，如牧羊、喂猪、养鸡及合作事业的收获，总区约 500♂余元。（二）政治上的收获：首先表现共产党在原来经济落后的陕北，在物质缺乏和技术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发起了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生产运动，并且第一年就做出了具体的成绩给全国人民看，起着推动全国生产运动的作用。并证明了只要努力生产实行自力更生，就能解决长期抗战中的经济困难，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建立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其次，边区的生产运动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创造，不仅发动了全边区广大人民参加生产，而且发动了不脱离生产的机关、学校、部队也直接参加生产，除了担任经常的工作、学习与战斗的任务之外，还能进行各种生产事业，实行经济的全自给半自给或 1/3 的自给，证明了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之下，共产党和八路军都能继续进行“一面战斗，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面生产”去支持长期抗战。第三，边区生产运动的成绩，表现了共产党的抗战建国的才能和毅力。边区的生产建设，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民的文化，建立了民主政治。（三）劳动是伟大的教育和锻炼：在过去 10 个月劳动的实践当中，最好的教育了我们，亲自体验了工农生活的苦痛，亲自参加了劳动的力量，

改变了自然，把荒山变成熟地，学会了如何组织与领导生产运动，学会了如何经营战时的经济建设，学会了活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产运动中等于进了一次劳动大学"，是很有意味的。在这次生产运动中，最好的锻炼了我们，考验了我们，以至改造了我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意识。在这种意义上说，劳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实践，最好的学习，最好的锻炼。（四）打下了今后生产运动的基础：有了1939年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物质基础，尤其是有了丰富的经验，可以增加1940年开展生产运动胜利的信心。1940年生产的耕牛、农具、肥料、种子以及耕地等等，都有了可供发展的基础。总之，边区1939年的生产运动，从各方面看都是有成绩的。在经济上，保证了农业品的供给，保证了边区经济的半自给。在政治上给了全国人民以良好的影响。在精神上对于我们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和锻炼。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央对于生产运动的号召和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1940年1月25日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励。"

1940年初　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在渝秘密建立。藏族青年平措汪杰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附设蒙藏学校读书期间，秘密建立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及其外围组织——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领导藏族学生抗议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为此，平措汪杰被学校开除。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叶剑英接见平措汪杰。平措汪杰离开重庆回到西南藏区投入革命活动，1943年，他首次在拉萨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他任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巴塘地下党）书记，及其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的总书记。

1940年1月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总结了中国革命20年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论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辩证关系。指出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两个革命阶段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保证中国的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不断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运用共产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和训练干部。这一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延安精神形成、发展和内容的充实中，都占着重要的地位。

1940年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指出，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要巩固扩大进步的军队；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中央指出，支持长期战争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是财政经济工作。农业是财政经济的最主要部门，春天已到，各地应立即颁布春耕运动命令。要求一切在职人员，在不妨碍战斗，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均应参加生产运动。

1940年2月1日　中共中央为三八妇女节工作给各级党部

发出指示。中央指出，1940年三八节中央决定在延安进行下列工作：举行妇女生活展览会；开妇女运动大会；奖励学习、生产、工作、抗属中的模范妇女及热心妇女、儿童工作者；慰劳抗属；召开群众大会和晚会等。

1940年2月1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他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发表的讲演中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2/5的敌人，和40个日本师团中的17个师团打。毛泽东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同国民党统治区相反，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为新中国的雏形。延安精神正是在这种基地上形成和发育起来的。

1940年2月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培养财经人员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指示。中央要求所有财政经济工作人员，要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经济学，研究苏联在各个阶段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研究国内苏维埃时代及目前各个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法令，以急速培养一批有理论基础的懂得大的理财知识技能的干部。

1940年2月3日　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1939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发出通报。通报了陕甘宁边区1939年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一）边区群众1939年开荒104万亩，增加粮20万石，增加牛羊百万头，大大改善了生活，并保障了1940年春征收救国公粮5万石。（二）4万个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3个月粮食，警卫营、保卫营及政治教导队则保证了10个月或半年粮食。（三）经济工作与政治任务相联系造成了全体民众的生产热潮，发扬了劳动热忱，涌出了3000个劳动英雄，这种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劳动，开辟了乡村中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大道。（四）在职人员特别是各校青年学生以自古无有的劳动实践锻炼了思想意识和身体，证明改造自然也同时改造人性。通报还提出了1940年边区生产运动的方针：（一）奖励民众的生产运动，政府帮助民众改良技术，兴修水利，借贷资本，以期增加粮食生产，同时即可保证1940年冬征收粮食税10万石。（二）在职人员实行多样性生产，着重于生活改善，以保障两个月粮食自给为限度。（三）在可能与必要原则下，发展公营工业，扩充造纸、印刷、棉织、制药、皮革等工厂，并充实修械厂。（四）加强中央财政经济部及边区建设厅的组织与工作。要求各地应根据中央2月1日的指示参考边区的经验，切实发展1940年的生产运动。

1940年2月5日　毛泽东要求革命者研究自然科学。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他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940 年 2 月 7 日　毛泽东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他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中国工人阶级，20 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为了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认为，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1940 年 2 月 10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在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

出，要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信任他们，坚决打破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偏见，使知识分子工农化，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知识化。并强调所有各根据地均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外援看作偶然性。

1940 年 2 月 10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央指出，斗争已进入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 1940 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一）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一般可按延安的经验，同时进行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普遍发展喂猪种菜等事业，达到改善生活，克服困难，节省公费之目的。（二）在不巩固的地区，可经由地方党、政府与当地群众订约，组织军民生产协作，由军队酌量抽派人力牲畜，帮助农民耕作，由农民供给驻军以一定比例的粮食马料。（三）行止无定的部队，应利用战斗间隙，普遍无代价的在自己地区之内，帮助农民春耕及各种农作劳动，进一步与群众打成一片，以便用另一种方式取得农民对军队自愿与踊跃输助。（四）生产运动要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与政治任务紧密联结，要有合理的组织工作，与实际从事指导的生产委员会，监督管理这一运动的进行。（五）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完成党的军事、政治任务。

1940 年 2 月 11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创造冀热察根据地的任务。在关于挺进军的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要注意扩大随营学校或抗大分校，分为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老兵、老干部，尽量抽调来训练，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大量的放手的从平津、冀东各地招收革命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只有自力更生，大量创造干部，才能担负创造冀热察三省伟大根据地的任务。要十分

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在抗大分校内，设立行政工作班，教授政权工作及财政经济工作。

1940 年 2 月 15 日　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各级党校教育。在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指出：（一）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以下几种学校和训练班：1. 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2. 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3. 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三）中级党校训练时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四）党校课程可依学生程度并参考 1940 年 1 月 3 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之。（五）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这个基本任务。（六）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七）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八）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九）党委必须慎重的选择教授人材，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十一）学校应制订教育计划及教授提纲或大纲。（十二）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十三）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挥民主。（十四）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的尽可能的派送县级及

县级以上的干部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1940 年 2 月 18 日　李富春总结陕甘宁边区 1939 年的生产运动布置 1940 年的生产任务。他在延安生产总结大会上作的《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1939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劳动实践证实了生产运动号召的正确。取得了很好的生产成绩：一、经济方面的收获：（一）农业方面——1939 年在职人员开荒 16.2841 万亩 5 分；粮食生产成绩为粗粮 1.4 万石，细粮 9572 石（每石 350 斤）。（二）商业方面——一年来边区以土产与必需品为主的商业，不论是私人经营的或公家经营的，都是生意兴隆，获利颇多。以公营商店而论，1939 年有 70 万元的盈利。（三）工业方面——建立了棉织、毛织、皮革工厂，供给部队及人民的布疋、皮革、毛织的需要，化学肥皂厂供给全边区及边区以外的肥皂、粉笔等等需要；中西制药厂供给军队、学校、机关与广大人民的卫生需要；以及农具制造厂、缝衣工厂等。扩大了印刷厂。（四）尽可能提高科学的 工作，如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建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开办农业学校，建设模范农场，组织专家的经济考察团等。（五）关于改善生活——农业副业的发展成绩也很好，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改善了生活，尤其是留守兵团、保安部队，不仅保证了全年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还有能力解决一套单衣、毛衣、毛袜、毛鞋。人民中喂猪、养鸡、养驴、纺纱、烧炭、卖草、贩盐等副业，比 1938 年平均收入增加一倍。二、政治上的收获：生产运动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一）生产运动的胜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明确的把握着抗战建国事业的自力更生道路。（二）表示了共产党言行一致。党员的模范作用，推动了广大群众对于生产运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劳动

热忱。（三）表示了共产党主张坚持抗战，最后战胜敌人是有坚强的、深厚的客观物质基础的。（四）在劳动中创造了广大的、成千成百的经济战线上的干部，创造出624个劳动英雄。1940年的生产任务是：（一）粮食生产任务的分配：中央一级机关、学校，边区一级平均生产两个月粮食；边区一级以下平均生产3个月粮食；留守兵团平均生产一个半月粮食；保安部队平均生产两个半月粮食。（二）1940年除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外，主要以改善生活为原则。（三）农业生产的多样性——粮食生产以谷子、糜子为主，并种植各种杂粮，还要特别注重蔬菜、植棉、畜牧、手工业等的发展。（四）改善劳动组织：妇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都不参加重劳动的生产；工业生产部门，不参加粮食生产；医院、休养所、保育院、小学教员不参加粮食生产；50岁以上的老同志，15岁以下的小同志，免除生产。（五）植树造林，预防干旱。（六）工商业生产：工业部门除栽种必要的蔬菜外，应以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增加工业生产量及改善工人生活为中心任务；改善公营商业与合作社的经营。公营商业要成为调剂边区经济发展的枢纽。合作社要走向群众化，使之成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群众经济组织。

1940年2月25日　罗迈论党的纪律。他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论党内铁的纪律》一文中指出，党要领导无产阶级战胜强大的敌人，完成其历史的使命，党的自身就不能不是最有组织的，最有严格纪律的队伍。什么是铁的纪律呢？（一）铁的纪律就是党内组织的服从。（二）铁的纪律是实现党在领导群众上的计划性、组织性与统一性的重要条件。（三）党的纪律是党的组织的统一，党内不容许有任何派别组织（小组织）的存在。（四）铁的纪律是统一的纪律。党内无论何人，不论他是普通党员，抑是领导人物，党内无论何种组织，不论它是高级领导机关抑是下级支部，

都务必毫无例外的一律遵守党的纪律。党内没有什么可以不遵守纪律的特权。（五）铁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铁的纪律虽然是带强制性的，即每个党员和每个组织都必须绝对遵守，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1940 年 2 月 25 日　莫文骅谈留守兵团在职干部的学习。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一文中指出，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的成绩：（一）政治方面：学习的兴趣大大的提高了，大家都觉得非努力学习不可，否则便要落在新时期的后面。因此，每周都有一次至二次政治课，一次讨论会，每天两小时的自修阅读，每月举行一次测验与总结。（二）文化方面：学习文化的热烈，提到比学习任何方面的东西还更积极，而且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结果，我们达到了：连级干部一般可以看《新中华报》，做日记、写书面报告、听课时作笔记。营级干部可以担任对连排干部的教育，比较进步的可以参加研究联共党史。

1940 年 2 月　陕甘宁边区举行生产总结颁奖动员大会。毛泽东、洛甫、李富春出席并讲话。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讲话中指出，1939 年生产运动能有很大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全体革命干部的努力领导与推行，全边区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1939 年生产运动的胜利完成，不但保证了食粮的供给，并大大改善了全边区人民的生活。在政治方面；教育与锻炼了全党及所有的革命同志。讲话结束，大会主席团宣布了中共中央机关学校与军事机关部队及边区一级各机关学校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英雄名单。毛泽东、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此外，还选出团体特等奖 5 个，个人特等劳动英雄 6 名，甲等劳动英雄 104 名，乙等

劳动英雄 252 名，丙等劳动英雄 262 名。

1940 年 3 月 6 日　毛泽东论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一)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 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二)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四)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五) 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六) 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七) 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八) 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份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九) 抗日统一战线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十)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

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1940年3月11日　毛泽东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他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一）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他说，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毛泽东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二）关于发展进步势力。毛泽东说，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毛泽东认为，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三）关于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说，就是

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毛泽东对这三部分人作了具体的分析，关于中等资产阶级，他认为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关于开明绅士，毛泽东认为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关于地方实力派，毛泽东认为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毛泽东说，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

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分析这些条件说，第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第二，尊重他们的利益；第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四）关于顽固势力。毛泽东说，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

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是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毛泽东进一步论证，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的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进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

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当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毛泽东说，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五）关于国民党。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六)关于抗日根据地内的政权。毛泽东说，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

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 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认为，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七）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

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要的政策。（八）关于党的最低纲领。毛泽东巧妙地把党的最低纲领，作出科学的概括，以作为动员广大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毛泽东指出，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毛泽东说，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毛泽东要求，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毛泽东告诫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毛泽东的这一著作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党的政治策略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理论说明。正是在这一策略思想指导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940 年 3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央指出，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政府应提高用于国民教育方面的经费的比例，要提高小学教员及社会教育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党应决心动员一批党员知识分子终身从事国民教育的事业，把这种事业当做一个党员的光荣任务。

1940 年 3 月 19 日　陈云论党的纪律。他在延安抗大第五期学员毕业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中指出，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要靠纪律，所以，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学员的行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他要求每个党员、每个组织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1940 年 3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发动群众，击退反共势力进攻，巩固淮北根据地问题发出指示。中央指示新四军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1940 年 3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这一指示对中央 1 月 3 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作了补充规定。指出（一）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四类：甲、有相当文

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二）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甲类，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三）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四）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五）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六）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该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七）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

1940年4月1日　中共北方局发出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北方局指出，要加紧生产建设：（一）积极发展生产，生产是自力更生，也是在各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财经政策的中心一环。（二）生产建设应以农业为主，加紧生产运动（春耕及秋收），办水利，开垦荒地，改良种子肥料。（三）提高生产，党政机关、学校、地方部队及正规军（在不妨害战斗情况下），应尽量参加生产，发展生产运动。（四）发展手工业（如纺织、织布、做鞋、肥皂、皮革）和家庭副业（养鸡、养猪、牧羊），组织各种生产，如药材水果合作社，发展土货、山林、水果的生产，如药材、水果、核桃、花椒、桐树。以土货、山货去敌区换取必需品。

1940年4月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缓远敌占区工作的决

定。中央指出，在现时具体条件下，绥远敌占区最适当与可能的斗争形式仍是游击战争，但这仍是异常困难艰苦条件下的游击战争局面。因此，今后绥远敌占区党的总任务是：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的局面。要大大的加深群众工作，宣传组织与动员广大群众为坚持游击战争的目标而奋斗。要建立党与广大群众联系，教育群众，积蓄群众力量，以便能够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决定还指出，要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内政治阶级教育，有计划的培养地方干部，使党成为精干坚强的党，才能支持艰苦的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0 年 4 月 15 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经常的确定的财政经济政策。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在华北、华中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已有将暂时的应急的不定的财政经济办法转到建立经常的确定的财政经济政策，而以政府法令颁布实行之必要。中央同意北方局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并作了补充。强调要求发展群众合作事业：（一）依靠银行建立公营商店，借以帮助真正群众性的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收买土货，调剂物价，发展生产，既补助收入又改善群众生活。（二）利用工业合作社名义，建立群众手工业合作社，吸引工业合作社向晋东南、冀察晋及晋西北投资，我们可给以帮助。要求各地必须开办财政经济训练班，在附近地区可选送一批人来延安行政学院学习。

1940 年 4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决定对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一次大检查。检查分为中央直属系统、军事系统和陕甘宁边区系统三个大单位进行。在 4 月 25 日以前检查完毕。要求选出模范学习小组，总结出好的学习方法，供各根据地干部学习参考。

1940 年 5 月 4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关于放

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1940年5月6日　总政治部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关于新四军政治 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军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旧适用。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

1940年5月16日　洛甫发表《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一文。洛甫指出，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在我们党内要提倡朴素，因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全世界最彻底革命的党，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虚伪”去欺骗别人，欺骗自己；我们的党是建筑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党，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夸大”去安慰别人，安慰自己。只有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我们所要完成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党内要提倡朴素的工作作风。要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他还指出，切实，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就是说，要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当前的

具体工作；就是说，要经常检查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在我们党内要提倡切实，因为我们的党是革命的行动的党，我们的任务不但在认识世界，而且还在改造世界；我们的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要说得出做得到。只有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在实际行动上实现出来，我们才能把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变为地上的现实。在我们提出任何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时，我们必须切实考察这种计划或工作任务的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可能实现的条件。我们决不能单凭自己主观的愿望来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我们党内要提倡切实的工作作风。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划，而不肯或不脚踏实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我们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来实现我们崇高的、远大的理想。我们要打破一切现实的障碍，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理想的、自由的王国。我们党要在朴素中，要在切实中表现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气勃勃，我们的不屈不挠，我们的光明前途。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

1940 年 5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对晋西北财经政策作出指示。中央指出，为解决晋西北的缺粮问题，（一）即动员全体党政军民加紧春耕，开熟荒，种早熟粮食及杂粮。（二）适当调剂劳动力、耕牛、农具、种子，在农忙期间更应极力减少群众出差命令，保证牲口，发动部队及妇女参加民间生产。

1940 年 5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本经济斗争中的贸易政策给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发出指示。中央指出：（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倾销日货，收买土货，强使伪钞，破坏金融等），以榨取中国资源，以战养战是敌人灭华极重要的方法之一。（二）对于日货的输入与推销，对于土货的输出，采取放任政策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有利机会，给国民党以造谣

的口实。（三）但对日货采取禁绝入口，对土货采取禁绝出口的政策同样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是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封锁政策，对抗战是不利的。（四）各抗日根据地必须以抗战的利益，为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在根据地周围，设税务局及贸易局，统制出口贸易；发展手工业，奖励家庭工业，以求自给自足；凡抗战军队及人民必需品而又不能自制者，准许入口，收低税；凡非必需品，禁止入口或收高税；为了收支平衡必须准许一些适当的土产品出口；在游击区、新占区，应设法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如没收日本商店、毁坏日本工厂、收集可资利用的物资等。

1940年6月6日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会议由王首道主持，罗迈作《延安在职干部一周年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朱德、任弼时、洛甫在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前方的学习情况，然后讲了怎样学习的问题。他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一切反动阶级，如今天的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对我们大肆攻击，但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为他们所欺骗；相反的，共产党人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正因为我们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最正确的。第二，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际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他还说，以我个人来讲，这次来到大后方，和很多人打官司。他们早布置好了，大家都准备难倒我，大家都控告八路军不好。但是，我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依靠，所以我也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驳倒了他们，说服了他们，指出他们制造磨擦是没有前途的，劝他们不要再固执下去，结果许多人没有话回答，有些人点头表示同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能在实

际中运用，要能改造实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我们要向前进，不然就要掉队。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便只有向前进步，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任弼时在讲话中强调了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学习理论特别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苦性、曲折性和长期性，更应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发展。洛甫讲话表示今后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掌握革命武器，中国革命一定胜利。罗迈在总结中肯定了一年来的学习成绩：（一）关于计划实行的程度。联共历史和党的建设已经学习完了。丙类党的建设，有的学完了大部分，有的学完了一半，但有少数还未学到一半。时事政治性质问题的讲话，平均每月举行了两次，负责干部的报告会举行过八次。（二）关于学习的成效。党史和党的建设的收效是相当大的，许多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一步。许多同志对工作的自觉性提高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和无原则的现象减少了，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能提高了。（三）学习制度和学习的习惯有了初步的养成，学习方法有了初步的建立。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在大多数同志间有了保证。（四）在学习运动中，已经涌现出来一些模范小组，他们在学习积极性上、学习方法上和学习成效上，都可作为大家的参考和揣摹。同时还提出了怎样把学习运动更加推进、更加提高的意见。

1940年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央指出，政权应当是各阶级各党派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要吸收中间分子及同情分子加入，减少党员成份到1/3。党对政权的领导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而不是遇事干涉、代替、包办政权工作，应信任政府人员去作。政权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必须大大提倡，党不应下命令给政府，不应妨害其民主。并指出，财政出路的中心

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

1940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北应注意解决粮食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华北各地久未下雨，颇有旱灾可能，为保障足食足兵，预防旱灾，各地党与军队应注意：（一）军队应用一切办法保护夏收秋收，反对敌人破坏。（二）发动仓库保管及发粮制度，严禁多领与浪费。（三）努力向平原平坝发展工作，发展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合理的收集粮食。（四）加强伪政权工作，秘密从敌区筹粮买粮运粮。（五）禁止粮食出口，奖励粮食入口。（六）可能与必要时，以部队一部开到有粮区就粮。（七）从各方面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屯买粮食。（八）由政府担保动员有粮的地主、富农捐粮借粮，调剂粮价，救济贫民。（九）如果旱灾已成不得已时，经过宣传动员调查登记农村全部粮食，规定粮价，由政府统制购买调剂。

1940年6月20日　洛甫提出关心与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克服同群众对立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一文中指出，只有我们关心与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我们才能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我们过去与现在，所以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是因为我们关心了与解决了群众的切身问题。但是党内也存在一种不关心群众切身问题的恶劣倾向，对于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情绪、群众的生活毫不注意。在某些党部与某些同志中产生了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把党所领导的组织当作凌驾群众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而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头顶上的“党老爷”、“党官”的严重现象。这种把群众当作 无知的任人摆布的“阿斗”，而自己当作万能的高高在上的“诸葛亮”的倾向，实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对此，（一）党必须最严重的提出这个问题，同那种脱离群

众、同群众对立的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各学校，必须严格的约束自己的工作人员，不使他们有任何违反群众利益的行动。对于那些鱼肉民众、压迫民众、欺侮民众的官僚、老爷们，必须给以严厉的革命的纪律的制裁。(二) 党必须大胆的发展党内与群众中的民主主义的作风，建立各种组织的民主制度，发扬党内党外的自我批评，以揭发与清除各种组织内所存在的这些违反群众利益的严重现象。(三) 党必须坚持教育全党同志，要善于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同他们打成一片，迅速的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意见，经常关心与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四) 党必须坚决纠正党内把动员工作当做党的全部工作的片面思想与习惯，各级党部除动员工作外，必须经常讨论当时当地群众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把解决这些问题，当作同动员工作一样重要的党的任务。

1940 年 6 月 21 日　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洛甫、朱德等 50 多人到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新哲学会成立两年，工作有了成绩。开过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努力。洛甫在讲话中指出新哲学会会后的几点工作：第一，要与反辩证唯物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没有这种斗争，新哲学的发展就不可能。第二，新哲学会应更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克服革命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缺陷。第三，使新哲学的研究与实践斗争更密切联系起来，使新哲学的研究成为生动的实际的有兴趣的工作，而不是死板的条文的公式背诵。第四，新哲学会后应推

动各地研究新哲学的活动，供给他们研究的材料，通俗化的读本，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两年来辩证法大大的发展了，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希望延安的哲学家多到前线去，帮助和推动研究新哲学，并写出通俗小丛书，供给前方需要。会议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会员宣读论文。

1940年6月21日　《新中华报》号召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克服困难。在发表的《认识困难克服困难》的社论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的军事行动，使中国抗战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要认识困难克服困难。而克服困难的道路，是坚持自立更生的原则，把坚持持久抗战的根基依托在四万万五千万广大人民身上，给人民以一切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坚持全民族的团结，使广大领土和资源都服务于抗战。

1940年6月25日　《新中华报》论自力更生是抗战胜利的保证。在发表的《提高自力更生的信念》的社论中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引起我抗战营垒内的一部分人失掉自力更生的根本信念，产生悲观失望和把中国抗战前途完全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上面。社论强调，中国要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能依赖于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而主要的是依靠自己，依靠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伟大力量，坚持自力更生的最高和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各帝国主义自顾不能暇的今天，更成为必要，更成为我国坚持抗战最后胜利的金科玉律。我国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和方针，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上面，这是最有力最可靠的抗战胜利的保证。社论号召，今天的中国，必须空前地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最高信念。

1940年6月29日　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政治部要求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在对晋西北工作发出的补充指示中指出，要加强党的工作，切实健全党的生活，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要进行党内教育，克服党员与非党员无差别的现象。要严整纪律，任何人都要服从制度。干部要首先遵守制度，遵守纪律，掌握路线与政策。要从政治上巩固干部的团结，反对庸俗，反对贪污腐化。关于工作作风，要转变到一点一滴的细微深入的工作，要接近下层分子，了解情况，解决具体问题，检查工作计划之实施，不做则已，做一定要做到彻底。

1940年7月1日　刘少奇在江北版的《抗敌报》发表《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文。他指出，我们最大多数的党员，他们那种为公共事业而牺牲奋斗的精神，那种为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而艰苦工作的精神，那种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为名为利，而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与人类解放事业而不疲倦的埋头苦干精神，表现了他们有人类中最崇高的道德，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党，作一个好的党员，他要求每一个党员，要尽心负责的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要有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的精神，作一个埋头苦干、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作一个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斗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好党员。作一个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的终身的好党员。

1940年7月1日　中共警备区特委会“七一”纪念大会给毛泽东发出致敬函。信中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在工作上认真负责的态度，细心规划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简单朴素的生活，和刻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对于 中国具体环境的灵活正确运用的

创造性。

1940年7月1日　王稼祥指出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他在发表的《度过困难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一文中指出，自力更生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了。为了自力更生，必须实行进步的彻底的抗战政策。一切政策——军事、经济、财政、教育、民众各方面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动员中国广大人力、物力、财力，一句话，应当实行民主主义的政策，而不是专制主义的政策。

1940年7月4日　抗大三分校举行第五期毕业典礼。朱德参加并讲话。他勉励学员们上前线不要骄傲，要和一切的干部团结一致。要爱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不要有军阀的气息，不要妨害老百姓的利益。要尽量团结各党各派各友军队伍一致抗日。他要求学员们继续学习，要从工作中学习，使理论和实际打成一片。

1940年7月10日　罗迈发表《举起自我评的武器》一文。他指出，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发展和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武器，是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武器，是正确地执行党中央路线的重要武器。近来，我们党里面似乎已有许多同志不大爱用这个武器了。有的地方，“瞒上不瞒下”、“互相包庇、一团和气”的风气相当流行。他指出由于缺乏自我批评或没有自我批评，会对革命带来危害。他强调我们必须高高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及时发现和改正党工作中的错误，来更加提高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和信任，来更加正确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来教育我们党员和干部，来更加巩固我们的党，来更加把革命工作推向前进。自我批评同党的关系，正如空气同人的关系一样。他进一步指出，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着改正错误和弱点，是为了教育干部和党员，为了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规勉，因此，自我批评应当成为积极的、具体的、实际的、认真的检讨工作，应当根据事实，客观、平心静气。

1940年7月16日　朱德论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对抗日的作用。他在为纪念“七七”三周年，在《解放》周刊发表的《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中，列举了华北抗战三周年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取得伟大成绩的原因，是我们造成华北广大民众抗日的热潮，并使其奔腾澎湃，不可遏止，使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老太婆做鞋，小媳妇下地，连小娃儿也盘查放哨。大家为参战和生产而努力。这就是说，我们取得的成绩，应当归功于民众，归功于民主。这就证明，只要我们在全国发动广大群众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克服巨大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成绩。

1940年7月16日　吴玉章论自我批评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在《解放》周刊发表的《用自我批评来纪念我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一文中指出，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是在党工作的错误中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就是不可被战胜的。文章批评了党的弱点和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如，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有少数同志不了解“三三制”政权的意义而不执行；沾染了贪污和官僚主义的恶习，有的意志不坚定的党员，由命令主义以至官僚主义，由小贪污以至于较大的贪污，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文章希望同志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锻炼自己，训练群众。

1940年7月16日　《新中华报》号召铲除官僚主义。在发表的《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党内批评文章中指出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和产生脱离群众的严重后果。文章说，官僚主义是革命的大敌人，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斗争，斗争再斗争。自满、顾面子是官僚主义的窝子，必须严格把这些窝子铲掉。肃清官僚

主义斗争的主要枢纽，在于上级领导机关自己坚决的发动和领导，对官僚主义要加以严格的批评，提出具体纠正的办法。最后，文章要求各级负责人及各级工作人员，都应拿出最大的责任心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去检查自己，检查别人，发现官僚主义的例子，加以批评，加以斗争，加以纠正，加以克服。

1940年7月18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直属队总结一年来的干部学习。指出这一年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干部的学习情绪和理论水平，思想上有显著的进步，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提高了干部的读书兴趣和工作能力。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强调，学习是每一个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今天，留守兵团的干部中，有的人头脑中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克服这种不良倾向，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他要求大家把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1940年7月23日　莫文骅批评留守兵团中的错误倾向。他在《新中华报》发表的《克服陕甘宁边区驻军当前严重倾向》一文中指出，留守兵团与保安部队中存在着资本主义思想、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倾向及其表现，分析了原因及其危害，指明了克服的办法。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改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的策略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把这些倾向从头脑中肃清出去，坚定每个党员的政治立场，严密组织工作，检查沾染这些倾向分子的错误实质，给以教育或应得的处分，并造成群众的舆论以反对之。还需要改善领导方式，教育领导人如何领导，工作中心放到连队中去。爱护部队，关心战士生活。最后，要发扬军民团结，官兵一致的刻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积极帮助人民，实行礼拜六劳动制度。

1940年7月25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学的总方针和

基本原则。《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第二期教学计划指出，抗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八路军军政干部的学校。它的总方针是要教育学生成为：（一）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使之获得前进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时刻把握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二）具有灵活的战略战术，使之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理论，革命的战略战术与军事技能，并在具体环境中灵活的运用。（三）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教育过程中使之养成艰苦奋斗的习性，百折不挠、英勇牺牲的精神，革命的实际主义与大众的民主作风，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实施教育的基本原则，是要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把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教育过程与生活过程统一起来，以达到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实际工作能力，而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社会解放及人民解放事业的军政干部。

1940 年 7 月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做抗战的模范和团结的模范。他在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指出，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他强调，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时，应当采取我党中央

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1940年8月4日　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训令指出，在边区内的各军事机关、学校、工厂有少数人员发生许多不尊重政府、违犯纪律及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表现在：不执行政府的法令，不尊重政府人员及不经过政府擅自捕人，擅自没收仇货，擅自抽收捐税，擅自无止境的动员群众，侵犯群众利益，强买勒赊圈地占房，随便砍伐群众的树木，甚至打人骂人等，这些严重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将使军民关系恶化。训令定出了克服和纠正这些严重现象的具体办法，并指出以后如果再有这些违犯纪律及脱离群众的现象发生，除严格处罚犯者本人外，各该直属首长也应受到批评与处分。

1940年8月9日　《新中华报》批评些政府机关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在发表的《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文章中指出某些政府机关存在着严重的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如，随便占有民众的土地和房屋，自由拿走民众的财 物，损害老百姓的庄稼，打骂民众，随便处罚民众等。其原因是某些个别的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对群众利益莫不关心。要根绝这些不尊重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文章说：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的负责同志，应立即而密切的深入的来进行检查，批评那些破坏群众利益的工作人员，加强对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让他们更深刻的了解党与群众的关系，向任何侵犯群众利益，也就是违反党纪危害群众利益的人作坚决斗争。要求每个党员注意群众工作，尊重群众利益，真正做到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1940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明确规定军政

的若干关系。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发出的指示中指出，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一）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二）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三）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四）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队及老部队。

1940 年 8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察的重要标准。在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的教授、研究和学习中，须尽可能充实策略的部分或方面。

1940 年 8 月 13 日　《新中华报》号召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在发表的《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的社论中指出了“左”的错误倾向和右的错误倾向的表现，如，个别党员与个别干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及惧怕自我批评，不愿深入下层群众，不去耐心的说服下级干部与群众，不虚心的接受下级的意见，不真正的在自我批评的原则上来检查自己的工作，以命令主义代替解释教育工作，以一味奉承或一团和气来代替自我批评等。这一些，如不纠正，对抗战是不利的。

1940 年 8 月 16 日　《新中华报》要求国民政府注意改善人民

生活。在发表的《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社论中。指出，政府应从速实现以下诸点，以改善民生，提高民众参加抗战工作的积极性。第一，彻底真正的平抑物价，严厉禁止奸商与发国难财者的操纵囤集居奇；第二，认真执行政府“战时保护劳工方案”，增加工资，保证工人起码生活的维持；加薪加饷，改善小职员小学教员的待遇；第三，废除苛杂，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第四，实行合理负担，真正作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第五，救济灾民难民，给灾民难民以长久的生计；第六，改变不合时宜的统制操纵垄断的错误的财政经济政策，大规模的发展生产事业，扶助民营工业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总之，政府应努力做到适当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和生产热忱，做到自力更生，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结成铁的洪流，以冲破一切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0 年 8 月 20 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节省人力 物力坚持长期抗战。在为此发出的指示中指出，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对人力物力使用作长期打算，向各抗日根据地提出下列比例：全区域党政军民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与全人口（不固定的游击区和敌占区不在内）之比例，不能超过 3%；军队人数（不脱离生产者不在内）与党政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之比例，至多应为二比一，即两个军人一个文人。为长期坚持，必须实行统筹统支，党政军民均须有严格的编制表，村一级粮款不应独立，而应统筹。劳役必须大大减轻，并应建立严格的统一的动员制度。生产事业必须大大发展。必须与敌人争地盘，各部队必须向外推进，争取新区域，发展游击区，缩小敌占区。

1940 年 8 月 23 日　高自立在《新中华报》发表《铲除新官僚和新劣绅的专横》一文。他指出，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人

员绝大多数，确是人民的公仆，忠心勤苦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也产生出一部分新的贪官污 吏和新劣绅，他们狼狈为奸，共同贪污，欺压善良，鱼肉人民，甚至捆缚老百姓，对于军队不但不帮助，反而故意为难。文章说，这些新贪官污吏和新劣绅，是我们行政机关的败类，是无法弄弊的卑官。这一部分人数虽不多，但是我们边区的民主政治和廉洁政治中的害群之马，对于他们，要从机关中驱逐出去，有些罪大恶极的，应当交付法庭严办，用铁的 纪律对付他。我们赶走这些败类，把新的积极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分子，提拔到政权中来，使我们的政权和有权力的机关，真正掌握在群众的代表手中。

1940 年 8 月 25 日　萧向荣论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他在为纪念八路军诞生十三周年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的《发扬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一文中指出，八路军继承了和发扬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一）八路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的代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二）在军队的建设上，八路军是以工农为骨干而建立起来的，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大部分都是从工农出身的，因此它能与广大人民联结在一起，并打成一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三）它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禁止打骂，废除肉刑，在政治上，指挥员与战斗员居于同等的地位，在生活上，指战员同甘苦、共患难。（四）它实行军民一致的原则，军队不准侵害群众的利益，要爱护民众、帮助民众、为民众解除痛苦。（五）它实行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原则。（六）它发扬英勇牺牲刻苦耐劳与廉洁的精神，鄙视怕死、动摇、逃跑与个人享乐的可耻现象，反对贪污腐化的行为。（七）它发扬切实朴素的工作作风，不重表面形式，着重实际内容，反对夸大、吹牛、掩饰缺点、风头主义的恶

习，提倡切实、实际、负责、埋头苦干、自我批评的精神。（八）它提倡学习，在政治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军事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理论与革命的战略战术；学习文化知识。并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九）提倡自觉的纪律，发扬自觉、自动的纪律精神，反对单纯的惩办主义，发扬说服教育的精神。（十）提倡紧张活跃的作风，养成动作迅速，做事敏捷、机警果断、生活愉快的紧张活跃作风，反对死气沉沉、呆板机械的现象。

1940 年 8 月 27 日　高自立论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在《新中华报》发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口号是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但是有些同志却忘了本，忘记了群众，为了纠正这种忘本的倾向，就要检讨工作，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一切违反批评、自我批评的倾向。

1940 年 8 月 28 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今后的抗战要作长期打算，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他们要求分局、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

1940 年 9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央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在各根据地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

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

1940 年 9 月 15 日　《新中华报》论民主的工作方式。在发表的《改变不民主的工作方式》的文章中指出，民主的工作方式，就是一切工作依照人民的利益和意见去执行，要宣传解释，说服教育，须要真正的民主会议，须要和蔼的态度，须要深入工作，亲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尊重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边区政府中已经作得很好。但还有个别甚至某些公务员，采用着不民主的工作方式，如强迫命令，打人押人，强行摊派，强征民财等。文章号召全边区最大多数的好公务员和全边区一切公民起来，响应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拥护和执行边区政府关于提高与巩固区和“判除新官僚与新劣绅”的决定，对于那些已经不可救药的“官僚和劣绅”应无情的清除出去。

1940 年 9 月 26 日　罗迈论政权的三三制。他在发表的《关于政权的三三制》一文中指出，三三制是以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来代替任何党派的一党专政。它是统一战线在政权构成上的具体体现，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杭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具体形式。三三制的推行，首先要注意，在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争取广大的同盟者。但这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政治上、工作能力上、同群众关系上、统一战线作风上的优秀党员。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着各党各军各界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其标准是，凡是不投降不反共，赞成抗日与民主的人，都可以参加政府工作。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 、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而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在谈三三制

的作风问题时，罗迈指出，有了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政权机关，有了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施政方针，还须有统一战线的、民主的作风。首先，共产党人自己必须尊重法治，对于民意机关的决议与决定，对于政府的决议和法令，必须首先而且忠实的执行，切实作到以身作则的、“奉公守法”的模范。其次，不要要求参加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及言论行动同共产党人一样，要接受非党人士的长处，热心诚意的帮助他们，有不同意见时，采取诚恳的商量态度去求得一致。如果彼此之间发生政策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原则分歧，应该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政府会议和民意机关去解决。第三，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自然而然的同非党人士进入精神上的接触、精神上的往来和接近。这需要感人以诚，动人以理，需要诚恳和亲切。他提出，要以正确的态度推行三三制，要勇敢的实践，虚心的学习，要拿出认真的、审慎的和学习的态度来对待它。

1940 年 9 月 26 日　青救会号召青年开荒。《新中华报》报道边区青救会发动青年，响应边委、政府秋季开荒 20 万亩的号召，指示各级青救会在青年组织中广泛宣传，并决定在延安、延川、延长、安塞、安定、志丹、甘泉，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青年农场，集体开荒。

1940 年 10 月 1 日　陈云论提高党员质量的重要性。他在发表的《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一文中指出，党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是依靠党员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组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发展党员时，要着重注意质量，提高质量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

1940 年 10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充实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宣部要求党的各级党校应有

计划的训练各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宣传工作干部。准备培养这些干部时，其成份不仅取之于新的知识分子党员，且应取之于老而有经验的干部。同时，党也要开始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工作。

1940年10月1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宣部指出以后各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应以1940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及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的教育的指示》为标准，而依据各地的干部状况及教育进度灵活制订之。要求各根据地把党的组织须尽量做到每个县委（包括县级机关）和每个区委（包括区级机关）有一个宣传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各级领导干部要能够在一方面保持自己学习上的积极性与经常性，在又一方面积极去推动和帮助其他干部的学习。

1940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中宣部指出，支部教育是党的基础工作之一。（一）支部教育的方针应该是：提高支干（包括支部的干事、某些小组长及其他乡村级干部中的党员）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使支部干部熟悉领导支部工作及乡村工作；培养以后进行支部自我教育的教育干部。（二）教育的方式：支部的训练应该由县委负责，可以由县委直接开办训练应该由县委负责，可以由县委直接开办训练班或由县委派出教育团到当地去进行训练；普通党员的训练，可以采用通行的巡回教育与流动训练班的方式，由区委负责办理；党的小组一般的应当兼有学习小组的作用，或者规定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组会议作为学习会，或者每次小组会议有一定时间用在学习上。同时还提出，地委和县委的宣传部应该保存适当数量的教育干部，由

他们去进行支干教育及协助区委进行党员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必须把支部教育工作放到重要地位上来，给以经常的检查和指导。

1940 年 10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中宣部指出，一年多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已经发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目前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加倍提高学习的质量。(一) 坚决实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二) 学习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以求学习的深入，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咬得烂，懂得透。(三) 充实和加强学习的指导。(四) 及时的解答疑问和争议。(五) 必须开始研究和总结正在进行的每一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六) 以后关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应该着重于教学质量与研究方法的方面，同时应注意于各个独立研究小组（或研究会）的检查，把他们中的优良经验传播出去。(七) 在职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妨碍他们现在所担任的实际工作，相反的，只有当这种学习能够提高他们对实际工作的兴趣与能力时，才有意义。

1940 年 10 月 20 日　《新中华报》号召完成秋收，增开秋荒。在发表的《迅速完成秋收与开秋荒工作》的社论中指出，党中央号召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做到自给自足，以粉碎敌寇的经济封锁，克服一切抗战物质上的困难。根据这一号召，边区党和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特号召和通令各县："迅速动员组织秋收，以便按时收割，打碾储藏完毕，避免粮食浪费。"并在秋收前后，增开秋荒 20 万亩，限 11 月底以前完成。关于机关生产，总生产委员会也规定，务必在 10 月 20 日以前完成收割工作。

1940年10月2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宣部指出，中央书记处1940年1月5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及3月24日《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所提到的干部教育方针和学习原则，以及1940年8月《中宣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对于大后方党的教育仍是适用的，仍需继续执行。

1940年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中央指出，（一）根据地之建立，政权问题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华中应注意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二）根据地各种政策应以统一战线原则为标准，发动基本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为轴心。因此，减租减息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是必要的。（三）关于财政经济，应注意一开始便作长期打算，节省人力物力，注意培养积蓄认真的爱护根据地，反对临时性的抓一把的办法，要有比较固定的经常的政策。要开展合作运动，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反对贪污浪费。严格规定动员人力、牲口的办法，禁止各部分随便自由募捐筹款，禁止一切浪费人力物力破坏生产的动员。（四）大规模的开办各种训练班与扩大联大分校，尽量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很好的爱护他们，培养他们来参加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反对不注意争取知识分子与不信任非党干部的狭隘倾向。

1940年11月7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发出的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地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1940 年 11 月 10 日　延安《新中华报》论晋察冀边区的政权建设。在发表的《晋察冀边区民主建设的新胜利》社论中指出，四个月中在敌后拥有 90 余县的广大土地，1500 万人民的晋察冀边区，从边区政府委员会到乡村行政组织，都经过人民投票重新改选，并产生了各级民意机关——边区参议会、县参议会、区代表会、村代表会——及国大代表。

1940 年 11 月 12 日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要求加强边区经济建设。在作出的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广泛的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这首先就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更加有保证长期抗战军队的供给，更进一步的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也就是为了更高的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决定还指出，边区存在着广泛开展经济建设的可能条件，要求各级党委把经济建设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来抓。并制定自己的计划，不失时机的开始工作。

1940 年 11 月 15 日　罗瑞卿论在敌后方办抗大的重要意义。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抗大是中共领导下为抗战服务而培养干部的学校，它是全中国优秀青年团结的旗帜，它也是我党我军——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主要来源。它之转移敌后，将吸引着广大青年，站在坚持敌后抗战的岗位上与敌寇进行坚决斗争；它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干部的需要，经过它的培养与教育，它将使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的提高一步。它将在建立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提高八路军、新四军战斗能力等等方面，起着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1940 年 11 月 16 日　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他在《解放》杂志发表的《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的施政纲领》一文中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特别声明：我们坚决争取并保证在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这是本党中央业已确定、本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明白公布了的，也是我们绝对遵守执行的。我们在晋察冀边区始终坚持建立各党、各界、各军的联合的民主政权，这是我们对边区政权建设的根本主张，也是我们纲领中关于政权部分的主要内容。

1940 年 11 月 16 日　谢觉哉、左健之论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建立。他们在《解放》周刊发表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在边区政府指导之下的自 1939 年开始的边区各机关、各部队及各学校的生产运动，其结果曾使人们改变了对劳动的态度，体验了“劳动神圣”的真义；曾使各机关、部队、学校达到全自给、半自给或三分之一自给，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改善各单位人员的生活；曾很大的影响全边区人民以至全中国人民，使他们相信只要努力生产、实行自力更生，是能够解决长期抗战中经济上的困难的。并且这个生产运动还创立了一个新类型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个经济形式，这个生产运动，曾使边区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今后，要更广泛的开展各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这是克服抗战困难的基本方法之一。不过，生产运动的重心，以后不是放在粮食方面，而是放在衣服、膳菜、用具方面，并尽可能在畜牧方面开始或扩大生产。

1940 年 11 月 23 日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号召边区创造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在发布的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

指出，陕甘宁边区为着打破日增的困难，为着实现反对投降、坚固民族统一战线。力争时局好转的严重任务，又为着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财政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走，而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政策，这就是目前财政政策的新方向。指示提出了自力更生政策的原则、实际内容、具体计划和组织工作等，号召全边区党内外120万人民起来管理自己的伟大事业，渡过困难，胜利的迅速的完成自力更生的任务，给全国人民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政策以基础，这也正是反对内战挑拨者及投降派的武器。

1940年11月24日　《新中华报》号召陕甘宁边区经济实现自给自足。在发表的《做到边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社论中指出边区是全国最模范的抗日民主地区，在经济建设工作上，它也应成为全国的模范，推动全国坚持自力更生的抗战国策，在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基础之上，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指出，边区必须做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才能继续坚持抗战，担负起推动全国继续抗战的艰巨任务，才能继续更大的支援前线和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党政军民学和200万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更加繁荣。社论指明了做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具有的条件，并号召全边区每一个干部、党员和200万民众，以最大的信心和热忱来拥护这一伟大运动的推行，从现在开始，有资本的出资本，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把做到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当前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去进行。我们相信，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建设运动，一定能够胜利成功。

1940年11月29日　陈云论干部队伍建设。他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干部的重要性，分析了干部的现

状，提出，（一）挑选干部的标准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具体的说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即忠于职守；守纪律。总之，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二）对了解干部和审查干部的要求：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并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要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三）提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四）使用干部的原则：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使用的方法是：放手使用，同时要经常地适时地检查和帮助。适当分配，并保持相对稳定，不轻易调换，以造成人才，积累经验。（五）教育和培养干部：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要鼓励干部吸取和正确地运用别人的经验。发展其长，克服其短。（六）纠正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反对家长式的对待干部，同时反对放任干部的错误，赏罚要分明，批评奖励要适当；反对和人拉拢，搞个人系统；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责，甚至打击报复。要正面、坦白、诚恳地对待干部；反对轻视干部政治生命、随例摆布干部的倾向。要经常关心和解决干部的生活困难；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处罚干部必须适当。（七）要加强党内干部的团结：要鼓励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党组织要主持公道，该批评的必须批评，该支持的必须支持。同时必须使所有干部认识一个基本问题，领导

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党，不论新干部和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 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八）要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要用各种方法团结非党干部，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九）要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干部部门要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

1940 年 12 月 3 日　毛泽东提出反对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作风。他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 1941 年生产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他还说，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940 年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中各项政策的指示。中央指出：（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二）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的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三）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环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

1940 年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开办学校大量招

收青年职工和知识分子。中央指出，你们的学校应尽量招收上海及苏北的广大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加淘汰。学期宜短，两三个月一期，学校便有了教员。要大量招收上海、苏北原有教职员参加办学。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

1940 年 12 月 16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出，各级党务委员会（在地方党未建立党务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的地方，由省委区党委等代行党务委员会的职权）应由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推选产生，军队党则力求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之。在委员分散不易开会的条件下，得成立常务委员会。党务委员会除解决党内纠纷，给个别之党员以处分之权限外，应负有保障党员应有之权利，监督党员实行应有的义务之权限。

1940 年 12 月 25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他指出，（一）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

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二)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三)关于土地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到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四)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原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敌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要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五)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六)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1940 年 12 月　刘少奇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他指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的方针与任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根据抗日民主政权的这种性质，政府的组织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在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应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二，这就是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这些非共产

党人员，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党何派，只要他们抗日并愿与共产党合作就可以参加。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1940年年底　毛泽东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时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他还说，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会拖长。他特别强调了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940年　陈云发表《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他指出，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每个党员应该信任党，对党毫不隐瞒，乐于接受党的任何考察。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党内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如

果我们的党员说假话，欺骗人民，那么，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因此，在党员面前放着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

1941 年 1 月 16 日　罗迈在《解放日报》发表《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一文。他指出，要取得 1941 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胜利，必须切实执行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第一，一般理论教育同策略教育应当同时进行，应该比以前更加强策略教育的方面。我们研究党的策略，必须避免把它当作公式或教条来背诵的毛病。第二，学习力求深入，办求咬得烂，懂得透，力求质量的提高。第三，必须强调自修，认真地自习，认真地阅读和思考，并立即实行在水平较高的干部中推广学术研究会（或研究小组）的方式。

1941 年 1 月 20 日　杨尚昆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他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一文中，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制度包含的内容：（一）首先表现在它的选举政策上。凡年满 18 岁的中国人，不分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程度的差别，除汉奸、患神经病者及受抗日政府之刑事处分者外，一律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选举的方法，应该是直接、普遍、平等的选举。人民自己选出自己要选的人。（二）各级民众大会选举代表 建立各级的真正民意机关，并在代表会议上，选举各级主要的行政人员。（三）坚持统一战线，调解各阶级的关系。在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人员构成的分配上，代表无产

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左派进步力量的、代 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我们不赞成共产党员的“清一色”参加政权工作，也绝不能忽视保持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优势，与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四）一切抗日党派均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五）将行政区域重新划小，使各级政权密切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吸收群众的意见，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六）各级政权是廉洁的，反对贪污腐化。保证行政人员的生活，不致与群众生活隔离太远。号召行政人员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作群众模范，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艰苦的工作作风。

1941 年 1 月 31 日　毛泽东指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他在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指出，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1941 年 1 月 31 日　莫文骅要求加强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九四一年边区驻军生产政治工作中心》一文中指出，生产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证生产计划的彻底完成，改善部队生活，以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同时应更进一步帮助边区党、政府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及各机关生活。为此，须深入动员每一个人，发扬三年来大生产的优良作风，要求每个干部发扬模范精神，加强生产的管理工作，避免任何方式的贪污腐化浪费以及本位主义不注意友爱、不关心部队生活的不良现现象。在生产中帮助当地党和政府动员与组织人民起来参加，并应更进一步的发扬 1940 年在生产中对人民帮助的良好效果。处处照顾人民的利益，纠正还存在的某些弱点，以增进人民对军队的

信仰，增进军民团结。

1941年1月　中共中央指出党性问题对全党来说是一绝大的问题。在《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中指出项英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1941年2月2日　《解放日报》号召陕甘宁边区1941年增产细粮40万石。在编辑部文章《为增加四十万石细粮而奋斗》一文中指出，增加40万石细粮是1941年农业生产中心的战斗任务。怎样来完成这一战斗任务呢？第一，首先要把这个任务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以获得农民的热烈拥护。第二，要动员农村中所有能劳动的人一律参加农业生产工作，充分发挥农村中各种劳动组织的作用。第三，及时做好耕牛农具籽种肥料的调剂与解决工作。第四，改进并讲求农业耕作法。第五，有荒地的区域应该发动大大垦荒，以补助良田不足。第六，大大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热忱，发动革命的竞赛，把增加粮食产量这一工作造成一个群众运动。第七，各级政府要正确的领导这一工作，有具体的计划、检查、督促办法。

1941年2月5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加强妇女工作。在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把下列各项作为经常工作：（一）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如家庭工业、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的各种生产），目前首先须动员农村妇女直接和间接参加

春耕工作；（二）关心妇女生活痛苦（如反对缠足、早婚、虐待、买卖婚姻，关心疾病、生育、婚丧等困难问题）；（三）注意保护母亲、儿童；（四）提高妇女文化教育；（五）动员妇女参加政权工作。指示要求加强培养妇女干部——党的妇女工作干部还异常缺乏，各级党委必须：（一）努力吸收优秀的女工、农妇及知识妇女入党；（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开办各种专门培养妇女工作的训练班和学校；根据女大经验，办专门培养妇运人才的学校，对开展妇女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

1941 年 2 月 7 日　军政委员会条例颁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的命令。命令指出，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但军政委员会并非执行机关，其决定应交各部门执行之。命令还指出，应向干部解说军政委员会之设立。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以收集体的领导，团结干部之效能，但军队仍是集中的组织，上级司令员、政委及各部之命令，下级应绝对执行，下级军政委员会无权讨论拒绝命令之执行，即同级各部门亦应执行首长之命令。军政委员会之设立，并不减弱个人负责制。

1941 年 3 月 17 日　毛泽东强调克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他在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了解下情、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克服存在

于党内的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还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这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并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研究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进一步阐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并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1941年3月　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屯垦。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旅长率领，开进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在这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用树枝搭草棚，安营扎寨，开荒屯垦。

1940年4月7日　洛甫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纪念五五学习节。他指出，提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急需解决下列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培养干部独立阅读（即是独立研究）的能力与习惯的问题。每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首先应该知道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不要好高骛远，妄想一步就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自己下一番功夫。要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必须虚心一点，放下空架子，切实了解自己，从自己今天的文化理论水平出发，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与习惯，自己下一番苦功来攻打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堡垒，这些是我们提高学习质量的一个基本方面。第二，关于增加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作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可能的。从具体到抽象，应该是学习上的一般原则，学习到的

抽象才是具体的真理，而不是空洞的教条。第三，关于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编辑与出版问题。要使干部学习能够按部就班的前进，能够学习具体的知识，没有适当的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供给，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宣传部及各高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在这一方面应予以更大的注意。

1941 年 4 月 19 日　毛泽东要求党员和干部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他在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的《跋》中指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是，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政策。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1941 年 4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大量吸收专门家。在《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中指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中央 1940 年 12 月 25 日的指示已强调指出，应该大量吸收同情分子参加我军工作；吸收这些专门家参加我军，便是吸收同情分子的重要的一环。对于上述各种人材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对于上述各项人材，一律依照中央指示，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指示要求我军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刻

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严重意义，而切实执行之。

1941 年 4 月 23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布置各机关的生产运动。在召开的第五十九次委员会议上，讨论各级机关生产运动。决定：（一）财经处应加强在生产运动中的政治领导，使各个机关和每个工作人员深刻认识生产运动的自力更生的正确意义，健全各个生产委员会的组织。（二）加强在生产运动上的技术领导，推广经验，改进技术。（三）今后的生产运动要以农业工业为基本环节，应尽量组织运输业，而以商业为辅助，彻底实现政府的生产自给政策。（四）推动并检查县级的生产运动，使一般的都能做到自给自足。（五）各单位从事生产的人员的生活费必须从生产中开支。（六）加强审计工作，各县审计指定专人办理。（七）创设农场，增加粮食蔬菜肉类等生产额。（八）筹建劳动俱乐部，提高生产中的文化娱乐生活。

1941 年 4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出指示。中央指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乘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举之际发布，共计 21 条。其中有：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

困难，1941 年开荒 60 万亩，增加粮食产量 40 万担，奖励外来移民等。

1941 年 5 月 1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缺的责任。但在革命运动中，尤其领导着军队和政权的党，共产党员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虽然可以与应该有一小部人，专门从事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决不能单单埋头实际工作而完全不学习理论。中央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要求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四）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实事求是原则的系统阐述

1941 年 5 月 19 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 20 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 20 年，但是党内还存在着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批判了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

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报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就是不要割断历史。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在讲演中提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二）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研究历史，首先是研究中国的近百年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三）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这一讲演是继《实践论》之后，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这一著作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1941 年 5 月 21 日　《解放日报》号召把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传播到群众中去。在发表的社论：《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中指出，把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同今天中国的某些地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统治阶层所实行的政策，加以比较，证明这一纲领是使中国人民真正获得解放，走上独立、自由、强大的三民主

义中国的大道。指出，今天放在全边区及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将这个纲领普遍地深入地传播到每个农村、学校、工厂、商店中去，向全边区的人民解释这个纲领，在这个纲领的旗帜下，组织1941的竞选活动！在这个纲领下忠实地工作，为全部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把陕甘宁边区更进一步地巩固起来，并把它变成先进的抗日民主的模范地区。

1941年5月24日　《解放日报》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在发表的《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的社论中指出，在将近四年的抗日战争烽火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华北、华中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内，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主，全体抗日人民（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都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都享有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充分自由。各级政权机构，都经过了人民的民主选举，建立了真正的民意机关（村代表会与各级参议会），在各级政权中真正执行了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经济方面，实现了减租减息，取消了苛捐杂税，实行了合理的、累进的新税制。人民生活获得了初步改善，大大刺激了人民的生产热忱，在政府奖励与保护之下，私营和公营的工商业都有大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有相当的提高（如开荒、水利、春耕、夏耕运动等）。社论指出，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都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1941年5月25日　周恩来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他在《论目前战局》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战争的政策，是独立自主，决不介入和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而放弃我们民族独立自由的立场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

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他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用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我们当前以及将要来到的更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以准备我们的反攻。拿我们这样自信的和坚决的抗战方针，以争取外援，适当的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灭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火焰之中。

1941 年 5 月　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各部队的生产工作必须遵循着党的财经政策，在发出的《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克服违反经济政策的行为与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本位主义，并以此教育各兵团及机关学校连队做到先公后私。要求各机关部队均须就驻地附近立即加紧夏耕工作，积极经营农业生产，多种秋菜，多饲牲畜，保证全年的全部蔬菜油料及肉食自给。

1941 年 6 月 1 日　《解放日报》发表《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的社论。社论指出，在陕甘宁边区，民主 政策和廉洁政治已经确立，苛捐杂税已经取消，合理税制已经施行，工农业生产已有显著进步，人民生活已有相当改善，已经造成了全边区没有乞丐、没有游民、家给户足的现象。

1941 年 6 月 4 日　中共中央指出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仍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在《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现在仍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不但应组织全体工农青年，还应极力争取地主、富农、资本家的青年，仅仅打击与孤立那些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与反共分子。还

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广大的城市知识青年转入军队中与农村中，和工农士兵群众密切结合起来，起了很大的与很好的积极作用。但尚有一部分人不认识农村与战争的特点，和工农群众结合得不密切，保存城市作风，浮在上面，表现苦闷与脱节，这种现象，即在从事青年工作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的。党应转变这些党员的观点，使他们了解实际，眼睛向下，联系群众，以达发展广大群众的青年运动之目的。

1941 年 6 月 7 日　王稼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起草给译电人员的一封信。他指出，中央及军委希望你们在工作中应努力的学习理论，以此来锻炼与发展自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与阶级立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们的机要工作紧紧地结成一块。

1941 年 6 月 7 日　《解放日报》发表《奖励自由研究》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本着学术的 良知来正视现实问题，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在边区，不但要大大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的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1 年 6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论党内教育工作。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在宣传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

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党内教育工作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党内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全党政策理论的水准，思想上巩固党的队伍，培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干部。党内教育的内容，应当集中在几门主要的课程上：(1) 马克思列宁主义；(2)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3) 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具体政策；(4) 中国历史；(5) 中国社会政策经济知识。党内教育可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在职干部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工作与学习互相联系的最好办法。在全党内应建立在职干部学习的制度，提倡学习的风气，养成独立的看书、独立的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二，支部教育，或普通党员的教育。党的支部教育，应当经常有计划的进行。第三，党校、党的训练班及政治学校，这也是党内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每个党的干部经过相当时期的工作后，进党的学校去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根据地内办党校办训练班及政治军事学校，大批的培养干部是非常必要的。应当逐步使党校正规化，提高党校的质量，慎重挑选学校的教员。

（五）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增强党性，加强调查研究

1941 年 7 月 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 20 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中央指出了党内存在的缺乏党性的一些倾向，提出了纠正的办法：(1) 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2) 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3) 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应当强调党内的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4) 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5) 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6) 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1941 年 7 月 1 日　《解放日报》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 20 年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的功绩，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纪念中国共产党的 20 周年，要继续提高全党的政治质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使理论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有更好的联系，加强研究环境、研究历史，从而得到科学的政策，使工作不发生错误，使抗战和革命能够更快的胜利。要继续巩固党，加强每个党员和每个干部的党性，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的周围，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

1941 年 7 月 2 日　刘少奇提出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阐述了党内斗争的重要性，批判了党内斗争问题上存在的机械的过火等错误倾向，指出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是要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性。他提出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第一，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把问题弄清楚，采取有组织地、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党内既不能容许家长制的存在，也不容许极端民主现象产生。第二，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尽可能的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多做正面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第六，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总之，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

1941 年 7 月 4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提高报刊质量。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中指出，一切报纸杂志，必须依

据自己的性质与任务，力求质量的提高。为此，在内容上必须注意：(1) 掌握党中央的政策与党的原则，为他们的贯彻而进行各方面的斗争，防止任何违反政策与原则的言论。(2) 反映现实，反映当地社会情况与工作情况，反映大众呼声，依此来进行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极力纠正那种主观的、表面的、教条的、公式主义的、无的放矢的和空谈的缺点。(3) 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表扬各种工作中的成绩，揭发其错误。但在表扬与揭发时，都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纠正那种夸大、铺张、虚伪、掩饰的恶劣作风。(4) 力求内容充实，具有多面性，改正空虚、单调的毛病。

1941 年 7 月 7 日　中共中央论党的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再一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

1941 年 7 月 7 日　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下设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国际研究组。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

1941 年 7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各级政治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总政要求各级政治部讨论这一决定，并联系各部情况，检讨缺点，开展自我批评，增强干部团结。

1941 年 7 月 13 日　刘少奇致宋亮信。信中论述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理论修养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指出党员在党校学习，从事理论研究的时

候，主要的任务是理论上的深造与把握，而不是学校生活的锻炼。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要埋头读书研究，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时所必须如此做的。还指出，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恰恰包含在实际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不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

1941 年 7 月 31 日　《解放日报》报道三五九旅努力生产。三五九旅的生产运动，半年来获得不少成绩。现有棉织、毛织、丝织、纺纱、织袜五个纺织厂，每月产棉毛布达 2000 匹，毛毯 150 床，毛巾 200 打，丝织及线袜数十打。煤厂两个，月产煤逾 30 万斤，盐厂每月产盐百余担。机器厂及炼铁厂可制造普通纺织机和各种农具。制鞋 2000 双。肥皂厂月出皂 1000 余条。其他尚有制油、面粉等作坊多所。以上数十个工厂和作坊，70%的工人，是从部队中抽调出来的。所产物品，大部供该旅自用，一部分销售于边区各地。农业生产，菜蔬可以做到全旅自给；种了粮食 2 万多亩，如今后雨水调合，秋收有望，将对部队食粮有很大补助，借以减轻人民负担。此外，并大量饲养牲畜，以改善部队生活，便利运输。商业经营有商店 20 余个，资本 20 万元，并向着流通商品，平抑物价，维持金融稳定的方向改进。

1941 年 7 月　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9 月，又把马列主义研究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强调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该院设立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中国文艺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等。

1941 年 8 月 1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

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决定规定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决定还强调，要把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

1941 年 8 月 1 日　《解放日报》指出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要掌握党的经济政策和培养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关键》的社论中指出，随着抗战而增加的军事需要与物质的困难，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来解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敌人与反共分子的经济封锁要求我们完成自给自足的任务。我们要严格地执行党的财政经济政策，要动员更多的优秀干部来参加经济建设的工作，把握住当前的政策，养成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要求我们不仅能看到工作的成绩与优点，更重要的是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有足够的勇气来承认与纠正自己的缺点。我们绝不应满足于目前的成就，必须实事求是，力戒夸张，更加埋头苦干。

1941 年 8 月 20 日　叶剑英指出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一文中指出，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如同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他说，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成为研究辩证唯物论继起的热潮，把辩证唯物论与军事理论和技术紧密相结合。他还指出，一些军事人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的热烈研究，是必需的。然而他之所以需要很好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为的是能够更好的执行党的政策，更好的掌握部队，更好的训练部队，更好的指挥作战。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军事任务。所以，必须更进一步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同时也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

1941 年 8 月 26 日　毛泽东为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一文作序。毛泽东指出，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序言说，高克林同志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1941 年 8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9 月 22 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在会上讲话说，这次党所提倡的学习教育的新方法，是使学习教育更联系中国的实际。要联系抗战解决抗战的问题。如果只能说出教条就不算及格，要能运用到大大小小的实际问题上去。

1941 年 8 月 29 日　《解放日报》论陕甘宁边区人民政权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在《读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社论中指出，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民主政权是依靠民众，力求进步的。它时刻关怀着人民是否尝到了民主的果实，生活是不是过得更充裕。没有哪一个政权像它那样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更没有什么能够分裂它和民众的团结一致。这个政权是勇于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缺点，能够研究产生缺点的原因，提出纠正缺点的方法的。它绝不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是毫不放松地检讨自己的缺点，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

1941 年 9 月 2 日　《解放日报》号召学习和精通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如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成是读熟它的个别结论和公式之学风盛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教条，看成是信仰象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不能把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的严重现象到处发生着。针对这些缺点，社论指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首先，必须把字句上的教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实质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别清楚；其次，必须善于领会和应用这个理论，否则，就是理论脱离实践，就是教条主义。第三，必须是根据我国革命和抗战的实际经验，来发展和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社论号召全党同志应根据党的六中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来学习和精通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反对字句的教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强调这种任务是再不能容许拖延下去了。要求在学习上来一个坚决的转变，要面向实际，面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1941年9月6日　《解放日报》号召加强党性修养。在《加强党性的锻炼》的社论中指出，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的倾向，表现在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党的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还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行动，不尊重党的决定，随意发言，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表现在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表现在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等等。为了纠正上述这些违反党性的倾向，社论指出，首先必须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的斗争，提倡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提倡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作风。在训练干部的学校内和在职干部教育中，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的教育。在学习中反对那些只尚空谈不管实际的学风，反对只记条文和只学字母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同时，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党中央决定和领导之重要性。强调党内团结互助，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发展党内自我批评。社论号召全党，要进一步的提高党性锻炼，进一步的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更好的统一党的意志和巩固党的团结。

1941年9月10日　王稼祥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应以思想领导为中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思想问题成为政治局今后的主要任务，今后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

过去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1941 年 9 月 11 日　《解放日报》提出根据地的教育应发展同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在《打碎旧的一套》的社论中指出，根据地的教育还没有战胜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要求教育要和今天的战争与革命相结合，和今天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和实际动向相结合。社论强调要打破旧的一套，彻底改进全部的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要战胜一切困难，切实转变方向，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1941 年 9 月 12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政府把下属的统计室扩大为统计科。该科的同志陆续整理出边区农村调查材料、边区人民负担统计材料，并着手组织深入的农村调查工作。边区政府委员会专门讨论了调查研究的工作问题，并对培养和训练干部，建立和健全调查研究的机构和各种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

1941 年 9 月 13 日　毛泽东论调查的重要。他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的《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1941 年 9 月 16 日　乔木论共产党要从思想上反对主观主

义。他在《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的文章中指出，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的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1941 年 9 月 18 日　周恩来强调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他在《“九一八”十年》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是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十年来，我们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抗战后，我们更主张加强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任何困难，任何敌人的进攻、包围、封锁和烧杀，都不能丝毫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

1941 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一）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而成立的。其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 300 人为限，内延安占 1/3，外地占 2/3。（二）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 20 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三）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

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四）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

1941 年 9 月 29 日　黎平指出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必须实行思想上的革命。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中，列举了主观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如：主观主义在政治上的一种形式是绝对主义；在理论工作上的一种形式是教条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一种形式是宗派主义；在工作方式上的一种形式是官僚主义。文章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做到：（一）把党中央最近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实行思想方法革命的指针，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作为实行思想方法革命的战斗口号。（二）必须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批评干部和党员中间所存在着的主观主义的各种形式。（三）必须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研究唯物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使唯物论不变成为空洞的名词，而成为真实的行动。（四）必须坚决抛弃教条主义，着手研究中国发展的历史社会经济，阶级状况，政治制度，革命运动等等，从这种研究中得出理论的结论，并以理论是否适合社会真实发展过程为理论之是否有用的唯一尺度。（五）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坚决的改造学习内容与学习方法，无论在学校教育上、干部教育上，都要改变专念概论，背诵条文，满口名词，不切实际的旧一套，要代之以了解情况领会政策的切实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在学习中理论真正与实际统一起来。（六）必须在中央的指示下，彻底检查自己的思想方法，以充分的自我批评的精神，虚心的不

厌求详的态度，来揭发自己的每一主观主义的病症及其根源，以便实行正确的医治方法。

1941 年 9 月　洛甫论反对主观主义。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癞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现在要补课。

1941 年 9 月　八路军三五九旅在金盆湾开始秋收。收获谷糜、玉米 503 石 8 斗，秋菜 89130 斤。还有夏菜 12.3 万斤，割马草 4 万多斤。该旅还建立纺织厂 1 所，木工厂 2 所，并开设骡马大店、合作社等 19 处。

1941 年 10 月 4 日　中央学习组提出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毛泽东、王稼祥在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中指出，（一）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二）在 1941 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83 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 1942 年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三）在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但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解答阅读中的疑难。（四）《六大以来》83 个文件中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五）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941 年 10 月 11 日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成立高级学习组。为领导党员和干部的学习，周恩来曾多次作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

1941 年 10 月 13 日　陕甘宁边区民主建政的主要成绩。边区政府委员会讨论边区选举工作的初步总结。据统计，边区 1549 个乡，共选出 3 万以上参议员。主要成绩是：（一）普遍实行了“三三制”(有的县共产党员只占 1/4)，边区内的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关系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二) 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人民能大胆地批评政府；（三）确实改进了政权机构，洗刷了某些不良的不积极的干部；(四) 更增进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五) 教育了干部与人民，更了解民主政治的实施与运用；(六) 更加团结了少数民族。缺点是：领导抓的不紧，有些干部认识不够。

1941 年 10 月 14 日　艾思奇论克服主观主义。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主观主义的来源》一文中指出，主观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是，书本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就要克服片面夸大、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病，要养成对具体情况作系统周密的了解的辩证的认识的健康作风。

1941 年 10 月 15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扩大办理农贷。政府拟发放款数百万元，解决移民贫民灾民困难，扶助农业合作事业发展，以促进农业发展，增高人民的收入。

1941 年 10 月 16 日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要求各级青年工作干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切实转变作风。在发出的《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中，号召各级做青年工作的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针对自己的工作，展开自我批评，进行深入的检讨，彻底扫除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普遍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切实有系统地周密有计划地去了解青年的各种具体情况，以掌握党的青年运动的政策，加强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胜利地团结青年整个一代到党的周围，为

革命事业而奋斗。

1941 年 10 月 18 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中央要各地把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及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

1941 年 11 月 4 日　毛泽东、王稼祥布置各地高级学习组 1941 年的学习任务。他们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安排 1941 年内的学习任务，并指出学习方法。要求 1941 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的 83 个文件通读一遍。在通读期间不要求详细讨论。

1941 年 11 月 6 日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并要求共产党员参议员，要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

1941 年 11 月 6 日　李鼎铭提出根据地应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 11 人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

敷出的经济紊乱现象案》，提出军队实行精兵主义，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参议会于11月18日通过精兵简政决议。

1941年11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实行精兵主义。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抗日军民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一）主力军，（二）地方军，（三）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指示强调，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相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只能占根据地全人口3%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

1941年11月20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林伯渠被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其他政府委员按“三三制”选出。

1941年11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加强军事教育。在关于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的决定中指出，（一）为了切实整顿军委所属各学校的教育，特决定以朱德等9同志组成教育委员会，由朱德负责领导。任务是，整顿学风，改良教育，确定各学校的教育目的，实事求是的培养各种专门有用之材，以借将来建军之用。（二）为了加强高级军事干部的学习，决定将军政学院三、四两队高级干部与抗大三分校合组为军事学院，以朱德为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于11月底改组完毕，12月1日后按新订教育计划实施教育。（三）原来的军政学院成为专门培养政工

干部的学校，组织照旧。

1941 年 11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决定高级学习组分为政治组与理论组，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同时分别规定了选择组员的具体条件，并确定高级学习组之编组以地域相近，而又工作系统相同者为适宜。

1941 年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在职干部教育。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央指出，这个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决定分为（甲）在工作中学习；（乙）工作以外的学习；（丙）在职干部学习的领导三部分。指出在职干部的学习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内的学习，一部分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外的学习，第一种学习对在职干部是主要的，第二种学习是补助的，但是必须的。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是在自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中。根据《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无论哪一领导部门工作，都必须要能够做到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极大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即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基本方面。关于本部门工作的调查研究，包含着同本部门工作直接有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他各种理论的研究与批判。中央要求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应该强调在工作中学习的这个主要方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应该在这个方面大大努力，适当的分配每个工作同志以一定的调查研究任务，适当的在工作会议上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与研究，得出一定的正确的结论。在职干部除在他专门部门工作中学习外，还应该在工作以外学习，这种学习包含文化的（国文、史地、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等），时事与策略的，理论的（包含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决定根据不同种类的在职

干部的不同要求，把延安的在职干部在学习方面分为四类并规定不同的学习内容：(1) 有工作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准的高级及中级老干部（简称第一类），应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自己有联系的某一方面学起）为主，同时应增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2) 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甚至半文盲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简称第二类），应以学习文化，首先以学习国文、数学、自然常识为主，同时应增加政治常识与社会常识。(3) 工作经验不够，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级及下级知识分子新干部（简称第三类），应以学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为主（同自己工作有联系的一方面学起），同时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知识。(4) 在学术上、技术上有较高成就的专门人材（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家）（简称第四类），应以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为主，同时应增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中央指出，每个在职干部学习能否进步，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除第二类干部学习应比较着重于采取上课的方式外，其他各类干部的学习，均以个人阅读与自我研究为主，各种小组会与大讲演等，只能起辅助作用。要靠自己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取得学问的必要条件。中央强调，在职干部学习能否成功的主要关键，决定于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领导。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直接组织、检查、督促与领导之责，属总政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及中央直属党委宣传科。中央宣传部应经过他们实现统一的领导。

1941 年 12 月 4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发出指示信。指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的最

有效的方案，是保证今后完全实现“五一施政纲领”和一切重要决议案的重要步骤。指示信还指出了边区各级政府机构头重脚轻，老一套的游击作风等毛病，号召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把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提出了对调整出来的人员的处理原则和注意事项。

1941 年 12 月 6 日　《解放日报》阐述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在《精兵简政》的社论中，阐述了提出“精兵简政”这一主张的主要依据及其意义。指出根据全国所处的抗战形势，在敌后方，我们的兵，不能不精，我们的政，不能不简。而在陕甘宁边区，精兵主义的执行，主要的应该提高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他们的物质供给，保证他们有充分时间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教育，更进一步的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更认真的遵守群众纪律，开展群众工作。在边区实行简政，主要应该是：行政工作抓中心，行政机构求精干，建立正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在干部使用上不仅要使人人有工作，而且要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财政工作上不仅要取之合理，而且要用之得当。社论指出，“简政”的实行，就是建立正规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今天不是“无为而治”的时代，“简政”不是恢复“简陋”；也不是提倡粗枝大叶的“简略”，这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一脉相通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不可平分力量，抓住中心一环”。社论指出：部队里的老弱战士不免要另行设法安置，某些机关冗员必须紧缩和减少；不急之务一定要停办或缓办，不急之需一定要少发或免发。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使我们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一切都为了使陕甘宁边区不仅在政治方向上、政策实施上，成为全国的模范，而且在工作效率上也成为全国的模范。

1941 年 12 月 6 日　陕甘宁边区成立编整委员会。《解放日

报》报道边区政府令各厅院处迅速造送编整计划。报道说，精兵简政经边府首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负责关于人员编整，计划执行，编整会于12月2日开首次会议，决定边区一级各机关应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1/4到1/3，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分别调整工作、休养、学习、或参加生产，使人人各施所长，各得其所。边府3日特令各厅、处、院即日召集各自直属机关人员传达此项决定，并迅速进行以下工作：在精兵简政原则下，按照减去人员1/3或1/4比率，拟出各机关具体的编整计划，开列编制表并附上意见，限于12月5月送交编整委员会审查。

1941年12月7日　林伯渠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方针。《解放日报》报道，林主席宴新闻文艺界，发表边府施政方针。林伯渠主席指出，为了坚决完成第二届参议会的决议，在民主政治实施方面：首先要健全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方式方法，实行精兵简政，改变过去行政机构头大脚小现象，建立区乡政府的经常工作，并号召与调动大批干部，面向群众，深入民间，加强下级政权和基层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发展生产事业，厉行节约，改良生产技术，农业上新开荒60万亩，增加细粮20万石，棉田10万亩。工业上则以发展私人企业为主。在财政方面：实行有计划的统筹统支，建立预决算制度，一方面依据民力，建立税收，另一方面部分从事生产，力求自给。

1941年12月8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实行精兵简政。《解放日报》报道，后方留守兵团认真执行边区二届参议会通过的精兵简政提案，除计划以3000人适当地转移到生产战线上，以解决1942年度部分经费外，并积极提高部队质量，在军事政治方面力求完全正规化，在文化教育方面，努力提高一般文化水平，使留守兵团真正成为文武双全的精锐部队。

1941 年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中央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指出这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兵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1 年 12 月 15 日　延安召开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李富春参加大会并讲话。林伯渠讲话指出：必须提高边区人民的生产热忱，发展农工事业。1942 年扩大植棉 10 万亩至 15 万亩，以 550 万元投资农贷。财政方面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在精兵简政的原则下，厉行节流。为完成上述任务，第一，尽速完成各级编整工作；第二，开荒 60 万亩；第三，运盐 30 万驮；第四，发展交通运输；第五，平衡财政收支；第六，发展贸易稳定金融；第七，纠正公营商店过去“衙门化”的不良倾向；第八，切实执行 1942 年度统筹统支办法内所规定的生产范围及节约规则。朱德在讲话中强调，1942 年度的抗战将更趋激烈，一切应以军事为第一，在后方工作的同志，要努力解决军事上的给养问题。李富春在讲话中指出，1942 年度边区的经济财政政策已经在边区参议会通过，但要保证其实现。李富春提出 4 条节省公约：（一）不建筑，（二）不宴会（宴请外客除外），（三）服用土布，提倡边产，（四）爱护公物，厉行移交制度。

1941 年 12 月 17 日　中共中央要求干部学校贯彻理论和实际、所学和所用紧密结合的原则。政治局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中央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

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使学生能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与实质，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并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为此，除正确的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中央还指出，学生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就是使学生能够用所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原则，中央规定了各学校的具体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员、教材及经费等各项具体措施，强调学生在学校内要养成好的学风，教职员要以身作则。中央指出，本决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延安，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 年 12 月 17 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并强调，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 3%。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指示说，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中央号召

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1941 年 12 月 25 日　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 1942 年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财政方面，必须实行以发展国民经济，解决财政需要的总方针，发展各项事业。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办法，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中心环节。在发展生产上，1942 年必须全力贯彻以农业第一的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同时继续发展家庭纺织业，大力发展人民运输业。

1941 年 12 月 28 日　毛泽东提出党 1942 年的中心任务。他在为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指示中，提出 1942 年的中心任务，要求各根据地坚决执行中央 12 月 13 日的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战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

1941 年 12 月　陈云阐述党的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政策。他在《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文中指出，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批评了党内缺少礼贤下士的空气，存在有浓厚的排外思想和严重的关门主义，歧视非党干部的缺点，提出了改善党与非党干部之间关系的办法：（一）重视非党干部的作用，在政治上信任他们。今后对非党干部不要疑神疑鬼。（二）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格。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的责任，并无排挤非党

干部之权力。（三）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应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共产党员应承认人之长，检查己之短，应满腔热忱地向非党干部学习。（四）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总方针，这是彼此合作不可缺一的条件。（五）非党干部负责某一行政部门之领导时，党必须要求他们在工作上符合于党的方针，党员应在行政上服从他们的领导。（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应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八）党与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九）党的组织部门或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的责任，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

1941 年 12 月　林伯渠到基层调查。他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考察团到鄜县、甘泉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区、乡基层的具体材料，为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作准备。

1941 年　刘少奇写《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他论述了：（一）党员与党及其他党员的关系。（二）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三）党的上级、党的负责人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四）“愿意”与“强迫”的统一。（五）自由与必然。（六）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对党的态度。（七）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或者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等问题。指出，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彻底执行。要反对不服从多数，不服从组织，不服从上级，不服从中央的自由主义。还指出，第一，党的领导者，或党的上级，自己首先要服从大多数。服从多数委员和多数党员。第二，领导机关应当合法产生，或者由民主选举，经上级批准，或

者直接由上级指定委任。领导机关应向所属党员作定期报告，并请大家审查。第三，要注意在党内发扬自我批评与讨论，批评领导机关的工作。第四，要尊重下级组织，尊重党员个人的权利和职权。第五，原则上多做说服工作，对同志的态度和方式要好，要虚心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文章要求共产党员应当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做诚恳坦白埋头苦干的老实人。

1941 年　刘少奇论反对官僚主义。他在《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一文中指出，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民主，提高党员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官僚主义是民主的反面，没有民主精神就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的一种，特别注重事物的形式，不注重事物的内容与实质，粗枝大叶和迟缓的都是官僚主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文章说，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要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办法。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在共产党员及干部间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其他人，斗争其他人，官僚主义就很难产生。

1941 年年底　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党校教育。中央作出《关于中央党校计划》。中央党校根据中央的计划和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行了彻底改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课程重新编制，入校学员以地委以上和军队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和军队政治工作干部为合格。教育内容贯彻理论和实际，所学和所用一致的原则。

1942 年 1 月 4 日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朱德到会讲话，他要求青年努力参加生产，储蓄经济实力，支持长期抗战。

1942 年 1 月 5 日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发出关于法币贬值

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指示指出，今后各根据地在金融上总的方针之一就是“要向着自给自足的路上发展”。

1942 年 1 月 8 日　《解放日报》号召要精于计算与管理克服浪费现象。在《彻底消灭浪费现象》的社论中指出，我们今天处在战争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我们面对着的是精于计算、强于管理的敌人。假使我们不善于珍视与使用自己的力量——大的与小的、公的与私的，我们将无以争取抗战的迅速胜利。我们一定要学习计算与管理，要在衣、食、住、行、烧炭、点灯各方面打算盘。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追求效率。我们要号召大家互相督促、互相检查来认真地实行节约，而共产党员与党的支部首先应该在这中间起模范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不仅要严格地检查、举发与纠正大的浪费现象，而且要注意研究节约的方法。社论强调彻底消灭浪费现象需要长期的教育，正规制度的逐渐建立、相互间的经常督促与检查，这乃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但这却是一个迫不容缓的紧急任务。让我们从今天此刻起，就投入这一斗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

1942 年 1 月 10 日　《解放日报》指出解救经济困难的根本办法在于发展生产。在《巩固经济阵地》的社论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和战时经济引起了莫大的影响，解救我国目前经济困难最根本的办法，不能靠外援，而是靠发展生产，使之达到自给自足。

1942 年 1 月 12 日　毛泽东论领导方法的一个问题。他在给彭德怀、罗瑞卿电中指出，由于敌后各根据地间交通困难，难于通讯，领导方法必须改变。领导方法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1942 年 1 月 13 日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制定 1942 年经济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贯彻以农业为主，广泛发展私人经济；在“分散经营，统一领导”原则下，巩固与发展公营经济，合理进行生产自给；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资金。

1942 年 1 月 13 日　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及后勤部队实行精简。为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他们召开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左权参谋长作《精兵简政之意义及财政问题》的报告。会后各单位即成立整编委员会，实行精简。

1942 年 1 月 13 日　十八集团军命令太行、太岳两个区所属部队努力生产，克服困难。命令并规定旅以上机关每人生产 100 元，团以下机关部队每人生产 10 元的生产任务。

1942 年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给解放日报写稿与供给党务广播材料的决议。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

1942 年 1 月 20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西工作及领导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解决平西问题的关键是实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超过平西我区人口总数的 3%，以减轻人民负担及财政粮食的困难；克服党政军工作人员粗枝大叶的作风，提高党的工作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认真实现党的政策和决议，使各种工作脚踏实地的步入正规。

1942 年 1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苏北阜宁城西北单家巷召开。刘少奇作《关于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华中今后工作的方针，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九项任务。他强调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建设强大而精干的军事力量，才是我们坚持抗

战与争取胜利最可靠的力量基础。他认为，加强政治工作是提高军政素质，使军队成为党的忠实工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要求一切政治工作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与必要的军事知识，必须严整政治纪律，务必在政治上、党性上作一切指战员的模范。会议至3月5日闭幕。

1942年1月21日　《解放日报》提出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方法的一个宝贵的锁匙。在为纪念列宁逝世18周年发表的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匙》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世界的最伟大的武器。共产党人只有用这个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在战斗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有些人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典籍上的词句，遇到问题，便把这些成语引证出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不是它的个别现成的结论，而是它的立场和方法。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只有用这种立场和方法，才能认识我们的现实，解决我们的问题。个别的公式和成语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立场和方法，是创造的，生气勃勃的。前者是躯壳，后者才是灵魂。社论指出，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对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锁匙。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特点是在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同时也只有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才能认识并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加强调查研究，是全党的责任，是每个干部的责任。

1942年1月23日　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指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

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

1942 年 1 月 25 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 1942 年度机关生产办法。要求专署以上的机关，每人每年所生产的 2/5 交公，3/5 改善生活；县级政府每人每年 1/3 交公，2/3 改善生活；学校生产，全部作为改善生活及补助公费之用。

1942 年 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要点指出，1941 年中央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的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者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者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错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1942 年 1 月 26 日　张闻天离开延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 2 月 18 日起到 4 月 12 日，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整理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从 4 月 22 日起到 9 月 10 日，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调查，整理出《碧村调查》和《兴县 14 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此外还有 13 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

是其他同志整理的。从9月26日至11月21日，在警备区米脂县杨家沟村调查，整理出《杨家沟地主调查》，嘴外还有刘家峁、高庙山两村地主的调查，是其他同志写的。从11月20日到12月2日，在米脂城内调查。从12月10日到1943年1月15日，在西川、双湖峪市镇乡调查，重点调查各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附带调查了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盐滩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和西川各区地主材料。从1月18日到2月24日，在绥德市调查商业。1943年3月3日返回延安。张闻天对一年多的调查研究的经验教训，于3月27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

1942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强调实行土地政策对调动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积极性的巨大作用，并重申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是：（一）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决定强调只有坚持上述基本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一切过左过

右的偏向，都必须加以反对。对于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必须按上述原则作适当的处理。

1942 年 1 月 29 日　行政学院教育方针制定。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讨论该局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行政学院的教育方针，决定三原则：（一）学习课目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与社会现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在学习期间，教员应注意学生实际工作经验之整理，毕业后，学校还应成为学生工作中的顾问。学校教员也应抽时间参加县区乡政府的工作，搜集和研究工作中的实际材料。文化课的学习，主要是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习惯，而不是只注意知识的灌输。

1942 年 1 月下旬　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后勤部召开经济建设干部会议。朱德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号召各商店团结起来，加强驿马大店，扩大运输力；在工业方面加紧纺毛线，不贪图便宜，不依靠洋纱；要重视农业，经营副业。

1942 年 1 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北新华社广播的指示。中央指出，各地广播应多着重根据地建设中各种具体生动的报道，从新闻中反映党的政策，避免不切实际的夸大宣传与枯燥数字的广播。

1942 年 1 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结南区合作社经验。总结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自此，边区的合作社逐步走上正轨。

1942 年 1 月　高岗到基层调查研究。他率领中共中央西北局考察团到绥德、米脂调查研究土地问题、三三制问题、文化教育问题、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为西北局召开高干会作准备。调查结束后，出版《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发扬

（一）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切实整顿党的作风

1942年2月1日　中共中央党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和中央诸同志出席会议。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指出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他分析了党的状况：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在整顿学风中，要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

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毛泽东在演说中，还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的糊涂观念：什么是理论家问题。毛泽东问，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他明确回答，这不能算理论家。他说，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以理论的说明，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他要求全党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在演说中讲到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时说，有许多同志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这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在反对宗派主义中，要提倡顾全大局，识大体，和群众密切联系，发扬共产主义的精神。党八股也必须肃清，因为它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的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革命的内容是不能由党八股的形式表达的。毛泽东在演说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运动的宗旨。在毛泽东号

召下，全党很快掀起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普遍整风阶段。这一演说，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这一著作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2 年 2 月 2 日　《解放日报》指出整顿三风的口号是党在这一时期加强干部教育的总方针。在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指出，整顿“三风”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中加强干部教育的总方针。因此，不仅党校今后工作将以此为基础，而且全党干部教育，亦应以此为准则。为了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每个党员都要痛切反省，纠正缺点，把自己的能力更提高一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社论指出，共产党人是不害怕自我批评的。我们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缺点。相反，自我批评，是我们教育自己、督促自己进步的最有力的武器。对于自己弱点和缺点毫不掩饰，毫不宽容，是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的表现。一切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忠于解放事业的团体和个人，都是应当如此的。

1942 年 2 月 2 日　延安地区自己动手解决穿衣问题。《解放日报》报道，在“解决穿的问题”口号之下，延安等 9 县有 7.3 万妇女参加了纺织组，自己动手解决穿衣问题。

1942 年 2 月初　南方局的整风学习开始研究党史。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整风学习，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周恩来作学习从党的六大到六届四中全会党的历史的报告。

1942 年 2 月 6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央指出，1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三个附件，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

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

1942年2月8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专为肃清党八股、反对宣传工作中浮而不实、无的放矢的恶劣作风而召集的。会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毛泽东说，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他宣布了党八股八条罪状：第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是主观主义的本色。第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这是主观主义加上宗派主义的表现。第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乱讲一顿，似乎是下决心不要人听不要人看。第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语言乏味得很。第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只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加以分类。第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写文章做报告时轻率从事，不研究，不作准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毫无责任心。第七，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说，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

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四个文件：（一）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二）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三）鲁迅论创作怎样才会好。（四）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在会上对《宣传指南》一书作了详细的解说，并要求人人加以熟读。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这一著作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2 年 2 月 10 日　军事学院开始党性检查。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基本精神，在全校开始进行普遍而深入的检查。为了使这项检查彻底深入，事先由院校政治部印发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等文件，并印发了《党性锻炼标准》。院校政治部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先从自己学习、生活、工作、言论、行动、思想意识、待人接物、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检查起，要以深刻、切实、客观、具体、认真的精神，大胆揭发本身缺点，然后推及他人、党的组织以及工作各部门。检查的方法采取分组讨论集体总结的方式。检查至 14 日基本结束。

1942 年 2 月 10 日　延安大学改革教学。延安大学贯彻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抽调本校各院系的学生 80 余人参加普查团，深入区乡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学校的教材和实际联系起来，力求实用。在学术研究上，将设各种自由讲座，各派不同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

1942 年 2 月 10 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拟定 1942 年教学方针。方针是：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社会现实沟通，教导一致。并由西北局负责同志担任各课的主任教员。

1942 年 2 月 11 日　中央军委、军委总政要求加强军队干部

教育。在发出的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指出，抗战以来，特别是从中央号召加强干部教育，提倡学习运动以来，部队中已普遍掀起学习热潮。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倾向：（一）忽视甚至否认对于本身业务以内的教育，没有执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二）不重视文化教育。（三）一般的不重视军事教育。（四）在一般干部比较重视的政治教育中，也只抽象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以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阅读马列著作就够了，可以不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当前环境的具体情况、党的政策之具体运用，结果使理论与实际脱节。因此，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必须改造。

1942 年 2 月 11 日　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指示各级宣传部，把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作为自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并在这一思想之下改造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要求各级宣传部务必改变本身工作的作风，要在宣传教育部门工作中造成一种新的作风，这就是活的、生动的、与实际联系的工作作风。

1942 年 2 月 11 日　《解放日报》指出废除党八股必须建立正确的宣传工作作风。在社论《宣布党八股的死刑》中指出，彻底废除党八股残余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正确的宣传工作的作风。正确的宣传必须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决不能无的放矢。为此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社论号召全党动员起来，肃清党八股的残余。

1942 年 2 月 12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目前党内宣传

教育工作给各级宣传部指示。指示指出，贯彻中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一思想，是目前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

1942 年 2 月 12 日　中国医科大学举行第 15 期学生毕业暨白求恩护士学校成立典礼大会。朱德在会上勉励毕业学生及在校护士，要有为社会为革命为共产主义服务的精神，才能把医务工作做好；要不断学习，不断的锻炼，才能把技术提得高。要做到这两点，白求恩是最好的榜样，每个医务工作者都应当学习。

1942 年 2 月 13 日　《解放日报》指出宣传工作要在各方面贯彻党的路线。在社论《展开宣传工作上的新阵容》中指出，宣传工作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思想问题、方向问题、行动问题，必须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宣传工作的中心关键，要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与党的整个工作相配合，在各方面坚持贯彻党的路线。中共中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这一方针，是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根据中央的这一方针改造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1942 年 2 月 17 日　《解放日报》论怎样把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下去。在社论《打破贯彻政策的阻障》中指出，贯彻政策的阻障有三：一是政府人员不能透彻明了政策；二是有个别以私营公的公务人员曲解政策；而最主要的则是关于政策的教育未能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使人民大众自动地监督政府。社论提出了克服办法，一方面加强对公务人员的日常教育，使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正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应把政策法令的教育普及到民间去。告诉人民：什么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什么是他们应享受的权利。义务自己决不推卸，权利决不容人损害，这样使政策的规定同人民的要求，沟通一气，结合为一，政府的法令政策，才

真能够畅通无阻，贯彻到底。

1942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要求在目前条件下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在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决定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并对在职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实施办法都作了明确指示。决定是整风运动必读文件之一。

1942年2月18日　毛泽东提出只有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他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一文中指出，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24周年的任务。

1942年2月20日　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估计、干部教育、财政经济等问题致电刘少奇、彭德怀。毛泽东指出：（一）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二）对政治经济亦有办法，边区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三）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变化。

1942 年 2 月 20 日　《解放日报》论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就是实事求是提高工作效率。在社论《再论精兵简政》中指出，精兵简政在行政工作方面具体是：事权分工一定要明确；现有干部加以合理调整；把必要办、非办不可的事先办，把不必办，不能办的事先放置一边，不办或缓办；这是我们今天办事用人的原则。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就是实事求是，提高工作效率。社论提出“注意效率”、“爱惜时间”、“养成计算习惯”三个口号请同志们注意。

1942 年 2 月 21 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讨论过去中央路线问题致周恩来电。电文说，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2 年 2 月 26 日　《解放日报》论党支部在生产中的作用。在社论《春耕运动中党的支部工作》中指出，党支部应当成为推动这一运动的核心，它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党员和个人的生产热情，而且应把这种热情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与他们日常实际活动联络起来。因此，党支部必须围绕春耕计划加紧进行具体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人民有了办法，政府才有办法，政府有了办法，人民才会更有办法。

1942 年 2 月 28 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第一，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 1942 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第二，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党校；第三，延安各机关学校高级干部参加党校学习共以 300 至 400 人为限度；第四，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

1942 年 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

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高中级干部学习理论的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教材，以党的20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

1942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延安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出，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各单位均须根据中央关于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方针检查工作，写出结论、决议草案，交中央审阅后，由各单位总结会议通过。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具体地分析与研究各个问题，着重检查领导方面的缺点，彻底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并造成新的工作作风。

1942年2月31日　中共中央提出审查机要人员的要求。在关于审查机要人员的指示中指出审查方法根据延安的经验：（一）要从深入整风学习与思想斗争中，提高每个同志责任心，即亲自号召对党诚恳坦白，使每个同志从整风中深刻反省和向党报告自己的来历，同时在整风过程中来考察他们的政治背景。（二）领导上按具体的对象，区别的审查，考察和整理各种材料，求得具体情况，在小组会支部会上先本人报告以后，进行讨论，最后根据每个人在整风时的反省和实际表现，作成具体的决定。（三）人员精干政策。各地主管负责人，对机要人员要经常注意政治上的关心和工作上的检查，尤其要在工作中加强党性锻炼和业务教育，养

成机要人员政治坚定、忠实、积极、精通业务、埋头苦干的品质和作风。

1942 年 2 月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和出版。毛泽东召集会议，针对高级干部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中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提出由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合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至 4 月 22 日列宁诞辰日完成了任务。这本书对整风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2 年 2 月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政权问题的总结报告》。他论述了五个问题：（一）政权的性质；（二）政权的建设；（三）三三制问题；（四）合法斗争；（五）关于基层政权的问题。

1942 年 3 月 3 日　中共中央强调全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在《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的通知》中，列出六大问题，希望各地根据这六大问题加以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1942 年 3 月 3 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检查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关于“五五”学习节给各分局、区党委发出的通知中要求华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有关决定精神，彻底检查和改造自己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使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精神，首先从干部教育中生动的具体的实现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知还规定了具体办法。

1942 年 3 月 4 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给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慰问信中号召指战员克服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自己动手，解决吃穿，达到完全自给。慰问信强调：完成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自信

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2年3月5日　《解放日报》指出全国应确立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在社论《确定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中指出，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的演变，我国战时经济也日益进入更艰苦的阶段。确立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已成为今日大后方解救目前经济困难所必须采取的政策，这是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增进抗战必需的农业工业生产的政策。为此，首先要发展广大的农村经济，增加农业生产。维护国防工业及日用品制造业，使之日趋发展，也是当务之急。要尽量鼓励民营工业之发展。推广合作运动发展手工业。社论强调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坚持抗战，才能打破日本侵略者的诱降阴谋，才能生长起伟大的反攻力量。

1942年3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各县长、议长充实三三制。要求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1/3的，应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县政府委员按同样的原则进行调整。

1942年3月7日　《解放日报》提出要重视培植地方干部。社论《培植地方干部》中指出，要确立对地方干部的正确态度，认识地方干部在工作开展上的作用，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在培植地方干部的方法上，必须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实行“带徒弟”的制度，帮助现有干部整理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其工作能力，并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程度，培养其理论学习的兴趣。此外，还应设立各种各样的

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有计划地训练干部。

1942年3月8日　毛泽东为“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2年3月8日　延安各界纪念“三八”妇女节。朱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号召妇女帮助春耕，参加生产，一切目标为了战争胜利。

1942年3月8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切实执行“三三制”。为此决定1942年度全边区完成村选，各县县选也同时举行。

1942年3月9日　《解放日报》号召下决心反掉教条主义。在社论《教条和裤子》中指出，把科学变成教条的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比方把资本主义前期的真理搬到帝国主义时代来，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真理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而不加以改变。这样的教条主义没有把理论当成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了行动的公式。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口头上拥护科学，实质上是毁灭了它，使科学成了荒谬。社论指出，谁要是诚心诚意的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人，只有局部和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

1942年3月10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拟定干部教育方针。政治部按照干部不同的水平，把干部教育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干部，以学习理论为主，提高文化为辅。第二类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以学文化为主，中国革命基本知识为辅。第三类是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干部，以学习实际经验为主，学习中国革命基本知识为辅。第四类为专业技术干部，以学习本专业技术为主，兼学其它。战士教育仍按

照军事第一，文化第二，政治第三的原则进行。

1942年3月13日　八路军——五师要求加强部队生产。政治部通令各部属帮助群众春耕，并加强部队生产工作。通令要求3人耕1亩地，每人养1只鸡，植3株树，10人养1口猪。该师1个旅1942年开荒2.5万亩，植棉40万斤。

1942年3月14日　《解放日报》号召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反掉宗派主义。在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里跳出来》中，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毛病。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时代，有些共产党员却不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他们和广大的党外友人是隔离的。他们似乎没有去想为什么要有共产党。共产党的责任，是打倒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但能够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其主要力量在于党外人士身上。民众有了共产党，则意志才能集中，力量才能表现。所以共产党一切力量要从民众身上吸取，正像植物的力量需从土中吸取，鱼的力量需从水中去吸取一样。社论强调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只有共产党和全国各阶层党外人士密切携手合作，才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

1942年3月15日　徐特立指出反对教条主义要看行动。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中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必须从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工作中去检查，否则反教条主义的决定，它本身也将变成教条。强调反教条主义主要是行动问题。

1942年3月16日　中央宣传部要求按照整风精神改造党报。在发出的为改造党报通知中指出，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党报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

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

1942 年 3 月 18 日　马文瑞号召在干部中开展学习竞赛。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共陇东特委宣传部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会上，马文瑞作了《提高干部问题》的报告，针对过去干部教育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缺点，提出了改进意见。他号召分区一级的干部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更好一些。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特委在庆阳成立了干部业余补习学校，马文瑞任校长。

1942 年 3 月 19 日　《解放日报》号召纠正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行民主主义。在社论《发扬民主作风》中批评了部分党员自高自大、包办垄断的宗派主义，指出必须善于同非党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和衷共济，倾听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共同磋商问题、共同决定问题。我们愈能发扬民主作风，愈能尊重别人的意见，愈能和非党人士和群众保持联系，那么，我们党的正确主张愈将为他们所欣然接受，而这样也就实现了党的领导作用。社论强调纠正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不健全作风，实行民主主义的作风是我们全党面前的迫切任务！

1942 年 3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考察团。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考察团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部队实际问题，转变部队工作作风，考察团由朱德、王稼祥领导，叶剑英、谭政、傅钟、萧劲光等参加。由萧劲光任团长，负责调查研究的具体指导工作。考察团分五组，考察时间两个月。

1942 年 3 月 20 日　中共中央研究院开始三风检查。为此停课 10 天，并停止一切日常研究工作，专门从事于党风、学风、文

风之大检查。

1942 年 3 月 21 日　《解放日报》号召切实改变党的作风。在社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南》中指出，党正处在一个改造的时期，改造工作正在开始。要深切认识这个改造工作对党对民族都是迫切的需要，没有这个改造，就要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个改造全党作风运动成功的关键，就是全党党员把中央所通过的与此有关的号召和决定都变成自己行动的方针。不要让中央的正确指示停留在纸上，变成了教条，而是要把它们溶化在全党的生活中去，生长在全党的血肉中。社论强调在这个工作中，领导机关必须以身作则，要改造别人，首先要改造自己；改变工作作风，是个长期的、耐心的、细腻的工作，不得急躁，不得强迫；要公开接受党外朋友的批评帮助，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党的作风。

1942 年 3 月 22—23 日　延安召开高级技术干部季度会议。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朱德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七项建议：（一）设立全边区生产建设计划委员会；（二）设立全边区卫生管理委员会；（三）在各生产部门中实行“精兵简政”；（四）组织各种科学研究团体，出版《科学季刊》；（五）筹设工业学校；（六）尽可能改善技术干部与工人生活，制定适用边区之工厂管理法；（七）此类会议每季召开一次。23 日，毛泽东到会指出：对技术建设不重视，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纠正。毛泽东认为专家们所提建议与中共中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精神是一致的。

1942 年 3 月 24 日　陈云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到什么地方学习》中论述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认识必须由实践中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强调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工作经验的同志应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

1942 年 3 月 27 日　《改造我们的学习》公开发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1941 年 5 月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改造我们的学习》。

1942 年 3 月 30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他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

1942 年 3 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中央指出，春耕已到，开展春耕运动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当前最中心最重大最关系全局的任务。1942 年春天应注意的事项是：（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其基本重心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私人生产上面，才能解决政府的巨额预算，保证全体军民的充分食粮及各种生活必需品，才能改善群众生活，以粉碎敌人对我经济上的封锁及破坏，坚持根据地。（二）除麦子外，必须在各地下种以前，就将一切春耕动员的准备工作完全做好。（三）必须尽量减少群众的支差、动员及开会，尽可能发动一切人力、物力、畜力到春耕战线上去。（四）政府 1942 年的经济建设，必须以 70%—80%以上用作生产。（五）各机关各部队，在不妨碍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内，也须积极参加生产，订出自己全年生产计划，尽可能做到生产本单位几个月或全年足够的菜蔬、油、肉及一部分粮食。（六）号召全体党员在春耕运动中起模范作用。（七）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敌情，有计划地准备武装保卫春耕，并克服敌人加于我们的困难。

1942 年 4 月 1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展牧业。为此，专门发布命令：从 1942 年起全边区的羊毛税完全废除。

1942 年 4 月 2 日　八路军总政治部召开各部部长会议，研究

如何布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方针。会议决定：指定专人负责重新传达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并责成各单位慎重进行讨论。会议拟定了检查提纲：（一）行政之间领导方式、态度、工作关系等。（二）工作检查（包括各部门）。（三）关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意见。（四）对支部优缺点的检讨。（五）党性。

（二）发扬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1942年4月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时亦是如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话不许说的态度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在研究及讨论中央文件时，应有准备有计划地来领导这一研究和讨论过程。在检查工作时，不要泛泛的检查，而要切实的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与各个侧面的。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并要估计到哪一方面是主要的，

哪一方面是次要的。如此，方能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与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一切与此目的相违反的言论及行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应记住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警语，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进步，即使是在进步中尚不免有错误，也应鼓励他，帮助他。要欢迎每一同志的微小进步，以此去争取他的完全进步。要使同志们懂得，我们是为此目的而去使用批评武器的。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决定发布以后，各单位根据决定的精神，对整风运动作了检查，促进了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整风运动进入整顿学风阶段。

1942 年 4 月 3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检查直属单位的工作。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检查直属单位的工作，检查大纲为：（一）政策方针。（二）组织机构。（三）干部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各方面的表现。（四）工作方式方法。（五）学习情况。检查的方法，以坦白、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入检查。

1942 年 4 月 3 日　周扬向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员工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他指出，有部分同志想在 3 年内成为一个作家或诗人，天下不会有那样容易的事。目前鲁艺同志和各根据

地的军队、民众有脱节现象，好像坐在碉堡里空想培养，尽是陷于空虚。知识分子应是生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不要轻视工农分子，要向他们虚心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

1942年4月4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问题作出决定。组织部要求：（一）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在职老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二）文化水平虽高，但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必须首先参加工作或学习一个很短时间后，即去工作，以便获得工作经验；（三）党龄虽长，但很少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必须参加工作，尤其下层工作，以补工作经验之不足；（四）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的，应调一部分参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代替之；（五）有专门技能的干部不应调动，使他们长期安心工作；（六）必须纠正以为党务工作才是党的工作或轻视党务以外其他工作的错误观点。

1942年4月5日　《解放日报》号召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整风学习。在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中指出，进行整顿三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确的方法；一种是不正确的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方法。用正确的方法来整顿三风，不仅不能整顿三风，相反地会做三股阴风的俘虏。社论提出两种方法的四个区别，指出整顿三风是我们党在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致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的。

1942年4月6日　《解放日报》论认真的自我批评需要科学的方法和郑重的准备。在社论《自我批评从何着手》中指出，党中央1941年8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为了在事实上、行动上克服这些文件中所指出的缺点，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

员中间根据这些文件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社论还指出，过去经验证明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就是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整风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准备。

1942 年 4 月 6 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强调整顿政风的问题。各委员一致认为：在过去的行政作风上表现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相当严重，在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宗派主义现象并未克服，所以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来整顿政风，也是简政的工作之一。整顿政风，首先从边区政府一级开始。检查的方法，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造成热烈的自动的民主讨论。这种检查要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并把握住中心，点滴深入，避免大而无谓的现象。在进行检查时，应防止各种可能发生的倾向，对人对事意气之争，不提出具体工作办法，形成极端的指责，使干部发生恐慌或麻痹的现象。会议决定 22 日开始边区一级的总检查。对各专署各县的检查，由边区政府组织检查团，分赴各地，按照所定办法进行检查。在检查专署时，除按照机关检查大纲执行外，更要注意专署如何领导县，并应把检查工作同帮助工作取得密切的联系。关于检查县的办法，由检查团到专署以后具体规定。到群众中去检查时，主要检查政府法令的实施，以土地法和负担为中心。

1942 年 4 月 9 日　《解放日报》号召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应普遍实施认真贯彻精兵简政。在社论《贯彻精兵简政》中指出，自党中央 1941 年 12 日初发出精兵简政指示以来，华北各根据地虽已开始执行，但还没普遍实施和认真贯彻。因此，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兵力，已是目前迫不容缓的重要任务。社论提出党、政、军、兵各级机关精兵简政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强调

我们的力量源泉是人民，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是人民，要开导这个源泉，要巩固这个基础，其关键就在于精兵简政。

1942 年 4 月 10 日　《解放日报》发表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一）。内容有毛泽东著《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斯大林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特辑》共出版 6 期，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这些文件后编入《整风文献》一书。

1942 年 4 月 10 日　新华社电称，中共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整顿三风。北方局各部门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和整顿三风的决定，总结检查 1941 年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并按新精神订出了 1942 年计划。北方局党校根据党性决定，检查全体学员的党性，认清什么是党性，什么是违反党性的行为。北方局组织部、宣传部、青委、妇委又先后组织了巡视团、调查团、工作团深入下层，了解具体情况。

1942 年 4 月 11 日　《解放日报》号召加强党内民主活泼党内生活。在社论《党内民主问题》中指出，整顿三风，是一个长时期的自我批评自我改造的过程。必须全党，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党员都表现最大的积极性与自动性。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发扬党内的民主，同时，又要把民主与集中适当地加以溶化和配合。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使党内有活泼的生活，使党员有蓬勃的朝气。社论指出整风过程中存在民主精神不够和曲解民主的两种偏向。纠正这些偏向，主要责任在领导同志。加强党员的民主教育，是党的组织的重要责任。社论强调当此党的工作改造，党的生活大活跃之时，必须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武器，达到发扬党内民主的目的，是加强党的战斗能力，巩固党的团结。

1942 年 4 月 12 日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风运动周

的指示。指示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整顿三风，这是我党思想上的一种改造运动，全军应下大力量进行，以彻底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恶劣倾向的残余。野政决定“五一”至“五七”为全军整顿三风运动周。要求进行五项工作：（一）召开干部大会，由高级负责同志作专门报告，传达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号召和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并组织全体干部进行深入讨论。（二）根据毛泽东和康生的报告及《解放日报》社论中的精神，各部门分别进行工作检查。（三）支部应扩大民主生活，发动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进行自我检讨和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以及对于组织领导上有何意见，均应尽量提供。（四）召开非党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的意见。（五）在干部中进行整顿三风的测验。

1942 年 4 月 14 日　《解放日报》号召在整风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社论《把“矢”拿稳把“的”认清》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有的放矢”的号召，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工作中要以理论之“矢”射中实际之“的”，然后工作才能做好。在整顿三风的检查中，尤其要把“矢”拿稳，把“的”认清。只有正确地认清“矢”与“的”，才能在整风中走上正路。

1942 年 4 月 14 日　八路军总政治部检查直属队的政治工作。检查连续进行三次。直属队政治部经过这项检查后，订出下列工作方针：（一）今后在领导上以整风为中心。（二）由政治部开始自上而下地开展自我批评。（三）在工作制度上实行三三制，即 3 小时处理日常事务，3 小时作调查研究，3 小时学习。（四）政治部在领导上更加专门化，具体化。（五）深入研究工作制度、工作条例。（六）正确发扬民主。（七）部、科经常对工作进行深刻讨论。直属队政治部拟在 5 月出版《政工通讯》月刊，以沟通上

下意见，交流经验。

1942年4月16日　延长县坚持三三制。《解放日报》报道：延长县20名共产党员参议员退出县参议会，该县参议会做到“三三制”。

1942年4月18日　《解放日报》号召把整风文件作为端正自己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武器。在社论《讨论整顿三风的具体化》中指出，真正了解整顿三风的文件，使我们能够运用这些文件作为我们改正思想方法和转变工作的武器，是目前的任务。要真正领会中央所指定的文件本身，同时把这些文件和各部门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以中央文件为“矢”，以我们的实际工作为“的”，来研究哪一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哪一种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样，才能使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亲切地感觉到这些文件确是对症下药，才能使整风运动在各方面充实和具体化。

1942年4月18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在八路军大礼堂联合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到会各机关干部2000余人。王稼祥等出席了会议。王稼祥对时局作了分析，指出我们正处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大家应好好研究中央文件，改造工作作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

1942年4月18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信。西北局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问题。党内三风（学风、党风、文风）不正，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现在仍有残余存在，所以还要整顿，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上的教育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是很重大的事情和很精细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

急性病一下子可以解决得了的。延安在整顿三风开始时，有个别同志走了弯路，他们不从整个历史上、思想上、领导上去看问题，只是从今天技术问题和事务总理上（如待遇问题、婚姻问题、娱乐问题等）去找“不正确”的三风，而又以绝对平均主义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的方式来进行揭发和反对，因此，曾发生过某些有害于整顿三风和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不正确的倾向，并因此而掩盖了真正整顿三风的正确目标。这一倾向在延安已在纠正，现在如果已影响到了各地，也需要加以切实的纠正。

1942 年 4 月 20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处工作人员大会，动员整风学习。学委会负责人王首道提出对每个同志的要求：（一）要下最大的决心，专心学习，坚持到底。（二）在思想上下苦功夫，要多用脑子，精研细读，深思熟虑。（三）要虚心学习，要勇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四）要自觉地遵守学习纪律和学习制度。对于阅读和研究文件的方法，要“眼到、心到、手到、口到”。学习计划规定：编组方法按个人斗争经验和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学习委员会分工指导和帮助各小组学习，在整风学习期间，采取学习小组和党小组合一制，每组设正组长，负责领导和督促检查研究中央文件，党的小组长为副组长，管理党的组织生活、课程分配和进度。把 3 个月整风学习时间，大体上分为总——分——合三个学期。第一学期为总的粗读阶段，时间是 2 周；第二学期为分析精读阶段，时间为 8 周；第三学期为综合的研究阶段，时间是 3 周。

1942 年 4 月 20 日　《解放日报》号召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上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在社论《迎接困难加强团结》中指出，现在是我党 20 年来历史上最团结的时期，但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的现状，还要加强团结。我们的党，是一个 80 万党员的大

党。我们有不少久经锻炼的老干部。这是撑持党的骨干。同样我们也有许多带着新鲜血液的新干部，这是党的宝贵资本。这两种干部的配合，才使党有力量，有生动活泼的气象。但在新老干部之间，无论思想方法、工作习惯，都是有差异的。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团结，就是要在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统一上去取得。这是使我们的干部相互学习，密切溶合的基础。最近中央以很大的注意来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这一方面是加强党内的教育，同时，也就是加强全党的团结。我们将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历史意义的工作。我们的队伍将团结得更紧。任何困难，都吓不了我们。黎明的曙光，不久就要到来了。

1942 年 4 月 20 日　朱德赞南泥湾为“陕北的江南”。朱德到南泥湾视察返延对记者说：“南泥湾为陕北的江南。”

1942 年 4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彭德怀、罗瑞卿到会。本期学员都是华北团级以上的军队干部和县委以上的地方干部。学习时间一年。学校对过去的学风作了深刻的检查。对本学期的教学作了改革，力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及敌后斗争的问题切实联系起来，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空谈主义。培养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了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了解党的基本政策和具体的斗争策略，确实能够独立地去组织工作，领导工作，能在各个不同的具体斗争环境中，去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彭德怀勉励党校的教员、学员，遵照中央指示，改正学风，把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联系华北党的斗争生活。并号召学员学习毛泽东“钻”的精神，像打仗一样用攻坚的精神。

1942 年 4 月 21 日　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以整顿三风为中心。他在致周恩来电中指出，在日苏战争爆发前，我们的工作是

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对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1942 年 4 月 21 日　中共中央要求在职工运动中深入开展整顿三风。在发出的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中指出，应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改造各根据地工会工作，深入肃清职工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残余。在职工运动中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于，硬将产业城市职工运动的一套办法搬到根据地来；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于某些工会党员包办工会；党八股表现于工作计划宣传教育的不切实际，不问对象，夸夸其谈。指示强调整顿三风是改变思想作风的长期斗争。要求各级职委和工会党团必须根据中宣部决定与实际情况规定自己学习检查工作的计划。

1942 年 4 月 21 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边区干部到会 2000 余人。任弼时讲了话，反复指示在 3 个月内，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整风 22 个文件学好。谢觉哉指出在学习中，一定要有决心，有领导，有民主，并特别指出欢迎非党同志参加研究。

1942 年 4 月 21 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爱护民力培养民力》。社论指出，自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 200 万人民不但尽了支持前方的抗战的光荣任务，而且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我们应当用等同的力量来培养民力，来补偿人民对抗战的贡献。社论要求各级的组织机构需要加以研究，是否有重叠可以裁并的机关，是否有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将现有的机构调整得更精干，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节省一部分民力。再检讨一下施政的情形，看看是否有政令繁多而又不能互相

配合的毛病，有没有不切合实际情形发生朝令夕改的现象，假如“简政”得使人民称便，那又是爱惜民力的一种办法。还要看看干部中有没有扰民的情形，是不是真正执行了政府法令。社论强调度过难关，争取胜利，我们依靠的是广大的群众。我们应该比任何人更懂得发扬与爱惜民力，也让我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

1942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使军事行动灵活便利。

1942年4月22日　抗大总校发动全校进行整顿三风的检查。政治部提出“四要”号召，要认识其重要性；要专心一意；要正确的进行；要勇敢放“矢”。

1942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王稼祥、陈云负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军委直属部门内按军事、政治、后勤3个系统分别成立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和检查。

1942年4月23日　《解放日报》号召切实掌握22个文件的精神实质。在社论《造成学习热潮》中指出，中宣部规定的22个文件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经验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研究这些文件的目的，就是要领会它们的实质，从其中学习正确的革命立场与思想方法，并学习其中许多具体而切乎实用的规定，来解决我们的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来处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要改造作风，巩固全党，提高我们的战斗能力，必须使用这些文件中所包含的法宝。我们要真正了解文件的实质，必须和此次整顿三风革命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只有通过整顿学风

党风文风的实践，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我们要真正了解文件，必须以文件的精神去检查每个同志自己过去的实践，纠正自己过去在学风党风文风的实践中的缺点与错误，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得到新的改进。

1942 年 4 月 24 日　《解放日报》提倡发扬爱护革命财产的精神和习惯。在社论《省吃节用，渡过难关》中指出，克服困难的主要的、积极的方向应该是更加团结、多打胜仗，应该是发展生产、增加力量，但是处在物资来源日益困难、人民负担已感沉重的今天，省吃节用，厉行节约，是渡过难关的一个重要步骤。民间有这样的格言“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要穷”，在大打算的同时，这中间的确包含部分真理。今天，我们吃饭穿衣，柴米油盐、纸张灯油、使用家具，所有这些事情上的小算也确有打的必要。要提倡“爱护革命财产”的精神和习惯。

1942 年 4 月 25 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召开会议，讨论全师整风大检查问题。会议指出，整风检查工作是改造我党我师的思想和工作的重要关键，是使我师走向正规化，模范党军的必要步骤。全师同志应以坚定的决心、战斗的精神来胜利完成党所号召的三风大检查工作。会议决定：师成立大检查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李达、蔡树藩、黄镇、朱光、张南生等 9 人组成，邓小平为主任，朱光为副主任。各旅各军分区分别组织检查委员会。以 7 至 9 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推动、领导、检查工作。

1942 年 4 月 25 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直属队召开全师直属党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今后党的工作：（一）健全党的工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以党的团结为核心，团结整个部队，成为坚强党军。（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迎接抗战胜利。（三）加强民运工作，帮助群众春耕。（四）整顿三风，加强学习，

根据中央指示和野政宣教会议决定，全师进行整顿三风大检查，改造学习，开展部队中教育的新方向。

1942 年 4 月 27 日　《整顿党的作风》公开发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2 月 1 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1942 年 4 月 29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决定嘉奖延安县柳林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他每年的收获量超过其他农民 1/6，全家两个劳动力，种地 40 余垧，1942 年开荒 35 亩。

1942 年 4 月 30 日　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任弼时出席指导。会议决定：（一）正式规定阅读整风文件为业务学习的课程，各级干部必须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学习。（二）高级干部都参加中级干部的讨论会，以起指导帮助的作用。另外，高级干部组可以在全部学习时间内单独开会四五次。（三）边区师范等学校的学生和民众剧团等的一般演员，应以学习文件为补助课程，不必以全部时间学习文件。（四）低级组上课不必讲授全部文件，可选择若干问题讲授。

1942 年 4 月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分校配合整风运动，积极改造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连队的学员分派到邢台、和顺帮助地方工作，至 9 月返校。回校后除了整理调查材料外，还进行了政策法令的学习，使获得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加以认识。经过这一次实际的调查和学习以后，他们的思想方法已有初步的提高。以往不愿接触实际、轻视地方工作等思想已大部分纠正，对于深入农村，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已很感兴趣。

1942 年 5 月 1 日　中共中央党校对于研究整风文件的计划作出补充决定。第一步（1 周）精读和研究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第二步（2 周）正科和预科甲乙各班，把整风学习文件全部浏

览一遍，以概括了解文件的大意（预科丙班先读5个文件）。第三步（8周），把所有的文件分类逐件精读，逐件作笔记，深入地研究讨论，并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和工作。在研究文件结束以后，进行总的自我检讨和检查工作时，有丰富的内容，并且容易做到彻底些。第四步（2周）进行检查工作和自我检讨，并作出本期的学习总结。计划还规定，在研究文件过程中，一切能记笔记的同志必须写笔记，各小组开会时，必须做详细记录，并且随时做总结。

1942年5月1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讨论整风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一）4月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风报告的决定，一般也适用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各级党的宣传部门，按照各地具体情形，规定具体阅读和讨论的计划。（二）华北敌后是处在战争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阅读和讨论的时间，应比延安长一些，华北各级党委，讨论整风文件的时间为5个月，从5月1日起至9月底止。平原地区还可延长一个月到两个月。（三）各级党委宣传部，应按照文件目录，汇集印发各级党的组织以供阅读。（四）注意四点：第一，不要妨碍工作。不应脱离实际工作去清谈这些文件；第二，必须转变以往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阅读文件的态度，必须反对空喊整风而不去研究问题的现象；第三，要有定期的检查和测验制度；第四，各级宣传部门应随时收集学习和讨论中的问题，以及整风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每月向北方局宣传部汇报一次。

1942年5月1日　朱德论节衣缩食，勤苦劳作是一切经济事业创造的必由之路。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纪念“五一”文章《克服困难向前迈进》中指出，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开办了一些工厂，在重重封锁包围中间，在边区非常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强壮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力量。想着冻死，饿死，困死我们的

阴谋是失败了。今天为了迎接更加艰难的局面，我们工厂的各种工作，还须大大向前迈进一步。第一，我们必须要教育工人们认清自己的事业和责任，用新的态度来参加劳动。我们边区工厂的工人须要懂得，他们不是简单的因为生活驱迫做工谋生的普通工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先锋队，应当最积极地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第二，我们今天是在艰苦的抗战时代，边区整个经济都困难，假如我们的工人和工作人员没有省吃省穿的自我牺牲精神，工厂便无法维持和发展下去。一切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工资的要求，我以为一定要首先不妨碍工厂的维持和发展为前提，工资的标准，一般以能维持生活、保证温饱为限度。节衣缩食，勤苦劳作，这是一切经济事业创造的必由之路。处在贫困的边区，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创造我们事业的基础，我们应当特别提倡“节衣缩食，勤苦劳作”的口号。第三，我们必须发挥工人的生产热忱，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质量。第四，为了减低生产成本，改善工厂的管理与领导，须要大家来爱惜工具，节省资材，严厉反对浪费现象。朱德指出，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倒我们的！克服困难！向前迈进！让我们大家一致努力啊！

1942 年 5 月 1 日　抗大总校第八期暨附设太行山区陆军中学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会议宣读了彭德怀等书面指示：希望以八期为分水岭，将过去教育工作与学习生活彻底清算，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学校在端正三风中，培养出大批优秀干部。刘伯承师长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

1942 年 5 月 2 日　由毛泽东主持召集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开幕。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

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会议至23日结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争论问题，扫除了关于文艺问题上许多错误混乱，开辟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讲话根据当时党的文艺工作状况指出：为了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必须在文艺界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通过学习和整风，“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和美学观，指出了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在革命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而且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首先向群众学习，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要到群众中去，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1942年5月3日　军委直属政治部作出军委直属队在整风期间党的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推动和保证研究整风文件当作中心的任务，并作出四项具体指示：（一）集中力量完成研究文件的任务，但也要照顾到日常工作。（二）研究文件，便是党的工作，防止把研究文件和党的工作对立起来。（三）党的组织和学习的组织取得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防止不过问研究文件的倾向，另一方面防止包办代替学习组织的现象。（四）考核各级党的工作成绩时，主要以在保证研究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为断。

1942 年 5 月 4 日　《解放日报》指出整顿三风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在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摧毁了旧的教条，提出了新的立场：科学与民主。但五四以后却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新的教条主义：割断了中国历史和脱离了中国现状，专门搬弄外国的学术词句，这一偏向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使许多党员只能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不能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不能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特点，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党员在工作中发生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不正确的作风。党中央今天号召“整顿三风”的运动，是为着打破新的教条的束缚，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精神和实质。这也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个运动中，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以五四时代对旧教条彻底摧毁的态度来摧毁教条主义。自然，今天反对新的教条主义，需要我们能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不是运用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而是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社论号召要克服极大的困难，以备迎接将来的光明。

1942 年 5 月 4 日　第四届五四中国青年节纪念大会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大会由冯文彬主持，一二 0 师师长贺龙报告晋西北敌后青年运动，并对延安青年提出五大希望：（一）欢迎延安青年上前方，多多接触实际斗争环境，这样可能使理论与实践贯彻一致；（二）欢迎青年作家、艺术家、歌咏家等上前方，可搜集活生生的材料；（三）希望延安青年爱护身体，提倡体育运动，锻炼坚强体魄，使每个人都充满活泼朝气；（四）加强军事技术教育，以便应付可能到来的困难局面；（五）整顿三风研究文件，必须使理论与实践联系，以精神与物质上的准备，加强保卫边区的

力量。

1942年5月5日　《解放日报》号召为彻底整顿三风扫清道路。社论《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中批评了对于整风工作和学习文件的各种错误态度，指出三风一定要整，二十二个文件一定要精读，否则党的思想行动不可能统一，革命事业不会胜利。全党应该齐一步调，精细地研究整风文件。一切与此相反的精神与企图，必须加以揭发与纠正，为彻底整顿三风肃清道路。

1942年5月6至9日　陕甘宁边区工业局召开各工厂联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后各工厂应集中力量放在研究技术改进上；团结工人巩固工厂应以提高工资与加强教育双管齐下；各厂组织机构应予紧缩，在经济上应厉行节约；各厂提高成品质量，应注意协助私人工厂之发展等。

1942年5月6日　《解放日报》号召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要培养千万个劳动英雄模范公民。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中指出，吴满有知道自己的命运和边区和革命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开的。他不仅努力耕作勤于家务，而且热心公务服务社会。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学习吴满有，我们希望有千个万个劳动英雄模范公民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942年5月7日　八路军总卫生部提出开展学习白求恩运动。在进行整风检查中提出“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口号。指出发起学习白求恩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学习他的革命工作精神，过去医务工作干部不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必须彻底纠正。这一运动不仅限于医务工作者，而是要在卫生部门的全部工作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942年5月9日　《解放日报》号召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中指出，共产党是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和错误的偏向作斗争，正确的路线就不能执行，党也就不能发展。要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就要反对“左”和右两方面的偏向。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个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要斗争。在两条战线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

1942年5月9日　三五九旅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以下各团及独立营各成立一学习分会，负计划推动与检查学习之责。自5月10日至8月13日3个月为讨论文件时间，在此期间，战士政治课、干部文化课一律暂停。

1942年5月11日　《解放日报》号召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在社论《反对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中指出，领导群众的艺术，是要善于去倾听群众呼声，了解他们的迫切要求，善于先向群众学习，懂得了群众的一切（就是先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才能产生正确的政策，去领导群众行动，同时也才能使党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为群众所拥护。但是必须指出，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余毒在不少地区还未完全扫除，曾经严重地妨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抗战动员工作计划的不切实际，只知向群众要东西，不问群众负担能力如何，有些什么困难，为了完成任务，只强制执行。在改善群众生活工作中，或者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是不研究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研究群众今天所需要与今天可能实现的东西；对群众团体

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上，常表现“老一套”与“一般化”的作风。社论指出，我们要坚持敌后更加艰苦的抗战，便必须彻底肃清现时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的这些主观主义残余。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2 年 5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王家坪召开各单位负责干部会。会议讨论如何克服目前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困难，更好地推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精读、讨论文件的办法。会议决定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和教育干部加深对整风运动的认识，对各种不同的干部要有不同的要求。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学习时间不够可适当延长。对于学习文件的办法和今后考察团的工作，会议也作了具体规定。

1942 年 5 月 12 日　西北党校学习委员会规定整风学习纪律。（一）学习和工作时间内，不得外出、睡眠、会客；（二）按期完成学习文件计划，不得随意拖延；（三）在学习时间内，不得随意阅读同整风文件无关的书籍；（四）能做笔记的，都必须详细做笔记，不得敷衍了事；（五）必须有充分准备地参加讨论会，不得无故缺席；（六）休息时间必须休息；（七）在研究讨论期间，任何意见在校内都可以自由发表；（八）因事请假，必须经组长（班上经管班教员或支干会）许可。

1942 年 5 月 13 日　凯丰指出整风是一次思想改造、思想革命。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中指出，整顿三风是一次思想改造，思想的革命，不经过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变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方法、思想、面貌来建设党，这就是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1942 年 5 月 13 日　《解放日报》报道朱德领导军委秘书厅高级学习小组进行整风学习。他们先学习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 12 条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他们在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事实或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时，朱德就以他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的精神，作了一番详尽的解释。

1942 年 5 月 14 日　彭真论领会整风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中指出，中央决定必须学习的 22 个文件，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真正领会贯彻它们的精神与实质。我们所以要领会它，就是为了要实际应用它，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武器，自己的箭，来改正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工作。总之，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究竟怎样才算领会贯通了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呢？有什么标准？显然的，标准是实践。如果我们能用这些文件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并且改正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又能依据它来检查自己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的工作而改造之，揭发并且纠正了其中的歪风，那我们就是真正地领会贯通了。反之，纵然能把他的学习句背得烂熟，仍然是一窍不通，——因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社论对文件中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了透彻的说明。

1942 年 5 月 20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会议提出要求，在一、二周内对边区政府各厅、院、处的行政机构重新调整，以简单、灵活而有系统为原则，将 50%的人数分配至县、区级及其他机关工作，以克服“头重脚轻”之现象，加强下级行政工作效率。

1942 年 5 月 23 日　《解放日报》号召整风中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在社论《一定要反省自己》中指出，反省自己，

比只就文件学习文件要困难一些。这是向自己的已经根深蒂固了的旧思想、旧习惯挑战，这是向“旧我”作严格的审查和顽强的斗争。反省自己，就是把文件与自己联系起来。社论指出，党是党员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党员，才能有健全的党。改造全党的思想和作风，3 个月学习文件之后，接着就是检查工作。检查工作做的好坏，要看大家掌握正确思想方法以及个人思想和工作初步改造的程度。个人的思想和工作的改造，主要是依靠自己。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党中央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帮助，只能给自己指出一个方向，一条道路。而道路要自己来走，别人是不能代替的。只要我们能够有决心来革除不好的思想和习惯，同时又有耐心一点一滴来建设新的思想和习惯，加上长时期不停地努力，则脱胎换骨，除旧布新，每个人都是可能的。

1942 年 5 月 25 日　《解放日报》号召切实发挥三三制的精神。在社论《三三制的运用》中指出，边区各县议会、县政府经过最近调整、充实之后，在成份上已经实现了三三制，今后应进一步做到真正发挥三三制的精神，运用它以达到更好地团结各阶级，合力抗日，合力建国。

1942 年 5 月 25 日　陕甘宁边区各厅级干部下基层。他们下乡深入群众，大多数到区乡任助理员或乡政府文书。

1942 年 5 月 25 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总委员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总结第一个月的学习。康生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指出，这次学习在延安已掀起空前的热潮，为延安历来所未有，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伟大的学习运动。现在高级干部既忙于自己学习，又要领导学习；中级干部在散步时，闲谈时，都在谈论学习问题；初级干部也不甘落后，积极性很高。党外同志也自动

积极参加。在一个月的学习中，已创造了许多新的学习方法，获得了初步效果；所有干部对中央文件重视了，研究文件的兴趣提高了，看问题的方法有了某些改进，干部间的团结日益增强，各同志已普遍开始了反省自己。教育的方向，老干部应着重在思想方法，新干部应着重党的建设。报告指出了存在着的某些缺点，提出了改进学习的12项办法。李富春作了补充发言，他强调了加强领导的问题。

1942年5月27日　中共西北局、中央军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关于公营商店的决定。规定公营商店必须照章纳税，应加入所在地的商会。公营商店的主要任务是在贸易局领导下，组织土产品输出，输入必需品，发展边区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并负责平抑物价，巩固边币。

1942年5月30日　《解放日报》号召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到自给自足。在社论《击破敌人的经济掠夺与封锁》中指出，日本侵略者在长期侵略战争中，不仅为兵源枯竭的难题所困扰，而且痛感战时物资的缺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对敌后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日益加紧，对根据地的封锁破坏也变本加厉，实行了更毒辣的办法。社论分析了日本侵略者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的破坏的特点，提出了击破敌人经济掠夺与经济封锁最有力的办法，就是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使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执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一方面要爱护民力，保护民财；另一方面，还要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发展私人经济。公营企业仅能作为发展生产的倡导，主要在奖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奖励人民开发企业。不管是资本家、地主、富农，他们参加生产，我们要一视同仁，切实保护他们的人权财权；不管是几千元或几万元的投资，作坊或小工厂的建立，我们都要予以欢迎，积极协助；这样

聚沙成山，才能使根据地的工商业 发达，生产力得以蓬勃发展。在敌后坚持抗战中，我们更应奖励和推广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只有用各种分散的独立的生产单位，才能减轻日军扫荡破坏的严重性，而且，只有把我们的经济堡垒分散建立在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上，才能发挥伟大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1942 年 5 月 30 日　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检查整风学习。当时，学院的同志正在热烈辩论学校过去的方针，检查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毛泽东在给大家的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两个根本问题，并且联系到学院同志讨论中的一些争执，作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解答。特别是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同志中间有许多糊涂观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因而也就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毛泽东在讲话中把鲁迅艺术学院叫做“小鲁艺”，而把充满群众斗争生活的广大社会叫做“大鲁艺”。毛泽东鼓励大家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942 年 5 月 30 日　晋西北行政公署通过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私下盗卖公粮侵占或虚报者，皆以贪污论罪。贪污公粮在小米一石（260 斤计）以上者，即处死刑。

1942 年 6 月 2 日　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并通知时事政治及工作等问题。中央直属机关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各机关成立学习分会。军委直属系统成立分

区学习委员会，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下成立几个中心学习组，如参谋部中心学习组、政治部中心学习组、后勤部中心学习组、专家中心学习组等，各机关部队成立学习分会。陕甘宁边区系统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均成立中心学习组（甲组），自己把文件学好来领导其他干部学习。此外有中级学习组（乙组）与普通学习组（丙组）。甲组人数较少，但是领导的中心。乙组人数最多，都是中级干部，是学习运动中最应注意的部分，甲组同志应分别参加。丙组人数不很多，是文化较低，又应该学习文件的若干干部，采取上课的办法为主。延安共有 10098 人参加这次整风学习。

1942 年 6 月 2 日　《解放日报》论述只有以身作则的领导才能使领导获得应有的效果。在社论《加强对于学习的领导》中指出，领导学习就是领导党内的思想斗争，整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过程。笔记、讨论会、漫谈、谈话、墙报等等，都是斗争所采取的方式。学习的每个步骤都应充满思想斗争的内容。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掌握这一切方式，帮助学习的同志们，运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向自己身上及别人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实行顽强的进攻。这种坚定的思想斗争，应当贯串着整个的学习过程。领导者的主要责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扩大并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缩小并消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这就要求领导者自己先要掌握住思想的武器，然后才能有效地帮助别人。因此，领导的同志必须成为学习的模范，反省的模范，实行的模范，改造思想改造作风的模范。只有作大家的模范，才能领导大家，只有以身作则的领导，才能使领导获得应有的效果。

1942 年 6 月 4 日　谢觉哉指出青年干部要正确认识自己和

群众打成一片。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赠言》，欢送陕甘宁边区政府100多名有知识的青年干部到县区政府工作。代论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每个同志要正确认识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帮助当地干部，改造自己，改进边区。

1942年6月5日　《解放日报》总结延安一个月的整风学习。在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中指出，全延安在4月20日开始学习22个文件的运动以来，已经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总结分为两部分，一是运动的情况；二是今后的办法。社论指出今后的方法，是要把已发动的热潮巩固起来，并注意运动的深入。

1942年6月7日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第三号通知。（一）为了各机关领导同志能深入地领导研究整风文件起见，中央总学委决定凡参加杨家岭中央学习组会议的同志，须在10天内（6月10日至20日）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论布尔什维克化12条》两个文件加以精细阅读，深刻研究，并准备在最近期间内举行一次测验，测验办法和日期，另行通知，并须调阅笔记。（二）各机关学校学习文件的计划，不要因此变更，仍按原定次序进行。6月23日，中央总学委秘书处通知中央学习组各组员，中央学习组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论布尔什维克化12条》两个文件之调阅笔记及举行测验二事，中央总学委决定推迟到7月7日以后举行。

1942年6月7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论布尔什维克化12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和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小组。（二）总

学习委员会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三）在整风学习期中，各系统所属之重要机关学校，应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作结论。达到真能“治病”和“救人”，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各学委会各同志和系统学委会商量之。（四）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委，按照延安精神，暂行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和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整风文件和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整风文件。（五）中央总学委建立秘书组，处理日常工作，由康生负责领导。（六）决定杨尚昆、柯庆施参加中央直属系统学委常委工作。还具体规定了中央学习组的学习内容、方法、编组等事项。

1942 年 6 月 7 日　《解放日报》论加强党的团结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中指出，日寇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扫荡”，推行“三光”政策，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百倍加强内部团结，包括党内的团结，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这是克服一切困难，能够坚持的中心关键。党内的团结，要从这次整顿三风中，使全党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造成一致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切实了解情况，正确掌握政策，坚固团结在党中央正确路线周围，便能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有办法克服，不发生脱离群众现象。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及其困难与要求。党政军各部分只有认真关心群众利益，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

1942 年 6 月 8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顿三风学习运动，从 4 月 20

日在延安进行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成绩，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意义的。因此决定全党均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学习运动。关于整风学习运动的进行和计划，除参考4月3日中宣部的决定外，根据延安的经验，应采取下列的办法：（一）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二）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三）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暂行停止一切其他课日（军事学校则暂行减少军事课目），专门学习22个文件。（四）机关部队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应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延安规定每日上午为学习时间，各地应依具体情况而定。但必须注意，不要忘记战争环境，不要忘记敌人的可能袭击。（五）依情况之可能，出版学习报刊讨论问题解答问题。并依情况之可能，各机关学校出版墙报。（六）在学习22个文件时期中，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七）学习时期规定为4个月到5个月，从何时起由各地自定，各地因情况不同，学习时期可以依具体情况伸缩之。（八）有些已经开始学习22个文件的地方，其领导办法如果是于本指示及“四三”决定相符合的则照原计划进行，如果是不符合的则须加以改变。（九）附件一，中央直属系统学习计划；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作为各地领导学习的参考。

1942年6月10日　《解放日报》指出整顿三风的全部精神实质就是宣传唯物论。在社论《宣传唯物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它的全部精神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

样有重大的意义。创钜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的第一等任务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社论指出近代的中国历史，证明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中华民族与唯物论的伟大结合将愈加坚固。社论要求大家说实话，大喊大叫地去宣传实话，在那里面才存在着和生长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

1942 年 6 月 10 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学委会召开各单位小组长联席会。到会 **300** 余人。方强副政委在报告中指出，一个月来虽然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可是还不够普遍，对文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其原因：第一，对于整顿三风的认识不够。没有普遍地深入了解这是全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活动。甚至有的人以为主要是“整”领导者，与自己无关；第二，学习的领导不深入，抓的不紧，没有保障每天 **4** 小时的学习时间；领导者没有以身作则地起模范作用；第三，学习方法不得当；最后，没有严格的学习纪律。方强提出三个具体要求：第一，把学习运动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开展起来，使运动更加全面化、组织化。第二，在 **20** 天的复习期间，要把握住反主观主义的中心思想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第三，开始转变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每个干部要根据文件来正确地无情地进行自我批评。

1942 年 6 月 11 日　延安中央研究院经半个多月对王实味的错误思想进行座谈、讨论、清算，今日结束。范文澜在总结中言明党委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党委为挽救他，谈话八次，但无效，其他同志也在口头上在文字上批评帮助他，可是他始终不肯反省。范文澜要求大家吸取经验教训，下决心反对自由主义，严守纪律，严禁小广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

好地学习文件，更切实地反省自己。

1942 年 6 月 12 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直属系统党代表大会召开。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认真检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部队中的表现，并进行长时期的思想上的改造斗争。

1942 年 6 月 13 日　毛泽东关于联防司令部成立及整风学习等问题致周恩来电。电文说，22 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

1942 年 6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一）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中互相参观时，主要的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以改进学习的实效。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之。（二）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争论，对于投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三）为着统一学习的巡视工作和收集材料工作，决定：（甲）中央各部委到各系统的巡视人员概交各系统学习委员会统一分配，但中央部委仍可单独召集各部委人员汇报，并可要求各系统学习委员会对各部委派出人员轮流到各单位去，以便普遍巡视。（乙）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除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外，不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各部委要现成的书面材料时，向各系统学习委员会索取，各系统学习委员会秘书处有立即供给所需材料的责任。会议通过了中央学习组组员名单。

1942 年 6 月 15 日　朱德号召向左权学习。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悼左权同志》一文中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民族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生活艰苦，从来不为私人作任

何打算。他同士兵一样吃穿，到34岁才结婚。抗战以来，每月5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但是对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于工作，则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他对自己谨严刻苦，埋头实际，不务虚名；对同志则虚心和蔼，对部属则以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精神，去帮助和带领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体贴他们的困难。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学习左权同志，坚持华北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6月15日，《解放日报》登载朱德悼左权同志挽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五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年6月18日　《反对党八股》公开发表。《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在2月8日的演说《反对党八股》。

1942年6月19日　《解放日报》报道八路军一一五师提出1942年经济建设的方针。该师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掠夺、摧毁所给予之危害，厉行生产节约，特向全师提出下列号召作为1942年经济建设的方针：（一）以团为单位，做到生产及节约全年经费开支的2/5，师旅直属队各做到生产及节约全年经费开支的1/3。从生产及节约所得之款，以2/5用作改善各部队的生活，1/5用作文化娱乐与教育学习之补助金，2/5交公家。（二）干部节省用衣服，不要公家发军服，改发内衣，营以下干部全年只穿两双布鞋两双草鞋。（三）按伙食单位计算，做到每人每月节省粮食5斤，以救济难民群众。（四）每一战士学习自补鞋袜及打草鞋，发扬爱惜一针一线精神。

1942年6月22日　《解放日报》报道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出训令。训令号召部队切实帮助群众春耕，并公布部队1942年的生产计划：（一）生产标准按人数计，旅以上机关每人生产100元，团以下每人生产50元（包括节约在内）。（二）师生产部，旅

及军分区的农场及基本菜圃，要培养出一批优良的菜蔬和谷食种子，准备来年分到民间去，提高根据地的生产质量。（三）加强各合作社及作坊的管理，提高生产率。（四）大量发展农业副业，喂养猪羊牛鸡等。（五）组织人力、畜力进行商业运输，稳定市场，维护冀银行钞票，繁荣根据地，与敌人作经济斗争。（六）切实提倡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七）每人帮助群众种树一棵。师政治部指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由各部队依据驻地的实际情形，具体订出详细的实施计划。

1942 年 6 月 22 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方局关于坚持冀南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已进入空前紧张时期。游击根据地之存在以依靠群众为唯一先决条件，必须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从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对敌负担的日常斗争中组织与武装群众，密切党与群众之联系，减租减息，生产建设等工作应按当时当地情况灵活进行，力求切合上述要求。只有进一步的依靠群众，才能克服新的困难，迎接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1942 年 6 月 23 日　《解放日报》号召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决实行精兵简政。在社论《再论敌后精兵简政》中指出，我们要更深刻地认识敌后抗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只有坚决实行精兵简政，对于非绝对需要的事业和机关，毫不犹豫地停办裁撤和合并，对于现有的场面毫不姑息地加以缩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应有的发展，使我们在敌后极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

1942 年 6 月 23 日　《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 24 次政务会议作出决定。决定指出与群众密切联系是政府工作的基本方针。要求政府人员要经常收集与了解人民的情绪与需要，作为

制定各种具体政策的张本。

1942 年 6 月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1942 年 7 月 1 日　朱德指出当前党的重要任务是认真整顿三风，建设党的新风格。他在发表的文章《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中指出，为了迎接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百倍增强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合作和全民族的团结。而增强我们党的团结和我们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则是克服困难，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朱德指出，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并领导着 50 万军队和敌后广大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几千万人民。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和他培养教育下的大批的富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忠诚勇敢的干部。我们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支持者和负担者。我们全党今天的重要任务，是深入进行目前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工作，扫除那些残余的恶劣作风，建设党的新的风格，改造干部和党员思想、工作作风，使全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1942 年 7 月 1 日　聂荣臻论晋察冀边区的整风学习。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晋察冀边区三风不正现象的主要表现，要求根据边区的特点进行整风，学习与检查同时并进，学习过程中同时进行反省自己，反省工作，并全面展开对工作的检查。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纠正整风中的各种偏向。聂荣臻指出，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革命风度。

1942 年 7 月 1 日　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整风委员会成立。晋察冀边区文化界为了统一指导和推动全边区文化界整风的学习和检查工作，文联常委会决定成立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整风委员会。推

选沙可夫为主任，成仿吾、邓拓、何干之等为委员。在委员会中组成指导组和编辑出版组。指导组担任对各地文化机关、文艺团体整风的指导和推动；编辑出版组负责编辑出版有关文化部门的整风的研究资料。

1942年7月1日　鄜县（今富县）太乐区区级干部整风学习开始。他们学习文化的办法是：（一）召集区宣传干部会议，具体讨论学习办法，回去切实执行。（二）建立函授制度。

1942年7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本侵略者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如果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有错误决不轻易扣大帽子。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1942年7月2日　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自中央及毛泽东提出整顿三风以来，在延安已造成热烈的运动，这对于团结和巩固全党，改正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有莫大的作用，现在虽还处在学习文件的初步阶段，就已经在改正干部和党员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效果。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但过去主观主义的思想尤其明显，抗战后部队在扩大，新的成份加入了我们的部队，加之统一战线的环境中，我们部队又带来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以必须在部队中

热烈地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整风的号召，更好地来团结、巩固和改造部队。革命军队的干部必须能充分掌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反对军事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肃清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对我们的恶劣影响（这不是指吸收这些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克服军事理论和军事学习的落后，不让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存在于我们的部队中，使我们军队干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蓬勃发展起来，这对克服目前困难，迎接将来光明，对目前进行游击战争和准备将来正规战争，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军队中整风，锻炼党性，是更有重大意义的。但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和进行。

1942 年 7 月 2 日　《解放日报》号召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解放日报》在社论《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中要求军队干部必须充分掌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建立与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1942 年 7 月 3 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整风学习委员会召开全院小组长联席会议。学习总会派胡乔木到会指导。会上对该院学习委员会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周扬对今后该院的整风学习提出 4 条改进办法。

1942 年 7 月 4 日　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聂荣臻电。毛泽东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

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教育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容易纠正。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

1942 年 7 月 6 日　中共陇东分区党总支委员会规定党性检查办法。（一）在整风学习第二阶段中，每个党员必须认真地反省自己，在会议上提出讨论。各支部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所属党员。（二）在检查阶段中，每个党员必须从头到尾把自己反省结果，有系统地写成书面材料，支部根据对每个党员的了解，向该党员提出意见。

1942 年 7 月 7 日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应始终同老百姓在一起。在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应当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遵守纪律，不脱离群众，不浪费民力，要向老百姓做宣传工作，要救护敌占区的人民。要牢牢记住：假如老百姓拥护我们，日本侵略者就无法打垮我们，假若我们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失败。

1942 年 7 月 9 日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他在关于掌握山东问题致刘少奇电中说，学习 22 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1942 年 7 月 9 日　毛泽东接待晋西北士绅。在谈话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胜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原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1942年7月9日　《解放日报》指出精兵简政的目的在于提高行政工作效能。在发表的社论《第二次“精兵简政”与增加县政府权限》中指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减少几个人，或裁并几个机关，主要的是为了提高行政工作效能。边区政府正在进行筹划边区及县区乡的第二次“精兵简政”，以求彻底达到提高行政工作效能之目的，发挥边区各级政府更大的力量，改进工作，发动一切人力物力，克服困难，争取抗战建国胜利。边府这次“精兵简政”的具体方针，除了要调整政府机构，建立必要的、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行政工作制度，提高干部与适当配备干部，密切党政军民的工作配合，边府各厅处实行合署办公之外，就是要增加县政府权限，这是在第一次精兵简政时未曾明确提出的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整个边府行政工作效能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应该予以正确的解决。社论强调，一方面增加县政府权限；一方面还要注意防止个别县借此“闹独立性”，不尊重边区政府之统一领导等偏向的发生。

1942年7月9日　环县学习委员会对县的整风学习提出意见。（一）以小组为单位，制定整风学习考勤簿，内分听课、讨论会、笔记等项。（二）先反省自己，再批评别人，检查了本机关，再谈别的机关，批评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不仅检讨过去，对现在的歪风也要立即纠正。

1942年7月10日　中央学习总委员会发出第六号通知。（一）规定自7月16日至19日，为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二文件的时间，自20日起，继续整风文件的学习。（二）各机关学风部分的总结，一律按原定日期推后15天。

1942年7月10日　王震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部队

的优良品质。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更加提高部队的品质》中指出，我们是品质优良的部队，这种革命品质，就是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诚与具有坚强的胜利信心；是坚决勇敢，刻苦耐劳，自我牺牲，奋勇杀敌的战斗精神；是自觉地爱护人民，尊重人民，与人民亲密团结的精神；是不怕困难，毫不疲倦地克服困难的精神。社论强调在政治教育上，1942年下半年能够研究22个文件，领会其精神与实质，掌握思想武器，来检查工作，反省每个同志的思想和工作，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以求得改造各个同志的思想与工作。每个同志尤其是干部，应该认清自己的优缺点，随时积极地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进步。一切摆老资格，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虚心学习，不尊重地方党政同志，对老百姓蛮横，不和蔼，不讲理的，正是品质不良和党性不纯的表现。支部和各级干部中，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1942年7月11日　陇东分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分区一级干部大会。会上传达西北局整风学习指示和报告两个月来整风学习检查的详细情形。会议决定，学习时间由4个月延长为6个月，至11月底结束。保证每天有3至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1942年7月12日　延安大学总支委员会号召该校党员配合整风文件进行自我反省。（一）各支部除自己在过去工作基础上进行彻底反省以外，并经常检查全支部同志反省的成效和偏向，研究和总结反省的方法。（二）各小组长应有计划地组织互阅反省笔记。（三）全体党员应以最大决心去掉爱面子思想，自觉地反省自己全部历史、思想和工作。（四）各支部分组研究反省的方法和要点。（五）彼此了解的同志，建立“相互反省”制度。（六）自我反省中的模范例子或发生偏向者，支部应分别予以评价和纠正。

1942年7月16日　中共北方局青委发出关于青运中整风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晋冀豫区党委青委在领导整风工作上，似过于草率。草率从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其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指示分析了华北青委工作情况，提出如何进行整风的几点意见：(一) 区党委青委及各级青救党团，必须根据党委关于整风的统一步骤密切联系当前斗争，拟定自己进行整风工作的具体计划。(二) 通过党员在青年团体中的耐心宣传和解释工作，使党的整风号召为群众所赞同。一般青运问题，均应通过青年团的领导机关和非党干部一起进行。党的青年干部，应起推动和模范作用，一方面要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一方面要和人诚恳商讨改进的办法。青委和各级青救党团，应特别检讨一下本身和其他群众团体的非党干部以及和党委的关系问题。(三) 整风的进行，必须经研究讨论和检查总结的步骤，千万不要急躁和草率。首先必须认真学习22个文件和确实研究领会文件意义，然后再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批评。

1942年7月17日　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发布命令。命令各地部队帮助群众生产，厉行节约以克服困难。

1942年7月21日　高等法院自7月17日开始的整风学习集体测验，今日作出结论。要点是：高等法院工作在总的方针上，没有主观主义的倾向，是正确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司法政策。边区司法是保护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在诉讼上是便利人民，废除了官僚主义手续，重证据不重口供，对犯人执行宽大政策并采取教育主义；此外又建立了人民仲裁制，使人民自己过问司法。所以高等法院的司法工作是在正确的政策下，依据边区的历史环境和目前实际情况及人民的要求具体运用的。在正确运用中，并建立许多制度，如批答、上诉、汇报、学习、劳动生产等，使边区司

法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但是，高等法院工作在个别部门中，也有着主观主义的作风，具体的表现：如在审判工作中，对某些案件的处置是怀着某种程度的成见，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成见和或多或少的感情成分。在司法教育中，有着理论和实践脱离的某些现象。

1942 年 7 月 26 日　《解放日报》号召要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在社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议》中分析了党的某些决议不能贯彻执行的六种原因，提出了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的办法。社论强调的决议不能贯彻的根源是三风问题，如果三风不能整好，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因此，必须在加强全边区党的整风学习中为坚决贯彻党的决议之执行而斗争。

1942 年 7 月 30 日　中央直属机关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学风学习，布置党风学习。会上，李富春代表常委会作怎样总结学风学习和开始党风学习的报告。他指出，中直机关约有 2200 人参加学风学习，学习了 3 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进行总结的目的：第一，是要看学习中是否真正懂得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是否还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存在。第二，是要看保障学习的组织方式是否适当，是否只重视形式而忘记了实际需要。8 月 1 日至 10 日为学风总结的时间。党风学习决定从 8 月 11 日起到 9 月底止，包括学习测验和总结的时间在内。

1942 年 7 月 30 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第一期整风学习结束。该部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该团直属机关、部队、学校整风第一期学习（3 个月）结束，提出第二期整风学习任务。方强在干部大会上总结时指出，在第一期整风学习过程中，部分干部、党员、或者个别机关、工作部门都有了深刻的反省，开始了工作转变，提高了干部的党性。在干部中发现了一批最优秀

的干部。一般同志都认为，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否则就是错过良机，而且是不可挽救的损失。方强指出，第二期学习内容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克服宗派主义的排内性和排外性。对兵团的基本要求是：在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学习运动的条件下，来增强干部的党性。消除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大会号召直属队干部党员加深对整风学习的认识，一面反省，一面改造，勇敢辩论，追求真理。

1942 年 8 月 1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关于边区系统各单位整风学习问题作出决定。决定主要内容是：（一）边区级学习计划略有更动，第二期学习延至 9 月 15 日结束。原规定第一期所学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反主观主义部分，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与斯大林等论民主与纪律三个文件，列入第二期学习。（二）为了学习领导上的集中和便利，决定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办公处并入西北局宣传部，今后边区各机关的整风学习统归西北局宣传部管理，由李卓然总负责。（三）各机关停止工作 3 天至 5 天，总结过去 3 个月来的学习。

1942 年 8 月 3 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彻底实行精兵政策》。社论指出，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已有些地区开始部分的缩小，敌人的“三光政策”大大破坏了根据地的生产力量；甚至有个别地区生产力减缩 1/2；再加以五年来长期的战争负担，不能不使根据地的经济更加困难。华北的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五年了。在这严重的关头，我们更应该关心民疾，照顾群众的利益。适当地紧缩部队，减轻负担，爱护民力。军事上敌人由正面进攻转而为敌后扫荡；在战术上，敌人由鲸吞转而为分期蚕食，封锁沟墙密如蛛网，大兵团不易活动。我们实行精兵政策，划小作战单位，充实作战兵团战斗力，符合战术上灵

活机动的要求。社论强调精兵政策是目前敌后建军的正确方向，是坚持敌后斗争和准备反攻力量的重要步骤，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应用一切力量来彻底实行精兵政策，扩大民兵的武装。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目前敌后严重的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2 年 8 月 4 日　毛泽东论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有科学的预见能力。他在关于华中精兵简政问题致陈毅电中指出，伴随着极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况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 8 万主力军 4 万地方军扩大至 15 万主力军、10 万地方军共计 25 万，党政机关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1943 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 1943 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望到 1942 年底或 1943 年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1942 年 8 月 6 日　军事学院学风学习结束。全院对于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运用，已有初步了解；两种思想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已逐步展开；个别同志大胆揭发了自己的错误以后，改变了过去对党不忠实的态度，许多同志已开始改正错误，并且也大大地影响了党外同志的进步，更加强了党内外同志的团结。在学风学习中，总结出七条学习领导的经验教训：（一）正确的理论有伟大的力量，所以应认真虚心地研究文件；（二）学习好才能领导好，领导者应先整自己而后才能领导；（三）虚心是工作好的主要条件，无论上级

下级同志都应当虚心相处；（四）选拔得力干部组成领导核心是成功的主要条件；（五）计划要精，检查要严密；（六）干部的模范作用是运动胜利的主要因素；（七）发扬民主反对自由主义才能展开思想斗争。

1942年8月8日　谢觉哉论作风问题。他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我们应有的作风》中指出：（一）计日程功，反对拖缓；（二）学习业务，培养专才；（三）注意领导，月讨有余；（四）养成法治，深入民主；（五）保持健康，作持久战。

（三）发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精神，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1942年8月11日　中共中央军委系统学习总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始党风学习的决定。决定强调加强思想领导，精简学习组织，更好地联系实际，深入反省和开展批评，加强个人多读多想。规定党风学习讨论题目共分九部分：（一）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二）对工作态度问题。（三）干部关系问题。（四）纪律和民主问题。（五）本位主义和独立性问题。（六）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问题。（七）自我批评问题。（八）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九）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问题。

1942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决定同意毛泽东所提的方针，即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个方面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1943年投资要多，公营为辅，1942年投资要少（1942年投

资偏重公营是必要的）。平衡出入口，只有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销为辅。在革命与战争环境下，部分的劳役制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党政军各方应着重批评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统一意志与行动，加强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政府党团应完全执行西北局的决定。

1942 年 8 月 15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向边区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政系统“精干上层，加强下层”；军队力求减少非战斗人员，以充实连队；学校团体亦求精干有力。为了贯彻这一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精兵简政委员会，负责检查督促这一工作。

1942 年 8 月 15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边区各地方学习整风文件问题指示。指示指出：（一）各分区、县学习文件虽已获得初步成绩，但最大的弱点是和实际联系太差，多数同志只是就文件上的字句发议论或上课，很少根据文件内容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省自己，少数负责同志对学习的重视非常不够，常常因工作把学习时间挤掉。（二）各分区、各县学习委员会以及党的宣传部门，立即对过去的学习加以研究和总结，采取具体办法纠正上述弱点。（三）乙组和区级干部的学习，在有适当教员的条件下，采取上课方式进行。（四）各级学习均应强调学和用、言和行一致，领导同志尤应以身作则。

1942 年 8 月 16 日　《解放日报》号召共产党应按照党员标准时刻省察自己。在社论《反省》中指出，反省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的练习，文件是理论，反省是实际，“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才能把文件变为我所有。共产党员不是平常的人，他担负着全民族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任务，应该时刻省察自己够不够资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我们反省的态度。

1942 年 8 月 17 日　《解放日报》指出整风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社论《学与用的统一》中指出，整风学习的目的，是为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因此，学与用的统一精神，不但应表现在整风学习后整个工作的检查上面，而且还应当贯彻于整风学习的全部过程。学的东西是否正确，对于文件是否真正融会贯通，也要从实践中得到考验，离开了实践，则学习就成为没有内容的东西了。党中央提出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就是学习要跟着工作来进行，不要离开了工作。把学与行结合起来，就是这次整顿学风中改造思想改造作风的重要关键。

1942 年 8 月 20 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委员会开始学习党风文件。对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的要求是，着重于干部间的相互关系，对非党干部的团结，以及其他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没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表现的反省；对一般干部则着重于个人利益及发展前途和党的集体利益的关系，思想行动上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具体表现的反省。除此之外，还必须发动全体同志积极而彻底地批评领 导方面的缺点和同志之间相互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论，以达到比较深刻地掌握全部党风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的要求。

1942 年 8 月 23 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社论指出，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举凡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经济工作等等的进行，都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加以新的考虑。同时精兵简政的实行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培养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联系起来。

1942 年 8 月 24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学习委员会要求总结四个月来的整风学习。学委会提出“会议简而深，笔记少而精”的

口号，停止学习新文件，集中精力总结4个月来的学习。检查内容是学习的方式方法、思想方法、学习领导等，着重检查每个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转变程度。高级组和中级组每个人先写一个4个月学习的自我检讨，然后在小组会上互相批评。低级组先由学习委员会指定一人进行个别谈话，然后在会议上进行检查。

1942年8月25日　延川县学习委员会对下乡干部的整风学习作出指示。由于县级干部面临着夏征等任务，大部分干部都要下乡，所以县学习委员会对下乡干部特作出指示：（一）征粮工作组长担任临时的学习组长，督促领导本组组员的学习。（二）原学习的三个文件中（调查研究决定、农村调查序、在职干部教育决定）以学习前两个文件为主，必须与征粮工作联系起来，作为检查学习的成绩。在学习文件后，要写出文件的中心内容。各区委宣传科长要帮助下乡干部的学习。

1942年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决定确定以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9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传达与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指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各地收到后首先应在各级党委党团及军队领导机关中讨论，还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在党校与军事学校中，在各级干部中进行郑重的传达与讨论，并列

入整风文件加以学习。9 月 2 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对这一重要文件，在军队党组织中、干部中、军事学校中必须深入讨论与研究。在战士中则根据决定编成教育材料，军队同志应根据这个决定精神检讨自己对地方党、政府、民众团体的关系，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扫除某些同志中存在着的不尊重地方党、政府与民众团体，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习气。军队同志应首先拥护统一，服从统一，并成为统一中的模范。

1942 年 9 月 2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分委、特委和直属各县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一）党员登记和支部工作改造问题；（二）干部政策问题。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根据整风精神讨论提高党员品质，整顿下层组织，整顿领导机关，整顿边区党员作风，以加强各级党的领导作用，求得党的全部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次会议的进行方式也和过去各种会议完全不同，它没有什么大报告，先由西北局的负责同志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然后采取活泼的座谈方式，自由交换意见，最后则按问题，根据大家的意见，得出解决的办法，使这次会议成为一个“集体创作”。陈云的报告说明了通过的各种决议的意义。会议把边区全体党员作了估计，认为绝大多数党员是合乎党员的四个条件或两三个条件的。对于这些党员要以不同的方法，教育他们，提高他们，党员中有个别恶霸和腐化蜕化分子，损害群众利益，破坏党的威信，应依靠党员和党外群众的力量加以淘汰。会议认为，党员在生活和工作中，应以公私兼顾为原则，如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是为私同时又为公，这里公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是分不开的。这次会议至 30 日结束。

1942年9月3日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整风学习作一个月的总结。从这次的检查的结果看，凡是坚持学习制度，重视整风，把精读和反省结合，认真检查思想和工作的同志，进步就快，反之就慢。存在三个缺点：（一）只在词句上用功夫，放松了对文件精神的领会，形成教条主义的学习。（二）仍旧抱着马虎的态度，认为“还不是老一套”。（三）不通过自己思想发挥文件精神，来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改造。在笔记方面，有的做文章，有的只抄书，有的只是为了给旁人看，写的琳琅满目，而不着边际。总的方面，思想领导不够，中心组没有能够影响和帮助全体同志。

1942年9月4日　《解放日报》论始终同老百姓血肉相联地团结在一起，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在社论《我们始终要同老百姓在一起》中指出，没有与人民的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坚持敌后残酷战争是不可能的。敌人用了各种方法来离间我们与广大人民的团结，可是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成功。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在我党我军与人民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一）抗战前途的解释问题；（二）斗争的“韧”性和灵活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问题；（三）爱护民力、节省民力、培养和积蓄民力的问题。如何解决第三个问题，社论提出了四个办法：第一，要切实限定各个抗日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与全部人口的一定百分比。若脱离生产人员太多，便会养不活，便会公私交困。第二，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主要是发农业生产，同时尽力做到根据地一切日用必需品，能够在敌人的封锁中自足自给。政府必须有计划地领导人民进行春耕、夏耘、秋收工作，发展合作事业，帮助人民解决种籽农具畜力资金等困难，并正确处理主佃与劳资间纠纷，使能相互团结，增加生产。第三，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除从事战斗与本身工作外，要努力参加生产，实行自力

更生，解决一部分物资供给。第四，要厉行节约，肃清一切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总之，坚持斗争，唯一正确与必须实行的政策，乃是一面照顾抗战需要，一面又要照顾到老百姓生活，能够得到人民拥护的政策。我们能认真地这样做，我们更能与老百姓血肉相联地团结在一起，便能克服一切困难，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1942年9月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联合大学工作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中宣部指出，联大整风检查依据的文件，应当是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与延安干部学校两个决定。联大过去工作的缺点主要还是教条主义，而不是宗派主义。

1942年9月4日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决定以战略区为单位成立生产贸易管理委员会，对敌开展生产；贸易的全面经济斗争，以打破敌人向根据地倾投法币、操纵贸易、掠夺资源的毒计。

1942年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克服了鱼大水少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1942年9月7日　毛泽东论党的领导要对形势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有科学预见的能力。他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指出，对于形势的发展及其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

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懂得了，但是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我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我们的口号是增强团结，今后还要增强它。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1942年9月7日　毛泽东论革命者要警惕不要让现状和习惯束缚自己的头脑。他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指出，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避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

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1942年9月9日　《解放日报》强调政治工作要巩固部队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在社论《敌后形势与我军政治工作》中指出，政治工作更加要巩固部队和加强我军内部的团结。尽可能关心战士们的物质生活，致力于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不要使政治工作仅仅局限于精神上的鼓励，应当使精神上的鼓励同实际问题的解决配合起来。要注意增进内部的团结，保障我军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之间，彼此精诚无间。大家要用严于责己的精神与诚恳坦白的态度，去团结别人，团结全体。要牢牢记着，团结是胜利的保障，而军队的团结又是巩固根据地的枢纽。

1942年9月上旬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同志在整风中进步。他们在学完反对主观主义的文件以后，大部分同志认为这次学习的主要成绩是对主观主义有了认识。如有些干部本来个性很强，自尊心很重，对他的错误向来不但不承认，而且一经提出，往往面红耳赤，还说别人，以致造成互相攻击。但是在认识了主观主义以后，自己在反省中，就很坦白地把过去的错误说出来，而且承担了责任。因之，干部之间也比以前更加团结。

1942 年 9 月 15 日　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贯彻精兵简政，着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高岗任副政治委员。

1942 年 9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发出关于学习党风中支部工作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发动全体党员作思想意识上的全面的彻底的检讨；（二）发动全体党员进行诚恳坦白的互相批评；（三）要清楚地了解每个党员的思想、情绪和倾向，并灵活地进一步引导展开讨论；（四）必须注意检查对非党员同志的关系；（五）要联系支部本身工作进行检查。有些工作可以推迟的予以推迟，以便使精力贯注在党风的学习和领导上。

1942 年 9 月 17 日　《解放日报》提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中乡村党政工作的正确关系。在社论《建立乡村党政工作的正确关系》中指出，陕甘宁边区乡村工作中，至今还存在着党支部对各种工作一把抓方式的残余。有些地方，党还是代替着一政府的工作。这种方式，使政府的独立工作不能发挥，事事依赖着党，同时使党忙于日常事务，而不能尽其对于政权工作的领导作用。党和政府机关正常的业务不能建立，则乡村建设工作的效能，就不能提高。现在的局势，要求在陕甘宁边区贯彻精兵简政的政策，提高工作效能，纠正党对各种工作一把抓方式的残余，建立乡村党政工作的关系，正是提高工作效能的一个重要办法。这个任务必须坚决执行下去。

1942 年 9 月 22 日　《解放日报》论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在社论《党与党报》中指出，党经过报纸来宣传，经过报纸来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报纸是党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党

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时刻警惕看重自己的责任。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

1942年9月24日　《解放日报》指出整风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社论《正确的学风、正确的党风》中指出，整顿三风是整顿三股不正之风。但是风虽然分三股，却不一定是从彼此完全隔离的三个防空洞跑出来的。三股风与其说是出于三个洞，不如说是出于一个洞的三个门，而正本清源，非实行辩证唯物主义，打倒主观主义不可了。整风的文件中，“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照实际办事，拨主观主义云雾而见唯物主义之青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的秘密，同时也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党风的钥匙。”

1942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作出关于整风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一般地区及部队的整风，应于1942年年底完成。苏南、苏中、盐阜各区党政民机关及战斗任务重的部队，于1943年2月底结束。在各师中无重大战斗任务之部队，所有机关部队团营一级以上干部，均需订立整风学习计划。经过部队之整风，来加强部队之整训工作。

1942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精兵简政的决定。分局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对晋绥军区部队的精兵简政作出决定：主力军（包括一二0师及新军）以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战斗部队。

1942年9月　毛泽东号召要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为无产阶级事业献身。他在接见一二0师战斗球队时说，你们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要好好工作，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力

量。过去无数党员和革命先烈，为革命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才把革命引上轨道。比如你们的贺师长，一把菜刀闹革命，经历了千难万难，不怕杀头，到处找才找到了共产党。现在党就在你们面前，你们要好好地跟着党走。要追求真理，要投靠无产阶级，忠心耿耿地替无产阶级打仗、做事。

1942 年 10 月 7 日. 陈云论干部应具备的条件。他在延安军事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作为一个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应特别注意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强调新党员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基层实际工作开始；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2 年 10 月 7 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简政要从思想上贯彻》。社论强调首先要对简政在今日条件下的重要的迫切的意义有足够的了解，要克服一部分同志思想中的那种只从局部出发而不照顾全局的片面观点；克服一种习惯的传统思想，他们习惯于老一套做法，而不顾在新的情况下加以改变。他们总是认为人多要比人少好，有一件事就得安置一个人，否则就觉得难以完成任务了。因此，现在党与政府都在准备积极贯彻精兵简政，要贯彻精兵简政，必须求得全体干部在思想上有明显的一致的认识。

1942 年 10 月 9 日　刘少奇《论党内斗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 1941 年 7 月 2 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论党内斗争》共分五部分：（一）引言。（二）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党内斗争中的倾向。（三）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之表现。（四）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五）怎样进行党内斗争。

1942 年 10 月 12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朱德题词。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1942 年 10 月 15 日　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军政治工作有其光荣的传统和显著的成绩，在整风时，如果认为在我们政治工作中统治着的是三风不正，是不合实际的错误估计。然而，假若自满自足认为政治工作没有三风不正的成份，一切都已尽善尽美，那也是主观主义的有害的错误的武断。为要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各级政治机关要进行下列工作：（一）各级政治机关人员，特别着重的是团以上的高级人员（营连两级主要靠讲解，不是阅读），切实仔细研究整风文件，以求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法，才能进行研究整风的特殊问题——政治工作中的整风问题。同时帮助军事工作人员对于军事整风的研究。在研究文件时须和军事工作人员一起进行阅读、讨论、反省、写笔记，但不得妨碍战斗。（二）研究各部队政治工作现状，由研究个别问题起，而达到总结一般问题。先分析后综合，先调查后研究，先收集材料后作判断总结。（三）研究我军一般的和各部门自己的政治工作的历史和敌伪友的"政治工作"，以求得我们的结论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全面的、历史的。指示强调必须负责地认真地检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拿起批评和我自我批评的武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决不妨碍战斗。

1942 年 10 月 19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结束。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有边区党政军民县一级、团一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 300 余人。在开会

期间，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毛泽东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中间到会2天解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尤其是他收集整理历史和现状的材料，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个文件不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解决了今天边区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而且给全体同志一个研究任何现实问题的方法上的榜样。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向大会作了重要的讲演。这次大会解决了三个问题，就是边区党的历史教训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大会用一个月时间讨论总结陕甘宁边区全部历史经验教训，边区党内最有威信的老干部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以及其他许多一贯拥护正确路线的同志，都相继讲话。过去虽曾站在错误路线方面但已觉悟了的同志，也一面进行自我批评，一面要求还没有完全觉悟的同志赶快觉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大家进一步了解了整党的丰富内容和伟大意义，进一步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这次讨论奠定了今后边区党的建设和团结的巩固基础。

毛泽东在11月22日、23日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讲演中指出了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提出了当前的一些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问题。他说明这些偏向虽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大会从11月24日起，用了1个月的时间采取大会讨论的方式集中火力来批评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讲话的有70多人，从县团级干部直到边区许多高级负责人止，都做了很深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的结果，就是使边区党不仅有了路线上的统一，并且有了政策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大会在政策问题上，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宽大政策、

加强民主和加强建设的主张都做了确切详尽的解释，纠正了过去一部分同志只看到片面和表面的错误，强调边区既未处在直接战争的环境，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的共同中心任务。在组织上，大会第一是决定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党的地委会，使全党明确认识党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最高形式的原则，纠正过去某些同志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看的不正确观点。第二是决定更加亲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为此大会特决定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并向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提议发起拥军运动。第三是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的某些缺点，如党的某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不够尊重，军队中某些干部的瞒上不瞒下等等。第四是决定整顿党的组织，而其中最基本的工作就是重新登记党员。大会指出这是一个极细致的工作，又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如果不做这一步工作，党内公然存在着一部分和党两条心的党员，那么党的统一就是空谈，这就是最大的自由主义。经过1个月的讨论，经过这些政策问题和组织问题的解决，边区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障碍除去了，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基本实现了。

大会认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是一两年的事，但是这一两年的中国，尤其是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却一定是异常艰苦，因此，这一两年内边区的责任也是格外的重大。边区党过去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的任务就是要更有计划更有效的建设。所谓建设，大会完全接受毛泽东的解释，就是生产与教育，而在两者中间，生产更有决定性。大会完全接受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的方针，并在这个基础上从12月下旬起进行了十几天的热烈讨论。关于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从1938年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密切加以注意，并且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后

来朱德回延安，也竭力提倡生产。5年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好的经验。但是对于这个发展过程，多数同志还是不完全自觉的，他们还没有深刻了解到经济建设工作是边区和平条件下的唯一中心工作，而总结其经验，研究其规律，乃是党政军民高级领导者尤其是经济工作领导者的重要职责。有些同志甚至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还抱着消极怀疑的态度。直到毛泽东为大会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文件，才使全党对于这个大问题有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向大会指出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农业、手工业，而发展经济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组织劳动力。在民营经济方面，劳动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这种经济发展的所得应该首先用以改善农民自己的生活，其次用以支持抗战的政府和军队，再则是用以交给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地主，以便在减租减息后，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在公营经济方面，应该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享受自己的所得，以便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这两支劳动大军指挥好了，我们是不怕任何困难的，我们是有伟大前途的。同时还必须精兵简政，大量地减少消费人员而增加生产人员。毛泽东号召边区全党的干部一定要把经济工作看作第一位的工作，一定要扫除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极端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朱德也向大会特别指明了军队重视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他说，在边区这样的条件下搞生产，不但为我们自己解决了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将来全国的军队，都可以效法我们的样子。大会对王震、习仲勋、马文瑞、贺晋年等22位生产中的模范各奖毛泽东题字一幅。

1942年10月19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发出指示。指示指出，在整顿

三风的运动中，必须具体地仔细地来研究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根据整风文件，可以发现下列三风不正的地方：军队的政治工作应当是实行与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然而政治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对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不求甚解，粗枝大叶，生硬搬用，不具体化的现象。政治工作的计划，往往空洞抽象，从主观想象出发，不会周密研究客观情况，而其内容，又往往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缺乏中心。上级对下级指示许多是不具体不痛不痒。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许多是空泛无内容。许多政治工作人员缺乏调查研究的习惯，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或者把书本上的、上级指示东西背诵一番，或者是局限在已有经济上，不管有无变化，重复老的办法。在宣传教育工作中，不问对象，背诵名词口号，抽象化、公式化，不通俗、不生动；在干部工作中，对干部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观察，而是带着片面性。在干部提拔上，不知兼顾德才资者有之；在新老干部、本地干部、外地干部、各部队干部等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宗派主义、局部主义的遗毒是存在的，急待检讨与纠正。指示强调在全军政治工作中统治着的不是三风不正的歪风，但是必须负责地、认真地检讨思想中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军队，提高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绝不妨碍战斗。

1942 年 10 月 21 日　《解放日报》论经济建设在整个建设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社论《转入生产中去》中指出，精兵简政，对于建设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有两种意义。消极的方面，是紧缩开支，节约民力，以便度过难关。积极方面，把精简下来的人员转到生产中去，扩大与发展生产事业。经济建设是整个建设问题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经济建设乃是建设之根本，生产乃是经

济建设之根本。其他各种建设，如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对于生产来说，都是帮助生产、便利生产、保护生产的。只有生产弄好了之后，经济建设弄好了以后，其他事业才有发展之可能。共产主义者对于劳动是最尊重的，体力劳动是与脑力劳动同样可贵的。应该造成尊重体力劳动、尊重生产工作的社会舆论，应该给予那些尊重党与政府的分配，乐意转入生产的同志以最大的光荣。

1942 年 10 月 28 日　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整风等问题致周恩来电。电文指出，边区正在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1942 年 10 月 30 日　《解放日报》论党员教育应实行理论和实际联系、学和用统一的原则。在社论《党员教育应有彻底转变》中指出，党员教育的主要缺点在于严重的教条主义，要使党员教育得到彻底的转变，必须严格清算这些教条主义的毛病，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联系、学和用统一的原则。

1942 年 10 月　八路军晋绥军区开始第二次精简工作。主力军由 3 万人减至 2.5 万人，地方武装由 6521 人减至 5000 人，共精简 6600 余人。

1942 年 11 月初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党风文件的学习进入一个新的紧张热烈的高潮中。各部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普遍展开，构成了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生动的图景。其共同特点是：（一）定出了学习党风的目的。（二）为了使文件学习更深入，不少机关已开始部分检查工作，就个别的问题展开研究讨论。（三）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各机关学

习目的明确，领导上抓紧了思想领导和实际问题的密切联系，各机关在这次党风学习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克服了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个人和组织关系问题上大部分同志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1942年11月4日　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为什么要提出整军？（二）整军要整些什么？（三）怎样来进行整军？他强调指出，这与全党一样，部队还存在着三风不正的残余，为了克服三风不正的残余，执行中央的号召，达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全军的目的，需要整军。总的目的在于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

1942年11月15日　军事系统的整风学习结束。军事系统的整风学习较为深入具体，并组织了五次报告（关于党内斗争、干部政策等）；目的是为了帮助各分委的领导，解决具体问题，收效很大。很多同志听了陈云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更加安心工作了。学委规定总结的内容是：（一）收获了些什么？（二）应当收获而未收获的有哪些？（三）现在干部的具体情况？（四）学习领导的优缺点？（五）今后对各种干部的教育应如何继续，教育内容与方法应当怎样？

1942年11月16日　朱德论实事求是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军事学院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朱德在毕业典礼上讲话。他着重讲了关于实事求是和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他说，同学们出去都是要干事业的，要做成几件事，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有什么样的武装，有什么样的敌人和地理条件，就必须打什么样的仗，调皮是不行的。有些人刚念了几本书，背了几条原则，就自高自大，以为是万能，毫不虚心，这是不好的，结果一定害自

己害别人害革命。因为革命是群众干的，没有群众什么也干不成，只有和群众一道，深入到群众中间，才能团结领导群众。你们技术学好了毕业出去，就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并且从低处起，来提高他们。不要在矮子里充高汉子，时时刻刻想做领袖。领袖是群众封的，不是自己想干就干成的，如果群众要你，就是再大些也不要紧。有些人，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结果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的。他们对世界各国的事情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实际事实他不懂。这些人给他们取个名字叫知识分子的无知或无知的知识分子。可是最落后的群众，也是无知，因为最容易受教条主义、无知的知识分子欺骗，假若这两个无知弄在一起，事情就糟糕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不自高自大，不夸夸其谈，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并且把落后的群众逐步提高，这意义就大了。只要大家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肯实事求是，虚心学习，将来一定能够为革命做许多事的。目前，革命胜利的希望比以前更大了，我们政治上要更坚定，永远做一个革命者。

1942 年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央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在 1942 年冬到 1943 年春做到如下各项：（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 3 个主要负责人员，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

是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并加强所属各县的领导。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三）干部相互间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而被分配到别地的别部的或学习的新岗位去。（四）实行时要预先周密研究，不要草率从事。

1942 年 12 月 6 日　中共中央总学委会要求肃清延安“小广播”。在发出的通知中指出，延安整风学习中暴露了党内“小广播”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有的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等秘密消息与机密行动都泄露出去，破坏了党内有关生命的机密；有的人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甚至于“广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破坏党内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制造反党谣言。这种严重的现象流行在每个角落里，无论在党政军民学各机关中，无论在老干部新干部中，无论公开工作部门中与机要秘密部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小广播”决不是小事而是极端危害党的大患，是党内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党员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甚至于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问题。反革命分子正是依靠着这些人的“小广播”进行反党宣传，特务人员正是依靠着这些“小广播”取得党内秘密，取得“合理流言”并作为反革命的掩护。因此各学委会必须严格地注意这个问题，在

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进行下列工作：（一）号召全体党员起来反对这种泄露秘密造谣的“小广播”，指出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动摇的，他们相信敌人造谣，对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是有些臭味相投的；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把党的机密当作表现个人的宣传品，至于是否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事业，这是毫不关心的。他们主张个人的言论行动自由，甚至于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与秘密工作制度；他们讲温情私交，论友谊，对个人的“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即使党的最机密的消息也可以冲口而出，对党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他们对“自己人”有错误可以互相包庇，对党的“公愤”可以漠不关心，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至于对不满意的人便造谣中伤，对个人的“私愤”便力图报复，就是党的干部也可以成为他个人的“仇敌”。这种人是过不惯政治的原则的党的生活；而是喜溜门子，专门调查党内的秘密作为广播资料，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以便把自己吹成一个“通晓党的人物”，而实际上是变成了敌人义务情报员，对这种“小广播”应号召全体党员群起而攻之，以促其觉悟，并须严整党的纪律，彻底肃清之。（二）号召每个党员深刻地反省自己与严正地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地报告出来。各学委会应把这种反省与揭发当作学习考试与学委检查的尺度之一。（三）各机关学校，应根据上面的主要问题与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

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四）根据反省与揭发材料及本机关及其他机关调查的结果，对能够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同志应给以赞扬，对能够向党坦白报告自己过失的同志，应欢迎他改正错误，对泄露秘密造谣生事者应按其性质程度之轻重给以处罚，对确有错误隐瞒不报告，应在群众中开展斗争使其觉悟。（五）要认真地进行秘密工作的教育，打破有些同志认为看不到秘密材料，听不到秘密消息，就是不相信同志的错误观点。根据各机关学校的具体环境，定出秘密工作之条例与工作须知等规则，并建立经常的检查制度。（六）各学委应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并配合党的支部共同进行。

1942 年 12 月 9 日　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强调在这解放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是党的重大决策之一。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依靠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战胜困难，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说，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群众，以提高其觉悟，这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只有群众工作做好了，才能容易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各项建设，才能真正发扬民主，把政权搞好，把财政经济工作搞好。因此，他指出，在党员中，在干部中，在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他说，我们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群众的联系。同时，又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说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

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我们在太行山曾截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说破坏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共产党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刘少奇告诫全党同志，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不可在行动中有任何违背。有的同志口头上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到行动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的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至于有的同志把群众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这也是非常不对的。如何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他认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是好的。就是派工作团下去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中心区、村在开始发动群众时，由政府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召开士绅、地主座谈会，说明群众运动要来，讲清政策，减少顾虑；同时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和发动更广泛的群众。要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下手（比如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的胜利，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然后成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心区的影响一传开，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这样，一二个月就能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教育农民所用的语言和举例应当是当地农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农民听懂了，觉悟会提高的。这样，农民的革命思想树立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教育农民。最后，他提出在群众运动中，应该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防止党、政、军干涉，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二，真正巩固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第三，加强领导，防止右倾和左倾。

1942 年 12 月 10 日 ·《解放日报》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正逐渐改变陕甘宁边区各工厂职工并给了他们许多新的精神。安心工作和尊重劳动，就是这种新精神的表现之一。在各工厂中，最近已经消灭了要求调动工作和见异思迁的情绪，大家都以长期决心埋头于工房和机器间里，有的工人在笔记上写着："生产是光荣的任务，怕吃苦做工是落后的意识，我们要提高技术，扩大生产，工人是最有前途的"。特别是有许多大学生自觉地要求进厂做工，心悦诚服地当学徒，去向老工人学习。全厂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学生、中学生也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具体的实践中把他们自己更加提高了。

1942 年 12 月 16 日　朱德号召学习刘伯承的一贯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品格。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中说，伯承同志是深入群众、深知群众的人。他律己严，待人宽，谦恭和蔼，身为群众表率。因此，他自然得到群众的爱戴，成为群众的领袖。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是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了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朱德还勉励全党同志和将士，学习和发扬刘伯承一贯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品格。

（四）发扬言之有物的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2 年 1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说：（一）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二）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习委员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整风学习已经结束的单位，要重新研究，没有学完的要深入学习。（三）在文风的学习中，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论文、文件、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教课、文艺、整理笔记、工作方式等），借以坚持彻底肃清党八股的余毒。（四）1942 年 12 月及 1943 年 1 月上半月内专门学习文件，个人学习总结可移到 1943 年去。

1942 年 12 月 18 日　《解放日报》号召反对官僚主义。在发表的社论《反对官僚主义》中指出，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既要反对直接的官僚主义，如高高在上，对群众强迫命令等，还要反对间接的官僚主义，即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他们虽是忙碌，对群众的情形还是不了解的。只有反对官僚主义，才能达到改造自己工作和作风的目的。

1942 年 12 月 21 日　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公私关系

上，就是“公私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在党的这一正确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解放区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党在后来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2 年 12 月 23 日　《解放日报》号召集中力量在后方抓好生产和教育两项中心工作，而以生产为中心的中心。在发表的社论《克服思想障碍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中指出，发展生产与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生产尤为中心之中心，因为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才能解决财政问题，才能解决教育问题，才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

1942 年 12 月 24 日　太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要求每个人在整风学习中作总的反省，同时配合干部鉴定工作。抗大总校整风学习中，创造了典型反省的方法，即发动进步同志，向大家进行自我典型反省报告，以发掘其过去思想方法错误的历史根源，提出改造思想的办法，来教育大家。

1942 年 12 月 29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总精神是根据团结抗日的原则，调整租佃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加强抗战力量，而对于边区历来所实行的照顾地主又照顾农民、保护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加以成文规定。1944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讨论通过，成为正式的法案。

1942 年 12 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一）简政的意义与目的；（二）划清职权，审定任务；（三）加强乡政权；（四）区以上须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五）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六）改善领导作

风；（七）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八）拥护军队；（九）巩固三三制；（十）厉行节约。

1942年12月　陕甘宁边区1942年生产计划基本实现。开荒45万亩，完成本年开荒计划的90%。耕地面积增加到1248.6万多亩，植棉增加到9.4万多亩，朱驴繁殖到36.4万多头，羊180.2万余只，收获粮食168万余石。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3990人，食盐年产销达20余万驮，生产布10万匹，价值2.5亿元，供给全边区军民全年需要量的40%。生产毯18000余条，比1941年增长一倍以上。造纸6000余令，较1941年增长2倍以上。肥皂、粉笔、精盐、牙粉均能自给。陕甘宁边区1942年组织起来的农民占全边区35万劳动力的80%，其中10%是经常性的。机关自给程度低的30%，高的达70%。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42年生产总值达6521万余元(木炭等尚未计在内)，农业生产总面积达2万余亩（三五九旅不在内）。兵团于1942年生产中解决了全部单衣、棉衣50%自给。办公费、津贴费、伙食费、蔬菜全部自给。

1942年12月底　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谈话。毛泽东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团结了。"毛泽东听到边区一家老乡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他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1943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干部晚会庆祝新年

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参加了晚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1943 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学习。毛泽东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艰苦奋斗的情况。

1943 年 1 月 7 日　任弼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发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讲演。（一）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二）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三）检讨历史的教训和党性问题。他提出了在边区地方党政中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和在军队中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反对闹独立性与实现党的一元化的必要性。他专门论述了党的领导作风问题，指出由过去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作风，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适应于今天建设时期的新作风。他阐明了今后领导中的四个主要问题：（一）抓住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作风。（二）反对官僚主义，建立正确领导。（三）发扬民主，展开自我批评。（四）适应当前任务，改进组织工作。

1943 年 1 月 8 日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召开生产准备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1943 年生产运动的特点；（二）1943 年的具体任务；（三）如何解决这个任务；（四）如何组织生产。报告提出生产是 1943 年各机关的中心任务之一，1943 年生产运动的目标是达到丰衣足食。会后各机关组织了临时生产委员会，总结 1942 年生产工作的经验，并根据各机关和劳动力的比例，订出了生产计划。

1943 年 1 月 9 日　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召开边区一级党政民学各伙食单位管理生产工作干部联席会。林伯渠号召各机关学校的同志，要以整风精神来进行生产，来改善经济

生活。

1943年1月10日　彭德怀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整风学习委员会上讲话。他强调整顿三风学习的重点，在于学习的改造，因为整顿学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反对唯心主义，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党内大多数同志是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严重的损害到党的革命事业，而且不从改造思想方法的根本着手，只是忏悔自己过去个别的错误，则遇到新的问题，又将不知如何处理，或者处理的不妥当了。他指出，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革命，是伟大的改造运动，而主要还是改造干部的思想，尤其是改造高级干部的思想。敌后是处在战争频繁的环境，和延安不同，所以必须把整顿三风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1943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晋察冀边区新纲领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新纲领草案中，应着重提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便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军民公私必须积极协力发展生产，发展贸易，以开财源，以裕民生。在目前边区斗争条件下，不仅要教育民众，尊敬爱护与帮助军队，更应教育部队爱护尊敬并帮助老百姓，使军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这点在今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重要意义。

1943年1月11日　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召开会议强调学风学习。在总结1942年的整风学习时，认为基本问题是学风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学风不研究好，不能改造本身的一切问题。

1943年1月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学习委员会发布关于1943年上半年整风学习综合研究的决定。决定要求：(一)根据敌后的环境和特点，在综合研究中必须与业务学习、自我反省、工作检查与总结和执行新的任务密切地联系，以求达到工作质量的提高。(二)各级学委会在领导上必须根据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

和任务的不同与参加整风学习干部的工作岗位的不同等等，提出不同的要求。(三) 研究的重点放在学风的改造，主要抓住思想方法的改造，但也不应该放松对党风和文风的学习。(四) 为了加强整风学习中的思想与组织领导，规定各单位的学委会每周应有具体计划，各大单位的学委会每 10 天与总学委会通信一次，每月底要做月终报告。

1943 年 1 月 14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毛泽东在会上讲演关于领导问题。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通俗的话，全面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使到会干部对什么是领导及如何实现正确领导问题，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领悟与认识。

1943 年 1 月 14 日　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获奖的 22 个同志题词。分别是：“有创造精神”，“切实朴素，大公无私”，“坚决执行屯田政策”，“以身作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善于领导群众”，“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合作社的模范”，“忠实努力，不夸不骄”，“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机关生产的模范”，“无限忠心”，“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不怕困难”。

1943 年 1 月 15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拥护人民的军队。为此，专门做出决定。决定指出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1 月 25 日，延安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号召人民军队拥护人民政府爱护人民。为此专门作出决定。决定指出，边区部队与边区人民是血肉

相关不可分离的，军队离开人民就无法存在。在部队中，须加强政策法令的教育，陕甘宁边区对于政府的各种法令，通过干部向战士进行深入的解释，务使每个指战员不仅懂得各种法律的内容，而且要认真执行，对于过去不尊重政府，只顾自己，不顾政府法令，不顾群众利益的思想与行动，必须予以彻底纠正。

1943 年 1 月 25 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主要内容是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当前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当前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关于教育工作，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对于干部教育，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 1942 年 4 月起学了 8 个月，1943 年 3 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准备以 1943 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 1943 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 100 至 200 人；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面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如果能在 1943、1944 年两年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干部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是 1943、1944 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

1943 年 1 月 26 日　邓小平指出正确地对待人民正确地对待中央和上级的指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他在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上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

针》报告中说，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的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对于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正确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问题，他说，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1943年2月5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1943年整风运动指示。指示指出，（一）1942年的整风学习虽然获得了若干成绩，但深刻的反省和高干的整风并没有普遍展开，整风学习还非常不深入。各地党和部队应进一步加强整风学习，重新进行新的动员，应把整风运动看成为1943年斗争中最中心的任务之一。（二）1943年的整风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委专署一级，军队中旅和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内容上应特别着重于学风部分。党的书记，部队中的负责同志应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务使上述干部深入文件学习和自我反省。（三）各级党的组织和负责同志，必须把整风作为自己当前工作中主要议事日程之一，并以自己整风的示范作用去影响推动其他同志，启示和帮助其他同志的反省和进步。

1943年2月6日　延安干部和群众到杨家岭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争取“耕三余一”。

1943年2月9日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大发展等问题致周恩来、林彪电。毛泽东说，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

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5亿元以上（合法币2.5亿元以上）。1943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300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1943年2月10日　毛泽东关于总结整风学习经验问题致周恩来等电。电文称，为了总结1942年整风学习，确定1943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1942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自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1943年2月13日　刘少奇关于对待伪军、国民党军队和财政经济问题致陈毅等电。电文中关于财政经济问题指出，目前你们应集中注意在生产问题上。凡是军队机关所需要一切东西，都设法自己动手生产及动员人民生产，然后才能克服困难。这在陕北及华北有很好的经验，陕北只有150万人，有6万到8万脱离生产人员，大半是靠自己生产维持，大多数战斗员都自己种地，自做鞋袜、毛衣、手巾等，根本不发津贴，但战斗员有钱用，每个单位养猪数十口，两天能吃肉一次，小菜很多。你们应在机关部队中作深入动员，定出各部计划，从事生产。民间生产，亦须切实动员。你们应将财经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要放在税收与纸币

上，这可能发生危险的。

1943年2月17日　八路军三五九旅检查军民关系。为贯彻拥军爱民的决定，三五九旅指示所属各部深入群众调查执行政策、纪律等方面问题，以改进军民关系。

1943年2月20日　毛泽东为庆祝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致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贺电。电文指出："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新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结自己，准备象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22日　邓小平论群众运动的规律。他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作结论。结论分五个部分：（一）过去的检讨；（二）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三）统一认识及一些具体政策；（四）造成整风运动的热潮；（五）加强一元化的领导和团结。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部分中，邓小平指出，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以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党应当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政府对于群众运动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解群众运动。（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七）政府人员

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在整风的内容方面，主要着重于学风的深入研究与检讨，即主要着重于我们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因为思想方法打通了，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而改造我们思想方法的重点，又必须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而实际上是一知半解的教条主义，农民落后思想的平均主义与利己主义等等思想，必须从思想方法上给予纠正和改造。在整风对象方面，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具体进行，步骤及其方式与方法是：第一，必须注意敌后战争环境的特点，不能机械采取延安的方式来进行，必须注意将整风与战争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注意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更要着重于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第三，必须将自己所学的文件与自己的工作业务相结合；第四，整风的进度与要求，不在多，而在精，不在走马观花，而在追根究底，贯彻始终，对下面进行整风教育，要少用名词，注意通俗化；第六，审查与鉴定干部的品质，特别是县以上干部的审查与鉴定，必须依据整风的精神，主要从思想上来给予鉴定。他强调，为使整风运动形成一个热烈的浪潮，在组织与领导上，必须将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结合起来，由各级党委与部队中的主要负责同志来担任这一工作的领导，并要把这一工作当成1943年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将它经常提到自己工作的日程上来。

1943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五年多来抗日根据地获得了辉煌的成绩，妇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我们在妇女工作中缺

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缺乏深入下层、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致使工作一般化，组织形式化，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战士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1943 年 2 月 26 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举行生产动员大会。大会提出为完成 6 千万元生产计划而奋斗，做到 1943 年丰衣足食，打下 1944 年生产基础的口号。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家务。大会选出了中直军直生产委员会。

1943 年 2 月　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系统讲述党史。二、三月间，办事处连续召开十几次党员干部会议，周恩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武器，联系自己亲身斗争经历，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43 年 2 月　毛泽东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3 年 3 月 2 日　朱德、贺龙电令陕甘宁边区部队响应生产大竞赛的号召。他们指出：“多生产一颗粮食，就是多增加一份抗战的力量。”

1943 年 3 月 3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电令各地党委在全边区

军队和群众中开展生产竞赛运动。西北局要求各地党委要特别注意这一运动，把它推动起来，切实地去组织和领导，提高和巩固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在运动中应组织变工队，劳动互助，发扬群众生产的组织性。

1943 年 3 月 4 日　延安举行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李富春、贺龙、林柏渠、徐向前等领导人出席。朱德和李富春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提出了 1943 年生产运动的总任务，奖励了黄立德、赵占魁等 66 位劳动英雄。

1943 年 3 月 8 日　朱德指出妇女教育应以生产教育为主。延安妇女 5000 余人集会庆祝“三八”节。朱德在会上讲话，他说，妇女教育应以生产教育为主，懂得生产知识，才能建立新中国。大会对马杏儿等 7 名妇女劳动英雄颁奖。

1943 年 3 月 10 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举行劳动突击手开荒大竞赛。参加者 175 人，最高记录达 3 亩 6 分 7 厘。旅部对李位等 6 位特等劳动英雄以优厚奖励。

1943 年 3 月 10 日　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种倾向问题》的讲话，希望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去掉两个缺点：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关于特殊倾向，陈云说，首先要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这有两种认识，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党员中间的分工不能作为特殊的根据。如果一

定要求特殊，这就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党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如果党没有纪律，就会亡党亡国亡头。党的纪律是有束缚性的。但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针对有人认为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妨碍文艺，陈云说，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关于自大，陈云说，有一部分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确有这个毛病。毛病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偏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我们现在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份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越痛。我们做文艺工

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1943年3月12日　晋西北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座谈会。林枫在会上报告学习的初步检查。他对晋西北一个多月来整风学习的估计是：一般同志对整风学习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表现在每个同志已能将整风和自己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大家正在诚心诚意地踏踏实实地进行整风，在组织领导上，已日趋健全。思想领导上，已逐渐深刻化。具体成绩表现为推动了工作；开始改进了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但是仍然存在着缺点。对晋西北的整风运动，林枫提出以改进作风，建设有力的党为总目标。在思想上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等主要倾向。作风上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关于如何开展整风学习，林枫指出，必须有健全的领导，各学习分会首先要思想上一致，同时要把握典型，发扬民主，不要操之过急，急于作结论。不要把三风机械地分开，要根据不同的部门注意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程度提出不同的要求。研究讨论的形式要活泼。必须熟悉文件，真实反省，批阅笔记；对人对己都有诚恳的态度；对自己要客观，对同志要有帮助的精神，不应客气。

1943年3月14日　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总学习委员会总结1942年的整风学习。在学习方法上提出五点要求：（一）整风要和业务联系起来，提高工作效率。（二）1943年整风要真正和反省联系起来。（三）整风中发动争论，在争论中求得真理。（四）文化水平高，实际知识缺乏的知识分子，要多参加实际工作，在工作中去测量到底会不会看问题，会不会处理问题。（五）要多找参考材料，以求整风深入。在领导方面，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并重，组

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并重，要更加细密地检查工作。

1943年3月15日　陕甘宁边区一级各机关举行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提出完成1943年1.1亿元的生产任务。

1943年3月18日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中，写出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1943年3月19日　刘少奇提出减轻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财力与人力负担的办法。他从延安发给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张云逸等的电报中，转告了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其一就是减轻根据地人民财力与人力的负担的办法：除开部队生产节约外，一切不必要的会不开，不必要的运动、工作和自卫军形式上的站岗放哨均取消，一切部队的粮食军需均由部队派人搬运，不动员民夫及派牲口搬运，如此则节省极大的人力，使之用在生产上。他要求华中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形加以运用。

1943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选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认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属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

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还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之必要，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根据上述方针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是：统一和集中有关宣传教育方面事业的管理，研究宣传教育方面的各种具体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宣传教育政策的提案与意见。对于宣传教育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作通知。宣传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决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同时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组织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是：统一和集中党的组织工作（政民在内）和根据地、大后方、敌后方党的各种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政策和组织工作的提案与意见；对于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通知。组织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会议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华中党、政、军、民

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

1943年3月20日　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1943年群众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1943年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进一步开展边沿地区和部分的深入敌占区群众工作，通过减租减息、增资与减轻群众负担的经济斗争，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开展根据地民主、民兵、文化运动，大量培养群众干部；调整农村统战关系，坚持斗争，坚持阵地。

（五）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整风学习总结，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党的优良传统成为每个党员和干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43年3月20日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总学委规定，为了将1942年中的整风学习、检查工作作一结束，开始新的学习计划，特规定整风学习的总结办法：（一）按各系统各机关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方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二）各机关总结学习，一般的应完成下列工作：甲、整风文件完全学完。乙、作出本机关的学习总结和今后各种干部的学习方针。丙、进行本机关的政务检查和常务检查，作出检查工作总结和1943年的工作计划。丁、进行干部的学习测验和学习鉴定。（三）检查工作范围，中央各部、委、局、厅、社和军委各机关一律检查1942年的整个工作（常务和政务），订出1943年的工作计划。

1943年3月25日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出关于检查精兵简

政执行情况的通知。通知说，1942 年 12 月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指示后，各根据地对于这一指示是怎样执行的，望即来电告知。陕甘宁边区的党与政府为了执行这一号召，曾经组织了编整委员会，从事边区各级机关人事上的调整。其目的不仅在于节省与培养民力，而且在于号召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在组织机构上力求精干，力求合理，注重效率，爱惜时间，纠正过去机关庞大、头重脚轻、组织重复、分工不明、手续麻烦、收效极小现象。在干部配备与使用上，抽调上层，加强下层，务使配备适当，各得其所，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在财政上注意收支合理，用之有节。在完成任务上，抓住中心，不要面端俱举。通知说，据最近前总来电说，许多的大机关主义，在敌扫荡时受损失很大，从这点看也说明简政之必要。

1943 年 3 月 27 日　张闻天给中央写报告《出发归来记》。这是经过一年的基层调查写出的。报告有 10 部分：（一）出发经过；（二）打破教条的囚笼；（三）从实际出发；（四）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五）在实际中和群众中审查工作；（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七）着重典型；（八）分析与综合；（九）调查方法点滴；（十）坚持下去。报告中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很多。客观的实际虽是天天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要求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然而我们却偏偏来个“熟视无睹”，不肯去理会它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但是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会或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地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

人亡。所以真正的唯 物论者，不论在发表意见时，不论在决定问题时，必须采取经过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的、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需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使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地调查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需要对于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原则的领导，而且还需要作战指挥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只有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作战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在党内有特别强调的必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找到证明。实践中证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的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我们必须认为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在实践中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的如何平淡无奇，“不足道”，我们必须认为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举和尊敬。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1943 年 3 月 29 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就春耕及救灾问题发表谈话。他动员全军帮助农民春耕，节省食粮，救济灾胞。

1943 年 3 月 30 日　《解放日报》报道太行的精简工作。太行

区各级政府机关精简工作人员8000余人，充实基层。

1943年3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发动春耕竞赛与劳动互助的指示。指示推广吴满有、申长林等组织劳动竞赛和延安县县长刘秉温组织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以发展边区的劳动互助，开展劳动竞赛。

1943年4月1日　彭德怀号召全军节食助赈。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号召全军节食助赈，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小米1两。

1943年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自1942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很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的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党的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运动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做出自己 整风计划。已经做出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决定进一步把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规定为两个，一

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决定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决定规定整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第二阶段，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决定要求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5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5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决定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如果各地能于1943、1944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

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

1943年4月9日　赵占魁发出开展友谊生产竞赛书。陕甘宁边区工人劳动英雄赵占魁向全区工厂工人提出友谊生产竞赛书，掀起劳动生产新高潮。

1943年4月16日　朱德论自觉的革命纪律。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一文中，强调革命军队组织力量的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上的，而这一纪律的基础在于；第一，全体军人对于革命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因而能抛弃一切一已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第二，上下一致，以对革命事业之热爱，相互爱护，服从命令，遵守军纪，以达到政治上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第三，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因而获得部下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对有功受奖者不应放任，应继续教育，促其继续进步；对有过受罚者，不应仇视或厌恶，而应以爱护的精神教育之，使之改正错误。所以，只有大公无私，一视同仁，如家人兄弟一般，才能团结全军，巩固纪律。最后，朱德要求，在我们的军队中，无论何时绝对禁止一切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

1943年4月22日　毛泽东复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信。毛泽东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4月22日　周恩来论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在中共南方局向干部作报告时强调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问题，提出了做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六条标准：（一）要有确定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周恩来还指出，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要面向群众。不仅要领导群众，还要结交群众。在领导群众中要注意到：（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其次，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在工作作风上要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1943 年 5 月 1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战争，生产，教育为 1943 年的中心任务，各地职工会应根据上述任务以整风精神来检查过去工作及布置今后工作。各地总工会或抗联的工人部，应分别检查各级职工会在工作作风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形式主义，和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对于这种恶劣作风，应予彻底纠正，引导职工会干部学习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作用。

1943 年 5 月 2 日　毛泽东关于整风和肃奸问题给林枫电。毛泽东指出，你处整风开始深入，应继续彻底整风，一般不提内奸问题，但分局常委开始注意观察内奸分子的动向，准备冬季开始肃奸。

1943 年 5 月 6 日　李卓然谈整风领导责任的几个问题。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整风领导责任上的三个问题》中指出，为了完成 1943 年的整风任务，从领导责任上说，必须：（一）一方面要根据整风文件的立场去具体分析干部中到底存在些什么不正

确的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并研究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表现的程度。（二）要求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在整风中能够以身作则表现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三）要耐心地说服和教育一般同志，不断地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

1943年5月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1943年的整风学习问题向各地委发出指示。指示说，关于1943年整风学习的问题，1942年西北局所拟计划草案基本上是可以适用的。现在还有如下提议：（一）各分区1943年整风任务是要根据中央整风文件和高级干部会议文件的精神，有系统地进行干部审查工作和工作检查，以达到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和改进工作的目的。（二）整风学习应和当前工作密切配合。（三）在以审查干部思想历史为主的第一阶段中，应强调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中关于发扬民主的方法，以便暴露各种不同意见，并从而纠正错误方面。（四）各级领导核心，必须善于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团结一切积极分子在自己周围，反映情况，整理经验，各地委应特别注意研究一个县的经验，作为指导其他各县的依据，并经常把这些经验电告西北局。

1943年5月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10条。（一）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个利益。（三）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四）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五）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六）互规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七）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八）爱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九）提高政治警惕性，严防敌探奸细。（十）努力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每条都附有注释，并规定这个公约适用于区级以上干部。

1943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骨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赋予的各种历史大任。

1943 年 5 月 30 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进行第四次简政结束。整风和简政相结合收效宏大，行政委员会从 1942 年 1 月开始着手简政，已进行了四次。第一次简政主要是从量的方面减少，缩小各级政权编制，第二次是第一次的继续，只是做到了减少人，而没有做到简政。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倾向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第三次简政是在整风初步总结和参议会之后进行的，将简政重点放在整顿组织机构和工作领导上。这一次收效很大，远非前两次所能及。第四次是第三次的继续。中心在于改进领导，进一步贯彻简政。现在组织机构已大减缩，做到集中和统一。在肃清文牍主义方面，边区政府委员会发表的文告，1943 年 3 月比 1942 年同期减少了 60.8%，收到的文件减少了 28.58%，而且仍在继续减少中。简政和整风密切结合，是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一期整风的具体成果。经过这次简政，边区政府委员会本身得到了极大 的进步，基本上克服了头重脚轻，机关庞大，机构不灵，分工过细

等弊端。初步肃清了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作风，边区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3 年 6 月 1 日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现状和我党今后的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指出抗战还需准备 3 年。党应在此 3 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的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 1 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1943 年 6 月 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决定。决定指出，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方法，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决定号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在 1943 年的整风中，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个单位，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

责人具体地解决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

1943 年 6 月 2 日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师级干部进行整风问题给陈毅、饶漱石指示。指示利用各师长到军部这一机会稍许延长一点时间，对各师首长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在诚恳坦白正面的态度下，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增进领导干部的团结，并在思想上相互打通。

1943 年 6 月 2 日　刘少奇关于延安反特经验和华中准备反特斗争问题致陈毅、饶漱石电。毛泽东批示："此报转发彭德怀、邓小平、朱瑞、聂荣臻、程子华、林枫六同志照此办理"。电文说，过去延安组织部门及全国各地审查干部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所以不能发现内奸也不能发现真正好的干部。只有延安这一次才是深入的认真的审查了干部。1942 年整风开始时，特务分子即利用党内的自由主义乘机活动，他们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机关首长各学校的领导，他们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一切不坚定的党员来进行反党。当时中央对他们的活动适当地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让他们活动并从而侦察他们，因此暴露了许多特务分子的面目。到适当时机，中央就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强调党的领导之重要，纠正在整风运动中的偏向，团结了一切坚实的党员在各单位领导核心的周围，使反党分子孤立起来。又在整风中，令每个党员就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行动，写反省笔记，写详细的思想自传及自己的详细履历，配合各人的表现及侦察所得材料，加以研究，如是发现了大批可疑分子，并在整风及反省中

使最大多数党员在认识上党性上有了极大进步。在这以后，又号召了坦白运动及进行小广播调查，即号召干部党员向党报告自己一切隐瞒的秘密和所做过的违反党的利益的事情，以及别人的隐秘与反党的行动等，因而又发现了坏分子的很多材料。在发现嫌疑分子后，各单位负责人即详细研究这些人的材料，并进行详细调查与侦察。最后由负责人找他谈话，给以各种质问和保障。如是许多人就供出了他们为特务的真相及经过。党对特务分子的政策，只要特务分子诚意悔过说出他的罪恶及其关系人，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不究既往，仍分配他们做适当工作，并就其将来表现，考虑他们的党籍，给以希望和出路。电文指出，为避免内战时肃反的那种错误，中央提出这样的方针，指导这个运动：（一）由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并要首长亲自地动手去审查。（二）要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方法，切忌粗枝大叶主观臆断。（三）分清是非轻重，不得随意下结论。（四）争取失足者，即争取特务转变为党为革命服务，原则上不杀1人。（五）教育干部，即教育大批忠实干部党员学会侦察审讯，学会反特务斗争。除这五项外，在清查坏人中严格禁止打人骂人及一切变相的肉刑（如不许犯人睡觉等），不得指名指事问供，不得轻信口供（但不是不信）。电文强调，这种审查干部工作，在华中党政军民系统中将来也必须进行，否则即无法巩固自己。但绝不能允许粗心大意地进行反重复内战时期与湖西肃反的错误。因此你们现在必须认真进行准备，认真深入整风。要在各根据地成立整风训练班，由你们及各地首长亲自负责来指导，以便中心突破，获得经验，来指导全军全党整风。

1943年6月6日　毛泽东关于整风和审查干部问题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

有在后一时期（1943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专门对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写一次反省笔记，延安党校曾为此四条研究了两星期。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可在冬季)。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应在1944年上半年了。如能在1943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1944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抓住此关键。

1943年6月8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作出1943年度战士政治教育的决定。决定提出，1943年度战士政治教育的五大教育任务：（一）巩固和发扬生产热忱，保证开荒、锄草及秋收的顺利进行和完成，表扬劳动英雄事迹，反对懒汉思想行为；（二）保证整军任务与训练计划的完成，鼓励全体人员的学习热情和操作热情，严格军营生活、内务制度，养成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优良品格；（三）改善军民关系，深入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克服不尊重地方政府，不关心群众利益的有害行为；（四）克服战士的地方观念、迷信思想、享乐思想；（五）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严防敌伪的奸细活动，进一步巩固部队。

1943年6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央指出：（一）山东分局要利用扩大会议的机会对各地及高级干部进行短时期的整风学习，互相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按照整风文件来检讨每一个干部的思想与党性，并要每一个干部在小组会上反省自己，然后由大家加以批评，最后在扩大会上加以讨论，以便在严格的批评下来教育我们的高级干部，使他们回到各地后能有效的领导整风学习。（二）各地工作的检讨应集中在对敌斗争、提高生产及整风学习三个问题上，要仔细总结这三件工作在各地的经验，并布置今后如何进行这三件工作。在群众减租运动已经完成的地区，农会应集中注意来发动群众提高生产与办理合作社，农会工作应有必要的转变。政府在公粮政策上应规定：在农民提高生产之后，不再增加负担。

1943 年 6 月 18 日　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问题致陈毅、饶漱石电。刘少奇指出，在 1943 年生产中，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使政府和农会工作人员熟悉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的一切办法，以便于 1943 年冬能够定出 1944 年发展生产的实际计划。农会在减租之后，应以组织群众生产及办理合作社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政府亦应制订比较固定的公粮、税收政策，保证农民在增加生产之后，不再增加负担，增产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一切参议会及其他政府的会议，应以生产为主要内容，其他一切与人民关系很少的民主会议的形式少开，以便能动员群众的力量到生产上去。各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实行广泛的生产运动，以便增加自给的百分比，而不增加农民的负担。

1943 年 6 月 18 日　中央社会部颁布关于审讯工作的基本条例。条例指出，为了正确地进行审讯工作，分清案情的是非轻重，实行对犯人的感化争取方针，根据延安具体环境，特规定适用于延安的审讯工作基本条例。条例强调审查工作必须严禁肉刑及任何变相肉刑“车轮战”、假枪毙、假刑审、打骂污辱犯人的行为；审讯工作必须实行调查研究，注重证据，实事求是，实行与犯人

机关联系制度、3 人会审制度（一主审、二陪审）、三审制度（侦察审讯、正式审讯、重复审讯），允许犯人提反正，每一审讯口供，必须交该犯人亲阅，并签名划押；审讯工作的人员必须有奉公守法的精神，自觉的遵守审讯工作的一切条例与一切纪律，违犯严禁事项者，按其轻重给以处罚，并建立检查工作制度与总结工作制度等。

1943 年 6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关于华中目前应以整风为中心工作给陈毅、饶漱石指示。中央指出，在布置生产及夏收后，你们除应付战争情况外，应集中力量于整风，进行干部教育与审查干部，务必在 1943 年底至 1944 年春，能达到深入整风、改造干部思想、清查坏人与巩固内部之目的。为此，你们组织一切负责同志并你们自己，亲自参加与领导这个工作，这是你们目前的中心。

1943 年 6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山东内奸分子的指示。中央指出，抗战后打入我党的内奸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其中有些是受过训练有高等技术很老练的人，很不容易清查出来。需要首先从深入整风的思想斗争入手，进而检查各机关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再进而清查各个干部的历史与思想，号召对党坦白。这是一件极精细最负责任的工作，且需用很长的时间在坚强干部正确领导之下，团结积极分子，动员群众积极性来清查，才能收到效果，否则不仅坏分子清不出来，且将冤枉好人，引起混乱。因此你们决不要着急，以致草率或匆忙从事。

1943 年 6 月　三五九旅政治部发出关于建立军人合作社的指示。指示明确规定了军人合作社的宗旨和业务方针。

1943 年 6 月，晋察冀边区生产运动顺利开展。北岳区大兴水利建设，得良田 1.7 万亩。

1943 年 7 月 1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干部晚会庆祝党的 22 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党 22 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辉成绩作了报告。报告充满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对于光明的新中国的信心。毛泽东说，今天是纪念党的 22 周年和抗战的 6 周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就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德意日。过去，法西斯侵略者非常猖獗，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现在，法西斯侵略者已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到了盟国手里了。可以断定，过去我们所指出的光明前途，现在接近实现了。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 22 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世界作一比较，又把 22 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作一比较。他说，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就使我们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我们就知道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去，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去，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则是抗战的中国，人民觉悟到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防阵线来同法西斯作战，有了共产党，文化也进步了，我们常常把眼前的许多进步事情当作家常便饭，其实，比起从前来，乃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泽东说，不仅在抗战的问题上 6 年来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就 30 年前后的世界和中国来说也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景，那是翻天覆地的大进步。这种进步，是人类用自己的手造出来的。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向前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政策可分为全国的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两部分来说。关于全国的政策，党中央抗战 6 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四条向国民政府的建议，这就是“加强作战”、“加强团结”、

"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以后怎么办？我们希望和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毛泽东说，我国抗战，现在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是做了工作的，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都是。毛泽东把抗战6周年来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政策，分作两个时期来总结，第一个时期：是抗战开始后的4年半（到1941年底为止），第二个时期，是最近的一年半。第一个时期中，党的注意力放在下列问题上：如何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和友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进攻，如何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制定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劳动政策，"三三制"政策等等，这些都是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四年半的后一年半中，还曾被迫去对付反共分子所发动的两次大磨擦。在第二时期，即最近一年半中，除了继续执行上述各项政策以外，又进行了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毛泽东讲到整顿三风时说，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的纯洁。毛泽东强调，这些工作仍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借以保证抗战的胜利，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1943年7月1日　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各界举行"七一"庆祝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讲话。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珍贵党，负起保卫党的责任。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团结在党中央和领袖毛泽东周围，为完成战斗、生产、教育三大任务而努力"。

1943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在苏北某地召开干部大会纪念"七一"。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会上作报告。他指出今后华中任务是加强对敌伪斗争，巩固根据地；努力生产，保

证军民丰衣足食；对群众进行整风教育，对群众进行抗日民主教育；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1943年7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卓有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开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共产党员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1943年7月5日　朱德论密切同群众结合。他在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中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就是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

1943年7月5日　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在为纪念共产党22周年与抗战6周年发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

族解放的道路》中指出，在最近发动的整风运动，反对主现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以教育共产党人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要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象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工农布尔塞维主义。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22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1943年7月6日　刘少奇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他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提出，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22年来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呢？他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中国有许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实际上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那么，何者是假马

克思主义者呢？刘少奇说，那种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口头上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实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教条。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不拿经验与对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而拿书本来做根据。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从分析具体实际生活中去求得，而是从书本上、从历史相象上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里面去求得。他们言行不符，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愚弄他们。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他们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实践经验来审查自己每一步工作。他们言行一致，不仅说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如何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呢？刘少奇说，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必须从他们的实践中，从他们的工作中，从他们的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中，从他们工作结果的检查中，去识别这种人。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错误的。他强调，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领导，达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3年7月11日　中央总学委要求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在通知中说，为了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地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继续加紧清除奸细，中央总学委有以下的通知：（一）将中共“七七”宣言、朱总司令通电、托匪汉

奸张涤非假造民意的消息、解放日报7月9日社论、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在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团体的广大群众中，展开热烈深刻的讨论。讨论时间，一般的规定为一星期。讨论方法，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辩论、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灵活运用。（二）在讨论文件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反特务斗争上，提高干部与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针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地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要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及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三）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目前特别应注意下列工作：（甲）从思想上去瓦解敌人。拿国民党撤退河防进行内战

的具体行动，拿国民党33个将级军官的投敌叛国的事实，与欢迎日寇奸细吴开先到重庆并作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具体例子，打破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实质上是日寇的第五纵队。号召他们不要再为日寇第五纵队服务。告诉他们国民党区域内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等具体事实，打破他们以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说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国功绩，实行民主自由、丰衣足食的事实，使他们晓得不应破坏与不可战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在此紧急时机起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但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则将以军事时期的严励的办法处理之。（乙）加紧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学校、保卫部门的同志应写反特务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号召自首分子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日寇第五纵队的实质，反对国特破坏抗战团结、挑拨内战、杀害青年、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的罪恶，号召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丙）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丁）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地教育干部，达到10%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戊）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九条方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四）加紧警戒工作，严格地执行枪支登记制度与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各机关学校应立刻建立有名有实的自卫军，彻底检查过去机关自卫军的工作，纠正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一切办法，使自卫军真正成为保卫自己警戒敌人的组织，并适当地进行军事教育。（五）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

机关学校的首长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

1943年7月12日　毛泽东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致彭德怀并各中央分局电。毛泽东指出，蒋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观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殊不知自我实行：（一）整顿三风；（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审查干部这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故蒋、胡如真进攻，是有办法对付他们的。敌后亦请你抓紧此六大政策于1943、1944两年完成任务，在群众中所提经常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

1943年7月15日　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而掀起了“抢救运动”。运动中一些人盲目地大搞逼、供、信，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1943年7月26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加紧运盐工作。在指示中指出，目前锄草的紧张阶段已经过去，是组织群众运盐的最好时机，各地应把生产运动的重心由锄草转到运盐中去，把运盐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

1943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清查华北内奸分子给彭德怀指示。中央指出，从延安发现大批内奸的经验，推想暗藏在华北各根据地各机关及部队中的内奸分子一定不少，须注意审查。审查方法可将重要的嫌疑分子用调赴延安学习的名义调来延安审查，其他的可疑分子则由你们以集中整风的名义办训练班（或称党校），由整风学习进入清查工作，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

1943年7月30日　毛泽东关于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问题致彭德怀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电。毛泽东指出，敌后

整风，请督促务于1943年切实办完，以便从1944年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1944年一年办完。审查干部之方针为："甲、首长负责；乙、自己动手；丙、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戊、调查研究；己、分清是非轻重；庚、争取失足者；辛、培养干部；壬、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失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的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

1943年7月　朱德到南泥湾视察，兴奋地赋诗称赞。"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原来荒芜的南泥湾，这时被誉为"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8月2日　周恩来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他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10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他说，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

1943年8月2日　周恩来谈党的方向、路线、理想和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中的地位。他在延安欢迎会演说时指出，事实证明，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

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他正告反共分子说，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取死亡。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于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 80 万的党员，50 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他说，中国共产党 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他强调说，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1943 年 8 月 5 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

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通知说，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的观点，老党员中也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都有极端重大的意义。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日，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自 8 月 16 至 8 月 31 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通知规定在此期间以学习以下五个文件为中心：《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并参考《解放日报》7 月 1 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7 月 12 日社论《质问国民党》，7 月 27 日社论《论时局》及其他有关文章。

1943 年 8 月 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问题给冀察晋分局指示。中央指出，晋察冀应实行精兵简政。晋察冀现在只有 90 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 90 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边区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 8 万多人脱离

生产，这是决然不能持久的。中央指出，目前你们应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1武4。减去的3万人中，1万人西移，其余2万在本地安插。如果1944年更困难，再准备从5万中减1万。

1943年8月8日　毛泽东谈干部标准。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大 会并讲话。他指出，在党校学习的目的是要达到作干部的标准，要对无产阶级事业有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着重阐述了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号召全体同志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1943年8月12日　毛泽东关于执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方法问题至聂荣臻及冀察晋分局电。毛泽东指出，拥政爱民是红军历来的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即使执行得有成绩的地方仍须检查其缺点，使之更进步。恰是最近几年各地发生了严重偏向，军队轻视党政民欺压党政民之事不断发生。冀察晋亦不例外，你们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毛泽东强调，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勿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此种方法（特别是劳动互助方法）你区正须提倡。

1943年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

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决定还指出，各地整风须延长至1944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参杂着进行。

1943年8月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保存干部问题给邓小平及太行分局各同志指示。书记处指出，应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干部400至500人送延安学习，提拔中下级干部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

1943年8月18日　朱德论从实际出发。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1943年9月1日　中共苏北区盐阜地委决定重新进行整风学习。地委为响应中共中央与华中局继续进行整风学习的号召，决定重新开始整风学习。凡区级以上及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干部参加。此次整风目的，在改造全体干部思想，进一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时间为一年。

1943年9月6日　彭德怀论整风运动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的作用。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召集的地委会议行将结束时，在北方局党校作《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问题：（一）三大任务（战争、生产和教育）的统一领导与相互联系；（二）战争问题；（三）生产问题；（四）教育问题。他指

出，自从整顿三风运动开展以后，党有了一个飞跃的进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党，采取这样深入和全面展开的自我批评、相互帮助的自觉改造办法，是最有效果的。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关于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一个新发展。他提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意识，治病救人，并不是打击同志，斗争哪一个人。在领导整风的方式上，第一阶段，必须强调提倡民主（但必须注意，不能将这些批评向党外公布），这一阶段大致要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文件学习方面则是学风和文风。第二阶段，仍是继续学习学风和文风。在这一阶段内，要强调“四三”决定上所说的“注重领导”的一个方面，发动与组织积极分子，对错误思想反驳，着重发扬正确意见。这个阶段大约也要一个半月时间。第三阶段进入党风文件学习，也是整风学习深入时期。党风学完以后，每个同志可以写个自我鉴定，由小组再来讨论，指出每个同志在思想上、学习态度上、工作方法及作风上，各种正确与错误的两方面，将对的巩固起来，继续发展，不对的注意克服，避免重复。

1943 年 9 月 8 日　三五九旅召开团首长会议。会议检查各部练兵、布置秋收冬藏、扩大畜牧业进行情况。王震旅长总结时指出：采用变工进行秋收，1943 年再开秋荒 6000 亩；发展畜牧，1 人 1 羊，2 人 1 猪，10 人 1 牛。

1943 年 9 月 9 日　新华社报道一二九师生产自给情况。八路军一二九师直属队自给蔬菜 22.46 万斤。司令部生产的蔬菜以每人每天一斤半计算，可吃到 1944 年 6 月底。

1943 年 9 月 13 日　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旅长贺晋年谈该部生产自给情况。他在答记者问时说，三边部队生产粮食超

过上级规定的任务，蔬菜可供全年之需，伙食、服装、办公、杂支等费可自给，麻子榨的油可供半年食用。

1943 年 9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关于锄奸的群众路线问题给邓小平指示。中央指出，你们采取群众锄奸路线进行反特斗争，这是正确的。这种方式应与首长负责、调查研究、个别解决的精细工作密切的结合起来，普遍的运用到各个地方去。群众反奸大会的内容，不是内战时期的公审大会，而是动员群众反奸、号召特务悔过的坦白大会，不是为了枪决特务分子，而是为了感化争取特务分子。这一点必须使干部认识清楚。否则就会发生错误。应当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党的宽大政策，并且使群众从亲身经验中晓得只有采取宽大政策，才能使特务分子敢于向我悔过坦白。才能使反奸斗争，更深入彻底。

1943 年 9 月 21 日　晋冀鲁豫边区农林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生产部联合召开全区部队、机关生产扩大会议。八路军总后勤部长杨立三、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出席会议。会议至 24 日结束，邓小平作总结。他指出干部应学习农业知识，精确计划，以身作则。大会号召，1944 年 3 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自给。

1943 年 9 月 24 日　晋冀鲁豫边区举办农展会。边区政府农林局与八路军一二九师生产部联合举办农业展览会和全区机关生产扩大会，展出产品 1000 多种，提高了军民生产热情。28 日闭幕。秋，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军区二、六分区八路军开垦荒地 1.1 万亩。

1943 年 9 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等视察南泥湾。毛泽东看到战士们辛勤劳动的丰硕果实时高兴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他还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

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1943 年 9 月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与对敌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互相推动，互相发展。

1943 年 10 月 1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指示说，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 1943 年秋冬准备好 1944 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套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指示要求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同时批评了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1944 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

1943 年 10 月 1 日　毛泽东阐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十大政策。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说，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举其现实最切要

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毛泽东说，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于1943年冬，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一年的总结。同时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1943年10月5日　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驳斥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种种诬蔑，对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总结。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团结起来，警惕极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1943年10月9日　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反特斗争政策。他在对绥德反奸大会简报材料指示中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五、党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系统总结，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结合党的历史和路线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3 年 10 月 10 日　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在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

1943 年 10 月 10 日　陕甘宁边区进一步开展减租运动。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各地进一步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减租斗争。为此专门作出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

1943 年 10 月 11 日　乔木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二）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三）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1943 年 10 月 13 日　八路军开展 1943 年冬季大生产运动。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队集体上山开秋荒，准备1943年冬完成开荒总数的2/3。10月1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各首长参加生产。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参谋长及李大章、马锡五等亲自参加开荒种地，已经完成秋耕任务。

1943年10月19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发表。该报编者按语说："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通知说，《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1943年10月28日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首届生产展览会在马栏开幕。展览的品种繁多，规模甚大，充分反映了1943年度关中的生产成绩和边区的建设繁荣。

1943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在阶级教育中一般应达到的目的是：

（一）在事实方面，暴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特务机关之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是残酷的剥削、压迫和进攻，对敌伪是消极观战勾勾搭搭。其结果势必使许多部队走到投降。将这些事实和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政策对照起来。（二）在思想方面，在所有新党员、新干部（包括非党干部）进行彻底的人生观教育，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个人主义的以及所谓阶级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严格对立起来，不允许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含糊。（三）在前途方面，说明世界前途和中国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法西斯反共分子特务机关的。这种前途不是渺茫的前途，而是显然可见的前途。在群众中间，要继续宣传我们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是如果内战起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抗战和革命的胜利，灭亡的只是反动派。在干部中间更应指出：今天的形势是在我党历史上空前有利的，根本区别于大革命时期的内战时期。世界形势不同（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的革命高潮，苏联的无比强大和不孤立），中国形势不同（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对日战争仍在继续，同盟国反对中国内战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处于：对敌伪、对友邦、对中共、对人民、对内部的五大矛盾中；国民党在各种困难中的削弱），我党力量不同（有几十万武装和许多根据地，有了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特别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因此，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通知说，为了进行这一教育，应采取干部会议、小组讨论、群众大会、文字宣传、戏剧宣传、音乐、绘画种种方法。一切机关、部队和学校都应无例外地进行，并应根据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内容和方法。

1943 年 10 月 28 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总委员会发出

通知。通知说，人生观的教育，是建立新的思想的教育，必须深入具体细密地针对着每个不同的对象进行，改进过去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建立无产阶级的、为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而勇敢奋斗的革命人生观。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参加学习，普遍反省，改造自己的思想。通知要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要精读、研究、漫谈、讨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学习乔木同志《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报告。

1943 年 10 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出版。这本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的主要学习文件。《两条路线》包括了从党成立到 1943 年 22 年内党的重要的历史文献 137 篇。

1943 年 10 月　毛泽东提出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论合作社》讲话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之后，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1943 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毛泽东说，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办好。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

种不正确的“学说”。也只有这种为群众的学说，才能把生产搞得好。毛泽东说，愿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产。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是一种合作社，农村的集体互助劳动又是一种合作社，此外还有包含各种业务在内的综合性合作社，被称为运盐队的运输合作社，工人们集体互助的手工业合作社。把这许多样式的合作社都发展起来，全体公私群众就会变为富裕的了，在敌后各根据地的目前困难状况，也就能够克服了。

1943 年 11 月 5 日　毛泽东提出检查太行、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反特务斗争的问题。他指出，中央 8 月 15 日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指示是正确路线。特务分子一经坦白，立即释放。目前一年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对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不用公审大会，而用调查、研究、解释的方法把问题弄清楚。以极大的热忱，千方百计争取为我们服务。群众不了解这种宽大政策的作用时，应对群众作明确解释。过去北方局所作反特务指示，凡与中央方针不合者，应停止实行，而全部实行中央方针。

1943 年 11 月 6 日　陕甘宁边区军民系统的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陈列了西北局、边区抗联会、西北党校、文协等单位的展品。西北局收菜 26 万斤，有牲口 60 头。西北党校平均每人每天吃肉 3 两 6 钱。

1943 年 11 月 6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纪念晚会。会议庆祝十月革命 26 周年，庆祝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莫斯科会议的重大成就。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全国军民坚决拥护英美苏中四国宣言，制止依然存在着的内战危险，驱逐日本侵略者，使中国能以新的姿态参加新的国际合作。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显示了世界和中国的光明

前途，更加提高了全国军民的争取民族解放胜利的信心。

1943 年 11 月 7 日　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决定要求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地方与部队中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普遍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学习运动，并检讨本身过去对文艺工作的自由主义或认识不足等缺点。

1943 年 11 月 10 日　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他讲到整风的伟大意义时说，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是有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的不小的损害。邓小平希望每个同志有正确的整风态度。因此，他向参加本期整风的同志提出五点要求：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第二，每个同志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

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一个同志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苦闷时，要好好地帮助他；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

1943 年 11 月 13 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朱德题词："今后做到丰衣足食，明年做到建立丰衣足食的家务"。展览会体现中直、军直 1943 年一年内生产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种地 13000 多亩，收粮 1800 多石，蔬菜 539 万多斤，生产与节约总值 6.66 亿多元。超过 1943 年计划任务 6 倍。粮食自给 2 个月，其他已做到全部自给。减轻人民公粮负担 44410 石。

1943 年 11 月 13 日　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总学习委员会订出继续深入整风的计划。决定即日起到 11 月底，学完五大文献。12 月 1 日至 20 日，学风结合反省，清算思想中的主观主义。12 月 21 日起至 1944 年 2 月 10 日以前，学完整风文件，进行党风反省。2 月 11 日至月底，进行整风学习总结。成立了滕代远等 7 人组成的鉴定会。

1943 年 1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反特运动给华中局指示。指示指出，你们应立即在军部与二师师部附近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除开严格遵照中央清查特务九条方针的决定进

行外，你们应经过各机关、学校或农村中可靠的领导核心，用细密调查研究工作，清查几个特务分子，用宽大政策说服这几个特务分子；然后召集几百人、上千人的坦白大会，作为坦白示范。如此即可清查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并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指示强调，为了这个运动的成功，必须在大会上宣布党对于悔过的特务分子之宽大政策并须真实的执行宽大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必须逮捕起来的特务分子，一经坦白之后，立即释放。坦白分子的党籍及工作地位，除最机要的以外，一般不变动。在群众反特务的热情已经高度发动并清出大批特务之后，即需防止群众中的“左倾”及坏分子故意“左”倾，打人骂人，诬陷好人等，而给以适当的纠正，并需防止坦白分子的自杀。要在运动过程中及时地教育积极分子与群众，随时总结经验，写成教训，并需特别注意利用已经坦白的特务分子去劝说别人坦白，这可收到极大的效果。

1943 年 11 月 15 日　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某地召开直属部队机关学校活动分子大会。师长李先念在会上作整风动员报告，指出由于鄂豫皖抗日根据地地区辽阔，环境动荡，高级干部的整风更为重要，强调整风重点是县团级和县党委以上干部。会后，李先念亲自到抗大分校布置和推动整风学习。

1943 年 11 月 19 日　南泥湾驻军举行首届生产展览会。一个连种地 1722 亩，收粮 440 石，蔬菜 7 万斤，存草 23 万斤，喂猪、牛、羊 300 只。

1943 年 11 月 26 日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及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朱德、高岗、林伯渠、贺龙、续范亭在会上发表讲话。林伯渠在讲话中总结了 1943 年的生产成绩：开荒 100 万亩，增产细粮 16 万担，植棉 15 万亩，产盐 60 万驮，改造二流

子 4500 人。延安各机关生产达 20 万元，并宣布了 1944 年增产计划：增加细粮 20 万石，植棉 20 万亩。12 月 9 日，毛泽东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观后在西北局办公厅邀请 17 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毛泽东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以求得这些经验能成为指导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的方针。

1943 年 11 月 29 日　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讲演。他说，组织起来就是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要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他在谈到 1943 年大生产成绩时说，边区的军队，1943 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 18 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党员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

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毛泽东于 11 月 29 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会上的讲演和 10 月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不仅告诉我们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把群众组织起来）与办法（用合作社形式），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一倍，可以使穷苦变成富裕，可以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可以坚持长期的抗战，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大革命，而且告诉我们实现这个方针与办法的正确作风就是要有群众观点，要依靠群众，要与群众结合一起，不要沾染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就是只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东西，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与军阀主义作风。这种毛病，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因此，各根据地党委收到此讲词的广播后，应大量传播，并在党政军各级组织中，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

1943 年 12 月 1 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通知说，选录在这里的季米特洛夫、曼努意斯基等同志的几段文章，其总的精神就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这些文章虽然多数还是 1935 年写的，较近的也是 1939

年的，除了少数几段之外，也不是专为中国而写，但其反机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则至今仍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每个同志深切注意。季米特洛夫等同志在这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解决了统一战线是积极政策而非消极政策，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统一战线下右倾的增长与反右倾的必要，团结中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民族战争与民主民生的密切联系，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确路线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中央都曾从同样的革命立场达到同样的正确结论，但也曾有些同志从相反的立场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一面可以帮助同志们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一面也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那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怎样绝对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绝对背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从而加以彻底地克服。因在整风学习中有吸收国际经验之必要，故选录此文件以供研究。

1943 年 12 月 1 日　八路军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布关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深入进行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具体检讨与改善军队和政府人民的关系，达到党政军民密切团结。并发布拥政爱民公约草案。

1943 年 12 月 2 日　延安各剧团下乡。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为了具体实现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面的指示，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组织延安各剧团下乡工作。下乡的同志制定了几条纪律：（一）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二）对群众态度不要轻佻；（三）借群众的东西，要有借有还，损坏赔偿；（四）宿营不乱，行前打扫。

1943 年 12 月 3 日　邓小平关于华北各区的经济状况和注意积蓄物资问题致毛泽东、彭德怀电。电文说，最近太行区，因敌

人封锁，山货不能出口，影响物价飞涨。特别估计到1944年敌人的破坏，灾荒的继续性，深值警惕。1943年冬太行展开了生产运动，部队正努力实现自给3个月粮食的任务，人民种麦比抗战前还多，1943年秋季屯粮可余三五万担，估计1944年财政可勉强解决。如1944年麦收秋收较好，不受敌人大破坏，秋后景况当较1943年为好，但恢复元气，是不容易的。敌战区物资空前枯竭，不但粮食困难，油、盐、火柴等在敌占区亦极贵极缺。这也是我区物价飞涨的原因，这种情况今后只有严重。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料的积蓄。因此，建议由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给以具体任务，最好能逐渐转送一部到延安或华北，以备不时之需。否则将来华北一日大军云集，困难很多，至于华北各地，当仍从生产、精兵简政，求得自给，不能依靠他区帮助。12月1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邓小平电。电中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的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1943年12月10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拥政爱民拥军运动的指示。中央指出，1944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1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年的习惯。应规定1944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各地各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及政治部，对自己根据地内及自己部队内应迅即进行动员的准备工作，此项准备工作应是考虑周密的而不是草率应付的。

1943年12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宣言中说，在毛主席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下，

1943年一年全边区开了100万亩荒地，多打了16万石细粮，安置了8000户移难民，改造了4500个二流子，种了15万亩棉花，打了60万驮盐，运输牲口比1942年增加了十五六倍，办了许多像南区合作社一样的群众合作社；咱们的部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自己生产，结果有的做到了部分自给，有的已经做到完全自给，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机关、学校也自己生产，自给由26%到76%。工厂自己制造了许多日用必需品。全边区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做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像这样美满快乐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热火朝天，大家动手的群众生产运动，我们从来没听到过。这是哪里得来的呢？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边区人民努力劳动的结果。

1943年12月20日　北方局提出1943年年终总结工作要点。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各单位进行总结生产、深入整风及进行时事教育、阶级教育、拥政爱民等工作。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关于生产、贸易等问题致邓小平、滕代远、杨秀峰电。电文主要内容：（一）边区生产运动已普遍展开，农业（牲畜、粮、棉）手工业特别是毛棉织物均有显著增加，变工、扎工、劳动英雄起组织增产的重大作用。在贸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经济上已开始建立了自给基础，惟财政开支过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币仍低于法币，中央已注意调节开支中，此间不需太行物品帮助。（二）太行贸易局从天津购之破毛机，希望送一架至延安翻造，这将帮助边区及晋西北毛呢之大发展。（三）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必须用一切办法开发冀南及南涉、清丰一带之小盐，经过群众及伪组织关系运太行政府并须确实掌握

调剂市场，稳定物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须物资入口（主要是盐），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锁，胡麻是敌必需品，封锁与敌不利，目前封锁是表面现象，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

1943年12月25日　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新旧年关的宣传要点。要点指出，中央10月1日关于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各根据地内长期适用的方针，各地应联系实际编成通俗课本，并经过一切学校、报纸、剧团，有系统地宣传之。在新年期间，应特别集中于生产运动与拥军拥政爱民两项。关于生产运动，除10月1日指示所说外，新华社已先后播出毛泽东同志新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与《组织起来》的讲演，各地应设法翻印之，最近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与劳动英雄会的材料，亦在陆续播出，这些材料，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务须认真研究，根据其原则，作出适合于前方战争条件的计划，并召集必要干部会，训练班，加以讨论传达，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准备1944年来一个大规模的群众生产运动，克服军民双方的困难。在拥军拥政爱民方面，则须总结一年来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党关系、军队内部各种关系中的症结，除在旧历年的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中，以联欢、座谈、慰劳、道歉、赔偿等种种形式予以改善外，尤需着重思想上真正有彻底的认识，并纠正部队干部中的军阀主义倾向，更为全部运动的中心关键。为此目的，中央决定将毛泽东同志1929年12日在闽西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全文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望各地收到时在高级干部，特别是在部队干部中，深入讨论，展开自我批评。

1943年12月26日　《解放日报》论述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方针。在发表的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

中指出，这个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方针，经过一年实践之后，又在这次劳动英雄大会上完全证明其为唯一的正确方针。其次，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明显地显示出劳动群众的真正智慧和创造能力。我们的世界和它的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我们发展生产，如果离开广大群众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领导生产，必须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变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比任何时候更加证明其正确了。

1943 年 12 月 26 日　中共太行区党委发出关于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必须使拥军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成为广大人民和全体战士的一种思想教育运动，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思想上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1943 年 12 月 28 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中央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刻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 100 人至 200 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943 年 12 月 30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北岳区高干会问题给北岳分局指示。中央要求在即将召开的北岳区高干会上，应把坚持敌后长期斗争的一些思想和方针问题作深入的讨论，求得在对敌斗争、生产运动、整风学习、审查干部、党政军民关系、肃清各种不正确倾向等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和方针，只有高级干部

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完全一致，才能使工作获得更大的进展。

1943年底　八路军一二〇师“友爱”部总结1943年生产成绩。计种粮食19736亩，收细粮1760石；种菜地1870亩，收蔬菜176.5万斤；种麻子3860亩，榨1700斤油。农业生产总值共2370万元，该部达到了丰衣足食。

1943年底　陕甘宁边区总结1943年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边区一年来更有计划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畜牧业和工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边区组织了46%的农民实行变工、扎工之类的集体互助劳动，耕地增加到1443万亩，比1936年增加77.4%。细粮增产16万石，使粮食自给有余。棉花生产100万斤。牛22万多头，驴18万多头，羊190多万只。合作社兼办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事事为群众谋福利。纺织业有28个厂，被服业有12个厂，造纸有11个厂，化工有11个厂，木工有8个厂，印刷4个厂，煤炭18个厂，加上其他机械、农具、制铁等厂，共101个厂。

1944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号召军民加强团结。在发出的向敌后军民贺电中说，六年半的教训，使你们知道取得一切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团结，首先是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亲，在抗战中间，不但为人民抵抗敌人的进攻，而且掩护人民的耕种收获，帮助人民的转移和恢复被破坏的家园，尽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据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给军队的食粮，积极参加抗战的勤务，自动进行侦察和掩护工作，普遍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因此，你们的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但是困难既然继续增加，你们的团结也就需要格外增强。

1944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新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朱德在晚会上作《展开拥政爱民运动》的讲话。他要求全党全军在新的一年里，要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更好地学会团结群众的本领，深入广泛地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一）在内部进行深入的拥政爱民教育，使群众观点深植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二）竭力想一切办法来节省兵力，解决人民的困难，尽力发展部队的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三）使拥政爱民成为全军的运动。（四）把团结群众、拥政爱民工作的好坏，定为检查工作、考核成绩的标准之一，而一切都是为了战胜敌人。

1944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1944年整风与审干的要求。在发布的关于1944年的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务须于1944年内争取早期完成。各地必须利用战争与生产的一切空隙，完成整风运动，应尽可能采用大部分干部进行整风，少数同志坚持工作的办法进行，半日学习制是很难完成的。应在整风过程中同时进行了解审查干部的工作，把文件中的反省与坦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不一定要在整风完结之后才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

1944年1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词《迎接1944年——纳粹覆亡的一年》。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批反动派纵容法西斯，反对共产党，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反对不得的，法西斯是纵容不得的。国际形势对我国抗战有利，但抗战的难关并未过去，投降危险与内战危险并未完结，加以战争连年，天灾威胁，因此1944年将是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后一年，但也许将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我们必须精神上对最坏的环境有充分的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始能取得新的成绩。

1943年1月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关于拥政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为了使边区党政军民更加打成一片，以迎接1944年的生产运动和防奸自卫运动，必须在1944年春节期间，普遍地、更大规模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及拥军的群众运动，不论军队或党政方面，都不能因已有的一些成绩就自满起来，都必须再三再四地深刻检讨自己在这一方面尚存在的缺点错误，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不批评对方）。并于今后坚决彻底改正之。（二）1944年的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不仅要普遍地实行，而且要使之更加深入，就是要更加成为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

1944年1月7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的《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讲演中说，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毛泽东指出，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我们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收效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的这一种办法。在农村，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为了提高生产兴趣与生产力，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

与组织互助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互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毛泽东说，一切部队、机关，于战斗、训练与工作的间隙，一律参加生产。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自己的家务。但须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方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毛泽东指出，边区及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功夫，才能完全学会全部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与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完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日本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944年1月9日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信。信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4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央指出坚持长期斗争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极大地注意发展军民生产及节用民间物力，在长期战争负担与敌人三光政策破坏下，劳动力日形减少，某些地区熟荒增加，生产力大大地下降的情形之下，组织全体部队、机关及全体人民开展生产运动，以便增加人民生产及减轻人民负担（你们那里人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觉得关于发展公私

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农业生产，在党内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也就抓得不紧，对群众农业生产还只限于个别问题的解决和注意以及军队帮助群众生产的方面，尚未有全盘地、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劳动力去进行生产运动。部队与机关还缺乏把生产当做自己一种极端重大任务的认识，因之就未能创造许多可能进行生产的办法，求得从生产收获中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同时减少人民的负担（据说有些战士因吃不饱发生不满），刺激和影响人民的生产热情。希望这次会议对于展开生产运动问题，着重地加以检讨，并根据毛主席《组织起来》所提示的方针，按照晋察冀实际情形具体布置 1944 年公私的生产运动。要坚持敌后长期斗争，必须更加依靠群众，在一切政策的决定与实施中都必须经常具有坚强的群众观点。要克服地方干部中只知向群众要东西，而不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的作风，这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缺乏明确尖锐的向干部提出此项任务及组织此项任务的实行。你们这次会上必须对此加以检讨，并经常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倾向。在军民关系上，拥政爱民观念在许多军队干部中还很不够，军队侵犯群众利益的军阀主义现象还是存在的。这些现象虽因战争环境，群众不多提出抗议而且时常加以原谅，但我们自己必须揭发纠正，并经常注意防止军阀主义倾向，使军民关系更加改进。今后军队要恢复苏维埃运动前期红军做群众工作传统，把群众工作看成自己经常的一个任务（作战、生产、做群众工作，应成为军队的三大任务）。在整风学习问题上，我们觉得成绩还不够，首先是没有正确认识到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我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思想上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

个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在整风学习中对此种认识的不够，因此过去你们那里的整风学习，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没有更好地进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把学习文件看成为一般学习，或者是偏重于业务整饬，而未把整风的重点放在干部的思想改造上，这种思想改造，又必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联系起来。每个干部，特别是犯过某些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工作经过深刻的反省，才会获得整风的成效。我们希望这次干部扩大会也像陕甘宁边区党1942年高干会一样，能够成为一次整风会议，把你们区域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运用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适当的揭发和检讨，求得在各种问题上一致的认识。这对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深入和更加发展以及整风运动的深入将起重要作用。上述各项问题，必须敢于放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要防止过火斗争，把一切问题都提到思想认识上去，从思想根源上弄清这些问题，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破坏团结，反而可以巩固领导、巩固团结。

1944年1月11日　邓小平论战争、生产、教育三者的关系。在《群众》杂志第9卷第1期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文章对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作了介绍，并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可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服务，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4年1月24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中央指出：（一）对于

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的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职业特务。第二类是变节分子。第三类是党派问题。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的蒙蔽分子。第五类是党内错误。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以上六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地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地担保党籍，因为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的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1944 年 1 月 25 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生产运动总结会议。会上李富春作了《更向前一步》的报告。报告对于 1943 年的生产运动作了基本总结，提出了 1944 年的生产任务是“巩固革命家务，提高自给能力，保障丰衣足食。”要完成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必须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实行各单位“公共生产与个人生产并

重”的方针。

1944 年 1 月　毛泽东关于在反特斗争中少捉少杀少捉不杀方针致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五师、山东分局电。毛泽东指出，反特斗争必须坚持少捉 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 5%，此点需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 1944 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

1944 年 1 月　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作为军队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全军的教材。决定指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立场方法和基本内容至今仍完全适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指出当时红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也即是军阀主义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各种表现，不但对当时红军是根本问题，对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根本问题。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故当时规定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我们的军队是人民所拥护的全国最好的军队，比 1929 年时有了极大的进步，但近年在军队和党政关系、军队与人民关系、官长与士兵关系、下级与上级关系、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军队与军队关系方面，都还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主要地是有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倾向，需要我们的

军事工作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在整风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加以深切的检讨与纠正，而这个文件却是处处从群众出发，处处为人民群众与士兵群众着想的，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供给了一件有力的武器。我们军队的政治教育，许多年来没有宣传这个文件，在宣传时又没有用以展开自我批评，以至重犯许多为这个文件所早以解决了的错误，这是一个损失。现在中央决定把这个文件稍加删节重新广播印发，并规定为军队干部整风文件与全军的教材，望各地收到时加以注意。

1944年2月2日　中共中央指示敌后必须战斗与生产结合。中央强调敌后解放区，必须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开展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3月2日，《解放日报》论战斗与生产结合是敌后军民道路。在社论《敌后军民的道路——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中指出，把战争与生产结合起来，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就是敌后军民的方向。在太行区武乡蟠龙线上，群众发明了“游击生产”的方法，即“敌人赶一赶，我退一退，你在前面打枪，我种后面的地，你到老巢内去了，我再种前面的地”；“握紧锄头，拿紧枪，赶快干一场，田庄是战场”。敌后军民只要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就能使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完全归于失败。

1944年2月4日　山东地区提出1944年生产节约要求。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及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出联合通知，提出1944年生产节约要求：（一）部队应节约经费20%至50%。（二）部队生产节约十天至半个月的粮食；（二）部队生产节约十天至半个月的粮食；政府机关及群众团体生产节约五至十天的粮食。（三）每人节约一件物品。奖励模范节约者。

1944年2月5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加强军民、

官兵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发出的对一一五师政工会议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的注意。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道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地从干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彻到全部议程中去。我们军队的特点，不但要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而且要会生产，这是中国革命特殊条件尤其目前敌后条件所决定的任务。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念，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我们部队中的官兵关系还不能说是很好的，今后要作到如家人父子一样亲密。应强调干部与战士真正生活打成一片，艰苦与共，那种只要求于战士而不关心战士生活，或只注意自己生活的现象，必须严厉纠正。在管理部队方法上，尽量运用友爱感情的力量与模范的作用。在部队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上（如伙食管理、文化娱乐等），应尽量多给战士以民主，多倾听与尊重他们的意见，这对于集中，不仅不会妨碍，而且可增进战士的自觉性。连队政治工作必须改变今天所表现的脱离群众、软弱无力的状态，要真正使我们的连队政治工作做到抓紧战士的心，能实际为战士解决问题。指导员应依靠

教育说服方式做到与战士经常在一起，多做个别谈话、漫谈、长谈、深谈，更重要的不只在讲而在实做（如作战、生产、群众工作等），过去连队政治工作中许多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必须彻底予以革除，代之以真正从实际出发，为群众所需要，对工作真有效果的作法。

1944年2月7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检查拥政爱民及拥军优抗的工作。中央在指示中指出，（一）党政发动民众拥军，应多注意于切实解决优抗、归队、帮助部队解决困难及精神上、政治上对部队多给亲切的热烈的鼓励，不只在多送东西。（二）在拥政爱民工作中，要深入关心革命军队本身的教育。（三）在部队进行群众访问、纪律检查、损坏赔偿时，除自己直接访问外，还可通过党政军民众团体去了解，才能使这种访问不是形式的。

1944年2月8日　中共中央转发陕甘宁边区各旅进行拥政爱民工作的办法。他们开展的办法是：（一）开反省会，反省一年来的拥政爱民工作，从思想上克服各种错误观点。（二）从下而上从内而外从部队到群众，进行纪律大检查。损害了群众利益一定要赔偿道歉，过去未得到解决的悬案，都要解决。借用群众的东西要实行调剂，保证群众过年不缺家具用。（三）在阴历年节军队本身开拥政爱民大会并决定：第一，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唱会拥政爱民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二，开军民联欢会。第三，在不妨碍整训原则下，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杀猪、宰羊、拜年，请吃饭等。（四）将反省结果编成教材，作为战士的政治课目。（五）进行拥政爱民的普遍宣传工作，如秧歌队、化装宣传等。

1944年2月　党务广播介绍华中整风经验。他们在整风领导上的主要经验是：（一）党委团结与负责，表现模范作用，有决定意义。（二）要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如健全的学习分会机构；一定

数量忠实可靠骨干的选择和训练；选出一定数量有初步材料的典型；骨干和典型的适当配备。（三）要作初步思想准备。如根据具体对象，从22个文件中选择一定的基本文件；开始在分读精读文件时，应强调民主，与强调一定条件下的思想放任。（四）有计划培养和教育骨干，与不断收集和研究典型，是整风阶段工作的核心。（五）正确组织思想反省，是启发政治反省的最有效方法。其次，不同环境（地区）与不同对象（干部）的整风采取各不相同的组织形式与学习内容，即采取在统一任务下，适合个别特点，分别进行的方针。

1944年3月5日　毛泽东、康生、彭德怀等关于审干反特问题致黎玉、肖华电。电文说，鉴于过去湘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外尚未完全消除，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有准备、有步聚地慎重进行。1944年不要普遍进行，只在分局附近开始进行，俟取得全部经验，再行扩广；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亲自参加，取得经验。对坦白大会要更慎重有准备地使用。

1944年3月7日　贺龙在《解放日报》发表《为完成十万石细粮而斗争》一文。他要求部队生产不仅要够用，而且要有积蓄；不仅要解决部队供给，而且要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的财政支出。他号召边区部队要更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完成收获十万石细粮的任务。

1944年3月9日　中共中央关于群众防奸运动发动以后，注意防止和纠正各种“左”倾错误问题给饶漱石指示。中央指出，根据延安经验，当我们同志和群众没有看见特务以前，总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但当他们一看见具体特务及群众的坦白运动发动

以后，即以为到处都是特务，不合事实地夸大特务活动与特务组织，因而引起反特斗争的狂热，随便给人戴上特务帽子并在下层常常发生逼供信的错误，以至使用捆绑吊打等肉刑。因此在群众的防奸运动发动以后，领导机关必须注意防止与纠正“左”倾错误。你处坦白运动已达全面突破阶段，应即根据运动中各种“左”倾毛病在领导骨干中详加说明，引起他们注意并及时进行检查工作，纠正偏向，无论如何不能让逼供信的错误现象发展。但在运动还没有发动的地方，还不要反对“左”倾错误。（二）坦白运动进行到适当的程度，应即停止坦白大会的举行，而集中注意于研究坦白分子的材料，辨别其真伪与可信的程度，坦白大会不可开得过多。（三）此时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95%不要捉）的方针，并注意防止自杀事件。

1944 年 3 月 10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赞八路军。他对《解放日报》记者称：“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只有八路军除了打仗之外，还要进行生产，自给自足，还帮助农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

1944 年 3 月 10 日　林伯渠个人生产节约计划。重庆《新华日报》登载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一）生产三担细粮交公；（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 1 月 25 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完全自给。

1944 年 3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群众生产问题给华中局指示。中央指出，春耕已到，你们应动员广大人民，一切男女老幼赶上生产战场，各级地方干部专员、县长、乡长等，均应亲自下乡，精细地去指导与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产，解决人民生产中的困难，发动群众高度的生产热潮。除此之外，关于部队

机关学校的生产，亦应加以切实的动员和组织，在不妨碍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造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华中的财政并不怎样困难，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农业手工业生产所得，应一律用以改善各该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的生活，公家发给他们的经费照常发给，不予扣除。在开始时，公家并应贷予各部队、机关、学校一笔生产基金，哪个单位生产很好，哪个单位的生活就可提高，让各单位的生活水平高低不一样，以刺激各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并应特别注意改善战士杂务人员及工作人员的伙食，增加肉食，训练伙夫，使饭菜做得适合营养的程度，以便保持健康，增强体力，减少疾病。一切浪费是应该反对的，但对于部队、机关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不应该再去号召节省，再去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各部队、机关、学校的首长，均应亲自计划与组织生产，务使1944年生产能获得显著成绩，则其他困难亦将比较容易解决。

1944年3月17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总支书记和分支书记联席会议。李富春代表中直党委对机关群众工作问题作了指示。他指出，机关群众工作，在整风以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机关干部和一般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整个机关和老百姓的关系。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不仅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要在目前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提出这个问题。要走出机关，面向群众，这是机关工作的同志的方向。整个机关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轮流去做群众工作，不仅在精神上去接近群众，而且要在物质上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个人要订出和群众联系的计划，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和群众交朋友，研究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村庄，了解他们的情况，了解工

作中的缺点，反映到机关中来，打破“孤立主义”现象。长期的或短期的帮助机关附近的群众。要在半个月内，把机关附近群众的情况调查清楚。关于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的结合，李富春提出了如下办法：（一）了解下层情况，打破首长界限，从“办公事”的方式中跳出来。（二）帮助机关一般群众学习文化。有些负责同志给公务人员上课。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必须放下架子，丢掉公事公办的作风，用灵活生动的方式去进行。（三）把本机关的生产的供给的单位和政治的军事的研究的单位，建立互相帮助的联系制度。（四）帮助建立工农通讯员。

1944 年 3 月 24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通过该局关于 1943 年工作基本总结暨 1944 年工作基本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 1944 年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第一个任务是发展生产，在 1944 年生产成绩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组织与发展人民及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在组织起来与深耕细作的两个基本口号下，人民生产任务要争取耕三余一两年完成，并帮助抗属及退伍军人发展生产建立家务。机关部队生产任务要从部分自给向大部及全部自给发展，并把厉行节约和丰衣足食配合起来，以达自卫备荒的目的。动员全党干部研究和学习如何在经济战线上与敌人做持久复杂的斗争。第二个任务是军事建设。在军事建设上首先是加强部队工作，部队工作应抓住彻底转变政治工作这个中心环子，继续推行生产、训练、防奸及拥政爱民，更加改善战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巩固部队，更加改善官兵关系及军民关系，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真正实行精兵主义。第三个任务是继续审查干部和深入防奸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切实纠正各种“左”的偏向。第四个任务是增加干部战士及人民教育，首先应加强在职干部教育，高级干部应继续加强对党的历史及理论的学习，中级干部应加强

对党的政策学习，低级干部应注重文化学习，干部教育学校应彻底加以改造，国民教育学校，亦应逐渐求得改善。第五个任务是加强统一 战线工作，边区党政军应团结这些非党人士在自己周围，特别是各级政权应注意团结非党人士。

1944 年 4 月 4 日　《解放日报》号召陕甘宁边区 1944 年实现经济上完全自给。在发表的社论《为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自足而奋斗》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44 年只征公粮 16 万石，比 1943 年少征 2 万石，比 1942 年少征 4 万石。要把边区经济搞得更好，1944 年除了要在粮食方面做到丰足有余，要继续产盐运盐以交换日用必需品以外，还要大大发展边区人民必需品的生产，以便在短时间内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自足，达到出入口的平衡以至出超。这样，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将更稳定，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安定。

1944 年 4 月 11 日　谭政代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做《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谭政说，1943 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根据 1943 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

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伍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意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有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称："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1941 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 10 多个，其中计有营长 2 名，政教 2 名，连长 2 名，政指 2 名，卫生队长 1 名，民运干事 1 名。但在 1942 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的更多的人，并且情况也不一定会变好。但在 1943 年，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等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也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的。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

1944 年 4 月 12 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

和时局》的讲演。他对于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党史中的两条路线过程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结论；对党在抗日时期的历史作了基本总结。在这个讲演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预见到中国人民已经有可能由取得乡村的胜利进到取得城市的胜利；已经有可能由取得各个根据地的胜利到取得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并进到取得全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获得和巩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避免骄傲和努力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毛泽东这个讲话，是延安整风运动总结性的文件之一。

1944 年 4 月 26 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报告。他说，这次学习，对于过去的两条路线都有了认识，知道是有着两条路线存在的，但对两条路线认识的深度，相差程度是很大的。关于学习方法问题，李富春指出：（一）路线问题的学习，应注重于思想政治问题。（二）学习应采取启发式的，而不是灌输式的。（三）学习应多照顾核心。过去的办法对核心照顾的不够，核心多用大力领导人家，放松了自己。

1944 年 4 月　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 1943 年边区财政工作的估计和 1944 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报告。报告内容分四大部分：（一）1943 年财经工作的估计；（二）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三）金融贸易财政政策上的基本方针；（四）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因此，必须全党都来注意这一工作，才能把当前任务的中心环节——经济建设工作搞好。

1944 年 4 月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

定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全边区的对外贸易。

1944年5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社论说，随着简政工作的实施，政府的领导方式与作风，也得到了改进：第一，是领导一元化的加强，各系统的林立与平分秋色的倾向，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同类机关合并了。第二，提高了各级政府独立工作能力，适当扩大了专署县府的权限，划清了各级职责。相当减少了上层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第三，提高了领导质量，增大了工作效率。且树立了朴实与艰苦的作风。第四，加强了干部劳动观念。第五，树立了干部群众观点，更加强了深入下层，深入群众，对克服政府中的官僚主义，收到了很大效果。

1944年5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反特斗争中纠正过左及逼供信的指示。中央指出，逼供信“左”的错误在各地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如果不彻底纠正，便会冤枉同志，孤立自己，不仅不能有效反对特务，反会在党内造成混乱现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使党遭受重大损失。逼供信错误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某些机关、学校、部队、农村，也严重地发生过。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深入，不了解特务暗藏在我党我军的组织内是极少数，不知将反对特务与保护好人统一起来，不重调查研究，不重证据，只凭口供，不精细地进行个别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而到处采用抢救运动的简单方式，不相信最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而有的地方对他们存在着宗派主义报复主义的倾向等等。中央指出反对逼供信错误，各地注意如下问题：（一）应清楚认识，任何地方只要群众反奸运动坦白运动开展起来，逼供信的“左”的毛病就会随之而来，绝不要以为自己那里不会产生逼供信错误，应该肯定这种偏向在各地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

此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彻底检查，实事求是地采取有效的方法，坚决地克服逼供信“左”的错误，并在工作中时时注意防止，稍一放松，就会出乱子。（二）在已经进行过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反奸运动的地区，应适当地将突破工作坦白大会暂时停止，使干部的脑子冷静一下，深刻地检讨工作经验，进行甄别工作。同时教育干部了解一个人如不是特务而戴上一个特务帽子，对他精神上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长期不能恢复，个别人还可能走上仇恨党的道路。因此，没有真凭实据的人，绝不能肯定他一定是特务，一些弄错的受冤枉的人，必须加以平反，去掉特务帽子，恢复他的名誉、地位和工作，而且在群众中公布。（三）在斗争刚刚开始的地方，干部必须深刻地了解和掌握中央的方针，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正确地估计敌人力量，相信自己的干部，注意调查研究，依靠真凭实据，千万不能轻信口供，即使许多人的口供大致相同，也不要信以为实。当群众性的坦白运动起来时，要使干部懂得坦白运动中的群众压力，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的。在群众威力下，即使不打骂不逼不斗，都可能使青年人在沉重的神经战刺激下自己戴上特务帽子。因此群众性的坦白大会必须慎重使用，而坦白运动大会的方式，不要采取抢救运动的方式，不要采取尖锐斗争反特务的方式，而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坦白生活的，道德的，工作的，思想的，政治的，党派的，特务的各种问题。不但反省自己也允许批评别人，批评上级，对上级的正确批评，领导人要诚恳接受，不能给以打击，不正确批评，也不忙于纠正，在适当的时期加以教育解释。即使坦白出特务问题，如果没有确定证据，或有证据而无紧急处理之必要时，亦可暂时不加深追，这样便于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便于启发坦白人的自觉

性，便于解释宽大政策，进行争取工作，不致造成对立形势，使坦白者容易向党靠拢，容易弄清是非，弄清问题。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

1944年5月20日　刘少奇论办好根据地的工业。他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最近几年搞起来一件新东西，这就是工业。工业这个东西，有它极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我们现在则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向前发展。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作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在学习中，无论什么人，一定要放下“包袱”，去掉骄傲，才能够学好。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应该是：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产品不可因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每个人办事的职责应该分明。

（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的召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

1944年5月2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于1945年4月20日闭幕。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一时期党的历史经验，研究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以及党的工作重心今后由农村转入城市有关的准备问题等等问题。1945年4月20日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正式作出结论，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

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使全党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国情，正确地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的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求到一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次会议和通过的决议，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这次会议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卓有成效的基础上召开的，决议是对整风运动丰硕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极大的发扬，不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很大的克服。延安整风运动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议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决议阐发了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1944 年 5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党校大礼堂为参加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职工举行招待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用中国工业化的技术和知识发展工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说，我们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陕甘宁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 700 个产业工人，1942 年有了 4000 人，到了 1944 年就有 12000 个工人，所以陕甘宁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是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

布的自给和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全部工业品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要大大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向着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向这方面努力。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共产党员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打击了85%的敌军，90%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1944年5月24日　延安大学在陕甘宁边区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延安大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延安大学所要学的，要学这一套，要做这一套。在政治上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党的各种政策和工作方

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要使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 31 万匹布，470 万斤铁。还有文化建设，要使陕甘宁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 1000 个字，要提倡讲卫生，要使陕甘宁边区 1000 多个乡每乡设立 1 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扭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一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毛泽东叮咛大家：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象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它是永远挂在空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我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朱德也讲了话，他指出延安大学这次开学是重新开始，重新教育，重新学习。他号召大家好好学习当前实际，学习毛主席的政策，把学和用联系起来。要自己动手，要参加生产工作，在生产中学习。学工科的和工厂结合，学农科的和农场结合。会上，周扬报告了办延安大学的意义和今后的教育方针，指出延安大学的成立，一方面是适应近年来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整风在教育工作者思想上清算了教条主义以后陕甘宁边区教育具体的改进。今后延安大学教育在学制和课程各方面都要切实做到为边区人民服务。延安大学今后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学和用的一致，和边区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

1944 年 5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中党的任务的指示。中央要求各师主要负责同志，除开检查各地区的工作及对于中央十大政策执行情形并交换经验外，应特别注意领导作风的检

讨与改善。为了打通思想，应以整风精神，使各同志进行反省，发展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纠正缺点，增进团结。为了要打通思想，进行反省，首先就要使同志放下自己背上的包袱。许多同志由于自己没有犯过错误，或资格很老，工作有成绩，地位很高，打了胜仗，有了经验等等，也可以成为负担。甚至只因年轻，或为工农出身，或在学校毕业等，也可以成为负担，而看不起老年者。各种可能的包袱，常使许多同志骄傲自满，妨害进步。必须放下一切包袱，才能畅快地进行反省，学习进步，打通思想。现在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在政治上、组织上虽然已不存在，但盲目的山头主义仍是严重存在着。不独过去一、二、四方面军及苏区、白区的许多干部之间至今仍存在很多隔膜，就是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的干部，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干部之间，也存在很多隔膜。在一些大山头之中，又存在许多小山头的界线，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又存在许多界线。这些来自各种不同山头的干部相互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标准去观察与测量对方，只看见对方的弱点，而看不见对方的优点；只许自己批评对方，而不许对方说自己的短处；只觉得对方对自己不起，对自己照顾不足，而不觉得自己对对方不起，对对方帮助照顾不足。在生活上各个山头干部亦互相表现特殊，对自己的人有说有笑，无甚不谈，而对其他山头干部则置之不理，格格不入。一般是当权的有势的山头干部，盛气凌人地欺压其他山头干部。军队干部欺压地方党政民干部。不论干部的升降、奖罚，人员、部队的待遇处理，都不自觉的有所偏袒，分出亲疏，因而在干部中造成许多不公不满之事，极大妨害党与部队的团结。希望你们在整风中提出这个问题，进行反省与批评。这是目前增强团结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944 年 6 月 7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

知。通知指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众，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复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如此。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 月 21 日，毛泽东给郭沫若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4 年 6 月 14 日　延安各界人民 4 万余人举行庆祝联合国和保卫西北动员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他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指出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各路盟军的伟大胜利，是各国人民坚持团结、民主、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是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胜利的新阶段。朱德回顾国内战况时指出，中原战役和湘鄂战役失利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反共的军事行动，不实行民主，使得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力量未被发动起来，形成军队和人民的对立。这种情况如不彻底改变，中国不但无力反攻，要想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朱德指出，情况虽然严重，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坚决相信目前局面是有办法改善的，中国抗战必然会胜利。朱德声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一切共产党员将坚持团结，坚持保卫祖国的战争，坚持联合盟邦，配合打击法西斯的方针。

1944 年 6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晋察冀分局扩大干部会

的指示。中央指出：（一）分局扩大干部会关于党内两条路线问题，可依中央12月28日指示作一个通知，但不必展开讨论，王明、博古名字亦不要写在任何文件上。（二）关于边区问题，可依据中央1月8日书面指示进行检讨，并与毛主席在延安关于学习与时局问题报告及中央5月28日致华中局电联系起来。应着重使到会各同志进行自我反省与打通思想，以便使到会干部能融洽团结，使边区各项工作更有进步。

1944年夏　毛泽东称自己是群众的一个小学生。他在同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G·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底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1944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央指出，军事整训就是练兵。练兵方法，第一，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改变过去少数人包办，即司令部与教员包办的作风，而变教育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使群众（干部、战士、杂务人员）自觉学习、自动研究、互相帮助、互相比赛；各个人，各大小单位的群众都关心自己个人与单位的教育成绩，生怕成绩落在其他同志与其他单位的后面；使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时间抓得很紧，从不甘落后；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第二，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改变过去教条主义的练兵方法。第三，练兵的领导方法：动员要普遍到每一个战士，使人人都了解练兵的必要，注意说服落后分子，打通思想，要使骨干与群众相结合。

1944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

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出席招待会并讲话。他指出，自从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一年半中间，合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课书。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他们学习。毛泽东还详细地说明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合作社是为什么人办的？是为广大群众的，为边区140万老百姓和10万部队机关学校人员。这个方针在1942年冬天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已经确定，这就是南区合作社的方针。第二，合作社办些什么事？毛泽东指出合作社的业务主要的有10项：工业、农业、运输业、畜牧业、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所有的农民、工人、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由人民政府领导，各阶级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做政府工作和党务工作的同志，都应该认清合作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边区的任何经济、文化事业都必须通过合作社才能完成，因此，要鼓励更多的同志去参加合作事业。毛泽东还号召全边区人民在几年之内消灭文盲，在10年之内每家种100棵树。

1944年7月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军委指出，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盛的根据地。

1944年7月6日　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其中对陕甘宁边区与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提出，要继续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发展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发展各界人民的经济

的文化的卫生的公益事业的合作社，改善军民生活，准备反攻的物质基础！提出坚决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没有减租的彻底减租，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驱逐日寇而奋斗！提出继续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工作，全体军民团结一致，打倒日本法西斯！提出一切共产党员，要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三制，虚习学习，力戒骄傲，艰苦奋斗，迎接反攻，完成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

1944 年 7 月 7 日　朱德论群众的英雄主义。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中说，七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许多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业，不但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而且是由于我全体将士的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与旧英雄主义有什么区别呢？朱德指出，旧英雄主义是为个人利益打算，是为反动势力服务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是新英雄主义，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他进一步阐述到，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于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的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新英雄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为群众所赏识，为群众所称颂，而不

是自封的、高高站在群众头上的。新的英雄也知道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力量中的一点滴，不轻视较自己稍为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体现“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朱德问到，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哪里？他回答说，就应表现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模范作用。事实也是如此。他举例说，坚持黄烟洞保卫战的12勇士全是共产党员，山东我军几年来伤亡总数的45%是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劳动英雄，80%是共产党员。因而，他得出结论，新英雄主义运动是我们推动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他说，我们部队的教育方法，重要的是拿出好的榜样教育与激励群众，而不是消极地申斥或近于恫吓的责备。

1944年7月19日　毛泽东致李先念、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冀察晋分局、晋西北电。毛泽东指出，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生产运动，1944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本侵略者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1944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要求西北局各分区、县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在转发西北局对各地委工作的指示时，中央指出，立即准备于参加联席会议之常驻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分区后，召

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凡边区参议员、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之党外人士，每县至少邀请二人出席，分区党政军负责党员干部参加。座谈会需按毛主席、高岗谈话及预备会议记录之精神进行之，求得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三三制等的缺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对各项建设工作则提出积极建议。我们的同志应悉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应虚心接受，如有误会或不明了之处，应诚恳地解释，以达改善工作，巩固团结的目的。

1944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要求收集研究全国经济情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组织农业工业生产，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已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最重要工作之一，但目前各根据地都感到缺乏敌占大城市和大后方的金融贸易情报。为了克服这一缺点，通知要求各地党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收集研究经济情报，每周或每半月或一月专门向西北财经办事处通报一次，如遇金融上重大风潮时，随时报告。

1944年7月25日　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河南敌后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中央在指示中指出，迅速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是我军深入新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应注意者，第一，我军进入新区第一件大事是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其次除在当地筹粮外，至少最初几个月应自带菜金，筹粮时每户只等一次，至多不过两次，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摊派粮草。人民吃什么，军队即吃什么，不得专向人民另筹米麦、细粮。我军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是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敌伪顽我的比较，在人民眼中第一天是从纪律和筹粮的具体行动出发的。第二，我军进入新区多半是敌伪顽等蹂躏过久的地区，人民痛苦最深，我军初到应安定人心，首先给好日子过，多做好事使人人都有来苏之庆，因此不筹饷，不乱打汉奸，不捉人，不罚款，

不杀人，就是坚决的反共分子、特务分子，也采取宽大政策资送出境。第三，对新区应适时发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我军一面要支援和领导群众的减租减息运动，一面要说服地主执行法令，采用双方协议，我军出面至诚的方式，减额不应过高，宜适合双方迅速达到发动群众运动的目的。

1944年7月28日　毛泽东要求各地答复十项重大问题。他在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中，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

1944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两三年内陕甘宁边区实现工业品全部自给的要求。在《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中指出，为了长期抗战，准备反攻力量和克服一切对边区经济封锁的困难，并保证边区军民丰衣足食的生活，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完成1944年西北局高干会提出二三年之内在各分区自给的基础上完成工业品全部自给的任务，必须继续发展公营工业和民营工业，因此各级领导部门及各工厂党的组织应当执行下列任务：（一）各级工业领导部门应责成机器制造工厂及化学工厂，帮助解决炼铁，火柴、纺织、印刷的某些机器装备及技术改造。首先做到布匹、铁、火柴的全部自给。（二）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奖励边区内地主商人创立工业，并欢迎边区以外的工商业家来边区发展工业。（三）为“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而斗争，应当成为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口号。企业化是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关键，必须切实而有步骤的实现，克服工厂组织机关化的现象。建立工厂管理制度，动员工厂所有党员去领导全体职工为提高质量发展产量而

斗争的群众运动。(四) 在工业生产战线上的一切党员干部，应当尊重党外技术干部，学习掌握工业技术，克服不学习技术的偏向。一切有技术的党员干部及一切技术人员归队，回到本行来。政府应奖励技术的发明。(五) 各公营工厂党的组织应继续领导和坚持赵占魁运动，在职工中建立新的劳动态度，发扬劳动英雄的革命品质，学习与熟练自己业务的技术，使全体职工把工厂看作是他自己的家庭一样，在竞赛中继续创造出各业的劳动英雄。(六) 各公营工厂的领导干部及党员必须联系群众，依靠职工群众的力量来改善工厂的生产与管理，并经常照顾职工生活及日常困难。有计划地组织职工互相储蓄，发展文化娱乐工作，处处关心职工技术学习和文化的提高。使职工在劳动过程和实际生活中体现到革命工厂的利益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七) 各公营工厂党的组织，应当注意吸收在生产中的劳动英雄及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并有计划地引进对工厂有技术贡献的职工及有管理工厂才能的党员，参加公营工厂的管理。

1944 年 8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对豫鄂区根据地克服财政困难和生产救灾问题发出指示。中央指出，解决财政困难不外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除整理税收外，主要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进行种菜、种粮、喂猪、喂鸡鸭、打豆腐、榨油、打鱼及采集各种山货和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均可克服很大的困难。如果部队缺乏土地生产，即可在人民自愿条件下合伙，将部队劳动力和肥料加在人民土地上，因而对所增加的收获，部队能分得若干成。其次，适当地进行对外贸易，组织公营企业，亦可增加一些收入。在节流方面，则需彻底进行精兵简政，将一切不必要的人员马匹裁减，机关部队单位合并，组织编余人员去专门进行生产。其次，则为进行节省，减少浪费。上述各项

生产救灾工作，是很细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吸取群众意见和经验，并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决定来进行，才能切实有效。粗枝大叶，官僚主义，则必扰民有余，救灾不足，必须教育各级干部改变这种作风。

1944 年 8 月 12 日　罗荣桓、黎玉致毛泽东电。电文称：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1944 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体力亦渐增强。1944 年，要求部队机关生产经常费 70%到 80%。农民生产方面，在发动减租减息与民主村庄、对生产有热情，一般的开荒、纺织、运盐、打油，是做到生活上的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所以，由此进一步转变了他们的意识，认为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

1944 年 8 月 22 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论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他们在关于华中整训部队问题致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中指出，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1944 年 8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给邓小平、滕代远、林枫指示。中央指出，甄别工作要求各级首先要更加认真负责，亲自动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则是非则非，郑重地分清是非轻重。是特务（此类人是极少数），则一个不杀，团结抗战；非特务（此类人占多数），则加以平反，去掉帽子。要耐心地教育干部，使他们晓得甄别工作是反奸工作的重要阶段，是干部实际的整风学习，只有在正确的甄别工作中，才能得到反奸斗争的全

面知识，才能从熟视目睹与特务如麻两个偏向中求得正确的经验。

1944年9月8日　中共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追悼会。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15年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长征，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班长，八路军云阳留守处警卫连三班副班长，中共中央军委通信营通信班长，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毛泽东警卫员，安塞石峡峪生产家场副队长，曾担任烧炭工作，被评为劳动模范。1944年9月5日因炭窑崩塌以身殉职。张思德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毛泽 东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1944年9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毛泽东指出，（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二）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四）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

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五）毛泽东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这个讲演，阐明了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 作用。

1944 年 9 月 13 日　中共中央要求在反奸斗争中防止扩大化。中央在给王鹤峰指示中指出，（一）为了慎重，以免弄错许多人起见，望你立即停止坦白运动，而集中注意研究坦白者的材料。对弄错者以迅速平反，对弄重者给以减轻，以便取得更多经验后再去工作。（二）最近延安进行甄别工作的结果证明，延安以前的防奸运动有许多错误，90％以上的坦白分子不是特务，而仅是党内错误或仅有党派自首等问题，而且有一部分是完全弄错的。这种错误，就是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对坦白半条心的人，一律予以穷追，结果有不少的人被追成特务，望你注意。（三）在坦白运动中，如果没有确定证据，对于一切坦白分子一律不要加以追问。如果只有党派自首等材料，则问出党派自首问题即应停止；只有对于确有特务材料的人，才可能要他坦白特务问题，如果他坚持不坦白特务问题，亦不可加以强迫，而应细心研究。如此才能免除过左错误，否则，必然要犯严重错误。

1944 年 9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和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的战斗英雄代表。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你们是部队里选举出来的，你们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同时你们还代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9100 万人民。我们的部队，不论在前方打敌人，或在后方保卫边区，不

论生产或练兵，不论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有很大的进步。在1943年拥政爱民运动中，运用了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们有缺点，互相批评。军队要有统一的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而且只会增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为人民的军队。每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对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和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要努力改掉，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1944年10月10日　周恩来论依靠人民和自力更生。他在庆祝双十节会上发表讲演时，回顾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败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胜利，指出只要肯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敌后抗日部队，在此七年多奋勇血战，除了抗战初期领了120挺轻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以外，从未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1940年起全部停止了。甚至连英美红十字会捐助的101箱药品，也被军事委员会没收了。因此，我们部队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完全是依靠于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自力更生的成功。

1944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问题。中央给北方局、平原、太岳指示中指出，关于解决河南新区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一）按每亩产量5%—7%，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

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二）或者照国民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哪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民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农、中农、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有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三）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四）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需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需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需按人数给予应得粮票，以免重复犯过去的浪费现象。

1944 年 10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北准备反攻工作。军委指出，新发展区及减租、减息未深入地区，继续深入减租减息斗争。减租减息已深入地区，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为准备对日本侵略者发动反攻做好扎实的工作。

1944 年 10 月 30 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演。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1944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给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指示信。华中局指出，为着应付向南、向西发展任务，

我一、二、三、四各师地区，应加强下列基本工作：（一）对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应作具体布置和检查。（二）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三）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坚决抽调大批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干部，进行训练，准备分配地方兵团，与发展新地区工作。（四）加强党与群众工作，这里特别要求加紧完成整风、审干、防奸。并从发展生产运动（发展和巩固劳动互助与各种合作社运动）中去团结根据地各阶层群众，与完成基层政权，即改造工作，使各根据地的工作达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五）整理公粮、税收，准备 1945 年普遍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积累大量物资。（六）加强时事教育，扫除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从思想和政治上，加强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认识。（七）经常要有反“扫荡”的准备与继续保持精简状态。（八）经常检查总结各种政策实施情况与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

1944 年 11 月 15 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44 年 1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关于审反工作给晋察冀分局指示。中央指出，（一）进行深刻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搞通思想，掌稳政策。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应耐心经常地进行，采取整风的方法研究文件，以民主的方法吸取群众的意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工作。务使九条方针的每一条都能深入到群众中，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二）在党校和分局、军区，行署各机关中审查干部更要特别慎重，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特务的方法使用于党内审查干部，也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

民党党部的方法使用于三三制政权中的非党人士。因此党校和机关的审干及反奸工作，应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坦白运动的党内方式。（三）在坦白运动中，应提倡说老实话，纠正干部中强迫坦白、指名坦白、过火要求，不坦白特务不过瘾的“左”倾情绪，同时反对坦白者哗众取宠、混编乱造、夸大其词。对逼供信偏向及时注意，即便个别现象也不要轻易放松。（四）经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与变相肉刑、车轮战、打骂、捆吊、侮辱等等犯法行为发生。（五）随时防止和纠正老的工农干部对新的知识分子宗派主义与报复情绪，正确估计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务只是极少数，不要将他们的思想问题与特务问题混为一谈。许多知识分子，从抗战以来，在军队中和战斗的环境内出生入死多年，当审查他们时，绝不要忘掉这个重要根据，对他们的方针既要详细审查，又需关心爱护，二者必须统一。

1944 年 12 月 1 日　毛泽东致陈毅信。信中说，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1944 年 12 月 11 日　晋绥边区总结 1944 年生产的成就。行署副主任武新宇在边区群英大会上指出，晋绥边区一年来生产成就：开荒 75 万亩，增产粮食 16 万石，产棉 130 万斤。工厂产品增加 43%，军火产品增加 65%，制药生产增加 15%，组织劳动力 1.4 万个，改造二流子 6700 人。

1944 年 12 月 15 日　毛泽东倡导在党内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就 1945 年的任务发表演说时说，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

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别人提不得不同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1944 年 1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关于五师财经工作发出指示。中央指出：（一）你处是处在分散游击环境，依照敌后各地经验，在这样情况下，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都证明是较好的办法。应动员地方党部、地方政权、群众团体，首先而且坚决地负起保证军队供给无缺的责任，多作说服教育工作，达到一致为解决供给困难而奋斗。（二）你们要立即就地建立公粮制度，要各部队与当地人民商量拿

出粮食供给军队，以公平的标准民主乞求的态度去办理。此外要说服部队不完全吃大米，养成吃杂粮的习惯，与老百姓同等。在游击区公粮征收后，可分散由人民保管，要吃时再到各家去取。（三）你们还准备迎接1945年春的大生产运动，部队和机关均应参加生产，或拨出一部分组织生产队（部队）或大部分参加生产（如后方机关）。生产办法：发展手工业，或开荒，或与人民合伙下地耕种，在军民兼顾原则下分配收成。敌后经济供给的重心应放在发展生产上面。只有在人民中间的生产量大规模增加之后，财政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四）你们还可考虑移兵就粮的办法，把中心区的兵力和机关学校移到边沿区去，移到粮食丰饶的新区，把中心区的机关人员大批精简出来派到新区去发展，师部区党委及边区政府合在一起办公，成为一个领导机关，而将大批人员派到各分区去加强分区的工作，让各分区独立工作，独立解决问题。（五）反恶霸斗争，不宜做为群众运动去普遍发动，宜就具体事件，妥善处理。解放区的正规的群众运动路线，是从减租减息，改造乡区政权，组织农民，组织自卫军及民兵，到发动大生产运动，只要在农村中确定了工农优势，如生活改善，群众组织起来，政权武装在握等。（五）你们党政军应协同一致为解决供给困难而奋斗，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1944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提出要特别注意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内战时期，我党不懂得发展生产，也不懂得节省人力，以致后来精力枯竭，不能持久。鉴于这个教训，现在必须注意发展生产与节省人力，使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1944年12月25日　毛泽东谈减租后的赋税和耕地问题。在给罗荣桓、黎玉电中指出，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其次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需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1945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问题给冀鲁豫分局并北方局指示。中央指出冀鲁豫还有广大地区尚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1945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1000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望北方局及太行区党委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派回平原去发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1945年1月6日　中共中央要求部队大会合后注意团结。中央在指示中指出，目前南进部队分途出发，在各地即有我军南北部队的大会合。鉴于我军在历史上两个部队会合的经验，常因领导方面对会合问题未预有各种政治准备，在初度热烈联欢之后，即继之各方面的磨擦对立，以致影响尔后团结和损害共同作战。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多而且苦，其关键在于双方都有盲目的山头主义，会合后双方自视甚高，外来方面不入境问俗，而本地方面亦忽视询问来者情况，因而在互相接触的批评中逐渐造成对立，影响团结，特别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群众问题。此次南进各部队以及在南面各兵团，均应于会合前事先召集干部会议，士兵大会，说明会合意义及自己对会合所采取妥善态度，最重要的一条是双方互相尊重，严禁批评对方缺点，并不许在自己队伍内部谈论对方缺点，提倡互相学习好处，隐恶扬善，如发现对方缺点和不满之处，宜

经过自己的上级机关通知对方负责同志作检讨的参考，要纠正在下面肆意指摘的自由主义态度。在双方群众面前采取说好、学好的互相学习的亲和团结态度，而在党的领导方面则采取交换意见、发扬长处、纠正弱点的严肃的原则态度，这是一个团结的原则和方式的综合问题，希望各地研究领会此一指示，妥善执行之。

1945年1月10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发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工作应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出发。他批评了“从城市观点出发”的错误思想和“部队、机关参加生产，会影响作战、训练和工作”的片面观点。他号召解放区一面要努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决不滥用浪费，为解放全中国做好物质准备和干部准备。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1945年1月18日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重庆文化人整风问题致王若飞电。电文指出，（一）如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两部门同志则可行，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因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的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历史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反而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需慎重的。（二）即对文委及新华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

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互相埋怨、互相猜疑情绪的增长。

1945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武工队工作给华中局、五师、东江纵队指示。中央指出：（一）三年来武工队斗争逐渐发展，已成为对敌连续进攻与长期发动农民的主要形式。武工队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应大大发扬。任何一个军事斗争（从主力到民兵），若是没有内线工作、群众斗争的参加，就没有可靠的把握；反之，任何一个军事斗争，又必须估计到发动群众的可能如何，不如此，便不能保证持续的胜利。按一般经验，切合时宜与切合群众迫切要求，提出经济口号（如反贪污、今年负担、反维持、反抢掠、减租生产、贸易合作等），是发动农民的中心一环（也可以说是普遍真理）。其他斗争与经济斗争相辅而行，逐渐提高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不合时宜的生硬口号，应当避免。（二）进一步贯彻群众思想。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仍然是武工队的重大问题。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必须见之于“让群众起来”的行动，包办群众斗争，忽视群众力量，任何胜利不会巩固的。只有群众起来干，不管任何地区，都能站住脚，扎下根。当群众起来之后，培养地方干部与培植地方武装，又是巩固与提高群众的两件大事。凡是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群众领袖就要注意培养，大胆提拔，绝不能限于资格、经验、文化的编见，而弃置不顾，贻误工作。武工队有了联系群众的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就可能成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三）贯彻群众思想，实行主动进攻，综合斗争，统一领导，是武工队完成任务的基本问题。

1945年1月27日　毛泽东批转21日《晋察冀分局对冀中工

作的指示》给山东、平原、华中、五师、广东、晋察冀分局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一）民兵生产战粮，不仅可以节省公粮开支，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到解决民兵武器、弹药。帮助村抗属荣军生产，解决困难，建立家务也有成功经验。（二）冀中财政开支很大，应研究如何从生产与节约两方面开源节流加以缩减，这对苏息冀中民力极关重要。你们的预算以不超过1945年所收公粮为原则。

1945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工作。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合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

1945年1月3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财政收支公之于民。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要求各级政府（县、区、乡、村）财政收支要向人民公布，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以充分发扬民主作风。

1945年1月31日　毛泽东号召在敌后游击区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他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中，以晋察冀游击队在晋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生产所取得的良好成绩为实例，指出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的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他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

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1945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

1945年2月9日　《解放日报》号召贯彻减租减息。在社论《贯彻减租》中说，自中共中央1942年2月6日颁布土地政策之后，敌后各解放区在执行这个政策上有巨大成绩，但还存在着减租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甚至地主夺地等问题。社论指出贯彻减租减息是一种艰苦的长期的工作，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进行连续不断的督促检查，反复几次始能贯彻。在已经减过租但不彻底的地区今后要深入检查，发现问题，重新发动，重新解决；在尚未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把减租减息当作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全力来进行。不论新地区与老地区，要把减租减息与对敌斗争、生产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坚决纠正干部包办代替，恩赐减租的“劳而无功”的方法，领导要尽量避免过去“左”的现象。

1945年2月14日　《解放日报》号召种棉花。在社论《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穿》中指出，种棉花，利最大；自种自纺自织，才能丰衣足食；买布穿，不合算；1945年不种棉花，布价还要大；争取布棉自给，稳定金融物价。要求各地干部把推广植棉当作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好好地宣传与发动农民种棉花，并随时在技术上帮助棉农解决困难，争取完成陕甘宁边区棉花布匹完全自给的任务。

1945年2月19日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要求根据地1945年耕三余一，主要工业品自给。在关于生产的指示中指出，1945年争取“耕三余一”，穿衣、主要工业品自给。

1945年2月22日　《解放日报》号召敌后游击区在开展武装

斗争的同时，要开展经济斗争。在社论《张瑞的合作社道路》中指出，过去不少人认为在敌人活动频繁，伪政权统治的游击区，只能进行武装斗争，进行经济斗争有困难。晋察冀张瑞合作社的经验证明，在游击区里面，不但能进行武装斗争（主要斗争形式），也能进行经济斗争，而且是游击区工作的主要斗争方式之一。经济斗争靠武装斗争的支持，经济斗争的发展又推动了对敌武装斗争。

1945 年 2 月 22 日　八路军晋绥行署召开政务会议。会议提出，为鼓励农业和纺织业，发放农业贷款 8320 万元，贷粮 5200 大石；纺织贷款 1350 万元，棉花 20500 斤。要求各级政府抓紧时间，迅速发放，至惊蛰前贷到群众手里。一部分贷款放给新解放区和边缘区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1945 年 2 月　新华社报道：八路军胶东解放区工业迅速发展。铁工业生产方面，除能制造纺织机、织布机、弹花机、水车等外，最近又创造动力机、印刷机；日用品生产方面，肥皂已自给自足，上等肥皂已销至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其质量仅次于力士香皂，并争取出口；文具方面已生产文化用纸，钢笔除橡皮管外，全部均能自己制造；无线电工业方面，新创造永久牌电池；纺织业方面，土布已达自给自足，丝绸因交通不便，尚有过剩现象。

1945 年 3 月 1 日　中共中央要求河南党委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和加强团结、加强纪律教育。中央在指示中指出，（一）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现决定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帮助你们伪联币 1000 万元作资本，约 6 月底才能送到。嗣后即须全部自给。（二）河南部队是否在作战与新创根据地

实行部分生产自给，请考虑。（三）全部河南我军着重团结内部与团结人民的政治及纪律教育，时时检查违犯纪律事件，加以纠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深入全军。

1945年3月1日　《解放日报》号召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社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大生产运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1944年生产运动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一）游击区能不能生产的问题；（二）比较富足地区还要不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问题；（三）党政民各级领导机关及全体干部，主要力量作什么的问题；（四）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对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社论要求所有解放区同志认真研究毛泽东《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演，开展一个比过去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945年3月6日　河南人民抗日军十大爱民公约公布。公约内容：（一）积极作战，打击敌伪，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二）爱护人民，组织群众，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三）尊重人民风俗习惯，关心人民痛苦，倾听人民意见。（四）帮助人民武装，建立民兵与自卫队，正规军与地方武装密切结合起来。（五）帮助人民群众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六）对群众讲话要和气，买东西要公平。（七）借群众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说价。（八）进出要宣传，提高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九）帮助人民建立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十）帮助人民安定社会治安，肃清一切敌探汉奸特务。这个公约是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于3月2日拟定，毛泽东3月6日同意公布的。

1945年3月23日　《解放日报》号召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在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中，总结了解放区新闻界整风的经验，

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实事求是方针，指出整风以来，我们的报纸有了很大进步，向壁虚造的是找不到了，每条新闻都是实有其事的。但是我们还有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有些新闻还有过分上的夸大。社论要求记者、通讯员克服这一毛病，更加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发掘问题，研究问题。

1945年3月26日　毛泽东把《晋察冀分局关于1945年工作的决定》批转给北方局、平原、山东、华中、湖北。决定指出1945年的工作为，（一）目前中心工作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运动普遍行动起来后，各地应抓紧空隙进行县、团以上干部整风。（二）工作队及活应按扩大解放区方案，准备干部，组织武装，调查研究，整训干部、部队，完成扩大解放区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便按计划举行战役。（三）利用农忙空隙进行民主大选举（包括村选、县选及边区参议员选举），期于大秋前选举完毕。（四）1945年冬召集一次扩大干部会，总结数年来统战工作等。

1945年3月28日　毛泽东把《晋察冀分局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批转给北方局、山东、平原、华中、湖北、广东。决定指出，（一）民兵是人民中的精华，在工作有基础地区应尽可能发展，不要停止在占全体人数5%的数字上。（二）在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召集前，各地必须总结数年来民兵斗争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三）各地应效法冀察、冀晋民兵生产战粮的经验，使战粮进一步推广到解决一部分武器粮。（四）各地应考虑以县为单位，或家、保、县联合在一起成立修械所，装置地雷，组织铁匠，建立民兵武器合作社。

1945年3月28日　毛泽东把晋察冀分局3月19日作出的《对于群众团体工作的意见》批转给北方局、平原、山东、华中、湖北。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一）减租减息后，群众团体的主要工

作，应转变到领导各界人民生产、文化、卫生方面。同时仍要时时照顾基本群众的现得利益，提防地主的反攻。（二）村级群众团体干部应成为群众中的领导与骨干，然后经过群众的自愿选举，把他们选举到合作社中来，使群众团体和合作社能密切合作。（三）区县抗联会与合作社合同办公。（四）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及其组织仍须保持。群众团体参加合作社，不是削弱群众团体的威信，而是使群众团体威信在群众中继续保持与增长。

1945 年 4 月 9 日　毛泽东要求敌后根据地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及群众工作。他在给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中指出，你们除粮食外，其他费用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的办法。1940—1942 年整整三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情形比你们还要厉害，从 1943 年起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解决了问题，仅有人口 150 万的边区，却养活了 15 万公家人而民不伤。1945 年是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关于扩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扩，依照那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这是游击战争特点所引起的方法。

1945 年 4 月 20 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

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从思想认识上指出，教条主义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而经验主义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他们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决议指出，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决议还指出，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

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决议说，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三）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1945 年 4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会上，任弼时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说明“七大”召开的伟大意义，“七大”代表的产生及到会情形。会议一致通过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向大会预备会提出的下列提案：（一）大会主席团名单；（二）大会正副秘书长名单；（三）大会议事日程；（四）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五）“七大”会场规则；（六）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中国人民和党经历的曲折而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指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为革命在全国胜利而奋斗。

1945 年 4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至 6 月 11 日结束，历时 50 天。大会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七大”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

代表121万党员。大会的议事日程有四项：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共开全体会议22次，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大会上作重要发言。大会讨论并分别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新党章。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一）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抗战的前途和任务，即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两个前途。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二）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党的政治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三）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基本内容的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四）制定了新的党章，规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提出党在组织上的任务。（五）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即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廖承志、王稼祥、黄克诚等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正确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一致，引导全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大会的胜利召开，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作了系统总结，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一起的作风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24 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总之，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

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办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1945 年 4 月 25 日　朱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在总结解放区抗战的经验时说，解放区经过我们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就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

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就这样，把解放区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和民族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纵使在敌人空前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之下，战斗意志仍然能够坚持下来。就这样，把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发扬到最高度，并普遍推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运动，不管敌伪从外进攻及其奸细特务的从内挑拨，这个团结都是打不散、挑不开的。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关于怎样带兵，朱德说，八路军、新四军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压迫制度。我们这里，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为人民而当兵，而不是为军官当兵。我们主张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朱德在谈到怎样练兵时说，我们军队智力训练中，近年来，在政治与文化教育之外，又加上了生产教育。生产教育，不仅帮助了生产运动，而且灌输了劳动观念，使我们的军人不会变成“兵痞子”、“二流子”，即使将来战争结束，仍是社会上有用的人才。他说，我们近年来在练兵习武中的新创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由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在我们军队中，已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互相帮助、互助学习的教学相长的新教育办法。这是适合于我们目前的战争状况的。怎样用兵，朱德说，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

的用兵新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头的。而我们过去有些犯“左”倾幼稚病的同志，也恰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说，一谈到军事理论，有些人就会搬出一套军官学校的高头讲章，或者广泛引用各国战史。他们讲的都是很高的理论，可惜这些理论，不一定合乎中国人民的实用。无疑义地，我需要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能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来的抗日战争，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朱德要求全体将士，切忌自满，切忌骄傲。他说，不论有怎样大的功劳，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应归功于人民，相反地，我们要时时进行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负于人民的信赖和委托。他告诫同志们，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山头主义就会减少，军内外的团结就会加强，我们就是无敌的了。

1945 年 4 月 27 日　毛泽东论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指出，军队的生产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他还说，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

物。这些副产物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三）增强纪律性。（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指出，1942 年和 1943 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的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他说，经过整风运动，即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解决着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他说，经过生产运动，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他说，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某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毛泽东号召，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1945 年 4 月　刘少奇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着重谈了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

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的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要做好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只有认清了工作对象，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才能帮助她们解决困难，为她们服务。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就要分析农村的具体环境。很可惜，我们在农村里搞了十几年的妇女工作，还有不少的人完全不了解农村妇女。我们吃了农民的饭，穿了农民的衣，住在农村里，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从农村的实事中去“求是”，而是从外国妇女运动历史类比中去“求是”；我们不去倾听农村妇女的要求和呼声，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是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其实农村妇女运动不是神秘的，只要你接近农村妇女，就能了解他们的思想、观点、呼声和需要。如何了解呢？可以做农村调查研究，找农民和妇女谈话。只要我们真正为他们服务，他们是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假若不实干，要出风头，跌下来，还是要从头做起的。在过去的工作中，不认真地去了解对象，不懂得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缺点。（二）抗日根据地同国民党区、敌占区的群运方针问题。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过去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在敌占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破坏；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则是建设。破坏和建设这两种方针有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三）过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群众观点不够。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人民的眼睛是

亮的，只要你做好事，就会拥护你。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但我们有些同志不老老实实替群众解决问题；想这样，想那样，还闹别扭。他还指出，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办合作社，就摊派股金，代农民做好每户计划，但是农民则把它倒贴在门上；变工也强迫，开会也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因此，人民中有所谓“日伪那里罪多，国民党那里税多，共产党那里会多”的严正批评。命令主义就是没有群众路线。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的程度。在群众现有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要去掉“爱面子”、“逞英雄”、“出风头”、“怕批评”等坏东西。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按这四点精神办事，事情一定可以办好，群众随时欢迎实事求是的人去指导他们。

1945 年 5 月 1 日　毛泽东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5 年 5 月 5 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

指南——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社论指出，这个报告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总结——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规定了这个政权的具体形式应是“联合政府”，还提出了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步骤。指出这个报告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将极大地动员中国人民来争取光明的中国，指导和促进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1945 年 5 月 9 日　陈云在“七大”会议上发言，强调共产党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说，我做了几年组织部长，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为什么骄傲呢？因为他看到自己有功劳，看到这一点就骄傲起来了。如何看待功劳呢？陈云说，假设你在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这里头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对于犯错误的看法，我觉得除了一个人的立场不正、心术不正以外，犯错误的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对客观事物看错了，所以行动也错了。这种情形多得很，过去多，现在多，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1945 年 5 月 14 日　刘少奇论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内民主。他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但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以下几个群众观点：第一，就是一切为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报告中说，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批评，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万万不可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

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也不但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1945 年 5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太行军工工业问题给滕代远、杨秀峰指示。中央指出：（一）工人不宜分外来及本军两类，而应实行同工同酬，待遇一律，否则外来与本军工人难以团结，影响产量与质量的提高。（二）工人家属应尽量提倡劳动，公家给以各种帮助。（三）延安是粮贱日用品贵。根据太行山实际情形，仍以半实物半货币工资为宜，同时货币工资也要依托实物，然后工人生活较有保障。（四）兵工厂帮助国民工业，不仅能推动国民工业发展，而且帮助解决财政困难，同时也解决了工人生活。（五）敌后根据地还须作长期打算，太行军需工业不可扩大，以免加重农民负担，但须认真提高工人的政治认识，爱惜原料，提高质量，增加产量。

1945 年 6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员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党章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义务中的第三项是“为人民服务，巩固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向非党群众解释党的政策。”权利中的第四项是：“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1945 年 6 月 11 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毛泽东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1945年6月14日　《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和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支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么，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

1945年6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七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任弼时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

六、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一）整党和党内民主的发扬推动着党的优良传统的发展

1945年6月20日　毛泽东把晋察冀分局6月12日作出的《关于冀察城市工作的报告》批转给平原、山东、华中局。报告指出，城市主要工作是：（一）在6月底前，将大城市附近及铁路两侧县区城工部长配齐，增设不脱离生产的小区 城工委员。（二）加强调查研究。（三）继续大量训练派遣，应以工人、苦力、伪军、伪警为主。（四）在城市中发展党与团结群众。发展党员对象以工人、苦力、学生、贫苦居民为主，重质不重量。用交友方式广泛团结群众，主要对象是广大下层群众。争取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专家等进根据地受训、参观或工作。

1945年6月24日　中共中央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在关于建立南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

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1945年7月1日　《解放日报》论七大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周年》中，回顾了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和二十四年党的历史，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结合的典型。从党的“七大”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它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时期与前一时期将有一个显著不同之点，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更加进一步结合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更加自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5年7月1日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给《盐阜报》编辑部信。他指出，报道工作不仅要报道进步、成绩的一面，还应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一面，以作为决定政策、改进工作和教育干部的借鉴。

1945年7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河南的战略方针与政策给河南区党委发出指示。中央指出，今后的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逐渐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对困难要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完成创立王岭根据地任务致王震、王首

道电中指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1945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要求加强收集全国经济情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组织农工业生产，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已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最重要工作之一，但目前各根据地感到缺乏敌占大城市和大后方的金融贸易情报。为克服这一缺点，决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编辑一种带全国性的经济情报，委托各根据地及办事处向一定的大城市收集必要的材料，按期编成情报，通知各根据地作参考。各地党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收集、研究经济情报，每周、半月或一月向西北财经办事处通报一次。

1945年7月30日　毛泽东关于批评赫尔利问题致徐冰、张明电。毛泽东指出，美大使馆前曾劝告我们不要批评蒋介石，这一点现在他们不说了，却来劝告我们不要批评赫尔利。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央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

1945年8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湘粤边根据地及准备长期斗争给广东区党委指示。指示指出，王震、王首道率3000人7月从鄂南出发，一个月内可到粤边。文年生、张启龙率6000人4个月内可到湘鄂边。你们要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

地。盟军登陆，日军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的准备。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绝对不要依赖外援。

1945 年 8 月 4 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豫、鄂根据地对付国民党发动内战给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指示。指示估计日本侵略者，1946 年冬可能失败。日本侵略者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阳扩展根据地问题。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五项，望在扩大会上，根据自己经验加以总结。军队不只是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这个问题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也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1945 年 8 月 6 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两广上层分子工作方针给广东区党委指示。中央指出，我党在两广的民主运动有两重任务。目前应在抗日民主的号召下动员人民实行自卫自治，并联合一切反蒋的上层分子，进行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但同时为保护人民利益，绝不应放弃反对地方封建压迫的斗争，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立起群众的基础。

1945 年 8 月 9 日　中共中央论武工队的性质和活动。在对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布置的指示中指出，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用各种方法（主要是隐蔽的）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没有必要和没有胜利把握的仗，绝对不打。到处根据群众的切身要求，领导改善生活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

原则，应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并照顾其利益，一切应作长期打算，落地生根，然后用细胞分裂方式发展。故武工队到处，应能参加群众生产，使其能联系群众，取得掩护，而又减轻生活负担。

1945年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他指出，由于苏联8月8日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的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5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提出要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指出，日本无条件投降，无可避免，实现在即，我军在华中应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占领城市后，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榜安民，维持秩序，发动群众，推行新政，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坚决镇压一切反抗。

1945年8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1945年冬1946春，必须在1亿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 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与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1945 年 8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会合王震创立的湘粤根据地给广东区党委指示。中央指出你们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们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没有此，你们将无退路。大城市不要勉强击打，一切被我占领之小城市亦须随时准备退至乡村，坚持游击。只要坚决依靠人民，少犯政策错误，总是会胜利的。

1945 年 8 月 13 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 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945 年 8 月 13 日　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1945 年 8 月 13 日　毛泽东提出党要在人民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说，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有过。今天中国

人民的觉悟程度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他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他说，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你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他说，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1945 年 8 月 13 日　毛泽东强调要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1945 年 8 月 13 日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的不良影响。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中说，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物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 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1949 年 8 月 13 日　《解放日报》论由乡村到城市、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问题。在社论《当前的紧急任务》中指出，从乡村到城市，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我党七次大会所预见的转变，由于时局的突变，现在要迅速加以实现。我们过去长期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所习惯使用的一套办法，已不足以适应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城市工作和大兵团运动战的新环境了。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勇于转变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细心研究转变的途径，掌握新的一套办法，并按照具体情况，坚决地和有步骤地实行转变。如果我们不向这方面努力，无视于今天局势划时代的巨大变化，满足于现有的一套，不愿实行转变，或者转变得不够坚决，那么一定会给我们的工作以不小的损失。

1945 年 8 月 16 日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中，驳斥和揭露蒋介石发言人 8 月 15 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犯者即为人民公敌"等无耻谰言。指出这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所取的方针是，全国动员起来，反对内战，制止内战，对

敢于进犯人民的反动派，则取自己立场，给予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1945年8月16日　毛泽东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骨气。他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1945年8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改变战略方针着重用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在给各党委、各军区的指示中指出，（一）苏联为中苏条约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二）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甚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三）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

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1945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宣告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

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论坚决依靠人民是革命队伍的出路。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告中说，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 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1945年9月2日　中共中央提出对新解放城市的工作方针。在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尚无县政权的，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需成立政权；成立人民自卫军、协助军政维持秩序，参加解放战斗；对敌伪公有财产及大汉奸的企业，成立一个统一接收机关，暂行管制；打击伪币，挤其外流，规定各种本币的兑换比价，照顾全局稳定金融；必要时成立粮食管理机关；救护盟国俘虏，保护外侨；对公用事业及财经机关的原有人员，尽量争取，保存案卷；照常工作等。

1945 年 10 月 17 日　毛泽东号召要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他说，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

好办了。

1945 年 10 月 17 日　毛泽东论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1945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央指出，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

1945 年 11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提出东北撤出大城市后我党的中心任务。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大城市退出以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

的要求，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1945年11月20日　刘少奇致中共东北局负责人电。刘少奇说，退出大城市后，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

1945年12月28日　毛泽东指出党紧紧依靠群众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他说，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他要求，我

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1945年12月31日　刘少奇致东北局负责人电。电报中说，12月24日你们关于群众工作指示，很好，望切实迅速贯彻执行。望抓住这一决定性的环节，集中全力，加以解决，这样我们就取得了第一个决战的胜利。我们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及进行减租、增资，群众才不会讨厌军队。军队必须用心进行群众工作，新建部队亦必须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巩固起来。

1946年2月1日　中共中央指出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中央认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我们党及我们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的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大，但是这一切困难是能够逐步克服与必须逐步克服。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放。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在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之后，军队中的党员将更

加依靠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去进行工作，应该比过去更加团结，更加守纪律，更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提高政治工作，借以保持和提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同时也告诫全党，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内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要在六个月至十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基础，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1946 年 2 月 4 日　毛泽东等与居民欢度春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在枣园与西区居民代表欢度春节，同时勉励大家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讲究卫生，易风移俗，学会为人民办事的本领。

1946 年 2 月 14 日　西北财经办事处召集生产、经济工作人员大会。朱德、林伯渠、习仲勋到会讲话。朱德号召边区军民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建立边区永久家务。杨家岭中央机关行政处长邓洁和中央党校供给部长牟泽衔在会上作了生产供给工作经验介绍。

1946 年 3 月 6 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坚持精兵简政。在给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的指示中指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众负担，这样才能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和坚持。因这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中央指示，如何精简，应速确定方针。中央意见，第一期精简 1/3，并于三个月左右完成，取得经验后，第二期再精简 1/3。

1946 年 3 月 15 日　中共中央针对目前时局指出对策。在给各地指示中要求，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特别是何、白军人派的

阴谋挑衅，除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同时要求，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以便于作好长期打算。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1/3左右，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制定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在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以便使复员者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方向，还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召开专门的减租训练班、生产训练班，纠正偏向，奖励成绩，在报纸上讨论减租及生产工作中的优缺点，务必在1946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务必加强注意力，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1946年5月1日　中共中央要求加紧练兵以对付国民党正准备发动的全面内战。在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中央局必须对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在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要求接到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

区的决心和信心。

1946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在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正积极准备内战，我们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今后六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们也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六个月又分为两期。中央希望各地首先抓紧目前三个月工作，切勿麻痹松懈。

1946年5月　任弼时论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他指出，今后如何苏息民力、发展生产，如何与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作斗争，如何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即对于今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全党必须认识，我们若不能组织1.2亿解放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那我们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不独没有力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且也不可能保持已得的胜利，终于是要失败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对手是中国的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我们在经济力量上是处于极大劣势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出路无前途而悲观失望。我们也具有许多有利条件，这就是解放区内控制着富有战略性的原料，而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建立了民主政权，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只要有正确而坚定的方针，整个解放区人民团结一致，节衣缩食，积累资金，学习技术，以解放区人民的力量，是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步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

经济上逐步走到自给。在财政上，各地要严格实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力求紧缩开支，整理税收。机关部队要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反对正在滋长的奢华浪费现象，倡导节衣缩食来发展经济。还应有计划地试行和逐渐改行薪水制度，以节省开支，并可提高工作效率。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全党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即算内战还有一个时期的延长，也必须开始有计划地（按照上述方针）组织解放区的经济事业。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要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均应成立财经委员会，积累经验，加强对财经建设的领导。而且要有计划地利用和争取大批党外经济技术干部，除开政治上教育他们，还要在物质上给以优厚待遇，使他们在解放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帮助我们培养自己的经济、财政、金融、贸易干部。各重要解放区应即计划开办工农商业技术学校，吸收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培养大批工农商业方面的人才，这已经是非常迫切的工作。

1946 年 7 月 5 日　中共中央要求部队注意纪律与居民工作。在给五师在行动中须注意事项的指示中要求：为孤立反动派，便利自己行动，必须注意军队纪律与居民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伙食单位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班排连利用行军中的大小休息时间，进行五分钟的纪律汇报，出发前宿营时首长要队前简短讲话，注意三兵三夫检查，各支部成立居民工作小组，领导党外战士，参加社会调查，向居民宣传写标语，向部队报告社会情

形。

1946年7月7日　陈云提出要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他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指出，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就有失败的可能。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凡能深入农村者给予鼓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这就既可以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又可以彻底改正干部的不良倾向。

1946年7月13日　陈云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他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会议上做《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讲话，提出总的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他说，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没有群众，地方虽大，离敌很远，也站不住。有了群众，地方虽小，离敌很近，可以站住。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东北群众工作搞起来。群众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一是提高农民的觉悟，开展斗争，与地主扯破脸；二是培养起本地干部。发展党员，则要有三个条件；三敢，即敢于要土地，敢于斗争，敢于武装；三不怕，即不怕离家，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坚持积

极发展，个别吸收的办法。

1946年7月20日　毛泽东提出解放区必须十分节省，力戒浪费，严禁贪污，努力生产。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党内指示中说，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要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即在东北亦应开始提倡。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6年8月6日　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的这一根本战略思想，他在1958年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

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他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1946年8月22日　李先念要求北路军各部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他指出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与依靠群众，是创造与发展根据地的基本问题。各部首长与政工人员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最有效的办法，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动员部队在可能时帮助群众劳动。同时应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捐、抗税、抗丁、

抗差等的宣传，以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并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民兵自卫队，在地方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要发动部队全体人员进行以上工作，使部队成为群众的组织者与宣传者。

1947 年 1 月 1 日　《解放日报》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换得新中国的实现。在《艰苦奋斗迎接光明》的新年献辞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新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作为这个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是解放区 1.4 亿最有觉悟的军民，因此，必须在思想上在群众中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一个高潮的到来。同时，国际国内 形势也决定了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种困难主要的将表现在蒋军进攻中若干地区的变为游击区，以及许多地区因军事的供应而发生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必须对此也有思想上的准备，定出克服的办法，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地去克服它，以迎接光明的到来。献辞还指出，我们的困难，乃是胜利中的困难，是新中国诞生的困难，因而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在有些变成游击区的地区，应该坚持游击战争，以便将来收复失地；对于经济的困难，要用组织生产，提倡节约和精密的计算来加以克服。献辞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与全国人民在一起，在新的一年中克服困难，艰苦奋斗，换得新中国的实现。

1947 年 1 月 1 日　朱德提出解放区军民和全体爱国同胞 1947 年的十大任务。他在元旦广播中提出，第一，解放区军民要在 1947 年停止反动派的进攻，收复失地。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加强游击战，特别是被占区的游击战。第三，无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民兵，都要利用一切机会，一切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借以提高战斗力和觉悟性。对于过去在这一方面注意不足，因而作战成绩较小，政治素质较低的部队，尤其必要。第四，一切部队都不要片刻放松拥政爱民的

工作，不要片刻放松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这是得到人民长期支持的重要条件。要反复宣传人民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泉源，严格执行和经常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时随地为民兴利除弊，帮助人民反对汉奸恶霸豪绅和分配土地，十分节省使用民力，帮助人民解决战争所引起的各种困难，帮助人民生产。后方部队还要尽可能为自己生产，保持我们人民军队既打仗、又生产、又做群众工作的本色。第五，全解放区人民要更加加强支持前线的工作。要加强我们的军事生产，保证对于前线的良好供给，认真管理和检查护理伤病员，照顾荣誉军人和战士家属的生活，并保证他们获得土地。第六，拥护各解放区农民群众的要求，好好完成土地改革。未完成的地方要努力赶上，争取在春耕前彻底完成。第七，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的迫切任务是要鼓励和帮助农民克服困难，互助生产，鼓励 和帮助地主同样进行生产，使解放区内部各阶层和衷共济，共同解决困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共同抵抗反动派的进攻和蹂躏。此外，手工纺织业也要努力推广。第八，为了解决自卫战争中的财政供应问题，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整理财政，缩减一切可以缩减的人员，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第九，要声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声援他们求生存的斗争。第十，争取和国民党内一切爱国的力量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总之，全解放区军民和全体爱国同胞，都要深刻了解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神圣责任，人人坚定胜利的信心，反对悲观失望，反对盲目乐观，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来克服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1947 年 1 月 12 日　刘胡兰烈士英勇牺牲。8 月 1 日，中共中

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赞颂刘胡兰光辉的一生。

1947 年 2 月 1 日　毛泽东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三原则。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中说，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第二个原则是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因此，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第三个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因此，除依情况应当集中经营者外，必须反对不顾情况，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

1947 年 2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中央要求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按七大时已有的原则决定，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由首长处断外，一般情况下，要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的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这样可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项工作能更好的进行。

1947 年 3 月 13 日　毛泽东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拂晓，胡宗南奉蒋介石令，率 23 万大军进攻陕北。这是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方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开始。胡宗南的 14 个旅分兵两路，右路董钊，左路刘戡，同时由宜川、洛川一线分路向延安发动猛攻。同时间，50 多架敌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梢林隘路和纵深工事展开英勇抗击，彭德怀紧急调来新 4 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敌空降兵。彭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及身边

工作人员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下午，敌机轰炸王家坪，一颗重磅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遍地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燃烧的辛辣气味。烟雾散去，毛泽东左手端着的茶杯竟动也没有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滴！而他右手的那支笔仍在地图上移动，那条调兵路线没打一点折扣！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彭德怀对那山摇地动的一声炸响毫无所动，目光追逐着毛泽东的笔尖。当警卫参谋贺清华冲进门来时，毛泽东看着地图问："客人走了吗？"贺清华纳闷说："谁，谁来了？"毛泽东用笔朝上指指："飞机呀！""喧宾夺主，讨嫌！"有人拿了一块落在门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然后对警卫排长阎长林说："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晚上，阎长林调查回来报告："南门外炸死一头毛驴。"毛泽东着急地问："人呢？"阎长林说："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后一个劲骂蒋介石。"毛泽东说："损失一头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3 月 16 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话，说到"群众发 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话音未落，轰隆一声巨响，天昏地暗。两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住处门前不远处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片刻，烟雾散去，窑内恢复光明。毛泽东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跟拔掉哩！"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起来。傍晚，新 4 旅的干部向毛泽东等汇报西华池阻击战的详情。旅领导劝说毛泽东应当马上撤离延安。毛泽东将手一拂，接着又在桌上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

延安的。”毛泽东微笑着对新 4 旅程悦长副旅长和 16 团袁学凯团长说：“你们代表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 20 多万人马，我们只有 2 万，陕北的比例是 10∶1。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3 月 18 日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同第二纵队王震司令员谈话，东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当毛泽东得知机关和群众都已从延安撤离，提出开饭。正当吃饭之时，彭德怀赶来，要求毛泽东马上走，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快快走，部队代你看了。”毛泽东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毛泽东走出窑洞，对站在身边的周恩来和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答应。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毛泽东登车之际，大声说：“同志们，走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1947 年 4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军委要求节省人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战争。关于后勤工作的通令中指出，为争取自卫战争走向全国胜利，解放区的一切战争动员工作都应从长打算，尤其是节省人力物力，严禁浪费，成为支持长期战争的必要条件。因此，军

委通令各部队各地区，根据节省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在全军全区进行广泛解释，并严格遵守下列原则：（一）规定各区部队作战与动员人力服务后勤的最高限度的人力平均比例，一律不许超过。车辆牲畜均应折合人力计算。（二）规定各区部队动员与使用人力、车辆应遵守的规章，并严格检查制度。（三）规定各区部队在休息整训期间，分出一部分劳力，轮流帮助农民生产或做其他劳动。（四）规定各区部队储存与消耗弹药及其他各种资材的规章，并定期检查。

1947 年 4 月 22 日　陈云要求健全党内生活。他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要求健全党内生活，改变辽东党内存在着的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容易发生的无原则的纠纷。同时提出三条意见：（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变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一个也不能少，这是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1947 年 5 月　新华社号召抓紧春耕生产。在社论《同打胜仗一样要紧的事情》中号召，全国解放区军民动员起来，克服战时的一切困难，进行春耕，防止粮食问题发生重大困难。春耕是与打胜仗一样重要的事情。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亲自动手进行春耕，争取时间，抢耕抢种。官僚主义必须打倒，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机关学校部队帮助人民耕种，有很多好处，可以增强军民团结，改善纪律，增加生产，进行劳动教育。不但后方应该这样做，前线部队，凡驻军有一星期时间，必须抽出人力和畜力来帮助人民耕种，首先是帮助军人家属和贫困农民。

1947 年 6 月 5 日　华北财经会议决议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争取自给自足。决议认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提倡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同时，要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工作人员，充实部队。在战争期间，部队可占脱离生产总人数的 3/4，地方占 1/4。部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保证野总队要占部队总人数的 1/2 到 2/3（能集中起来机动作战的）。地方机关和军队后方机关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

1947 年 6 月 10 日　朱德提出老干部要防止骄傲，要大力培养干部。他在视察冀中后在冀中军区干部会上讲话时提出，现在我们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打开了许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在不停地进步，还是切记毛主席“戒骄戒躁”的指示，要谦虚谨慎。许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是我们干部中最主要的部分，要好好培养起来，准备担负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这些同志精神上也

要有准备。总之，你们要大量培养干部，机关要精简，但学校要加强，有计划地保留和训练出一批干部，准备将来打出去使用，这是很重要的任务。

1947 年 6 月 20 日　毛泽东论真正的黄埔革命精神。胡乔木撰写的新华社时评《哀号无济于事》中说，蒋介石 16 日对他的军校学生发了一篇“训词”，要他们拿出 23 年前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革命精神，来挽救“国家之忧患”。时评说，黄埔的革命精神，它是随着国共合作而来，随着人民立场而来，在国共分裂以后，在背叛人民以后，这种精神就必然从蒋介石的队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剑。蒋介石今天的哀歌，当然也不能替黄埔招魂。时评指出，其实黄埔的魂并没有死，它活在林彪、徐向前、陈赓等等黄埔出身的忠诚革命军人的身上，它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军校的身上，它也活在今天各大城市中为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而奋斗的青年们身上。毛泽东修改这篇时评时，在这之后加写一段话说，黄埔军人中现在正发展厌战情绪，其中有些人，正在酝酿反蒋反战，投奔人民解放军。这种情况，随着今后蒋军的失败，必定会有可观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欢迎这一发展。真正的黄埔革命精神，仅仅属于占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军方面，这就是事物的根本变化。

1947 年 7 月 17 日　朱德提出党在农村要代表雇农和贫农的利益。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日本投降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策略也必须按照客观情况改变。从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央为此颁发了“五四指示”，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五四指示”发布后的一年多，各解放区都发动群众，进行了土改，一般都很有成绩。土改搞得好的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整顿，军队壮大了，战争打胜

了。但是有些地方土改很不彻底，这主要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发展起来的党，思想上、组织上不大纯洁，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另外“五四指示”因受当时形势（国共谈判还未最后破裂）的限制，政策上还有不彻底的地方。党在农付主要是代表雇农和贫农的利益，但这个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还不普遍，很多人入党多年竟不知道这个道理，因而需要普遍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只有这样，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才能贯彻下去。

1947 年 8 月 4 日　刘少奇谈在土改中充分发扬民主问题。他在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土地改革本身，已无重大原则问题要解决，存在的重大原则问题则是关于民主的问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建议中央在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一切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完全忠实和正确实行此方针，并很好完成任务。在土改业已彻底的地区，即进行改造组织及干部工作。同时，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城市建立市民代表会）并在适当时候建立全国农民总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另外，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分别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和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鉴定、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为人民作长工，并严格遵守纪律。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复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所述各项意见和建议。

1947 年 8 月　毛泽东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要创造

崭新的历史。他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东原村，向一野的领导干部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可惜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把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吃过败仗。"他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坳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握在我们手里。"他数道："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吃掉了六七个旅。我们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将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毛泽东继续说："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不管他逃到哪里，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毛泽东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朱官寨后，召集周恩来、任弼时等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地说："辛苦些是应该的，是值得的。我们将要创造崭新的历史！"

1947 年 8 月 20 日　毛泽东给彭德怀题字。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第 36 师，俘敌 6000 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反攻。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47 年 8 月 27 日　邓小平论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他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起草向所属部队发出的指示中，指出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的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傲，兢兢业业，上下一心，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

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1947年9月7日　朱德论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他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就整军问题指出，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首先，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大大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技术。其次，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每一个战役结束后，从组织一个班的战士检讨作战的优缺点，一直到全部队都来检讨战术，这就能大大地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第三，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现在部队中出现的“三合一”班的三种战士，各有各自的优缺点。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阶级觉悟模糊些，老战士有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新战士是土改后自动参军保卫土改成果的。开诉苦会就是提高一班人的阶级觉悟的很好的办法。第四，实行奖励也要走群众路线。战士、干部立功都要奖励，并通过报功的办法，把部队同各方面都联系起来。在部队中工作的同志，应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带好部队，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

1947年9月　毛泽东在黄河边进行农村调查。中共中央进驻神泉堡之时，国民党已停止向解放区的进攻，往回收缩，形势变得对解放区缓和起来。毛泽东便分出一部分精力，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在黄河边几个村庄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为了制定正确的土改政策，毛泽东在调查中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剥削的程度；以及各阶级对土改的态度都作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毛泽东的这次调查，正是解放区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农民喜气洋洋。毛泽

东和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样的高兴。在调查时，毛泽东帮老乡推碾子，刨山药蛋，打谷子，唠家常，同老乡谈心。他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各种道理。例如；当谈到往地里施肥时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有人用呢?"老乡说："都说这个黑土上地壮，可就是用不习惯。"毛泽东说："你们试试么，你们是重实际的，亲眼看见了才信。你们试试之后，看到黑土能多打粮食就向大家宣传推广，好不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将来打败了国民党，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生产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肥料。一个窑洞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既有利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毛泽东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你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947 年 9 月　毛泽东论古代寺庙是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毛泽东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来到陕西葭县白云山下的南河底村，山上有座规模宏大的白云寺。当他听到有人说这些寺庙"都是一些迷信"时，连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参观这个大寺庙时对老和尚说："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但是要劳动。参加劳动后，身体好了，也不剥削人了，这就对了。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毛泽东又询问老和尚种多少地，打多少粮食，白云寺建于何时，扩修于何时，鼎盛时期有多少和尚等问题。寺庙很大，有 50 余座殿、堂、庑、阁。各式各样的佛祖、菩萨、金刚、力士，栩栩如生。毛泽东尤其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和牌匾感兴趣，看得很仔细，一字一字读。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

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他对陪同参观的葭县县长说：“请县里拨一些经费，把庙修一修。”

1947 年 9 月　毛泽东谈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搞不好。毛泽东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时到白云山赶庙会。毛泽东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去行善作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和习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有很大好处。”

1947 年 9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工委提出结合土改开展整党。在关于土地会议的精神给热河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土地会议决定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同时，在全国各解放区普遍整党，以便先肃清党政军民各机关阻碍平分土地的障碍物。原因是党政各机关及支部中有严重不纯洁状态，地主富农成份在干部中比例很大，并有流氓及蜕化分子，他们包庇地主富农，反对与批评农民运动，贪污果实，压制群众，严重妨碍与破坏土地改革，所以必须整党，首先是由上而下整，召开各级干部会，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查阶级，查思想，调换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及妨害土改的干部，并规定严格的纪律以便裁制一切反对与 阻碍土改的分子，只有如此，取得全党思想上组织上的一致，才能集中全力去团结与发动农民，以贫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实现平分土地。在平分土地后，再进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来改造与整顿党政，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

1947 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伟大号召提出四项要求。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向解放军发出伟大号召。他说，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你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

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他要求：（一）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二）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建设成为巩固区。（三）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四）我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1947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在为总部起草的训令中指出，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二、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三、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已提出部队对待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8 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 年夏，提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 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 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这些纪律，对于规范全体党员的言行，加强党的建设；对于优化社会道德风尚，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品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集中表现之一。

1947 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谈黄河。当中共中央驻在葭县神泉堡时，毛泽东在起草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后，专程到葭县县城看黄河。毛泽东为黄河的景致所陶醉，不禁叹道：“真美呵！”他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还无限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 5000 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机关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到华北。在船上，他对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子龙，给我照一张相吧！”“把陕

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在船上，毛泽东和同志们交谈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47 年 11 月 7 日　毛泽东论以自力更生精神能够依靠自己组成的力量打败敌人。他在修改胡乔木撰写的新华社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 30 周年》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 30 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

1947 年 11 月 12 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要求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新式富农应除外）。在土地改革中，应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人民代表会政权，在没有工业区及大城市的解放区，实际上主要是（在区村则完全是）农民代表政权，各级农会成立后，应使农会委员会（或主席团）成为各级代表会的常驻机关，应将代表会的工作当作自

己的主要工作。为了加强工人、雇农及人民的先进分子，在各级代表会的领导下，规定工厂、机关、军队、学校得派较多的代表，党应将最好的干部，经过人民出于自愿的委派到代表会去工作。应从思想上使这种代表会制度同各种办事机关的委员制分清。这种代表会最便于群众直接掌握与监督政权，反对官僚主义，最不利于官僚主义者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应积极在发动起来的群众中，放手创造与试验这种制度，注意收集经验，以便将来能正式规定解放区的政权制度。各级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而不应集中于委员会或群众大会。群众大会不能实行有系统的权力，委员会集中权力则容易变成一般官僚机关。由各级代表会委派各级政府委员会及其他办事机关，在代表会的协议与指令之下进行工作，各级政府委员会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也都在代表会通过或批准。村长、区长、县长等名称可照旧，其余的改称主任委员，区村公所改称区村政府。各级代表会代表，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各工厂各机关各部队，也应代表到相当的代表会，代表任期以一年为宜。各级代表会应经常集会，有事时召集特别会议。各级代表由各级农会主任当议长（或称主席），并由他召集开会。各级政府机关，应向代表会报告自己的一切工作，请求审查和批准。代表会对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武装等一切事项，均有权决议或否决，各政府机关必须完全遵守并执行代表会决议。代表会代表不称职者，得随时由选民撤回另派。各级政府委员会不称职者，得由代表会全部或个别撤换、审核。

1947 年 11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工委要求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在关于政权制度及城市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要求在一切群众业已充分发动的乡村和城市，由上而下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

并使之成为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人民代表会的整个系统，应在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禁止任何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及反对一切机关和新老干部的官僚化等等斗争中确实建立起来。首先成立县区人民代表会，然后召集省与全东北人民代表会，并需经常开会，由各级代表会的主席团自行召集，由各级政府向代表会作报告并提出各种议案，使代表会真正成为解决各种重要问题的权力机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政府委员会及代表会有权改变下级代表会的决议及解散下级代表会重新选举召集之。只有这种代表会系统建立起来，才能使各级政府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密切联系群众，并巩固各种纪律和制度。同时，在城市工作中，要加强工会工作及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东北局及各地负责人应经常到工厂中及工人大会、工人代表会去做报告和讲演，使党的各种政策和工作能首先取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1947 年 12 月 25——28 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于 12 月 25 日在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和他于 1946 年 4 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作出决定，认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 1947 年双十节各项文件（按指 1947 年 10 月 10 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教育，并

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这次会议还作出其他重要决定：（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二）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的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另外，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讨论的结果，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

1947年12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八个部分：（一）指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进一步论证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三）概括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彻底地土地制度的改革。（五）说明了整编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七）详细解说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八）在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

1947年12月25日　毛泽东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伟大意义。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

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1947 年 12 月 25 日　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他说，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1947 年 12 月 25 日　毛泽东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军事原则是：（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部、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连打几仗）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

获得喘息的时间。毛泽东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他说，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 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关于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 1958 年 6 月 23 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1947 年 12 月 25 日　毛泽东论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的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十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他说，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1937 年至 1947 年，11 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

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270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200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放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1947年12月25日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他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一）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三）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 这个总目标

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1947 年 12 月 25 日　毛泽东论陈独秀、王明的投降主义思想。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他说，在 1927 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失败。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告诫：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1947 年 12 月 25 日　毛泽东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

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1948年1月7日　中共中央要求建立报告制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1948年起，规定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办法。报告可以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其余问题留待下一次再着重写。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要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所以规定这次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仍有一些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

分明了他们重要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从1948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例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1948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内容包括：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1948年1月9日　毛泽东针对军队在高家堡破坏纪律问题作出指示。毛泽东指出，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方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的正当的营业税收关锐。没收敌军佐家属的财产，也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948年1月10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布告全体共产党员书。书中指出，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到12月中央局召开了全区土地会议，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和蜕化忘本思想，全体一

致衷心拥护并准备坚决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即将开始的全区复查土地改革彻底平分土地的运动中，要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遇事与农民商量，好好地与农民研究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领导全体农民起来实现这个大纲，达到农民的彻底翻身。书中还指出，两年多的边区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些地区搞得比较彻底，不少共产党员起了模范作用，和群众平等，走群众路线，不居功，不自傲，同群众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但不少地区还搞得不彻底，甚至还很不彻底。特别有不少党员作风不好，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服从群众的意见，强迫命令，独断专行，与人民为敌，脱离群众，人民对他们不满意。在今后复查土地改革平分土地的运动中，所有犯了上述错误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向群众承认错误，接受群众的批评，并且必须在行动中切实纠正。号召所有犯错误的党员和干部，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诚恳地接受批评，接受处分，坚决改正错误，贯彻平分土地的任务。中央局再次重申 1947 年 5 月决定，党员一律公开，由群众来审查鉴定。每个党员应该勇敢地来接受群众的审查鉴定，特别应虚心接受贫雇农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所有党员和干部多分或强占群众斗争的果实，应无条件地迅速地全部退还群众。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把党整顿好。此外，中央局还号召每个党员在今后贯彻复查土地改革平分土地运动中要做到：（一）坚决执行土地法大纲，不得有任何违反土地法大纲的言论和行动；（二）要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不得违抗，不得向党闹独立性；（三）要服从贫农团、农会及农代会的一切决议，不得违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当长工，不得向群众闹独立性；（四）在平分土地财务时，党员不得多分或强占；（五）党员不得包庇本

家本姓及其亲友，不得包庇军干烈属，党员犯罪应交人民法庭审判，各级领导机关不得因系党员加以包庇；（六）要爱惜土地斗争果实，爱惜公产公物，不得有任何破坏浪费行为；（七）全党团结农民，联系群众，不得对农民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不得挑拨农民内部团结，招是惹非，不得参加农民内部宗派斗争；（八）要紧紧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凡事要与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不得消极放任，不得强迫命令、代替包办；（九）要宣传土地法大纲，不得抱自由主义态度；（十）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得做假报告、假指示，阳奉阴违，两面态度。

1948 年 1 月 18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毛泽东根据 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杨家沟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文件提出：（一）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二）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三）关于政权问题；（四）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这一文件是对毛泽东 1947 年 12 月 25 日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对端正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各项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48 年 1 月 18 日　毛泽东论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

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她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分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认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1948年1月18日　毛泽东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

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1948年1月18日　毛泽东论对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

1948年1月18日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毛泽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他主张，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

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1948 年 1 月 18 日　毛泽东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总结党的经验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另一个条件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例如共产党要领导中农，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消灭地主武装，平分地主土地）。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虽有斗争而没有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再则，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例如占委员的 1/3）。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是如此。

1948 年 1 月 23 日　刘少奇致信薄一波等就土改整党问题提出意见。刘少奇认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

方式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希望在这种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以便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又，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故只在土地问题上常常不能组织广大群众队伍及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以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

1948 年 1 月 30 日　毛泽东要求在军队内部开展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他在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中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但是这种推选不是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

1948 年 2 月 5 日　周恩来论毛泽东的领导作风。他在一封党内信件中指出，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 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因为对每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

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这些人既是基本上好的，虽有严重而多的错误，我们只能在信任中抓紧，而不应置之不理，冷淡起来。否则，领导者自己就无法批评他们的错误，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们，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

1948 年 2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在通知中说，部队中实行了广泛的民主生活，经验证明，很有好处。这样对防止军阀主义，加强部队团结以及提高军事技术作用极大。通知充分肯定了有些部队为使民主生活更能够经过一定组织形式，当作制度建立起来，经常发挥作用，而组织起来的经常的士兵委员会的作法是好的。同时还指出，各部队均可在连队中普遍成立士兵委员会，并应将连队党的支部完全公开，使与士兵委员会的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支部开会应邀请士兵委员会的非党战士参加，保证他们在会议上对党员有自由批评与建议的权利，达到不仅确立士兵委员会的一定的民主生活，并在党内也建立一定的民主生活，使支部不脱离群众，使党员接受群众监督，保证党的领导正确和组织的纯洁。

1948 年 2 月 22 日　周恩来论结合土改进行整党。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在老区半老区，应准备以二年到三年时间（1948 年至 1950

年），有计划地完成全区域的土改与整党任务，而不应操之过急，以致发生许多不应有的毛病。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速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使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土地改革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但是在一切决定发动工作的地方，又要集中力量，按期完成工作计划，不要拖延太久，致使群众情绪减低，既碍生产，又不利于工作的推进。对于一切领导土改与整党工作的领导者及工作团，均必须加以训练，讲明政策，并要适时地检查他们的工作。各地整党工作中创造了许多方法。其中，以经过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采取这种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之感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组织与党的会议

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实行这种方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上级党的领导健全，一是本支部要有几个好的党员骨干。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罪恶、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当开除出党。对于那结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均应坚决清洗出党。对于那些虽然是从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时候，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并获得党外群众的同意，就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而不要马上开除出党。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

1948 年 2 月 27 日　毛泽东谈领导方法问题。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说到，在领导方法上应注意的问题。他说，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以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

是领导方法问题。

1948年2月27日　毛泽东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说，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1948年3月1日　毛泽东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党内指示中指出：（一）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

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二）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1948 年 3 月 7 日　毛泽东论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 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 90％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

1948年3月8日　周恩来论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及其经常化。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中指出，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的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可以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讨论；（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经验，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1948年3月20日　毛泽东论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偏

向。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说，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活，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48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央指出，为使中央充分明了情况起见，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必严格遵守外，兹规定：（一）凡对下级发出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何项问题，不论是用电报或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所做的政策或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的，亦须同时告知中央，文字较长的，可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向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话，各中央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

1948年4月1日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一）毛泽东对比了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势。他说，你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所实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工作，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二）毛泽东要求，在这种形势下面，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他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

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三）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他说，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对这条总路线从几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第一，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70%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第二，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

判这种思想。第三，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第四，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8%左右，人数10%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第五，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

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在新区，必须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第六，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第七，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党的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四）毛泽东指出要做一个完全的清醒的革命者。他说，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

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1948年4月2日　毛泽东提出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时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说，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

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他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1948年4月2日　毛泽东论对党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

1948年4月2日　毛泽东论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

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1948 年 4 月 25 日　邓小平论端正党员思想方法，认真进行整党。他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上作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中，批评了有些共产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遇到困难，就看不到光明和胜利，就悲观失望。他指出，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应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针对整党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它会使党丧失战斗力，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为克服这些现象，非整党不可，否则，党确实要腐朽。但整党要整得对，要教育同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全党要接受整党，谁也不能强调特殊。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只是轻重大小不同，人人都要反省，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

1948 年 5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指出，在干部问题上，反对忽视成份，也反对唯成份论。中央在关于革命军人成份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整军、整党三查运动中必须反对忽视成份的不严肃态度，

如在培养与提拔干部时，不特别注意与提拔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干部，又须反对唯成份论，如认为工农出身者一律都是好的，而不看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表现。

1948 年 5 月 25 日　毛泽东论如何开好干部会议。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在为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1948 年的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的议论，至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讨论政策的会议，人数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准备，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按情况，大约以十几个人，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开会一星期左右为适宜。传达政策的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不可过长。只有整

党性质的高级和中级的干部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可长些。毛泽东说，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

1948年5月25日　毛泽东要求坚决克服无纪律状态。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1948年5月25日　毛泽东指出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说，中央、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直到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不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失去作用，或者减少了作用。犯

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

1948年6月1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决定。决定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现在重印列宁的这一章著作，全党同志——特别是一切负责的同志们，必须认真阅读，并参看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为消灭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与适当的斗争。并相信全党干部一定能够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地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迎接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1948年6月5日　中共中央强调在宣传工作中要加强纪律性。中央在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中要求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

1948年6月6日　邓小平论切实整顿领导机关提高工作效能。他在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中强调，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某些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而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相当惊人程度。因此，应在

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全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1948 年 6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对晋绥整党工作发出指示。中央指出，由于党内存在着许多严重不纯的情况，而使整党成为巩固党的十分必要的步骤。如果不能整掉党内作风 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以及不能把党的成份弄得更加纯洁一些而任其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的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一切认为“整党是多余的”一类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但是问题的产生，不能只由下层组织来负责，上级领导机关是有重大责任的，而且主要地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本身的检查和自我批评，而且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成份、作风和思想的纯洁性。对于过去犯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而所犯错误又不十分严重的，就一般地不要去处罚他们，相反，坚持错误或重犯错误的，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或完全蜕化的分子，则要给予应有的处分。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要注意，不应该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有些党员和干部可能存有各种意见，要制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发泄牢骚。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同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人以反攻的帽子来抑制

党内民主。

1948 年 6 月 28 日　任弼时论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晋绥分局的电报中指出，党内存在着许多严重不纯的情况，因此整党成为巩固党的十分必要的步骤。如果不能整掉党内由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以及不能把党的成份弄得更加纯洁一些，则我们的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一切认为“整党是多余的”一类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份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之产生，不能只由下层组织来负责，上级领导机关是有重大责任的，而且主要地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由于对农村党员疏于教育，对其缺点疏于防范，在农村党的建设工作方面就有某些严重的缺点。因而，对于过去犯了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而所犯错误又不十分严重者，就一般地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去处罚他们。只有对于那些不肯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坚持错误的分子，或者只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以后又重犯同类性质错误的分子，以及钻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和完全蜕化了的分子，才应该无所顾惜地给以应得的处分，直至开除出党。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目的。

1948 年 6 月　毛泽东给警卫战士题字：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他对警卫排长阎长林说：“现在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

发展，就会落后了。我圈的这 14 个人，要送他们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学习回 来以后，再把你们 6 个人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毛泽东为去学习的战士合影送行，并在他们的学习本上题字：“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毛泽东和去学习的同志一起午餐时跟大家说：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咱们在一起多年，你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也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人才了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你们现在才 20 多岁，最大的也只有 30 岁左右吧。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会交给你们重担子挑的，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的怎样了。路子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成为党的好干部。

1948 年 8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央指出，自中央发动党内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反对把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和所指挥的军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的危险倾向以来，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兵团首长开始遵守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但在军队中，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并没有完全消失。要求一切兵团及军区负责同志，在战争第三年内，必须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此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有分析有结论，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

1948 年 9 月 8 日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

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各方面的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会议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在5年左右时间内，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7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一伟大战略任务。要求各战略区在解放战争的第3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为了加强中央对各地区、各部队党委集中统一的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必要前提，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党的集中领导。

1948年9月13日　任弼时论必须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的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大革命时纪律性强些，派工作是毫不讲价钱的。纪律之无条件即是不讲价钱，而不是讲纪律之养成，纪律之养成必须有条件。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500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此外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对于民主问题，在直接作战的区域，需要在块块内集中，过去强调一元化是对的，而且在这种地方，强制命令的范围

也是大些的，但这种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干部会的长处是办事迅速方便。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有了批评自我批评，而且是真正的，小广播就没有了。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大会上自由结组讨论是一种好的形式。所谓打破开会的封建秩序。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党的组织发展与整顿问题，在城市中，今后发展党应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农民中发展主要是在新区，而且要加强领导机关中的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的工作。农村中整党可以结合着其他的中心工作来进行，如在生产运动中整党。思想教育必须与执行纪律相结合。有些犯错误的党员不处分，党就要脱离群众，即使是已承认错误者，仍然是要处分。党内缺乏基层组织生活，应加强组织部。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中央机构必须加强，而且准备过渡到建立中央政府。

1948 年 9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起见，中央就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规定。并要求根据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和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

1948 年 9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革命理论和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27 年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也指出由于战争环境，到处在地下状况，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在政府工作中的民主生活的不足，已使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产生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在展开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又常常发生极端民主或无政府现象。使得党内某些错误的主张和不正派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和无纪律状态，暗中流传和滋长，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许多损失。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和政府有可能和有必要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关于扩大和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中央决议：（一）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级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会议去代替，而必须按期召开。（二）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三）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四）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并须报告中央。（五）各级党委会召集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六）健全党委制，是良好地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各级党委，首先是地方地委以上、军队师党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均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而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

1948 年 9 月 20 日　毛泽东提出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的要求。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党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 1956 年 9 月 1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

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这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1948 年 10 月 2 日　刘少奇论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他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我们到处要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这种联系。

1948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其中指出，我党党员由 1945 年 5 月的 120 万增加到了现在的 300 万。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大规模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左”倾错误。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有领导的、由全体指战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 1927 年至 1932 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同时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

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样为他们发挥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长期的严重困难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弊端，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度到正规战争的形式。为夺取全国政权，也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而且，必须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中央会议已通过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

1948 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为即将复刊的《中国青年》题词。题词原文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948 年 11 月 9 日　张闻天强调要大量提拔和培养新干部。他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主持起草的社论中提出，要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随着全东北的解放，许多巨大的新的任务，尤其是经济建设任务提到东北党面前。干部缺乏的困难也就出现了。只有大量地提拔与培养新干部，才是解决干部困难问题的主要方法。但仍提起老同志注意的是对新干部必须在工作中进行耐心的教育工作，既要奖励他们工作中的成绩优点，又要指出其缺点错误，并告诉他们如何发扬成绩优点，如何纠正错误缺点。应该克服一切忽视与轻视新干部、不敢提拔新干部的偏向，给新干部以学习的机会。同时，根据东北局决定，在各省县市大规模地开办党校、训练班、专门学校，大批地培养新干部，把他们提高一步，使他们能担负更多的工作。

1948 年 12 月 14 日　刘少奇强调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他在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或多或少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读书不要依赖别人，那是懒汉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

1948 年 12 月 21 日　中共中央要求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区的大城市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1948 年 12 月 30 日　毛泽东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动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

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1948 年 12 月 30 日　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的问题。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

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8 年 12 月 30 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提醒全国人民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他说，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士兵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1948 年 12 月 30 日　毛泽东论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

敌人的。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毛泽东说，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1948 年 12 月　中共中央提出克服经验主义的主要办法。中央在给东北局建党工作的指示中，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很大数目的干部有相当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但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不能与党中央的领导水准相适应。克服经验主义的主要办法：第一是领导各级干部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学习理论，使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理论的启示下，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来组织与领导这种学习。其中关键是高级干部自己的学习和抓紧对学习的领导。第二是抓紧建立定期的请示报告制度。在各级组织中，依靠党委的集体领导，来建立起经常地精心研究与总结工作的习惯，并且经常地不断地通过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路线，使各种实际经

验，在上级指导和帮助下，逐渐系统化上升为理论。同时还强调，在思想上迅速地掌握新情况、新任务，迅速地改变党内许多不适合于新情况新任务的旧思想、旧作风，学习新思想与新作风。但对旧思想、旧作风应加以正确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加以否定过去的一切。

1949 年 1 月 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的决议。其中指出，1949 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主要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同时，必须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 1948 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1949 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完成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1949 年在干部学校及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干部教育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 1949 年 3 月底以前办理完

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4月份交来中央。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必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1949年1月14日　毛泽东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他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

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949 年 2 月 1 日　毛泽东论北平和平解放的基本原因及其意义。他在修改胡乔木撰写的新华社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北平的和平解放》时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 1 月 22 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 1 月 13 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29 个钟头内 10 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匪首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 15 日攻克天津，16 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周北峰将军成立了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 1 月 8 日由张东荪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1 月 19 日北平人民的 11 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 41 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畅谈和欢宴。代表中的一个是前

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壁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22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内国民党CC系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壁这一类，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所反对。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最近20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20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

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1949 年 2 月 8 日　毛泽东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他在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 20 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同时，乡村工作，也是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

1949 年 2 月 8 日　毛泽东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他在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准备 5.3 万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

个学校，2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1949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提出在新解放地区吸收党员应注意的事项。中央在给港分局并刘晓、钱英、沪局的指示中，要求通知其所属严格遵守1月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关于发展党的组织作出的规定，即“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必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必须警惕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企图混入党组织。在城市中尤其大城市中，宁肯在吸收党员时对上层知识分子暂时关门（对个别要求加入者，可鼓励其先努力工作），在已有基础的地方如上海等地，一般发展也可从缓，以待解放后再说。但在工人及学生中，则应采取多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的方针。

（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

1949年3月5日—1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缺席者20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一）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二）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三）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分析了

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四）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 6 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于 3 月 13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认为自党的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 1945 年 6 月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同日，全会还通过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全会还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3 月 23 日，全会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一）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党和人民就将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二）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

问题上，既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三)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1949年3月5日　毛泽东提出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鉴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党将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的党，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已经紧迫地提到党的日程上。适应这种形势，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其要点为：

(一)党在全国执政后关于解决干部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毛泽东提出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他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人民解放军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503万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开展了。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二)执政党的建设要能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说，从1927年到现在，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提出应注意的事项：第一，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第二，城乡必须兼顾，必

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第三，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第四，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他告诫全党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须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第五，在城市斗争中的依靠力量问题。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第六，在城市的建设事业中，要把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他说，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党

员、干部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党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三）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新中国。为此，毛泽东提出，就要着力进行经济建设。这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戒“左”戒“右”。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已在革命根据地内执政，把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毛泽东认为应当这样的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 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中国共

产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党当前的任务。毛泽东从七个方面作了论证，指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进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并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四）执政党必须有正确的对外政策。毛泽东提出的对外政策的要点有：第一，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党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第二，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党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认为，在做了以上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第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被彻底摧毁以

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党组织群众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第四，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第五，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新中国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第六，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新中国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五）执政党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并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同时，党的方针是不拒绝同南京政府及其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党既然允许谈判，毛泽东提出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党在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党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毛泽东告诫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同时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六）执政党要千方百计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为此，就要明确政权的领导力量、基础力量和团结对象。毛泽东提出，第一，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党去认

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第二，同时也要求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党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1947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七）执政党要用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来巩固胜利，就要首先把党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作为胜利的党，事实已经证明，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但是党能不能领导人民把国家建设好，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就党内情况来说，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毛泽东首先向全党展示了今后更加伟大艰巨的革命路程。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去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认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的。他强调，执政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执政党要更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只要如此，就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执政党要善于学习，要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执政以后，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新

中国建设得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更好些。

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着重强调了加强党委会的建设，阐明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要把党委会这个班带好是不容易的。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这同部队上班长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三）“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的干部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党的干部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会“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

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人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

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会议为此专门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住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执政的党，要把党的领导工作做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1949 年 3 月 13 日　任弼时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

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开始工业化，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全国革命胜利后，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城市，努力发展工业，首先是国营工业，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同时，任弼时还指出，在战争结束后，军队大部分复员了，脱离生产由公家养活的人员应当精简，不能如国民党那样多，他们有1200万人的话，我们最好争取在800万。要提倡节约，战争结束后，要全部实行薪金制，而且薪水不能比国民党时高。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10年之后，我们才能喘过气来，才能有将来真正丰衣足食的基础。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也应当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我们要依靠工人，发动工人，就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吸收时仍应经过严格审查，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发展工作。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还应当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

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要只忙于登记干部、转发介绍信，而对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很少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1949年3月　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决不当李自成。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要进城了，要做好准备时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向北平前进。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行，从涿州换乘火车，驰向北平。毛泽东回忆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949年4月12日　任弼时论建设新社会问题。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虽然接近于全国的胜利——这也还要不骄不躁地认真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完成——然而要使中国达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则还需我们极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一切以为革命快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

康的。要知道建设比破坏要艰难多少倍。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约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只有这样，再努力十年到十五年，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是最终地巩固起来了，那时我们有可能和人民一道，过着更加充裕更加文明的生活。我们的前面还有如此艰巨的任务，而旧社会交给我们的遗产又是如此贫乏与落后。虽然如此，我们绝不能因此发生任何的悲观。在具有如此勇敢、如此勤劳的四万万几千万人民力量的基础之上，有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加上苏联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我们有根据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比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会要更为迅速的。

1949 年 5 月 7 日　周恩来提出学习毛泽东。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向青年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要求。他说，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丰富的内容的。学习毛泽东，首先是因为我们能够向他学习，毛主席的成长也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其次，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是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我们要学习他坚持原则之中的两点：一是坚持方向；二是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他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

毛主席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还要学习他的学习态度，即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他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难免会碰钉子，但不要气馁，也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人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勇敢地前进。

1949 年 5 月 10 日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青年努力从事生产和学习。在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动与今后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中指出，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重要任务，青年无论在什么生产岗位上都要采取积极态度，向着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向努力。青年应当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节衣缩食，以便积累经济建设所必须的资本。同时，为适应时代的需要，青年必须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一切爱国青年都应当努力学习新中国的创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忠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原则精神，学习毛泽东的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1949 年 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中央要求进入江南各省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必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

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三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同时具体规定12项纪律。（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的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的违抗。（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的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相待。（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及乘坐电汽车，必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其要除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公共建筑，必须爱护家俱设备。（八）军队的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的，可在将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城郊外择地关喂。（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须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必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谈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他说，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谈新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他指出，中国人民将

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6 月 30 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部著作：（一）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二）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三）阐述了人类进步的远景；（四）论述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五）澄清了当时人们认识不清的一些问题；（六）号召全党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努力学习。这部著作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49 年 6 月 30 日　毛泽东论人类进步的远景。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1949 年 7 月 1 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

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论先进的中国人士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列宁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

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他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

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实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论中国人民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28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28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

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都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毛泽东说，孙中山死去24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

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号召全党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做一个既会革命又会建设的党。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要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1949年7月4日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接见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的学员。毛泽东向学员指出，你们记住，无论做什么，要有个目的。没有目的前途，乱来是不行的。他说，中国革命历史上

有很多次，拿洪秀全来说，他们就要搞个太平天国，他们的“太平”，意思就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不打仗的“天国”，不是旧国，世界大同，同天上一样。但是他们不能成功。只有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和你们及广大群众在一起，共同斗争才行。他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之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1949 年 7 月 31 日　新华社论人民解放军力量的总根源。在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22 周年之际，新华社发表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的总的根源是人民。它具有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第二，它是有思想的同时也是有崇高理想的军队。这个军队贯穿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贯穿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这个军队的成份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它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有高度集中纪律的军队。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他们都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自己的高度战斗力。这三个特点是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领导所达到的结果。同时社论还指出，我们克服困难，仍然依靠中国人民伟大的战斗英雄主义，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智慧。为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三）在此基础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

1949 年 8 月 12 日——9 月 16 日　新华社连续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信的六篇文章。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评论文章是：《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其中，第一篇为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后五篇为毛泽东撰写。

1949 年 8 月 14 日　毛泽东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精神条件。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自从 1840 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1931 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1937 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 50％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 109 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和不流血的经

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1949 年 8 月 14 日　毛泽东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1949 年 8 月 14 日　毛泽东号召要用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说，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

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毛泽东说，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1949 年 8 月 18 日　毛泽东论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

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9 年 9 月 16 日　毛泽东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生大的作用。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 20 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的这个话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次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

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1949 年 9 月 21 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指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他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永远是胜利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的条件是

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七. 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

1949 年 10 月 1 日　邓小平在新中国建立之日，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1949 年 10 月 26 日　毛泽东致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信。他在信中称：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 1936 年到 1948 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 年 11 月 8 日　陈云强调新老干部要团结。他在欢迎东北考察团归来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新老干部要团结。他说，老同志对原在国民党区工作的技术人员应采取信任的态度，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应该改变。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愿意改造思想的，有许多人将来还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应该使用他们，不能搞关门主义。老同志必须信任新同志，放

手让他们工作，同时帮助他们克服弱点。新同志要尊重老同志，教老同志文化和技术。只有双方都明白了这个道理，认识靠拢了，才能更好地合作。

1949 年 12 月 5 日　毛泽东号召军队参加生产建设。他在签署的军委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和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 1950 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

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此外，为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指示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各军区，发出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发表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你们看到后应即加以研究，就自己管辖范围内使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地适当地实施起来，注意避免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时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前线和后方，区分具备了参加生产的条件的部队和机关与目前尚未具备此项条件的部队和机关，考虑地方条件和资金条件，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获得改善，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后　记

《毛泽东和延安时代》一书，是“毛泽东在延安”丛书之一。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马文瑞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并为本书写了序言，得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全体作者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组织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延安大学、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编写的，由黄士安、赵广、王延湜主编，参加编写的有黄士安、赵广、王延湜、刘友于、唐广发、刘文军、史金龙、苏作霖、林海、朱信泉、陈治赵、郑生寿、任学岭、高尚斌、阎树声、米世同、刘煜、刘凤梅、黄建平。

毛泽东和延安时代这一党的历史上的重大科研课题，对我们来说，只是刚刚开始探讨。这部书的出版，希望得到更多的革命前辈、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指导、批评和帮助。